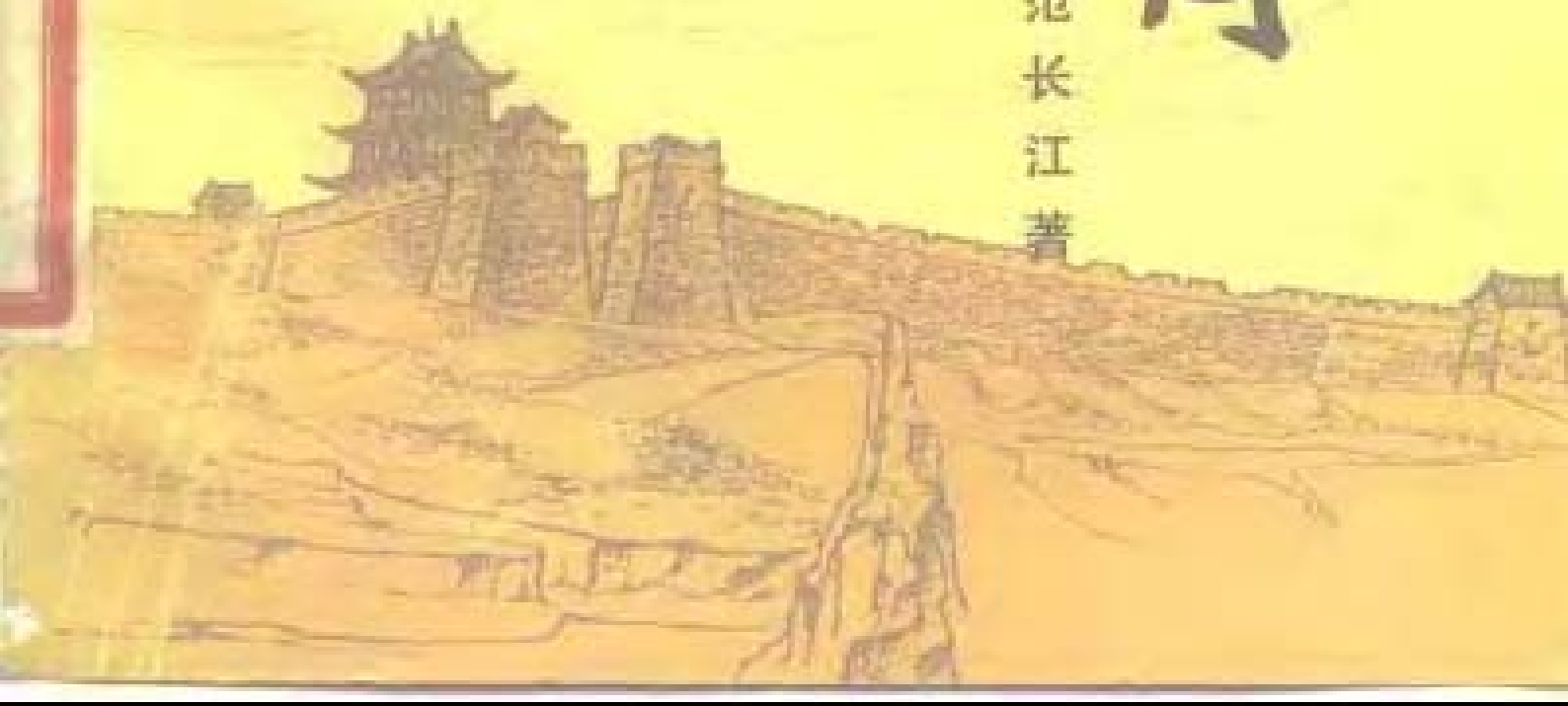


# 中國的西北角

范长江著



I253/16

# 中国的西北角

---

范长江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9793



新华出版社

769793

# 中国的西北角

范长江 著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新华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70,000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5月重庆第1次印刷  
书号：10203·011 定价：0.90元



袁 江

一九〇九——一九七〇

## 编 辑 前 言

范长江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是无产阶级新闻战线上的杰出战士。他于一九七〇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为了整理中国新闻事业的史料，为了纪念范长江同志，我们在他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搜集、整理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一部《范长江新闻文集》。这本《中国的西北角》是其中的一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深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经开始；国民党对外卖国投降，对内妄图以连续不断的“围剿”消灭工农红军，使祖国面临亡国的危险、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正在读书求学的范长江同志，怀抱着救亡图存、探索真理的志愿，曾经迢迢数千里，从北平到南昌，秘密地阅读和研究关于工农红军和苏区的制度与政策的小册子；也曾经长途跋涉，到抗日前线的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了解当时国民党和地方当局以及军队中政治腐败、士气低落的情况。而在中国工农红军开始进行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年仅二十六岁的范长江，为了深入了解红军北上抗日对于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以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西北地区的现状和未来，他走出书斋，离开学校，进行实际考

察。他以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到川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广大西北地区去采访，他的足迹越过祁连山，绕过贺兰山，北至包头，西达敦煌，全程四千里，历时十个月。他将旅途通讯陆续寄到大公报发表。由于他第一次公开如实地报道了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揭开了当时神秘西北的黑暗和危机，他的通讯引起了全国的震动。

当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由于国民党对真实情况紧密封锁，范长江同志又冒险只身进入西安，以后又到延安，了解事变真相，并迅速报道出去。他在通讯中，报道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会见他时所作的长时间谈话的内容；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从而使党的声音，光明的信息，公开地传给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重视和欢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长江同志冒着敌人的炮火，到前线去。他到芦沟桥、南口前线，到西北、华中、东南等地战场，奔波不息，辗转万里，写下了许多革命人民前赴后继的可歌可泣的篇章，揭露了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的腐朽和无能。从此，范长江的通讯，脍炙人口，中外注目。我们在编辑范长江同志的新闻文集时，除了将过去已经汇编成书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西线风云》中的文章，加以校订以外，并且广泛搜集了他当时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对新闻工作的意见、讲话、论著、总结等。这些都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宝贵史料。

范长江同志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有着强烈正义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新闻记者，变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位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领导者，他是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的。他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和

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当他一旦接受了革命真理，就勇往直前，为之奋斗终生。他的新闻通讯和其他文章，如同他本人的性格一样，具有鲜明的特点，洋溢着他努力追求革命真理、勇于考察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和不畏艰险、果敢坚定的革命风格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长江同志写作这些通讯和文章，距今已三、四十年了，由于受当时思想认识和时代条件的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也正可以看出他奋斗前进的过程。解放以后，许多同志多次提议长江同志将这些著作重新出版，都被他拒绝了。有的同志曾经建议修改后出版，他也不同意。他说：“修改后就不是原来的面貌，也不合乎历史的真实性。错了就错了，不必乔装打扮，借此骗人。”这是多么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的高贵品质！

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八年秋天，对参加华北记者团会议的记者，谈到范长江的新闻通讯。他说：长江同志过去在白区当记者，写了很多报道，是全国有名的记者。但他的报道并不全都是正确的。同志们要知道，在国民党统治的条件下，有百分之七、八十甚至百分之六十真理挤出去也不容易呀！……这是少奇同志对长江同志的正确评价；也是对长江的通讯报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我们在搜集、整理、编辑过程中，承蒙长江同志的夫人沈谱同志和其他家属成员，长江同志生前战友，以及新闻界、出版界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深深表示谢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一九八〇年三月

## 序 言

许多在三十年代生活过的朋友们现在还常常向我谈起《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当时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本书在发行以后的短短几个月中，曾连续印刷了七版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长江后来在他的《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讲过，他当年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他感到这是当时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两个重大问题。因此他不畏艰险地开始了这次采访旅行。

他的新闻通讯在《大公报》连续发表，描绘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北地区的黑暗、腐朽、愚昧和贫困的现状。对于那里经济的雕敝、民族的压迫、宗教的纠纷、军阀的争夺和日益深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无不予以入木三分的揭露。这些通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促使广大读者深入地思索民族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特别是他第一个公开报道了正在进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打破了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增进了广大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他努力用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来使读者了解事实真相。

在本书中，长江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



想。坚持这种进步的思想倾向，努力追求真理和光明，使他终于从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获得机会直接接触中国共产党，并聆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诲，他的政治立场开始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长江在世时常常用严格的标准谈论自己当时的作品，认为自己的认识水平很不够，感到自己没能更早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很大的遗憾。如果今天长江还活着，他不会同意本书重版。然而我想，这本书对于研究近代历史和新闻史的同志们或许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对于其他对本书有兴趣的读者也许会有所裨益，所以在新闻界、出版界同志们的敦促之下，我同意将本书重版了。这也是对长江的纪念吧。

对原版本比较明显的文字上的错漏，我作了必要的校正。

本书重版承蒙新闻界、出版界同志和朋友们的大力协助，我在此深致谢意。

沈 谱

一九八〇年三月

## 第四版自序

本报(指《大公报》——编者)出版部朋友来信告诉记者,本书正赶印第四版。记者在绥远前线工作,深觉有许多朋友,对于我们西北一角在当前解放战争中的战略情形,缺乏正确了解,往往中了对方虚伪理由的毒害。所以借此出版的机会,提出驳见,和读者诸君商酌。

察、绥、宁、甘、青、新六省,除新疆而外,其余五省,就目前现状而论,经济价值甚微,比平津及沿江沿海一带,肥瘦之差,直不可以道里计。然而日本关东军却以非常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不断由东北以伸向西北,不惜重大的牺牲,在内蒙古草原与沙漠中,作凶猛的经营。东北之后,继以热河;热河之后,继以察北,近更不惜作武装夺取绥远的冒险行动。

日方对外宣传,其所以企图占领西北一线,为“防止赤化之南侵”。换言之,即为“围困苏联”,以救中国于厄运。自表面言之,日本之侵略西北,乃“防共”之手段,而非目的,似为尚可原谅之动机。最近某地学生救国联合会拟就宣言一篇,其中认识深受此种不真实宣传之影响。认为日本之攻绥,目的在包圍外蒙古,进攻苏联。

记者以为中国人必须根本认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

们中国。其“防苏”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为苏联在亚洲的领土，深深威胁着日本在大陆上进攻中国的大路。故日本欲求安全地进攻中国，不得不对东部西伯利亚和外蒙古加以武装控制，甚至想掠为己有，此其一；其次，日本无已止地进攻中国，势必迫中国以求国际援助，英美受地理条件限制，所能给予中国之助力有限，但万一中国自西北以联合苏联，则军事上立即可起非常变化。故日本必先在陆路上截断中苏联合的纽带，即所谓大陆封锁政策。

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

记者希望大家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

长 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于绥远

# 范长江同志小传

## 东 辑

范长江同志，原名范希天，一九〇九年十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赵家坝村。少年时代的家庭是没落地主。他的母亲以个人手工劳动的收入供给他读书。他先后在内江中学和四川省六中上初中和高中，学习期间，成绩优异。由于受到大革命时代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他以高度的热情，参加了当时国民革命的一些宣传工作。

一九二七年年初，他转入吴玉章同志所办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入校不久，重庆发生四川军阀制造的“三·三一”惨案。学校被封，革命学生尸体枕藉街头。他从血腥屠杀中脱身之后，抱定参加革命的决心，离开家乡，乘船前往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在武汉加入二十军的学生营，随军进入南昌。部队编入贺龙为军长的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学生营在潮州被打散，他在汕头寻找主力部队未果，遂流落于广州、福建、江西、安徽一带，以讨饭为生，后重病几死。为糊口计，他又入军队医院当看护兵。

长江同志当时虽然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但还没有具备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为了生活和进一步学习，他考入了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选学乡村行政系。当时他希望

以著名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的精神为模本，走出一条救国救民的路来。然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危机愈益加深，国民党的统治日趋反动，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这一切使他逐步感觉到，他所受的教育绝不能回答他所关心的民族命运和人民前途的大问题。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全国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中央政校校方奉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意旨，对此无动于衷。长江同志在一个晚上军训点名以后，站了起来，对数百同学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愤怒斥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要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感动得许多同学放声大哭。此后，他积极担任了学校学生抗日运动的领导工作。但是不久，在校方软硬兼施之下，学生运动却被压制下去了。这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卖国贼的丑恶面目。他决定脱离中央政治学校。利用一个星期日，他换掉制服，秘密潜逃。

一九三一年底，他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北平。为了探求真理，继续学习，他在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工读生活之后，于一九三二年夏秋际进入北大哲学系。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侵占山海关。他强烈地意识到，脱离实际钻故纸堆是无法解救空前的民族危机的。从此，他全力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实际斗争。他曾参加“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的活动，出发到热河省凌源一带。回北平以后，又参与发起组织北大学生长城抗战慰问团，到长城各口慰劳抗日军队。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他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益世报》投稿，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新闻。这是他投身新闻事业的开端。一年之后，他成为《大公报》的撰稿人。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致力于抗日军事问题的研究。

一九三五年七月，他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从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查旅行。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专横的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为一般外界民众所了解。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成为他当时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另外他那时认为，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以后，西北地区将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而荒僻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却很少为人所知。为了向广大读者解答这些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他以惊人的勇气踏上了旅程。这次考查旅行，西达敦煌，北至包头，全程四千余里，历时十个月，足迹及于川、陕、青、甘、内蒙等广大地区。他的旅行游记陆续在《大公报》发表，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他的游记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于增进人们对红军的正确了解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游记中对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作了淋漓尽致的披露。他的报道谈古论今，意趣横生，涉及宗教、民族关系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其中引人入胜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议论，广博充实的知识，以及处处表现出来的正直高尚的民族民主主义精神，获得广大读者的称颂。这些游记以后汇集出版，就是《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几个月内连出七版，一时脍炙人口。

这次旅行结束以后，他回到天津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

一九三六年八月，为了解日本帝国主义覬覦内蒙西部的实况，他长途跋涉深入额济纳旗，后骑骆驼穿行千里戈壁返抵阿拉善旗。

绥远抗战期间，他担任战地采访工作，从百灵庙和红格尔图一带抗日前线写出很多通讯。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为了揭示事实真相，澄清社会舆论，以利于促成团结、民主、全面抗战的政治局面，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从宁夏飞抵兰州，又由兰州进入举世瞩目的事变中心西安。在那里他经过杨虎城找到周恩来同志，并作了竟日之谈。二月六日，他在博古和罗瑞卿同志陪同下，驱车前往延安。二月九日夜晚，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与他作了通宵的谈话，讲解了十年内战的经过，并详细地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除美国记者斯诺而外，他是以正式新闻记者名义进入延安的一个人。他所写的《陕北之行》，打破了蒋介石的新闻封锁，以极大的热情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介绍了我党的著名领袖人物，宣传了我党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主张，对全国各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这些报道使蒋介石恼羞成怒。长江同志的信件也开始被检查。

他的自西蒙之行以来的通讯后来汇集成册，题名《塞上行》。

在斗争的风浪中，长江同志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救星，他和党的关系密切起来。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以后，他奔赴抗日前线采访新闻。在枪林弹雨之中，写出大量通讯。

一九三八年三月，他与徐迈进、陈同生、恽逸群等同志在汉口共同发起创办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在党的支持、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青记”成为团结抗日的进步青年记者的中心。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弃守前夕，他因与《大公报》张季鸾、胡政之之流的政治观点分歧已达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公开

宣布脱离《大公报》。随即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他与胡愈之、孟秋江等同志创办国际新闻社。一九三九年初，在抗日文化中心桂林建立了国际新闻社总社。

同年五月，长江同志在重庆由周恩来等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从此以后，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与敌人展开复杂激烈的斗争。

他参与领导的“国新社”和“青记”的抗日新闻工作，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利用合法地位，与《新华日报》互相配合，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网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国新社”发出的新闻稿报道了抗日战争的真相，宣传了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长江同志与沈钧儒的女儿沈谱同志在重庆结婚。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青记”和“国新社”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蒋介石下令逮捕长江同志。他得到李克农同志通知后，立即撤退到香港。到香港后，即在廖承志同志领导下，办我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并兼顾香港“国新社”的工作（当时香港“国新社”是恽逸群同志负责）。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记”和“国新社”随后也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停止活动”。一九四一年年底，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长江同志辗转桂林、武汉、上海等地，最后到达苏北解放区。在解放区他担任了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

抗战胜利以后，一九四六年五月间，他从苏北到南京，参加了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进行谈判时，他是中共代表团对外发言人之一。



解放战争期间，他始终跟随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担任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四大队队长，及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

全国解放初期，他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一九五二年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一九五四年第一届“人大”以后，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他为创造和发展新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六年，党和政府派长江同志到科技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参与制订了十二年规划的组织工作，组织和参加了科学界历次重要会议。在主持全国科协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他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事业，努力学习自己原来不熟悉的东西，成为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卓有成效的领导干部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疯狂打击迫害革命老干部，范长江同志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摧残。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范长江同志在河南确山被迫害致死。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 目 录

## 第一篇 成兰纪行

- |                    |       |
|--------------------|-------|
| 一、成都出发之前·····      | ( 1 ) |
| 二、成都江油间·····       | ( 4 ) |
| 三、“苏先生”和“古江油”····· | ( 7 ) |
| 四、平武谷地中·····       | (12)  |
| 五、过大雪山·····        | (16)  |
| 六、松潘与汉藏关系·····     | (22)  |
| 七、金矿饿殍与藏人社会·····   | (25)  |
| 八、白水江上源·····       | (29)  |
| 九、野猪关和茶岗岭·····     | (33)  |
| 十、岷河沿岸·····        | (38)  |
| 十一、洮河上游·····       | (41)  |
| 十二、杨土司与西道堂·····    | (45)  |
| 十三、行纯藏人区域中·····    | (49)  |
| 十四、大夏河回藏两要地·····   | (53)  |

## 第二篇 陕甘形势片断

- |             |      |
|-------------|------|
| 一、长安剪影····· | (57) |
|-------------|------|

二、兰州印象·····	(59)
三、对于西兰公路之观感·····	(62)
四、陕北甘东边境上·····	(67)
五、渭水上游·····	(73)

### 第三篇 祁连山南的旅行

一、兰州永登间·····	(80)
二、庄浪河至大通河·····	(83)
三、到了西宁·····	(85)
四、马步芳的政治作业（上）·····	(88)
五、马步芳的政治作业（下）·····	(91)
六、动荡中的青海·····	(94)
七、班禅在塔尔寺·····	(97)
八、回教过年·····	(100)
九、西宁至新城·····	(103)
十、过大板山·····	(106)
十一、浩门河上游·····	(109)
十二、祁连山中·····	(112)
十三、走出祁连山·····	(115)

### 第四篇 祁连山北的旅行

一、“金”张掖的破产·····	(118)
二、张掖的破产，是人懒的过？·····	(121)
三、弱水南岸的风光（一）·····	(124)

四、弱水南岸的风光（二）	（127）
五、弱水南岸的风光（三）	（130）
六、策马望酒泉	（133）
七、酒泉走向地狱中	（137）
八、嘉峪关头	（141）
九、玉门安西间	（144）
十、塞外桃源的敦煌	（148）
十一、敦煌返张掖	（153）
十二、到古意盎然的凉州	（157）
十三、武威现状不乐观	（161）

## 第五篇 贺兰山的四边

一、再会吧！兰州	（166）
二、过大峡	（169）
三、红山峡和黑山峡	（172）
四、路过中卫	（175）
五、宁夏地理特性	（178）
六、西夏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教训	（180）
七、宁夏民生的痛苦	（184）
八、宁夏的纸币、鸦片与宗教	（187）
九、宁夏赴青铜峡	（189）
十、飘羊皮筏到金积	（192）
十一、灵武城中忆当年	（195）
十二、河工与屯垦	（198）
十三、踏破了贺兰山缺	（201）

十四、满洲人的治蒙政策.....	(204)
十五、平罗南北.....	(207)
十六、石嘴山外.....	(209)
十七、磴口和宁阿之争.....	(212)
十八、三圣宫天主堂.....	(214)
十九、临河、五原到包头.....	(217)

# 第一篇 成兰纪行

## 一、成都出发之前

人事的变化，往往非始料所及。记者入川以后，本来打算先作环川旅行，然后入西康。但是到了成都以后，因为朋友的方便，得了一个由成都经松潘北上兰州的旅行机会，这条路在平时亦是不易通行的去处，尤其在目前军事紧张时期。有人说：机会是一个美丽姑娘，只是她的头发披在前面，如果不趁她对面来时，当面把她抓着，她一过去，事后苦苦思念，也无济于事了。记者因为爱惜这个机会，所以放弃了过去准备，决定和朋友们先行到兰州。

到兰州的同伴，一时还动不了身，而成都的社会，又叫人难于应酬，所以趁一个空，先到成都外面去看看。

七月初旬，正是成都平原的热季。记者一个人带上非常简单的行李，出了北门，向新都出发。这条路是川北大路的起点，而且又密迩省会，观瞻所在，自然是“飭沿途居民，勤加培修”。所以虽然是一条小沟一条小沟的，在路面上交错着，织成各种的花纹，然而远远看去，总是还象一条公路。黄包车走在上面，尽管如酸秀才哼“古文观止”一样，左右摆头，只要小心谨慎的坐着，头碰车篷的次数总可以少些。成都到新都四十里，两旁碉堡林立，主碉大体皆用砖和洋灰筑成，雄据山头，颇为壮观，任何

军队如果要想通过这条碉堡线，殊非易事。记者曾亲历热河战争和长城战争，如果当时也筑了这样严密的工事，则敌人当然不能长驱直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从容应付，不至一败涂地，造成那样可耻而奇重的牺牲了。

在北方乡村旅行，所见是一片黄土，只有一丛丛的柳树，才点缀着相当的绿色。然而成都平原上是无边的青翠，只有农家村落的土墙才能看出稀零的黄土。鲜红的太阳斜挂在东方，三三五五的庄稼男女，背荷着他们几月辛苦得来米谷和蔬菜，汇集到大路上，向城里进发。看他们劳苦和兴奋的面庞上，似乎他们的农产品卖去以后，所得的代价，就可以偿还他们的债务，付清了税捐，乃至开支了日常的家庭用度，过他们的清闲日子。他们哪里知道，在现在中国经济情势下面，他们的生活，只有一天一天的低落下去，绝无改善之可能！照通常情形来说，都市工业是剥削农村的。第一，都市工业破坏了农村手工业，使农民减少副业收入。第二，工业以低价收买原料和粮食，而以较高价格出卖工业品，这是农村与都市剪刀形的发展。特别在中国，国民经济以殖民地为基本性质。工业的中心，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外国工业品所换得之代价，直接流在外国，而无再回复至中国农村之可能。所以中国农村比外国农村破产更为急速。日本丝制造业破坏了成都的丝绸工业，因而使成都平原上的农民蚕桑方面的收入根本取消。而农民的生活支出方面，依赖于都市制成品的程度，逐渐增加。工业品价格的增长，又远比农产品之增加为大。所以农民经济生活，纵没有天灾人祸的降临，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再计算上随中国一般生活窘迫而日益加重的政治剥削和经济剥削，则中国农民生活之恶化，绝不能幸免。哪里能希望卖点农产品就可以解决生活的困难呢？

成都中上层的人，没有不知道新都的。因为新都有一個有名的桂湖，这里是夏季最好消暑的地方。湖大虽尚不及扬州瘦西湖之一半，而却浓荫盖道，曲港含情，小桥桂径，画榭波栏。游人如初游其地，顿觉进入清幽境界。成都的青年男女学生讲恋爱者，少不了要到桂湖来游游，而“桂湖之夜”这一类的新诗和小品，又正是热恋的情人们回到成都以后，相互赠答的题目。至于上层社会的人物，特别是军人，他们是干脆带上姨太太，在自己建造的别墅，或占据一定的公共场所，大“消”其“夏”。月明之夜，他们是“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女人的嬉笑声，老爷的呵叱声，与夫役们的急步声相应和。益以游人的谈话声、蚊声、拍扇声、小孩的哭声、劳动者的怨语声，使人感想万端。

新都城里，此时驻了一团新由江油败退下来的四川军队，因为好久没有发饷，士兵不服管束，相率逃亡，后始以不下操和自由出入为条件，暂维残局。出了新都城即是一片丰腴的农田，禾苗正峥嵘的长着。看形势，今年又是丰收。但是奇怪得很，城根附近和大道两旁，却有许多被饿得半死的农民。看他们的皮肤颜色，他们确是非常健康的劳动者。以肥沃的土地，丰收的年成，勤劳的农夫，而终不免于成为道旁之饿殍，实令人大惑不解。

在新都住了一天，又转向新繁。两城相距三十五里，顺河小道，风景颇佳。然而一看人事社会，随处予人以悲痛之感。成都平原如此富庶，而道旁农村大多破败不堪。苦力多嗜鸦片。因穷，其吸烟方法，大半仅张破席于地，即躺身为之。农民中有此嗜好者不少。途中来往之行人，其面目充盈，身体壮实者，难得其半。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四川民众终有明白之日也。

新繁西北行三十里即彭县，为四川过去都督尹昌衡故里。彭县是四川有名的矿产地方。成都平原，到彭县为止，再往北就



是山地。彭县的关口以北，山势雄峻，人情也大不相同。这里面有几位“土皇帝”非常厉害，有所谓“七大王”、“八老子”、“九千岁”者，他们利用特殊的地形，和对外交通闭塞的关系，包办了山里的一切。他们大半是大地主，自己有很多的枪，养了许多爪牙，对乡民为所欲为。凡是反对他们的，轻则重刑，重则处死，县政府不能过问。

关口山里，出产很好的煤和铜，铁和瓷土之藏量甚丰。成都过去的造币厂和兵工厂的铜，就是这里供给，煤是供给成都和附近各县的消费。里面有一家瓷器厂，出品销川北一带。惟以交通不便，未能发展，殊为可惜。

## 二、成都江油间

记者等一行于七月十四日正式离开成都，乘汽车向江油出发。天下小雨，这条路是川西北大道，过去是田颂尧的防区，由成都到广汉，倒还勉强可以通行。广汉以后，简直就不能叫“路”。平坦地方，车轮往往陷人软泥一尺以上，无法开行，要乘客大家下来推车，有时还要雇乡农来推，才能开动。如果上坡，因为没有固结的路基和路面，天稍下雨，泥土发松，车子就无法上去。如果上了大泥路，车子总是向两面滑来滑去，无时不有倾覆的危险。坐在车里，简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样，没一时敢于松懈。几个重要渡河地方都没有桥梁，由近百数的人拖着汽车在水里游泳式的通过。将近绵阳，才有一个渡船，但是汽车上下渡船，如同过鬼门关一样危险可怕。汽车上了渡船以后，是否还能安全下去，就是管渡船的人也不能担保！名义上我们包了一个车，实际上走路的机会，非常的多。在一段最难走的

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发汗，汽车还在后面烂泥路上摆尾摇头，似乎还在希望我们去扶持它。这里道旁却立着几块大石碑，歌颂“田公颂尧军长”的德政，说他如何发展交通，如何便利民行，称颂他的是所谓“民众”。立碑的目的，是要“流芳千古”！记者看看脚上的烂泥，摸摸头上的热汗，回头看那可怜的汽车，再瞻仰那巍峨的德政碑，总觉“田公”实在是功德无量！

绵阳为蜀汉时代之涪城。刘备和庞统攻取西川，就是由三峡溯长江而上至巴县，然后再由嘉陵江以入涪江，到绵阳告一段落。其后进取成都，即以绵阳为起点。庞统被射死的落凤坡，就在绵阳到成都中间德阳县县境内。那时似乎还没有发现沱江和岷江的道路。到诸葛入川，他自己本人仍然走刘备的旧路，而使赵云率兵由岷江（外江）以迫成都。邓艾入川，也只是在剑阁大道之外，另辟一条涪江小道，仍然通过绵阳，以达成都。由松潘经茂县灌县到成都这条岷江大道，他当时亦不知道，所以三国时的绵阳，是成都平原的总门户，地位异常重要。田颂尧统治川西北，亦以绵阳为根据。绵阳经田颂尧十余年来的经营，除城内仍有“壮观瞻”的马路外，城外麇集着数百家破陋的蓬户，茅屋不蔽风雨，衣不蔽体，杂粮亦不足以充饥。但烟馆林立，鸠形鹄面之士，所见皆是。田颂尧治下首府，尚且如此，其余各县，当难比此地更有进步。

从绵阳沿涪江西岸北上，一直到江油，一百一十里之间，是一条很好的汽车路。虽然许多地方没有桥梁，虽然路基是无代价占用民地，虽然修路是完全义务征用民工，虽然用了几十万的公款，究竟这个还象一条马路，让旅客们看了也高兴。

涪江沿河西岸，皆筑有“自欺欺人”的防御工事。所以徐向前于突破嘉陵江之后，很容易渡过涪江，进入江油中坝。我们十

五日过的中坝，这是比江油县城还大的市镇。发达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川西北药材水陆转运的口岸。平日有三万左右的人口，百货云集，贸易甚为兴盛。徐向前今年过中坝。记者至时，只有极少数新近逃回的商人，经营简单生意，荒凉景象，窒人气息。据本地未曾逃走之老汉语记者：徐向前到中坝时，每日皆开大会，讲演各种事情，故民众皆忙于开会。徐走后，在中坝北门外立了一块大石碑，两面共镌了八个大字，一面是“平分土地”，一面是“赤化全川”，记者过中坝时，此碑尚未拔去。徐向前过涪江向岷江推进的时候，是希望与朱毛会合后，进图四川，从“赤化全川”的石镌大标语上，也可以得到若干的佐证。

中坝至江油三十里，沿途战痕斑斑。大道西面山地，无处无工事，乡间农民，一部壮丁从徐向前北去，其余大都逃亡，回家者绝少。故村中多静寂无声，炊烟难见。隔江油十余里处东山上，即发现徐向前围江油时所筑之环山大堡寨。要路口层层障碍，随山路之曲折，于射击点上节节作成土垒。环山大堡寨，以竹竿及松柏等枝干，交叉编成篱垣。环山三十余里，无一处有空隙可入。同行有通晓军事之某君，睹此布置，亦叹徐向前用兵之能，而恍然于川军之非其敌手。

江油为一小城，东以七八里之遥临涪江，西北皆凭大山，主要者为光雾山。徐向前围江油时，川军杨晒轩一旅被困城中，相持月余未下，以地形观之，守城颇非易事。当时徐之大本营即在光雾山，县府某君，曾引记者至城楼观光雾山之形势，则见城西一带山地，从山脚至山顶，密布十数道壕堑，现虽已由川军拆除大部，而痕迹犹在，使仰攻者辄生望山不前之心。城外民房，大都被焚毁，败瓦秃垣，残梁断柱，比中坝之仅静寂萧索者，又加一层惨象。

小小的江油，经战争破坏之后，住民已无多。城内来往的人们，除正式军人而外，其余表面穿便衣，从事各种小商业者，全为川军被裁编下来的副官参谋和下级军官士兵等，他们一旦脱离了军队，生活无着，所以逼得来经营小本生意。他们因为特殊关系，可以不纳税，不出捐，而且可以强借民物，强占民房，所以大半都有利可图。川西北一带之被裁官兵，改作商业，已成风气。

这般人，县政府绝对管不了。现在要修碉堡，要派民夫，全在剩余的几个农民身上想办法。农村已经破坏了，家庭里衣食全无着落，然而又要尽义务去修碉堡，甚至被派去当民夫，送米上平武松潘，一去就十天半月不能回来。其死于路途者，尤比比皆是。这时岷江之路不通，由成都至松潘，只有走江油平武一道。平武松潘方面军队所需要之民夫，多仰给于江油，每师动索夫数百，以致江油全县，壮丁几尽，老弱亦以之充数。因“为政”不能得罪“巨室”，一切差役，皆课之于中下之家。记者亲见盲眼老者，与跛脚木匠，皆被派当夫，道路上呻吟叹息之声，不绝于耳。

### 三、“苏先生”和“古江油”

我们预定十五日住宿的地方，是白石铺，这里离江油只有二十五里。离江油北行五里，即进入山地，其形势与彭县之关口，河北省昌平县之南口相似。形势雄壮，关隘天成。涪江即自此山隙危崖中流出，以入于平原。入山口沿涪江西岸行，路即变为险窄，天晚始达白石铺。此地本有三百余户人家，大都经商，今则门穿壁破，仅有二三老妪，点缀其间。

徐向前部在白石铺住过一两个月，街上遗留下许多的宣传品和标语，最大的标语是：“武装拥护苏联！”大大的红字写在白墙的上边，差不多的民房集镇都有如此一个标语。

白石铺过夜后，十六日过江，沿江东岸行，有渡船一只可渡。天雨路泞，滑溜难行。因便，先东去猪头垭，上山计行十五里始达山垭，然后再由山垭回至河岸。溯岸北行，路尽在悬崖上，马不能行，步行亦须小心，始可得过。愈走愈高，仅行十五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上，其东接连悬崖万丈之“藏王寨”。寨由石灰岩组成，周十数里，高耸云际，四面皆绝壁，除二小径外，决无路可登。望之，如上海国际大饭店，惟规模更大，悬崖更高。相传唐玄奘取经，曾驻足于此。又云：蜀汉刘备曾在寨上留住，惟皆无可信证据。寨上亦有居民，亦务农，并有极美之泉水，野产党参甚多，运销江油中坝。惟寨中人与外间少来往，赋税捐役，所负亦少。陶渊明所理想之“桃花源”，此或足以当之！

大石堡仅三五家居民，徐向前部占白石铺时，此间居民亦曾被召集开会，组织“苏维埃”。据一壮年男子与记者谈：伊曾任“土地”，但不知所司何事，官职大小。记者再三研究，始知“土地”，乃“土地委员”之略。农民不了解复杂名词，故只记得“土地”二字，令人发笑。再叩以归何人管辖，答以“苏先生”，问“苏先生”之名号籍贯，他又茫然无以对。问其见过面否，答以“未”。继而曰：“凡是红军区域，皆归苏先生管辖”。记者始恍然，所谓“苏先生”者，乃“苏维埃”之误。

十七日由大石堡下山，路行崖际，俯视涪江如带，对岸山下大道行人，皆如幼童。路由泥石夹杂混成，雨后泞滑不堪，记者滑倒数次，满身泥污，行半日始得下山。问之土人，此辛苦之半

日，仅行十五里。用竹筏再渡涪江后，即为平谥铺。铺之大小，与白石铺相当，而破烂荒凉，亦大致相等。徐向前部亦曾据此地，所留宣传文字较白石铺尤多。至此以上，经煽铁沟以至响岩坝三十里地方，民房铺店所贴宣传品，大多完整。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向农民解释“苏维埃”。上面说苏维埃是工农士兵自己的委员会，不是人的名字。Soviet在俄文表示的意思，是“农工兵委员会”，俄国人一看见Soviet，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把它译音成“苏维埃”后，中国一般民众就不容易懂了。

过平谥铺煽铁沟等处，时疫流行，苍蝇遍地。居民传染一种软体病，得病后，体软肤黄，不进饮食，最多七日即死。煽铁沟本有居民七八十户，多已全家死去，此地亦无人治疗，听其辗转传染，恐将成险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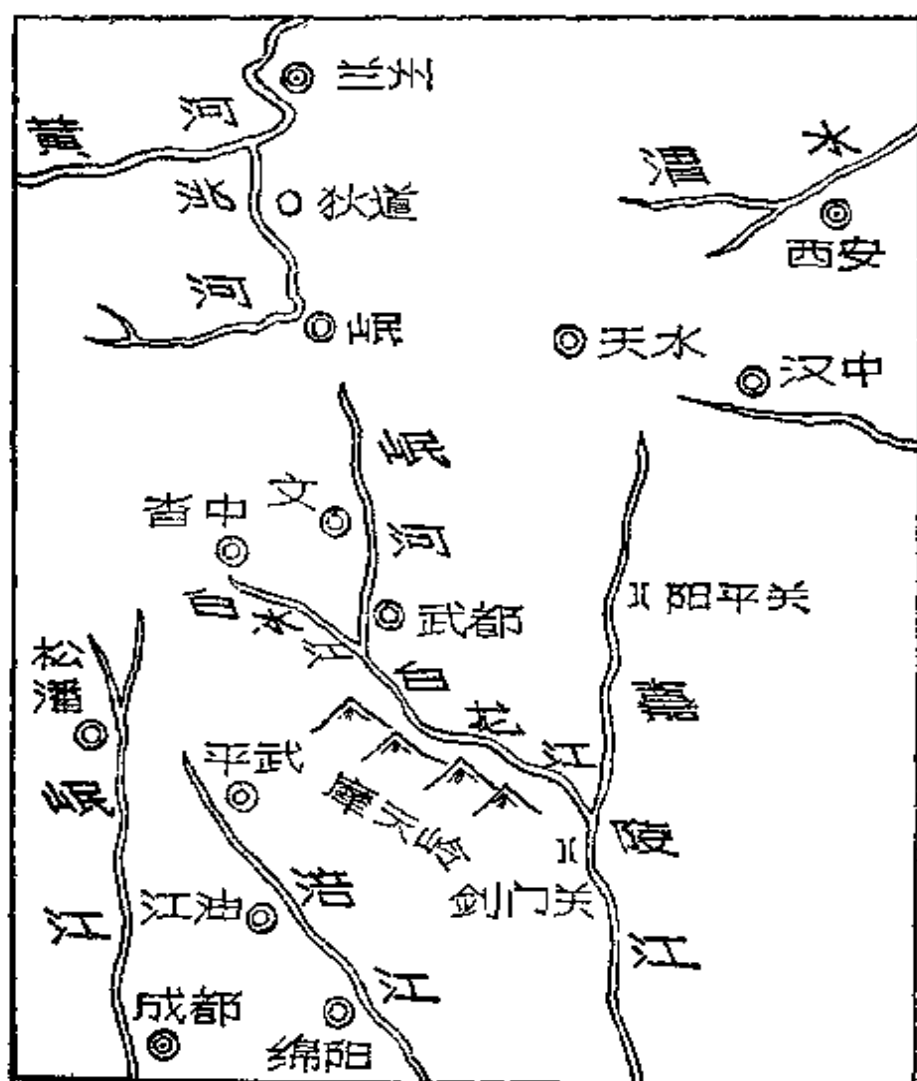
愈向山里走，交通愈不便，则愈容易出土豪。十七日夜，记者等一行在响岩坝所住之人家，即为一有名之土豪。他家里有一人在川军中当团长，于是家人恃势横行乡里。自己造了一所楼房大住宅，所用木材，尽以廉价或不给价向附近人家山林上强迫取来。木工、泥工、石工等，亦皆不给足额工资，以强力使其工作。十八日宿南坝，行四五十里，此地亦有一大土棍。他当一个地方上小小的保安队长，剥削乡民血汗，积资至三十余万元之富。南坝镇上近二百家的市房中，有一半为他所有，乡人对他，简直无如之何。

南坝本地人都说“古江油关”就在这里。邓艾过了摩天岭后，首先攻取的江油，即是这个地方。立在高岗上写着“古江油关”四个大字的大碉楼，引起了每一个旅行者的注意。但是人言言殊，记者亦感到众说纷纭，特加以粗略研究，以就正于专精蜀汉史地的学者。

蜀汉时代，由成都北出，通陕甘的大道，是有一条总路。即是由岷江流域的成都东北行，经涪江流域的绵阳，再东北行至嘉陵江正流的剑阁、昭化。这里有一个总口子是剑门关。从剑门关出去，偏东北溯嘉陵江直上，过阳平关即为汉中。从剑门关出去，偏西北走，溯白龙江而上，即达武都，昔为阶州。由阳平关以出祁山，先据渭水上游，然后夺取长安，此为诸葛孔明的根本战略。到姜维继孔明主持蜀汉军政的时候，蜀汉大势已衰，而姜维亦无直夺长安之气势，其争夺主要区域，改为洮河流域甘肃西南诸地。盖其意图在先得陇西南诸地，即今甘肃西南洮夏两河地区。一面结合藏人（即羌人），以为久计。然其总交通口仍为阳平关。到姜维最后一次北伐，才改了方向，他从白龙江上去，到“沓中”屯田种麦。所谓“沓中”，照《辞源》解释，是在甘肃临潭县西南，那就是今白龙江上源叠部地方，即今西固以上杨土司所辖的藏人地区。另外溯白龙江支流白水江上去，经文县南坪到松潘之东北，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叫做“沓中”，或曰“踏藏”（皆藏文译音，音相通）姜维种麦的沓中，即今白水江的沓中，即亦可知。

那时四川对陕甘的交通路，总不出嘉陵江本流的范围。涪江和岷江两条大道，还未曾发现。

和姜维对峙的是邓艾。邓艾指挥的是陇西诸军，所谓陇西诸军，即现在天水、陇西、狄道、兰州这一带的队伍。邓艾受了攻南的命令以后，他是先对付姜维。蜀汉时的“陇西”，其城池在今甘肃之临洮县，即狄道城，邓艾当时即驻于此。他在狄道还留有一个遗迹，就是狄道的点将台。他当时是分三路对付姜维：一路断文县之阴平桥，绝姜维归路，一路从甘松袭姜维之后，一路再直攻沓中。阴平桥在白水江上，甘松在松潘西南，则“沓中”



在白水江上游,较为合理。后姜维突破阴平桥守备,始得归还剑阁。邓艾本人系由狄道经今之岷县,顺岷河而下,以至白龙江。至今岷河上尚有“邓邓桥”一座,传为邓艾父子所建,故名“邓邓”以纪念之。如果顺白龙江下去,又归到剑阁大路。但是那条路已被邓艾的竞争者钟会占了。邓艾乃另辟途径,从白龙江翻摩天岭,取道涪江流域,直捣绵阳(当时所谓涪城)。这是当时初辟的道路,当然走起困难些。不过邓艾过了摩天岭后,曾否经现在之平武或青川,记者无所知。但据若干地图上之记载,邓曾走



左担山，左担山在平武东一百余里，其未过平武，似可成为定案。但过左担山后，系过今之南坝镇，抑系直入今江油县东蜀汉所置之“江油戍”，则记者目下尚无可信之参考资料，未敢臆定。

惟就上述之材料观之，世界舆地学社发行，上虞屠思聪先生著之中华最新形势图，第二十图及第十四图上所示之古阴平道，系经康县、武都、文县、平武以至于今之江油，恐有相当可疑地方。

#### 四、平武谷地中

江油至平武共二百四十里，南坝适居其半。江油至南坝系在河西岸行，南坝至平武，则须由南坝过河，改至河东北岸行。南坝水急，过江甚险，军人往往抢渡，每覆舟，溺毙者以数十计。过江后即为何家坝，由此东北通青川，西北通平武。平日街市甚为繁盛。自徐向前部退至涪江西岸后，此地已被战火付之一炬，记者至时，只存一片瓦砾，居民已不复见，仅河岸有土碉一座，若干渡河军人往来于瓦砾场边，稍减寂寞气象。

何家坝上行三里为旧州，地虽不比南坝、何家坝为大，然而过去曾盛极一时，商业之盛，闻名川西北数县，今则与何家坝同其命运，人烟绝迹，鸡犬不闻。由此顺江西北行九十里至古城。除古城外，沿途向日繁盛之镇市甚多，今皆荡然无存。旅行者至此，饮食住宿皆无法解决。间或有老嫗携粗恶之饼团至路旁贩卖，嗅之令人发呕，然而争相购食者颇不乏人。路旁单间民房，间或有未被焚烧者，有锅有刀有水缸，在旅行者视之，直不啻上海人人国际大饭店，极尽满意之能事矣。惟此等居民经数度兵燹之后，粮食衣物，被掠一空，现虽幸保茅屋，可蔽风雨，而

饥肠辘辘，果腹无方。此种山岳地带，惟涪江两岸平地，略有农作，余尽大山大岭，可耕者少。且壮丁被征发殆尽，遗留乡间者，全为可怜之妇女，面目黧黑，衣服褴褛，少妇处女之衣不蔽体者，随处有之。

途中行人，以军人及搬运军粮之士兵与民夫为主，普通商贩，百不得一二。天气正炎热，中暑病倒之兵夫，络绎于途。生于乱离之世，不死于枪炮，亦死于徭役，哀我农民，奈何无自救之方也。

古城、何家坝间之九十里，实有一百二十里，记者等十九日深夜始达古城。古城附近，独有一大片平地，利用河水灌溉，产米甚丰。街市长二三里，房屋亦整齐完好，惟壮丁稀少，物资征取殆尽，仅老弱及妇女留家看守。此地驻军为十九路军旧部，颇有建设力，对于街道整洁，道路培修，及建造简单公园等，成绩斐然可观。据某军官为记者言，闽变后，十九路军之下级干部与士兵退伍回粤者甚众，经调河南训练改编后，今所存原有官兵，已十不过二三。回忆“一二八”上海战争，至今不过四年，在当时闸北、虹口、江湾、吴淞狂热抗战之官兵，孰知有上海停战协定，有福建事变，有河南改编，更谁知有在四川西北丛山峻岭中作战之事哉？人事变化，几令人不可捉摸，然而如从每一事件之环境上加以分析，则因果关系，仍有线可寻，在某种环境之下，必将发生某种结果，虽非毫厘不爽，要不至失其大概。

二十二日由古城赴平武，计程三十里。中经一山垭，有小市镇名桂香楼，地甚险要，风景亦佳。有士兵卖稀粥，每碗一角，暑中得此解渴，直等琼浆。午后抵平武，平武城内精华在南街，现已焚烧一空，惟三台土马路尚在，宽敞平直，醒人沉闷心情不少。

平武亦曾入徐向前部之手，土著某君为记者道平武失守之经过甚详，可笑者甚多。缘平武人口稀少，所辖地方辽阔，沿江平地，尽属汉人，山林草地大都藏族（俗称番子，视之如蛮夷，颇不合民族平等之原则），政权尽在汉人手中。汉人中有两大土豪，皆把持地方团队，各养众多爪牙。一为某甲，其势力在平武以西，涪江上游。一为某乙，其势力在平武以东青川一带。某甲资格较老，管握地方政权有年。某乙出其部下，曾借故将某甲推倒，自代其职。某甲乃遁走松潘，联合松潘哥老会及流氓等，收集涪江上游沿途民团枪械，合千余人反攻平武，某乙不敌，逃青川。某甲再得政权后，将帮助其反攻平武之哥老会等一律缴械遣散。自是甲乙两方相持不下。此次徐向前部由嘉陵江突过韶、广、剑防线后，一部趋青川以迫平武。某乙在青川，知事不可为，乃连次急电平武某甲，请其防备，青川之富有者亦多电告某甲，请其注意，某甲皆认为是某乙乘机图回平武，谋加报复，斥为虚妄。殆青川已失，民间已得消息，平武已危在旦夕，而某甲仍美酒娇妻，享乐自在，直至徐部隔城十余里，某甲始着慌。一面令城中商民筹数千元“剿匪费”，一面令其平日豢养之团队出城抵御，同时以武力禁止民众逃亡，而自将私人银钱细软妻妾儿女之类用四五十匹马骡载负，渡过涪江，经北川安县，欲逃成都。此等团队平时教他们去剥削农民，倒颇威风凛凛，真正要他们作战，要去拚命，他们就不服从指挥，他们要问某甲要饷、要钱安家。正在纠缠不清之际，徐向前的部队，已经由土人带路，从平武城北山上翻城墙缺口进城来了。啪啪啪……五枪，平武城即完全被占领。某甲急逃过河，率队保护家眷财产，向北川前进。在将近北川处，土匪知某甲巨万过此，遂将其财产全部夺去，枪杀其子，并将某甲本人拘留，至今生死不明。这真所谓剥削一世总

成空，恶名永留在，任他几度夕阳红了。

在平武休息了一天，二十二日启程赴松潘。说去松潘，平武的土人，都替我们感到为难。平松相去三百六十里，路并不能算远。只是这条路溯着涪江的上源走，山险路小，平日已经人家稀少，食宿困难，兵乱期中，通行尤非易事。最令土人害怕的是过“大雪山”，似乎过这一架山有赌生命的危险。

我们顾计不了这许多，只好走来试试。离开平武三四里路，道路即变了常态。这里的道路，是在壁立水中的石崖半腰上，用人工凿成，其形如“冂”。对上行者言，上右下三方为顽石，左临急流，二人绝不能并行。河中时发现浮尸，或有为乱石所阻，状至狰狞可畏，臭亦难当。如此行十余里，山势益峻拔，凿路工程愈大。二十里至火溪，溪由北来，流入涪江，两岸石壁对立如巫峡，有铁索桥以通溪之西岸，名铁龙桥。桥长数十丈，其造法，系立铁桩于两岸石岩中，然后以五三铁索相联，横铺木板于平行之铁索上，再以钉绳等固结木板，如是，人马即可通行。人行桥上，前后波动，如同时过桥者在十数人以上，则桥之动荡益烈，初过此桥之东南人士，未有不心惊胆战者。

过桥，上急坡为铁龙铺。人家七八户，门窗多败坏。胡宗南部初复平武时，欲由沿江大道，以入松潘，部队通过此段路程时，被对河红军射毙甚多，后始改由平武西北而出，经火溪上源之高原草地渡过火溪，更顺火溪西岸，直下铁龙铺，平松大道，始得通行。

铁龙铺以西，路稍平易，沿途满布碉堡，枪孔相望。盖涪江上源，河幅渐狭，渡河较易，故河防不能不稍严耳。但据当地土人谈，涪江之水来自雪山，其水性与普通河水不同，寒度甚大，其自身虽未结冰，但如人畜入其中，能使人畜之血凝结，肢体僵

硬，倒入水中而死。某军官亦言，当徐向前部尚占据涪江南岸时，第二师曾派最善泅水之官兵游泳过河攻击。以仅三四丈宽之河面，五六尺深之河水，在江南一带，泅涉当非难事，但下水官兵十之八九皆被水冻僵下肢，没水而死。记者亦曾以足部试之，下水数分钟，即失足部知觉，急提出水，必经五六分钟，始能回复原状。

是日行九十里宿水晶站。有居民七十余家，房屋未受重大损害。惟此间粮食，素赖平武以下江油一带运来，今交通梗阻，粮元来源，居民多向山居藏人购买豌豆等杂粮为食，油盐亦缺乏，食之颇难下咽。

## 五、过 大 雪 山

二十三日继续西行三十里，至水晶堡，见有索桥一座，横跨涪江，其建造方法与铁索桥相同，惟以竹索代替铁索而已。同伴某君试行其上，全桥摆动，比铁索桥更为危险。过水晶堡，又有一种单索桥，此桥仅一单竹索系于两岸，索上穿有长约尺许之空木筒一个，筒外再束以小绳，垂其两端各约四五尺许。过桥者，即将此筒上小绳，紧缚于腿腰部分，如有荷物，亦束于胸背之上，然后手抱木筒，足离地面，借重力作用，此筒一滑即至河心。河岸高者达二三十丈，此孤悬河心之过客，见者皆为之捏一把冷汗。最奇怪者，记者所见三四架单索桥，过桥者，皆女人，甚有怀抱婴儿者。往往因滑行急速，飘动过烈，此勇敢母亲怀中之婴儿常呱呱啼哭，益令人为之惊惧。过单索桥者，滑至河心以后，大半要休息相当时间，然后以手攀桥索渐次上升，直达对岸，此时手力不强者，即无法可登彼岸。内地男子敢过此桥者，百难得

二三，内地女子可谓绝难得其人。盖生活环境习于平易，此种初民生活之技术，早已无使用之必要也。然而生于今日之中国，不作强硬之斗争，决不足以自存，而斗争之两大工具为头脑与身体，头脑方面，固当求其发达，如身体方面亦能练至如此程度，当有可观也。

午后天大雨，行装尽湿，乃宿叶塘，共行六十里。叶塘气候渐冷，盛夏夜间亦无蚊虫，对旅行者颇为便利。此地亦有近百户人家，不吸鸦片者至少。各家大半住有病兵，缺衣，缺食，缺医药，无床板，无垫草，睡泥地上者甚多，便溺纵横，秽浊不堪。病兵多直鲁豫人，如不设法转地疗治，恐断难有生望，北国家人闻此消息，不知作何感想也。

叶塘西行十里，过木瓜墩铁索桥，即入松潘县境，此时涪江正流以近似瀑布之斜度，由乱石中流出。气候如江南之深秋，山高坡陡，谷窄而曲，路亦凸凹于乱石之间，所能见天空之面积亦缩小。大雨新晴，轿夫行泥泞道上，稳足不易。道旁坡地，尽种包谷（即玉蜀黍）。十里难见茅屋一间，偶尔有之，亦系空无所有，仅流落病兵夫役寄足其中。更行四十里至小河营，此地有小小城垣，立于山谷平川中，为过去汉军统领所驻地，用以镇慑藏人者，城门上所立某某汉军统领德政之石碑，尚存留甚多。城内有居民百余家，由此以上，路更荒凉，汉人夫贩之肩挑背负者，多至此为止。由此至松潘，多改用藏人之牦牛，力大负重，并能露宿，亦可供人骑乘。惟藏人管牛无方，上路后任其乱挤乱闯，并随地吃水草，所费时间甚大，故牛行每日只三四十里，如管理得法，日行八九十里，当非难事。

小河营以上，有十余里平地，山势又转危急，道路没人从林中，时行坳上，时行崖下，过某石崖时，上为老林与岩石所蔽，

不能见天日，崖窟不高，且有泉水潺潺流出，道亦不宽，左面崖脚，长古老之苔藓杂草，左面江水受乱石激荡，水花时飞溅上岸，记者身入其中，俨然如入森罗地狱，阴寒彻骨，不敢久停。此段山林密懋，道路曲折，同行者相隔二三丈，即不易相见。天已将昏黑，尚未达宿处，记者乃拔手枪在手，实弹前进，以防野兽之来袭。傍晚见一木房，趋视之，阒无一人，惟观其有长木榻及破凳数件，知为曾作宿店者，方欲勉强过宿，忽于地上发现一死尸，已有臭味，同伴皆惊走。不得已再前进，行四五里，又发现一小木房，记者迳入屋中，寻主人，无应者。屋前河岸上有自松潘下来之难民七八人，正在烧火，架毡帐，准备露宿。记者疑其不住屋而露宿，必有别情，乃细审屋内，觉有臭味发自榻上，临近视之，则三尸横陈一榻，且似皆为军人，不知已死若干日矣。同伴续到，得此消息，皆怅然不知所从。盖天已黑，腹已枵，前去不知尚有若干路始有山村也。有主露营者，终以无露营设备，仍于无可如何中向前再进。同伴手枪皆出壳，提防野兽与土匪。黑夜行此高山古林乱石小道中，每人皆无声息，呼吸急促，健步急进，日间足痛者，至此亦捷疾如常人。山迴水转路崎岖，只有水声风声与树梢声相伴送，至十时左右，始见丛林中透出之如豆灯光。比达山村，仅一间破屋，门壁皆无，但有锅灶，有主人，有草垫，有水，遂就此住宿。地名观音岩，二十四日一日约行九十里。

据观音岩店主人谈，此去大雪山，地更荒凉。故二十五日天明即行，路上问道亦无人，行五十里，至一平川地，名三舍驿。农地渐少，草地增多，木房十余家，多属藏人，服装异式，言语不通，心情极度紧张，稍息即行，闻过雪山尚有四十里也。此四十里中无店可宿，且为虎狼成群出没地带，如不能过山，颇不易

度夜。

三舍以上，涪江已成溪流，水势转平，山亦不如前此之险恶，时遇藏人驱牦牛成群而过，随地拾草果纳人口中，每视记者等而笑。由三舍行二十余里，至黄龙寺，已至大雪山顶之脚，有数间破屋皆无人，亦无可资食宿者，欲再进，同伴落伍者尚多，且据松潘来客谈，午后过雪山阴风甚大，人至难当。无法，只好在黄龙寺附近寻宿处。黄龙寺为松潘一带之大寺，汉藏民族每年朝拜者甚众。寺在一原始大松林中，时有虎豹成群行于寺外，但不易伤人。现寺中无一僧人，想亦因避兵乱他去。寺离大道约半里，须过一小桥，名“涪源桥”，即涪江发源处。时黄昏将近，晚风吹来，冷不可支。同伴皆到，多以毯子裹身，如过严冬。后幸于黄龙寺上二三里处，寻得木篷屋一家，四面皆无壁，无椅桌等任何设备，但有破土炕半节，已睡满军人，最可珍贵者，为有一半截煤油桶，可以作锅煮饭也。主人为二女孩，年皆在十岁左右，衣不蔽体，问其父母，答皆死于军役，其吃饭问题，则全赖此半截煤油桶之助。盖过往行人，多借此煤油桶作饭，此二可怜女孩，遂得沾其余惠也。

到此虎豹区，夜间当有警戒，记者与同伴决定轮班值夜，记者所值，为午夜后二至三时。九时左右，同伴刚解行李席地就寝，警戒者即以虎警闻，幸即他去。记者当值时，身披棉被，手持手枪，仰观满天星斗，耳听呜呜风声，极目向四面黑暗中侦察。此时心境旷逸，忽东忽西，深觉人生之平淡，所以终身奔劳不休者，特为生存之必要所驱使，并无特别之意义，故本于生存之必要而活动，此即为人生之真谛。

二十六日俟日出始登雪山，但前进四五里，仍不见大山峰，路宽而平，山皆草地，亦无森林。再前进，亦仅平斜之山坡，绝



无险峰，问之东来者，谓前面能见之小坡即为大雪山顶，记者因疑一般传说所谓可怕之大雪山者，并不见其真可怕也。适路左草丛中，跃出黄色野物二，初以为山羊，迨俟其走近视之，为大小二鹿，记者急拔左轮枪射之，同伴亦出驳壳快发击之，皆未中，任其逸去。迨接近山顶，忽然呼吸困难，行三五步或十余步即觉喘气不止，必须休息，同伴皆如此，众始惊异。夫役一名，竟自倒地且死，急施以药，强扶之始能行。愈近山顶，呼吸愈难，大家至此始悟大雪山之所以可怕者，特因其地势过高，空气稀薄，心脏衰弱者，必因空气之不足而危及生命。盖大雪山离海平面五千公尺以上，合中国营造尺一万五千尺以上，其东南有一水成岩高峰，终年积雪不化，名“雪宝顶”，过雪山者，皆能望见。记者到山顶后，因等后面同伴，停留甚久，此时正午前十一时左右，日光直射，然而风寒刺骨，必须运动或在避风处，始能久待。举目四望，群山皆低，所谓“只有天在上，嶙嶙万山低”者，凡曾过雪山顶者，皆能领略此中真义矣。

大雪山为鹿头山脉之一段，山以东为涪江流域，山以西为岷江流域，分水处，不过十数丈，而两河愈去愈远，涪江东南入嘉陵江以出重庆，岷江南行至灌县分岷沱二江，各出瀘县、宜宾，诚所谓差之毫厘，失以千里，人事分野，亦往往如此。

涪江仅为嘉陵江之一支。四川省名，乃因于嘉、沱、岷、乌四江，而涪江不与焉。但涪江自江油以上，本已非大江之规模，而犹溯源至六百里，可见欲成大河者，必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愈长，则此河之前途愈有浩荡奔腾之日。基愈固，则人生事业愈不敢限其将来。但世俗之见，长江必出三峡，始惊其浩瀚，人必至事已成功，始佩其英雄。长江上源，在重山峻岭中与顽岩怪石冲激之时，谁亦不加重视。人在艰难困苦荆棘榛

狂里苦斗之日，何曾有人愿加以援手？此种成败论英雄之俗见，最易丧失青年奋斗之勇气。惟自奋斗者本身言之，大可“闭耳不闻俗人话，专心一志奔前程”！

山顶有古代城堡遗迹，惜无字迹可考。路侧有碎石堆甚多，皆埋过往旅客之死于山顶者。日中日光蒸发，略放尸臭气，不知谁家男女，丧命此间？使死人而有知觉，借此清静山头，回忆生前奔劳，追究一生忙碌之目的，恐亦当不觉失笑。俗人皆谓在此社会中，所忙者为金钱，有钱者可以美衣，丰食，华屋，拥娇妻，夸耀乡朋，进而支配他人，荫及子孙。无钱者如是追求，有钱者亦如是追求，以求更多，更好，更美满，更优裕之生活。日常流行的一些道德上的好听名词，都是欺骗普通民众的说法，并不足以说明人生之真谛，不能解决和解答上述事实。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追求？果使生活美满以后，又有何意义？设使死于此山顶上之路客，皆在松潘开金矿，成百万豪富，荣归成都，于是第甲连云，日用所费，皆纽约伦敦出品，果又有何意义？今虽不幸死于山头，与装水晶棺，葬名山者，果又有何实质的区别？死者有知，当亦无词以答记者之问也。但人皆为生存之维持，继续与扩张而努力，此为一平淡而坚定之事实，只此平淡之事实，即为人生之本质。人何以如此？人自然如此，人不得不如此！生存为人生之本质，以全力以维持生存，继续生存，扩张生存，即为人生之光明正道。为自己生存之存续所采取之任何手段，自其本身言之，皆为道德之行为。故不论贫富，其终身碌碌不休者，自其本身言之，皆合于人生之本质，亦即皆为合于道德之行为。今穷病死于雪山者，与葬于东陵西陵者，在人生意义上，皆无丝毫之轩轻，请死者不必自以为歉也。

## 六、松潘与汉藏关系

在大雪山上，已经可以望见松潘附近的山岭了。同伴赶到后，相率下山，坡陡几过六十度，有泉水处，下步为艰。然因已过此骇人听闻之高山，前途平易，且今日可到松潘，精神倍增。十里至风洞关，有汉人猎户一家，相见颇亲热，闻记者打鹿事，重为惋惜。盖如此大鹿一只，在松潘亦可值三百元，如运至东方都市，恐将近千元之价也。

风洞关以下，所见尽藏人村庄，庄之四周，立无数之藏文长旗，随风飘荡，且有击铜铃者，叮当作声，近山小庄，多为木制，墙壁乃挟整松木为排列，房顶则为树板所盖成，板上再遍压以石块，用铁器处至少。进入平川后，村庄形式大变，每家皆有树枝编成之篱院，房皆为两层，上层供人住宿，下层为牛马羊群寄居之所。建筑材料，仍以木料为主，墙壁已多用锯成之厚木板，惟房顶及第一层露台，多用泥土盖成。门窗皆甚完全，与汉人村庄相去无几，平川地多已耕种，山坡中始见牧畜之牛羊群。

藏人身体强壮，胸常佩剑，男女皆善骑，记者途中相遇甚多，时同伴皆已前行，独记者一人因摄影等事留后。言语不通，习惯不明，口渴欲寻一碗水，亦不可得。且藏犬大而猛，见生人近村，即狂吠。藏人多向记者笑，偶有以藏语相问者，记者不解，惟亦笑以应之。

藏人农耕方法，尚甚简单，然其进入农业以后，原有之游牧民族的服装（长皮袍长靴）即不适用，故在田中工作者已有局部的改为汉装。经三十余里长之如此地区，再至一小山顶，始见山下之岷江与松潘县城。

松潘原为藏族地，明代始置松潘卫，汉人来此者渐多。清代改为直隶厅，民国改为松潘县。至今仍只城内及大道两旁为汉人，其余皆为藏族。城跨岷江，其主要部分在西岸，东岸为宝塔山，乃松潘军事要地。

松潘境内，藏人占百分之八九十，而政权却在少数汉人之手。藏民虽有土官，而上官亦受县官管辖，可以说完全为被征服之民族状态。汉人称藏人为“番子”，番子乃视之为蛮夷之称，自民族平等之眼光观之，此种称呼，至不合理。但若干藏人，亦只自知其为番子，不知为藏族。此等藏人，在汉人统治之下，经千百年汉族文化之陶溶，经济方面不及汉人，文化方面不及汉人，政治与军事方面，皆在汉人掌握中。压迫、侵略、同化之结果，过去曾盛极一时之藏族，今已成为等视蛮夷之“番子”！民国所谓五族共和者，实空有其名耳！

记者以为以汉族为中心，而统治满蒙回藏四族，以汉族文化同化四族人民，在今日之国际形势下，决不可通！盖人皆为自己生存而努力，乃为不易之原则。无论民族文化如何低下，其生活上所受之实际利害，则皆能明了。如其所感受者，尽为压迫与剥削，则此被压迫者对压迫民族，必无好感，可为定论。松潘原为川军二十八军邓锡侯防地，他定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汶川等数县为屯垦区，白为屯垦督办。所谓屯垦者，乃侵占藏人之地土地山林，以供汉人之垦殖耳。而事实上，亦未认真使汉民垦殖，徒位置自己亲信的几个官僚与军阀，用各种名目以剥削敲榨藏民，故作官者每视“办番案”为优差。藏民无援，任凭压榨，亦无人反对。故往往一件无关宏旨之案件，可逼使若干藏民倾家荡产。如此而言共和，而言平等，几何不遗重大之危机也。

东亚国际争夺之重心，已集中于中国，中国各民族的不合理

关系，正与人以可趁之机。姑不论事之内容如何，满族已不在中国范围中，外蒙古之独立，西藏之附英，已为不可讳言之事实。所余者，仅内蒙一带之蒙族，宁夏青海甘肃一部之回族，及西康青海四川边境之藏族而已。以目前情形观之，此等部分，如加以外力之煽动，及相当之强力引诱，是否能再维持如今日之关系，恐难得乐观之答复。

真正团结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联合，所谓民族平等的真义，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经济上，“发展机会之平等”。诚如是，在各族间压迫既不可能，生存上相依成为必要，经济之自然溶通，文化上之自然交流，如是必能造成巩固之团结，孕育出充实而崭新的文明。非然者，记者窃恐中国今后民族之大分裂，为期不远也。

记者刚到松潘的那一天，第一个酸心的印象，即是随处倒毙的死人太多。城内外大路大街上，到处有死尸。有些在城外的死尸，已经腐烂到肠肚毕露，或四肢不全，苍蝇成群附在其上，遇有人过，辄嗡然飞起，甚有转向行人头面各部飞来者，可厌可憎可怕，而又无如之何。据地方整理委员会友人谈，此种死人，皆为松潘一带作苦力的汉人，及贫寒之家。在军事未兴时代，汉人多从事商业，或专任搬运脚夫，以其所得之报酬，买米布以维持日常生活，故来往者日不绝于途。军兴以后，松潘对外交通，岷江大路，完全断绝，涪江、白水江及草地通临潭夏河道路，除军事运输外，商运已完全停顿，故此辈无事可作。且松潘粮食，来自外方，现粮道既断，粮价飞涨，而民间粮食日益耗尽，纵出高价，亦无处购买。故此辈苦力遂无以为生，相继成为饿殍。中等人家，亦感不能维持。胡宗南氏乃与政府商议，统筹若干粮食及现款，遣散此辈至各方逃难。然“从手到口”之苦力，当不能饿

待如许之时光，势不得不早放弃其可怜之生命！松潘每日死人以数十计，地方整理委员会所掘之几个大土坑，皆已满载，死者不但无棺材，即麻布口袋亦已用尽，诚为浩劫。

藏人本多粮，然而他们却坐视汉人成百成千的饿死而不救。即柴草等燃料，松潘城中汉人无现金付予时，亦不再来贩卖。喇嘛本来讲慈悲施舍，而却不施舍予汉人。由此可以了然于民族关系之重大，凛然于藏人对汉人之敌意，而痛彻反省我们过去民族政策之错误，亟应从速改弦更张。

胡宗南部在松潘，军食至为困难，兵士每日仅吃一顿，且所食者为青稞（最粗之麦子）。为节省消耗计，青稞亦不能磨成面粉，只是煮整青稞为粥而食之。故因此得病之官兵，各连皆至普遍。

我们在松潘住了两天，所看到的松潘完全是一座死城。几条大街绝对没有卖吃食的店铺，有一次看到一个士兵，带了十几个非常粗劣的青稞麦饼经过街上，饼且极小，后面一群人追上去，向他强买。每个饼出价到五角，他还不肯卖，只是后面跟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挤到我们看不见的街巷去了，还不知结果如何。

## 七、金矿饿莩与藏人社会

二十八日离开松潘，沿岷江西岸大道向北前进，目的在进入甘肃。本来由松潘入甘肃有三条路可走，有两条是走草地，一条是过大山林。一条路是由松潘正北出至红桥关，然后西北出至黄胜关，再由黄胜关西北出，经郎木寺可到甘肃夏河，及临潭县。第二条是由黄胜关东北行经包座，以达甘肃之临潭、岷县、西固。第三条是由红桥关正北至章腊，然后东越弓杠岭，顺白水

江而下，至南坪、文县，亦可由南坪至西固。我们因为没有走草地的设备，所以走的第三条。这三条路都是藏人的区域，如果照我们传统的偏见，认藏人为番子，则我们可谓来到番邦了。

行二十里至红桥关，有桥跨岷江，过桥改沿河东岸行，再二十里即为章腊。沿途饿殍载道，臭不可闻。在红桥关南，有一垂死之男子，屈腹卧道旁，口唇时动，记者乃以馒头一枚予之，其手已失知觉，眼亦不能张合自如，屡触其手，并以馒头置其唇鼻间，久之，彼始移手接馒头，又久之始以馒头纳口中，经其咬一口后，但见其全身突然颤动，口眼大开，直视记者等，呜呜作声。饥之于食，非身历其境者，不知此中滋味也。

又行二十里平川大路，即至章腊。将至章腊城时，记者乘马行麦田小径中，马忽惊跃狂奔，几掀记者于地。勒马视之，则麦田中有三五腐尸，蛆虫累累，已不成人形。

世人皆谓松潘产金，其产金处，乃在章腊。章腊在岷江北源东岸，有土城一座，江西岸为金矿区，江上有一桥相连。金矿俗称“金厂”，平日有采金工人一万三四千人，各路来此之商贾云集。其平日金价为四五十换（旧时称黄金与货币的比价为换。金价为四五十换，即一两黄金兑换四五十元——编者），现涨至五十换，惟用中央纸币则为一百零五换。军兴以后，交通断绝，粮食无来路，金货无出路，于是各厂皆相继停工。工人平日皆无存蓄，今一旦失业，生活毫无办法。且此地工人，大半吸鸦片，烟饭两缺，逃难他乡，亦不可能。其身体弱者，多死于章腊附近，身体稍能行动者，亦多死于数十里外之道途中。其有家眷者，亦皆同为饿殍，据土著某君统计，章腊金厂工人，已死亡逃散七八千人，因死人太多，即欲埋亦来不及，故章腊附近之死尸，远比松潘城附近为多。

普通所谓“财富”，是指金银等货币及有货币价值之金银货及珠宝等而言，然而在此种情形之下，金银毫无用处。食之不能充饥，御之不能敌寒，尽管有千万金条，如果根本无粮食，亦将成饿死鬼。故货币必在“生活资料”不缺乏情形下，始有其作用，真正之财富，乃解决民生之衣食住行上消费的货物。故实际增加社会生存上所必需的物质资料，乃为政治的根本急务，开发金银矿，并不一定是解决民生问题之道。

二十八日，我们宿在藏庄昌盘寨。这是从金厂顺岷江西岸走的，计约行二十里，所过尽藏人村庄，岷江两岸肥沃，故多已开垦，种植青稞。藏人仇汉情绪甚高，一二汉人由此通过，未有不被其劫夺者。某次某师办给养之士兵四人，至藏庄购粮，藏人不但允卖予，且将此四人赤身缚于柱上，取小刀欲行剥皮，幸有其他士兵在村外过路，闻救命声，始鸣枪相应，藏人畏逃，因此得免于难。

藏人不用纸币，非有现银不售货。（其已完全汉化之藏人，已加入汉人社会生活关系者例外）记者在各地所遇汉人朋友，多认此系因藏人不开通所致，此诚有相当理由，然而根本原因，却另有所在。盖藏人之社会经济，尚在畜牧初入农业经济的阶段。商业经济，藏人中异常不发达，仍在货物交易时代中。其衣，其食，其住，皆完全由其自己社会中自己供给。其所缺者为茶，为烟，为盐，及一部零星用品，此等须向汉商购买。然而其所生产者，有皮毛、麝香、野物、牲畜等大宗货物，故其对外贸易形势为出超。即其向汉人换茶烟盐等物时，亦多以物易物，对外使用货币之机会甚少。反之，汉人向其购物时，则多以货币为交付之媒介。因此藏人在收入货币之后，不再能在市面上流通，作为交易之媒介之机会，而只存储于地窟中，与珠宝等同其性质，只作为



富裕之表征。因此藏人所接受之货币，必须有确实性、耐久性、稀少性、不变性、美丽性。只有金银才合此条件，受其欢迎。简单的货币交易，在他们社会中没有普遍。这种近代工商经济时代进步的货币制度——纸币，当然不合他们的需求。

我们进了昌盘寨，使我们一筹莫展。这里是三四十家藏人的村庄，经济是农业兼牧畜，一色的两层楼房，没有城堡。村口里来来往往的藏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注视我们，有的和颜悦色，有的怒目相加。问他们话不懂，他向我们说话，我们也不明白。侥幸我们还有七八匹马，七八支手枪，他们还莫奈何我们。后来辗转找到了关系人，才到一家藏庄住脚。不过这家藏主人，非常的不愿意，很宽的地方，通通把门锁起来，只留过道给我们开铺，不许我们买他的柴，不许用他的水，就是给他现洋，也不卖面给我们吃。不停止的向我们咕噜咕噜，发泄他们不乐意的情绪，这真叫人难于对付。川甘边汉人都知道的一句谚语，是：番子认话不认人！只要你能通藏语，这些困难可以减少些。晚间，我们找来一位藏人通司，大家十分高兴，请他为我们买一只羊，杀来犒劳大家。他对我们非常恭敬，但是他说一只羊要大洋五元，我们还不要皮子。后来打听，那只羊最多两块钱，而那位通司实际付给卖羊人的，只是一元五角！

藏人在途中相遇或平日相招呼时，互相呼阿罗！声如英文之“Hello”，状至亲热。男女皆善骑马，男子出外多骑马背枪，威风十足，女子亦能疾驰如飞。惟女子地位，至为特殊，其在少女时代，春情发动以后，可以与任何男子恋爱，家庭中毫无问题，如将情人带至家中共宿，其家人亦乐于招待。其恋爱方法，大半系在山野溪边，放出娇嫩歌喉，唱思慕英勇男子之情调。在另一方面之男子，如自觉尚过意得去，亦高歌相应答，深致倾诚渴念美

人之私衷，如歌情相合，两方遂愈唱愈近，而佳偶遂“天”成。亦可带至家中，此可谓绝对自由时代。结婚以后，稍有限制，必在男子默认情形下，始可另寻情人。然而藏人结婚，多系招男上门，不是女子出嫁，而是男子出嫁。家庭系统是母系，不是父系。妇女终身不穿裤子，只是外面一件大长皮衣，天气热的时候，或劳动的时候，妇女们上身全袒露出来。这才是最近代的最解放的女性，现在，所谓文明民族，办到这个程度，还不是短时间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是藏人中最劳动的分子，是女子，不是男子。女子操持家务，兼作耕种牧畜，男子只是作小部分的工作，平日只是享受，只是消费，他们就某种程度说，是女子的玩物。所以“劳动”和“地位”是有直接因果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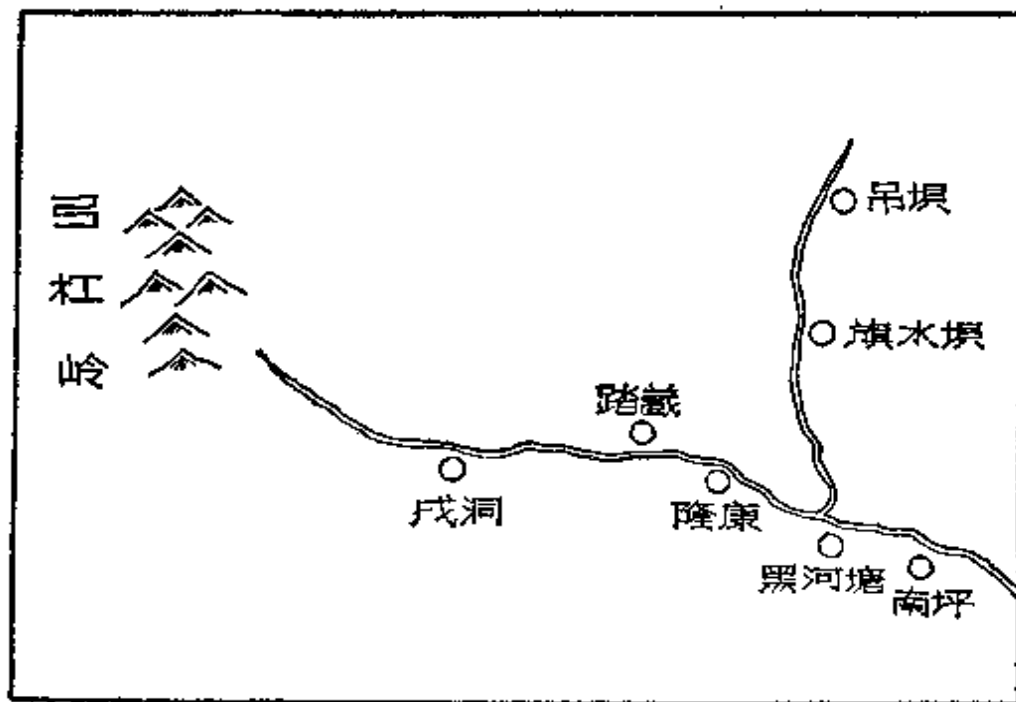
## 八、白水江上源

松潘到章腊，是向北行，章腊以上，我们旅行的方向是由东北而转向正东了。由昌盘寨东行十余里过一喇嘛庙后，即无人烟，必再行一百余里始有宿处。故今日情绪，较往日紧张。二十九日别昌盘寨首途后，途中遇藏人跨马持枪赶牦牛群者四五队，多系为胡师运军粮者。道路尽在草地中，平坦宽畅，驰马最宜。两旁草丛树下，往往有四五具，五六具，甚至十余具一堆的死尸，臭达数十丈外，皆半途饿死之难民。甚有腐烂路中，亦无人过问！此种草路约有四十里，马行仅二小时即到。惟途中有一种烂泥地，往往陷死人马，不知者异常危险。盖此平平之草地，乃一高四千余公尺之山梁，名弓杠岭，为嘉陵江正干之支流白龙江的支流白水江与岷江北源的分水岭。地高泉大，地中往往溢出泉水，

透浸软化地上泥土至一二丈之宽，五六尺之深。然而地面甚少溢出泉水，不知者，误踏其上，即被陷入，难以自拔。惟牦牛过此，可无问题，同伴某君曾被陷入，马几不起。

出弓杠岭山口，下山道路突转急峻。从山口展目东望，但见一片无边林海，一层层向东低下。松潘是一块高地，除了西北方面而外，任何方面向松潘来，都是愈走愈高，从松潘向各地去，除了西北方外，也是愈走愈低。好了！我们的旅行从此以后算是走向易走的方向了。

弓杠岭东坡下一百五十余里，完全是原始森林，笔直的松杉，无间隙的长着。在林中的旅客，很难找到从树梢上透漏下来的大块日光。这个森林不知道已有若干年了，我们只看见在森林里自己倒下来的木材，好象叠床架屋一般的积累着。普通的木材，都有二三尺的直径。因为没有人采伐，倒下来的木材，在下面的已经朽败不成原形了。记者不知道，这个森林的面积有多大，



这里面的松杉有多少株，我一面为在地面腐朽的木材可惜，一面望着正在长着的大松巨杉出神。我想如果这个森林长在天津上海，不知有多大的价值！同时以记者年来旅行经验所见，中国社会各方面废置的人才，也不知有多少，有眼光，有魄力，有才干者，颇不乏人。然而因不得志，因而自我消沉者，不知凡几。其有勉强苦斗，暂维饭碗者，因政治无通达之途，终亦将同现正生长之森林一般，只有归于任其自倒自朽的厄运。

林谷低处，汇水为溪，白水江即发源于此，道路即在江之南北岸行。林树荫茂，盛暑旅行其中，气候如仲春，勒马溪边，引吭高歌，高山迴应，曾不知跋涉之劳矣。

途中烂泥亦多，东来之马，曾陷死二匹，同行幸皆无事。穿林海行三四十里，遇杨土司（积庆）所派为胡师送粮之藏民甚多，有用牦牛载粮，有用背负者，背负者比牛载者为多。送粮伙子中，男女皆有，少女亦负与男子同样重量之粮食，行走亦如男子之急速。女子装束甚简，赤足，短围裤（粗土布为之），粗土布单衣，袒胸，发束为十余条小辫，披于颈后，表现十足之天然美！盖女人美的条件，以近代观点言之，为黑发，大眼，黑瞳，挺胸，大臀，健腿，天足，且须姿态自然。藏女因生长蛮荒，终日爬山越岭，受充分日光、水、空气之陶养，加以长期之劳动，故体力充实，举动捷活，十足的具备近代美之要件。如只以外观美而言，若干藏女，其美丽远在沿海都市上所谓“名星”“皇后”之上。凡自沿江沿海都市来此之朋友，几无不为藏女之纯美所惊倒。

此辈运粮藏人，来自白龙江上游叠部一带，俗呼为“生番”，即为与汉人少有接触，不通汉语，不习汉俗之比较纯粹的藏民，为杨土司所管辖，其与汉人接触甚久，受汉人同化甚深之

藏人，则又无此美态矣。

整整下山走了一天，没有看到一家人家，只吃了一点自带的干粮，开水都没有地方喝。我们真羡慕那些藏人，他们自备小铜锅，带上干粮，要到哪里休息或宿营，就在河边平地上停下，把小石砌成临时灶台，把铜锅装满河水，拾枯木枝作柴，只要片刻，就可以茶开吃饭。夜间完全露宿，只要羊毛衣一件，狗皮一张，后者垫地上，前者盖头脚，不管你大森林也好，大草原也好，他们一样的哪里黑，就在哪里憩。女子也是如此。

这条路真正寂寞，真正长。一直走到黑，才找到一间房子，虽然非常的秽浊，也只好就此住下。地名戎洞，离昌盘寨一百三十里。马皆走坏，记者等亦疲惫不堪，马行一百三十里，本为平易之事，但此时弓杠岭至戎洞之间，因白水江水发，大路多被淹没，且随处有泉水，有烂泥，道多绕行懋林中，马行困难，费去时间甚多。

戎洞只一家汉人，主人共父子两人，嗜鸦片，枯瘦如柴，以种附近二三亩平地为生。室内烟尘满壁，如死人窟，比之藏人之生气横溢者，相去又不啻天壤！

戎洞再东行七十里为隆康，亦为藏人地。在近隆康处，森林始渐稀少，途中村落渐多，惟藏人仍居多数。白水江江流渐大，谷面亦较宽，山势则转高峻。三十日宿隆康一汉人团总家，戎洞以后之藏人，可谓完全汉化，不但习学多少汉语，且多着汉服，他们渐渐放弃了畜牧生活，全恃一小片土地种些青稞来维持家庭，收入异常微薄，与弓杠岭以西之藏人大不相同。他们已经没有了“土官”，政治权直接操在汉人手中，十足的成了被征服的民族，汉人最坏嗜好——吸鸦片，他们也普遍的染上了。这一带的汉人几乎无人不吸鸦片，而此带的藏人也接受汉族“文化”，同

陷于难拔的深渊。这带的藏人有马者已不多，体魄魁梧者，已非一般的现象。女子亦浊陋不堪，对于汉人，绝对听其支配，如垂毙之驯羊。记者虽为汉人，并不敢以此现象为可贺。第一、藏族固有文明因同化而牺牲，不能使之充分发扬，以构成将来新中国文化之一部。第二、此带汉人无有力民族与之竞争，即不能励精图治的促进其体力、智力，政治与经济上的发展。

隆康之上五六里为踏藏。依记者意见，踏藏即沓中，为蜀汉姜维最末一次伐中原时种麦的地方。这里有一条路北通包座，既可出临潭，又可出西固，地势险要，而又可以屯田，现在藏人种植仍极发达，隆康下行二十里至黑河塘，有水曰黑河，自北来会白水江。黑河亦为军事上要道，其重要不在踏藏下。然而山势之陡绝，远非踏藏所能比拟。记者等一行，乃过白水江溯黑河北上，在绝壁下行四十里至旗水坝。路无民居，我们的目的，欲由此再上至吊坝，然后东越青山梁以至甘肃之西固县。抵旗水坝后，遍寻向导，皆无曾行此路者。某汉人保长云，伊在二十年前曾经此路，今已被藏民挖去道路，根本不能通，三十一日遂宿旗水坝。

次日仍回黑河塘，向南坪前进，途中汉人渐多，购买饮食亦较易。将到南坪处，山势紧抱，白水江迂回折曲于顽固之石峡中。大路则凿石崖而过，若干处已成栈道，过一关口即见南坪。南坪虽不平，然而自久行山林之旅行者视之，已算非常开旷之平野矣。

## 九、野猪关和茶岗岭

八月二日在南坪休息一日，更换马匹，略为补充行李等事。南坪为松潘分县，无城垣，仅有土堡。街市亦略具马路形，盖亦

受四川“观瞻马路”之风气所影响。东顺白水江至甘肃文县，须过阴平寨，为邓艾入蜀时，以兵断姜维归路处。南坪往西北及绕东北，皆有路可通西固。惟皆须过大山岭。南坪对外交通，主要者为甘肃地方，风俗习惯语言等，皆近甘肃，故有“南坪不象四川，碧口不象文县”之谚。碧口虽属文县管辖，其经济权尽在川商之手，住民亦大半为川人。

三日向甘肃之西固进发。同伴某君雇轿夫六名，皆系由县当局选拔而来，六人皆吸大烟，皮肤长满疮疖，瘦如骷髅。三里一休息，五里一抽烟，状至可憎。然而南坪附地欲寻不抽大烟之力夫，根本无之，即如此者，亦已经相当选择而来，尚非易得者。离南坪东北行十余里即入山，又几里至一村曰野猪关，已至山脚，再上即登山。山曰野猪关梁，上下山计有三十里，野猪关梁产野猪甚多，大者重五六百斤，常结队五六十为群，出山吃农作物，农民莫可如之何。因此等野猪过大，獠牙伸出口外尺余，较小之树，被其一撞即倒。如以枪击之，中二三枪毫无关系，但猎者如被其发现且被追到，则断难幸免。离野猪关庄上山，山路崎岖，马行艰难，至山中，有歧路，因无向导，任择一路走去，愈前进，路愈不明，惟在丛林深草中试探前进，辗转迂迴，绕过几重崖峡地，竟达一绝壁处。前左右三面皆数十丈之石壁，草木亦不能生存其上，人决无法可登。但绝壁下却有入迹，记者初疑为盗匪聚会之处，后细审之，前面石壁有石缝一条，乃探身视之，竟有洞可通石崖上，单人可以爬行，徒步同伴乃相率由洞中上山，记者与骑马同伴不得已下山，改道再上。下山时，大雨如注，山路滑湿，记者跌倒数次，全身皆染泥污，如此一上一下，已费三四小时。至换路再上时，人马皆已疲劳，而此山上下三十里内无人烟，又不得不前进，行行重行行，腿酸脚软，马亦喘喘不愿

续进。及过半山以上，只见雨在山下落，云从脚底生。再上经十里长之森林泥滑小道，始达山顶。时已午后二时，回首望南坪白水江，仍历历如在目下。过山后，路尤陡急，记者蜀人，尚惯行山路，北国同伴，遇此烂石陡急山路，其痛苦有不能形容者。黄昏始达山麓，约夜十时抵董上庄，遂投宿。

董上已为甘肃境，语言及生活习惯，皆不同四川。但鸦片之毒，其深与四川相伯仲。由此有一小河东流至阴平寨会白水江，再至文县，亦蜀汉时征战之场也。

甘肃境内的民众，比四川要柔驯得多。看到一个外面来的旅客，恭敬得了不得，开口大人闭口大人。最大的原因，是他们自己本身没有武力，只要一把马刀，就可以叫他们屈服，一部分的男子被鸦片烟抽得皮包着骨头，开口一笑，就好象僵尸复活一样狰狞可怕。村庄里的房屋，很少见到充实的住满了人口，各个房子，也没有看到有整刷的气象。一般是没落萧条，因循苟且的过活。村庄的人口日益减少，房舍日益破坏，生活日益艰难。某君自文县来相遇。曾痛谓：中国再如此过活十年，这些地方的人口恐将至绝种了！

四日，迷途同伴尚无消息，乃顺江东行二十里至中寨，打听消息，中寨再东四十里为阴平寨，市集甚大。东北四省未失以前，甘省党参销路甚好，其出产地区为岷县、西固、武都、文县一带。文县之碧口为收货总口，中寨以上之“番地”——即藏人所居之山地，出参亦不少。碧口商人多在中寨有分庄，收买药材，九一八以前，中寨市镇至为热闹，今则党参之大销场已失，且军事繁兴，运货为难，中寨原有之商号，相继撤销，所余数家，亦仅勉强维持，无交易可作，中寨市面亦因此一落不起。市上无一家卖食货的商店，公开零卖熟鸦片烟土的，倒有好几家，



一角钱可以买好几大口烟土，真物美而价廉！

午后知迷途同伴，已仍由大路过山。一行日昨爬过洞口后，继续向山峰爬去，穿过大森林，至全无人迹之大石峰下，始折回原路下山，住野猪关一宵，第二日始过野猪关梁。枉受一日辛苦，走的却是樵夫们砍柴的不通小路。是日夜宿董上西北五里黑格寨。

五日溯小溪北行，路中汉回藏人杂处，藏人见马队至，尽携粮食衣物等避山上。这一天风雨交加，未带雨衣的同伴全身濡湿，苦不自胜。行八十里宿地尔坎，此为一大藏庄，藏人已逃尽，粮食马料皆无处购买。这样的消极抵抗，已给我们无限的苦恼，假如他们再进一步用武力和我们为难，我们虽然可以勉强通过，总得受相当的损失，甚至造成重大的牺牲，亦未可知。这个经验，我们被压迫的朋友，却可以牢牢记着。等到国际战争时，试验试验，看所谓兵强马壮的“兄弟之邦”到底有多大之威风！

地尔坎后，即为驰名川甘的茶岗岭。此岭上下七十里，七十里中亦无人家。此山看去不如野猪关梁之雄奇，至山麓时所见，不过一中等高度之草山，以盘道上升，并无若何之艰险，待到山顶后，每个旅客始皆顿改常态，望山兴叹，盖尚有一架更高山头横阻其前，之字形盘梁道，不知盘过多少次，始达山顶也。一盘、二盘、三盘，盘来盘去，盘去盘来，空马上山，有几匹马已盘得全身出汗，力鞭不前了。好容易，侥幸已到刚才所见的山顶。但是真正的山顶，还在上面！我们最后终于走到了，每一个到了的人，只是摇头，没有什么话说，刚才轻视茶岗岭的，至此连它的名字也不提了。

下山尽在老大森林中进行，树类比弓杠岭复杂，朽木特多。老藤蜿蜒巨木上，远视之如巨蟒。山产细竹，竹干粗大如箸头，

大雪山东坡亦产此，颇美观，适作编蔑器用。六日晚宿半山藏庄茶岗寨。藏人亦逃尽，食粮几不能解决，所能侥幸解决者，不过山芋杂粮面而已。

七日续进，过一大藏人集镇为哈儿河镇，再行，略上坡，即下二三十余里之甘乍梁，人马皆困，乃宿梁下毛儿坪。此地为汉人村庄，语言可通，有菜蔬食粮可买，如入天堂，同伴愁容皆解，约行七十里。

自毛儿坪东出，行数里，出一峭壁组成之峻峡，地势渐平，十里至南于寨，地突见平川。盖此为白龙江之正干，两岸有若干冲积地，故农地较多，青绿宜人也。

南于寨有木桥（如邓邓桥然）跨白龙江，过桥逆行二十里为西固县城，城虽甚小，但记者离松潘以后，此为第一城。刚抵城，适某君自吊坝过青山梁来。记者惊问之，据云，伊系在草坝（吊坝北）寻得一汉人樵夫作向导，此樵夫此生亦只走过两次青山梁，除他之外，汉藏人皆在近十年中无有走过此路者。山之西面，多藏人，皆所谓生番，喜劫杀路人，青山梁以森林密懋而得名，山中无明显道路，只沿水溪行，水发蒸气，不易辨路，须以手电烛之，且歧路最多，不知者误入藏庄，即难得安全。最难者，即上极顶之后，须爬行二三十里之绝壁峭崖，旧有人行路已被藏人破坏，今全须攀木附藤而过，山下亦无路，全系吊坠而下。他们天刚明入山，天黑尽，始行出山。山中时闻怪兽狂鸣，常发巨声。记者本欲与之谈茶岗岭，今闻青山梁情形，不啻小巫之见大巫矣！

## 十、岷河沿岸

西固县设自明朝，原系藏人地。现在县境内，仍以藏人为最多。县府命令，难通行全境。此间布告，系汉藏回三种文字并列。惟藏回民族能认识其原有文字者绝少，除口头命令外，颇难生效。

白龙江源出夏河正南之郎木寺，自叠山与羊膊岭中流出，西固以下，河幅较宽，水流亦较平。两岸冲积地异常肥美，除耕作外，果木丛生，桃柿梨苹果花椒之产量极丰，价廉惊人。乡农自离城二三十里之路程背一大捆木柴至西固城中，只能得价铜元三百文。而银价为一元合铜元五千余文，是一大捆柴，尚不值一角也！农民每年之货币收入，数量渐减，但其支出，如购买布匹、油、盐及纳税捐等，则其货币数量年有增加。

松潘以上岷江沿岸，及西固之白龙江沿岸，皆有煤苗暴露于外，惜皆无人开采，其藏量如何，及其煤质如何，皆不得而知。西固顺白龙江上行八十里有地曰落大，以产金闻名，为杨土司所有，藏人开采不得法，成效不著。

由西固到岷县，从落大东北去，有小路，须翻几架大山，如果顺白龙江而下，过南于寨，至岷河与白龙江合流处之银河口，然后溯岷河西北行，路较平坦，可骑马乘轿。

我们从大道到了两河口。转北沿河西岸行，对岸即为岷县至武都大道，为邓艾入川时所经之路。两岸道路，虽皆名为“大道”，然皆在极不牢固之脆片岩壁上，凿道而行，遇雨后，路即多被冲去，又须重修。自西岸看东岸，因不能见路面，但见路线起伏，上无坚壁，下有松岩，危殆之状，不敢正视。

岷河两岸，绝壁甚多，开路不易，乃以栈道继之。每段长数丈至十数丈不等，其建造方法，系于绝壁上凿上下两排洞孔，每孔相去一二尺左右，每排相间三五尺不等。各孔皆以长短相若之木条插入，然后再于下排木条上立支柱，以接上排木条，使不下坠，上排再铺以木板，板上再铺以泥沙石块，栈道遂告成功。初行此道者，无不有惧戒之心。岷河源出铺县东南之分水岭，至两河口合白龙江处，计长二百三十里，本为白龙江之支流，但《辞源》误岷河为白龙江，不知真正之白龙江，其源在四五百里以外，若干地图上亦载之甚详。最有趣者，岷县南六十里之哈达铺，因在岷河上源，距分水岭三十里。此地本为藏人地方，哈达铺即藏文地名。此地文人因哈达铺今已入“文物之邦”，“番”名不能任其长存，乃根据《辞源》，认岷河为白龙江，哈达铺在白龙江源上，因改名为“白龙镇”，并立煌煌大匾以记之。此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者也。

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先生编纂之中国分省新图（二十三年本），关于岷县武都间之“大道线”，亦有错误。岷县至武都乃顺岷河而下，至两河口，又顺白龙江直下，并不经过西固。经西固者乃小道，绕路远而难行，如再南下欲入四川，则大道必经碧口，阴平寨却非大路所必经。

九日行八十里宿接官亭。所过两岸山高崖峻，易守难攻，昔姜维屡出白龙江以图洮河，不知若干英雄好汉，曾丧命此河中矣。

接官亭上十里为邓邓桥，桥接于两岸断崖上，水流甚急，修筑不易，土人故名“邓邓”以纪念之（言邓艾邓忠父子二邓也），有市镇亦名邓邓桥。记者伫马桥头，回忆一千七百余年前蜀魏战争之形势，不禁发生今昔之感。

甘肃人中上级的人家，以麦面为主要食粮，而一般的农民，只能吃洋芋。（内蒙一带所谓“山药蛋”）他们吃面条，叫做吃饭。我们初入甘境，听到老板娘说为我们作饭，好吃大米的南方同伴，以为有米饭可吃，欢喜欲狂，但是到吃的时候，才知是一条条的面食，始惊诧失望。

甘肃汉人社会，封建积习很深，家庭中的中年妇人，很不轻易和外面男子说话。少妇和闺女，根本就不能随便进入他人的眼帘，东南一带来的军人，过惯了比较开通的男女交际生活，到了这边也是和在东南一样，看了女人称姑道嫂，借东要西，这使甘肃人最为头痛。然而甘肃人对军人和官吏之恭顺，乃为沿江沿海一带所万万不能者。随便一个稍为有一点“公事气”的人，都可以向地方要马来代步。大小一个官，都可以受地方当局的招待。只要背了一把刀，在乡村也可以横行几时，这般汉人太驯良了！

记者所过岷河沿岸之镇集，随处见有欢迎××委员，××长之标语，新旧重叠，似被欢迎者，已不知曾有若干人矣。标语多不通，且沿途所见标语，总不出下面几条内容：“××委员（或×长）是为开发西北而来！”“××委员（或×长）是西北民众的救星！”“××委员学识高超！”“××委员是军事优良！”“××委员是不辞辛苦！”“欢迎××委员保护西北民众！”，……

十日宿宕昌，镇长为一完全汉化之藏人土司。他现已不自认为藏人，虽知其历史者，与之谈其过去统辖藏人情形，他亦作不乐意之回答，盖耻为番子也。

甘肃苛捐杂税之多，骇人听闻。四川以前所谓百货厘金，甘肃名为特税，各县各村镇皆有，百货皆有税，而税又必苛细。

重重苛征之结果，商业自然停顿，岷河为川甘交通大道，所过二三百家之大集镇甚多，除宕昌外，难寻得一较为完备之饭店，且现在尚非军事期中，来往商贾，寥若晨星。特税之功，当在不小！

宕昌以上，地较平坦，农作面积加多，然肥美之田野中，以鸦片最为主要！此时正收获期中，烟果林立，阡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苦勤，采此毒汁。

六十里宿哈达铺，十一日仅行六十里。十二日向岷县进发，但见旷野无边，山有脉而平平，绿草青山，平川漫水，未垦之地尚多，行三十里有小山凹，即所谓分水岭。但是这个分水岭的形势，可不单纯了！这里是所谓岷山山脉的正干，是所谓北岭山脉的脊梁，岭以北的水流入黄河，岭以南的水流入长江，我们虽然入了甘肃境，走了将近千里的路程，然而还是在长江流域中，过了这里才是黄河流域。这里离海平面在三千公尺左右，合华尺约一万尺，比大雪山矮两千公尺，本是平凡的地方，没有奇峰，没有异岭，然而它却是南北两大河流的分脊。

## 十一、洮河上游

记者十二日到岷县，朋友们留住盘旋了四天，直到十七日，才动身赴洮州。

岷县为昔之岷州，地当岷山山脉北麓，城位洮河曲折处南岸，为川甘大道必经之处，现为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驻防地。鲁及邓宝珊部为现仅存之甘肃汉人军队，鲁部纯为甘肃西南狄道、岷、洮、武都、文县一带之子弟兵。鲁之兴起，乃在十九年中原大战之际，冯玉祥军队尽撤至陇海路上作战，甘肃后方空虚，盗

贼蜂起，鲁得南京委任，只身由四川成都经松潘，过草地，来至洮河上游，改编民团，收束土匪而成。鲁在成都时，曾求与邓锡侯合作，邓以其无势力，未加重视，不知鲁终组师成立，并曾击败邓部于川甘边境。惟鲁于初起时，颇收纳青年知识分子，及其得势后，遂不复如前此之虚心迈进，现其所处环境甚为困难，军饷不充，枪械弹药不足，而其内部又缺发扬之气象，满招损，谦受益，人在善于自谋而已。

岷县风气最淫，妇女皆讲究装饰，妇有外遇，并不受社会道德之制裁，群认为当然，无足为怪。俗说岷县境有金童玉女二山，风水所关，故人事不得不如此，此当为无稽之论。

此间县政府之“班头”，闻名各县。一切县政，非得班头同意，决办不通。班头下乡，乡人必设香案迎接，县长亦无此威风。城内街市住宅，凡较为宽敞壮丽者，皆为班上人所有，故有“大门皆班”之谚。然而所谓“班上”者，不过县府之行政警察，何以有如此大势力，此则中国县政制度若干年来已养成如此变态形势，至今日益形厉害。中国各县县政，素无完善之表册、规程及记录等。一切县政，全在经手之胥吏心中，世代相传，班头等形成一种“肉表册”，关于县政情形，除彼等外，即难有人知晓。故作县长者，多仰其协力，因而权势益重，搜括日多，浸成中上之家。“钱”“势”相互影响，其魔力愈大。现在之县长随时更换，而班上人员，则永无调易，故乡人不重视县长，而重视班头；得罪县长，充其量受几个月的罪，得罪班头，则恐终身均不能安宁也。

东南人士，每谓西北荒凉，意识中似乎认西北都是沙漠一样，想起都可怕。其实，西北沃野正多，宜于人类生活之地区甚广，只因地位不同，气候有别，它的外形表现与生活方式，和

东南各省区有若干异趣处而已。以甘肃而论，我们普通在地图上所看见的，伸在蒙古青海间长长的一块地区，酒泉（肃州）、张掖（甘州）、武威（凉州）一带，西面延伸到嘉峪关、玉门关，似乎应该是最不适宜人生活的地区，然而事实上这是甘肃省内最肥沃的地区。这里雨水很少，然而却有雪山溶解下来的雪水，可资灌溉，致成异常宜于种植的地方。甘肃的主要出产是米，即南方的大米，这在东南人士听起来多么诧异。陇南一带，因为有渭水上源及其支流的灌溉，白龙江、西汉水、洮河、大夏河更纵横其间，农田之利，所在皆是。只有陇东平凉一带，因无河流之利，农事比较困难。如能凿井开渠，陇东之前途，仍未可限量。

记者十七日离岷县，西溯洮河前进。洮河两岸，好一片冲积平原！此地直可以用机器耕种，洮河之水，如能自上源顺山脚开渠下引，则洮河流域能有四川成都平原上“灌县形式”之水利。开渠成功，则洮河两岸，可改成水田，南方人士移住此间，再不会有无大米吃的痛苦。

可惜得很，这片平原上，鸦片烟占了主要的面积！我们中国人似乎大家还嫌死得不快，一齐努力来生产毒品，加紧摧残我们大家身体的工作。一般农民，自然不知道什么复杂的问题，他们完全在经济和命令支配之下活动，我不懂这般负责任的当局，为什么这样发昏，纵令大家去自杀！

这样肥沃的平原，而在平原上生活的农民，却穷困得惊人！近百户人家的村庄，几乎鸡蛋都买不出！所谓客店，除有空炕而外，什么都没有。当晚我们宿的西大寨，已在洮河北岸，行程五十里。所住的旅店，是冯庸先生不久以前，才住过的地方，店主也是兼营农业的，他疲劳而颓丧的对记者谈，这个生活



真不容易，从前象洮河两岸的川地，每亩值洋二百元，现在二十元也没有人要。粮食一年一年的不值钱，而开销一年比一年大，做庄稼能赚下自己吃的粮食，就算是上等，大多数是赔了人工，赔了辛苦，赔了肥料，结果还增加了自己的债务。所以洮河平原上的地主有把土地白送给别人种植，不要租金，不要其他任何报酬，但求能代为支应他那块土地上应出的“公事”（即捐税摊派等），即算了事，然亦无人接受。

十八日仍循洮河北岸行，翻越两架上下二十里左右之山梁，即到临潭。临潭为旧时洮州，有新旧二城，旧城在新城西北六十里，临潭县治设新城，因城内有潭水，终年不涸，故名临潭。

新城为一周大近二十里之大土城，四出皆漫坡小岭，水草丰美，宜耕宜牧，南隔洮河三十里，为汉藏回三族杂处之地。过城外商业繁盛，市场比栉，自十七年国民军与河州（即临夏县，为西北回族大本营）回军发生冲突，遂扩大为回汉民族之斗争。焚烧杀戮，互为鸡犬之不留。是年回军马廷贤兵败过洮州，洮州回民暴动，迫走县长，围城屠汉民，城内外房屋，被焚一空。民十八年马哈希顺率回民再至洮州，焚烧藏民村落，杀戮藏族人民，于是两族互相仇杀，互相焚掠，藏族在洮河上的第一大寺院卓尼寺，被回军焚毁，而旧城回教新教（关于新教，详下）之教堂，本与回军无关者，亦遭无情之火灾，遂至洮河上游北岸所有城池、寺院、教堂、村庄，不论汉藏回三族，皆成焦土！即以洮河区而论，被焚杀人口在十数万以上。而汉藏之间，又因鲁大昌与杨土司之冲突，时发生刺杀事件。经此事变之结果，藏族大本营之卓尼寺，因被焚烧殆尽，杨土司乃迁其政治中心于洮河南岸之拨鱼，向北岸筑碉堡，以为警戒，因杨土司所辖之藏民主要部分

在洮河上游之南岸及白龙江上游地区中也。汉族素无坚固之团结，亦无负责统一之指挥，变乱后，惟各别逃还故里，苟且重渡简陋之生活。惟回族除新教徒外，旧教徒皆不敢回家，因新教徒未参加暴动，对汉藏感情皆好。旧教徒为暴动之主力，回军退走后，彼等无武力之支持，恐汉藏人对之施行报复，故不敢“上庄”（即回家再从事耕种之意）。然而回族素来强悍，逃亡在外面之回民，年来皆准备武器，互相团结，他们提出口号是“武装上庄”，就是又要重演种族间之战争。记者至临潭时，回民因得某种政治的凭借，活动甚力，他们以难民之资格，要求“武装上庄”，汉藏人民皆群相惊惧，谋所以自卫之方，苟任此迁延下去，此间之种族纠纷，将愈弄愈大也。

## 十二、杨土司与西道堂

在临潭休息一日，二十日至洮河南岸访问杨土司。洮河与白龙河之间，为终年积雪之叠山，树林懋盛，山势重叠，因以得名。杨土司受封于明代，世袭已十余代，至现在土司，其家族殆已完全汉化。现任土司名积庆，号子瑜，年在四十左右，受甘肃省政府委为洮岷路保安司令，其司令部及私人住宅，原皆在卓尼，有大喇嘛庙，曰卓尼寺，曾盛极一时。十七年回乱后，迁浞鱼，浞鱼在叠山山脉北麓，洮河南岸，为一幽美恬静之村庄，离卓尼寺十五里。记者过洮河后，山风袭来，冷不可支，经数重碉堡，始到浞鱼。杨氏住宅即为司令部，司令部门前颇缺乏振作气象，其所率军队，曰“番兵”，皆为藏民，既无组织，又无训练，有事调之出，即以乌合之形势而临阵，枪械、弹药、粮食、马匹，皆为自备，故难有统一行动。杨氏自练有特务营一营，以为

护卫，完全照汉军编制、装束，惟精神不振。司令部大门内放有迫击炮数门，尘土已满。相见后，杨氏以极流利之汉语相寒暄，其院内及客室中布置，完全如汉人中上等人家。其用以待客之酒席，完全为内地大都市之材料，烟茶亦为近代都市上用品。杨氏衣汉式便服，衣料亦为舶来品之呢绒等货。记者颇惊此边陲蛮荒之中，竟有此摩登人物也。

杨氏聪敏过人，幼习汉书，汉文汉语皆甚通畅，对于藏语反所知甚少。喜摄影，据云已习照像二十余年，其摄影之成绩，以记者观之，恐非泛泛者所能望其项背。杨氏足未曾出甘肃境，但因经常读报，对国内政局，中日关系事件，知之甚详。

杨之经济与政治基础，至为薄弱。藏民之在洮河一带者谓“熟番”，对杨之赋贡，每年不过以“什一”之比例，提供其牲畜而已。其在白龙江上之藏民，每年仅纳现款二百钱，洮州银价，每元合五千文，是藏民每年对土司之赋贡，尚不到五分大洋也。此外藏民打猎所得，如虎豹之类，亦有贡纳之规定，然所得无多。杨氏所处之社会，为牧畜到初期农业时代，而其生活之消费，则已至近代工商业鼎盛时期。生产与消费相差之时代，当以千年计。杨氏经常来往商店为上海先施公司，为上海柯达公司，货物通用邮寄。尤以其对柯达公司有二三十年长期交易，信用卓著，即不汇款亦可以请公司先行寄货，且已屡试不爽。以如是之收入，作如是之支出，则其人不敷出之差额，必异常巨大。赖以挹注之方者，惟其自己派人直接经营之土产贸易。每年伊必有大批党参运卖天津北平等地，近年来市场阻滞，此种收入逐渐摇动。

政治思想方面，杨之趋向，倾于接受汉族文化，承认汉族统治，对鲁大昌之情感，虽甚恶劣，而对甘肃省府与南京国民党

中央，则绝对服从，对胡宗南部之接济，极卖气力。惟其对藏人之统治，则采完全封建的、神权的方法，毫无近代有力的政治机构，更丝毫无民族主义之意识。

但杨与记者谈过去一般汉人对彼之态度，辄摇头不已。凡与杨氏及其部下办理任何交涉之汉人，几无人不视之为野蛮愚劣之下等民族，而以愚弄、欺骗、恐吓、压迫等方法取藏人之财货。正谈话中，适有藏兵送报告至，杨氏看毕叹息，转以示记者。视之，则其第一团团长姬某所呈报告。姬团现住白龙江南岸之杨布大庄，有某委员至杨布大庄视察碉堡，姬团整队欢迎，并妥为招待。次日，某委员问姬团长索虎豹狐狸等皮，及鹿茸麝香骡马等，姬团无以应，乃推该地不出产上述各物，某委员大怒，立命限于一日内筑成一百余座碉堡，否则呈报上峰究办。

杨土司生于安乐，无发奋有为之雄图，虽其有为藏族前途努力之机会，亦视其自身是否善于利用之耳。

杨氏晚间更对记者谈其处境之困难，请记者为之代办数事。伊仅有秘书长一人，无参谋人员，司令部中此外更无助手，当不足以言发展。次日临去时，杨谓近十年来英美法人之至其辖区内调查者，已有二三十人，甚有在其家中住居一二年者，中国新闻记者之至其境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言罢，不禁唏嘘。

二十一日冒大雨绕道卓尼回临潭，马行甚滑，下山尤难。次日，雨仍不止，二十三日始首途赴旧城。沿途所有村庄，只剩颓垣一片，其回家者，亦寥寥无几。下午三时许达旧城，城内外亦只残败土墙，家屋全好者无多，可以想见当时种族仇杀之惨烈。

记者在新城时，即闻旧城有回教新教，曰“西道堂”。到旧城后，即往访教主马明仁并有关系人物，对于该教之全貌，略得其概况，而认为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运动上，皆有值得重大

注意之必要。

新教之发生，完全为旧教之一种反应。西北回民所奉之回教，其教律极严。宗教隐然支配政治、军事以及一切社会活动，而宗教上之主持者为“阿訇”（即教主），教堂视所辖区域之大小，其权力有不同；阿訇视其所主教堂如何，而有高下之差别。回民信仰宗教，其一切行动，皆以回教堂圣经为准绳。

新教的组织是根据清真教（即回教）教义，而以中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中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为宗旨，比较的偏重于文化方面。新教教主，不是世袭，而是由全体教民公推。道堂经济，系由该道堂内所经营管理之商业农业而来。所有属于道堂者“概为公有”，悉用于道堂建设、教育及一切社会公共事业。教民为该教堂服务者，各尽所能，分工合作，但生活方面“一律平等”。其在教堂经营范围之外，私人经营事业者，要求道堂援助，教堂量力所能为之。经营结果，如赚钱，则除还本道堂外，利益对分。如赔本，则道堂再给以资助。此行不通，再改行，必安置其适然之生计而后已。赔累时，道堂不再索本利。道堂外之教徒，其不能谋生者，由道堂救济之。该道堂重视教育，凡该教教民除受回民教育外，并注意国家教育，无论农商各界子弟，幼时均须受小学教育。学校不足之费用，由道堂担任。毕业后，择其优良者送中学或大学。他们教民间的婚姻，无财聘，只先征求两性之同意，然后父母及介绍人呈明教主，请阿訇照清真教古礼，诵经完婚。这是近代的新式婚姻。现在新教徒还不甚普遍，堂内外合计，不过二三千人。然而他们的势力，确乎不小。商业势力，西至西藏，南至四川，北至青海北部，东至察哈尔等地，操这一带的经济大权。新教徒无业游民，人人皆有饭吃，而且吃得一样。

### 十三、行纯藏人区域中

次日别旧城，西北行，又进入纯藏人区域。承杨土司派员护送，沿途由藏兵引导，有通司翻译，故通行尚不困难。

藏人骑马技术，实有惊人独到处，护送记者之一藏族青年，曾为记者表演上下山跑马。普通骑马是上下山都要慢慢的行进，因为上山时，马最吃力，故须慢行，下山时，人最吃力，亦须缓进，甚至上下山皆下马者。然而藏人却有一谚，恰与普通情形相反，“上山不跑非马，下山不跑非人”，他们的意思是说：上山跑不起，不是能马，下山不敢跑，不是能人。那位青年得了通司传达以后，回头向记者笑笑。只见他略整缰鞍，皮鞭响处，马蹄风生，马鬃直立，马尾平伸，顷刻间，即上山头，略无喘气，待我们后面马队赶到后，他又扬鞭一挥，怒马直狂奔下山。他安坐鞍上，到山下平地，始勒马回头向记者等招手，其英勇豪迈之姿态，令人神往不置。

在这种生活下面，骑马打枪，当以年富力强者为上选，老年人血气已衰，当然无力和青年人竞争。藏中人重少轻老，就是这个原因。老了的藏人，在自己觉得精力已衰的时候，就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拿来，请喇嘛念经，念完后，尽以施舍，自己则到山林沟壑中等死，往往尚有未确死者，其家人即弃之河中，行水葬，或悬之树间，行天葬，他们以为早点葬了老人，是最道德的。“敬老尊长”，是农业社会成功后的道德观念。农业靠天时者最多，关于天时之认识，非经验多者不能有把握，故俗有“不听老人言，一定打破船”之谚。但是到了工商业社会，社会情形复杂，科学与知识，日新月异，今年所知者，到明年往往已有大大变化，只有

青年才能真切了解新环境，应付新环境，老年人的地位，又因此不能再维持了。

藏兵好勇，平日即喜佩剑骑马打枪，枪法最准，其命中点多在要害，与之对阵者，无不有畏惧心。但因其无组织，一切皆自备，故行动乃以个人需要为转移。粮食完了，他就回家去再行预备。弹药完了，他也就个人回去了，自想办法。如果叫前进，他们是蜂拥而上，无计划的自由放枪。如果被对方打死几个，大家遂一哄而逃。他们打仗，如果第一次冲胜了，那他们的骑兵遂漫山遍野而来，能够将对方完全消灭。如果第一次失败了，他们就会一败涂地，自相践踏，再也无法收拾。所以有组织的军队和他们战争，没有不打胜仗的道理。但是这些藏兵如果以近代方法加以组织，更装备以近代物资，再贯输以新军人精神，则哥萨克骑兵之美誉，恐难专美于欧洲也。

四十里至下弯哥罗，有杨土司部下总管驻此，款记者等以酥油炒面，西康谓之糌粑。酥油即牛油，质料甚好，惜制造不得法，腥臭难闻，人口即欲呕。炒面为青稞麦粉炒成，粗涩不能下咽，其吃法系先盛热茶于碗中，以刀切酥油大片投于茶中，使之自行溶解，先喝茶数口，然后放入炒面，以手和之，至油茶面三者皆已完全混合，成为干面团为止，即以手捏小面团而食之。藏人及习惯此种生活之汉人，皆食之津津有味，记者亦能勉为其难。惟护送记者之某君，闻味即不能耐，强劝之食，食仅少许，其眼泪几已夺眶而出，亦云苦矣。

又十里至上弯哥罗，有藏民十余家，再上即为全无人家之荒野草地，且为杨土司与拉卜楞黄正清司令辖区之交界处。藏匪与回民之化装藏匪者，常于此荒原中杀人越货。因杨土司之关系，故上弯哥罗又有藏兵来会，数十骑藏马驰骋平川草地中，只

有青山绿野相伴送，他们高唱藏歌，时见山坡羊马群中，发出少女歌声与之相答和，歌声婉转，清澈柔媚，歌中似有万般浓情者。

为避匪计，向导引走草地小路，四十里完全为原始草地，无巨树，无丛林，山间小溪边随处有小野兽、豺狼、崖獾之类，其数直以千百计。近陌务寺处，经一大平野，草深及马腹，大鸟甚多，不知其名。

傍晚抵陌务寺，有大喇嘛寺，已为拉卜楞管区。寺院规模甚大，夕阳返照中，金光四射，立使人感到另一环境。此间可谓为完全藏人势力，寺院中喇嘛为最高阶级，汉回两族另在寺院前划一地区居住，视为化外，如清朝初与西洋通商时，对西洋人的态度一样。汉回人在此有种种之义务，而却无权利可言。平川中草地，绝不许汉回人牧畜，然而寺中喇嘛夜间闻山中鸟噪，不能成眠，则尽驱汉回人起身，至山中为之赶鸟。

民族关系不能得适当的解决，彼此所受痛苦，其性质正复相同。

陌务汉人，设有小学校一所，有学生二十余人，有一校长兼教员兼工友之先生，所教课本，有幼学，有论语，有千字文，有国语教本，有生物自然等，古今并列，甚为可观。先生为一客店老板，记者与之谈话，觉其不似教育界人，乃叩以成都之所在，答不知！再叩以西安，亦不知！乃书以示之，恐口音不懂也，而彼仍不知！叩其待遇，则全年小学校经费，教师薪水在内，共为二十五元。合学生之贡献，年可得四五十元。此亦为甘肃教育界之奇迹。

藏人无姓，多随其主管官长取姓，杨土司境内之藏民，多姓杨。往往有解汉语之藏人，如叩以姓氏，则多作有滑稽性之答



复：老爷（指问话者）姓什么，我姓什么。汉人如此，当引为大怪矣。

在陌务宿一夜，次日续进隆洼，计程六十里。藏人正于田中收获青稞及豌豆蚕豆等作物。男女杂沓，红衫辉映，一双双，一对对，情歌缭绕，呼应和答。他们的男女关系，比汉人之受重重礼教束缚者，要美满得多。

行十余里，忽见后面山上，数十骑骏马飞奔而来，并狂呼作声。记者不知所以，乃勒马持枪实弹以待。及近，见为首者滚鞍下马，经通司介绍，始知为陌务红布（红布为官员，如汉官中之总管）杨步云。其家离陌务十余里，今晨知记者过，特来相送者。并希望记者下次再至时，下榻其家，盛意可感。

二十五日驻隆洼，路过卡加，两地皆有喇嘛寺。路行山谷中，不复有大草原。计程六十里。二十六日遄赴拉卜楞。隆洼藏人甚穷，红布亦不能吃酥油，只有茶和炒面。寺中喇嘛始有酥油佐面。经堂课毕，披红袈裟之喇嘛，成队出院，老幼不齐，傲步山上，口中犹喃喃作声，手运佛珠不绝，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不知果作何景象也。

藏民有一种运输制度，名为乌拉。凡有公事，运物载人，即由当地红布派出牛马，逐站转送。记者本无公事，惟同行某君之马，前蹄已坏，不得已请隆洼红布派马一匹，送至拉卜楞。红布不解汉语，全恃通司传译，而通司往往自作主张，故双方真意，颇难明了，幸此君为一青年分子，英武豪俊，与记者相处甚好。二十六日晨，一藏妇牵马至，面有泪痕，皮衣亦已多破孔，惟其中之红里衣尚鲜艳夺目。问之通司，知此妇三日前新丧其夫，其夫在时，两人甚相欢爱，今死后，顿感孤单，终日痛哭。此间红布之部下，又强派之作乌拉，故更自悲痛耳。记者因调

查乌拉之派法，名虽有轮流之规定，实即藏人总先使汉回居民负担，万一不足时，始摊派藏人之贫苦无力者。此种官官相护，扶强削弱之现象，不图于藏族中亦有之。

## 十四、大夏河回藏两要地

过一上下二十余里之山陵，计行六十里至拉卜楞。拉卜楞寺为川甘青康边境最大之喇嘛寺，教权支配区域甚广。有活佛曰嘉木样，现任嘉木样系西康理化人。汉姓黄，现其全家皆住拉卜楞，其兄黄正清被任为拉卜楞保安司令，掌军政大权，其弟数人，亦皆被指为活佛，分掌教权。

拉卜楞本为青海循化所管辖，民国十七八年时，青海回军与拉卜楞藏军冲突，黄正清败走，与嘉木样逃兰州，寺院几为回军所焚，后始由甘肃省府划拉卜楞入甘肃境内，另设夏河县，此为刘郁芬主甘政时事。

拉卜楞为寺名，寺院规模甚大，有喇嘛近千人。其寺院建筑，远视之如洋楼，红墙金顶，光耀夺目。初至此者，直如身临十里洋场中。寺院独成一区，普通人不能居住，东约三四里为商业地带，为汉回藏经济中心。其贸易之大宗，为出口之皮毛，人口之粮食杂货。南番（即在拉卜楞南部一带之藏人）每年秋季，以大宗皮毛运至此间，交易粮食布匹而归，每年贸易总额，约二百万元，商业权十九在河州（即临夏县）回人手中。

黄正清与格桑泽仁友善，颇具有相当近代知识，人亦精强有作为，他曾组织一藏民文化促进会于拉卜楞，并创办一藏民子弟学校，惟规模不大，成效无多。盖藏民多黄教，黄教在事实上使藏族大多数之男子尽作喇嘛，喇嘛不结婚，不事生产，终日念

佛，只知消费。故藏族之经济，无由发达，人口只有减少，绝无增加之可能。经济上，人口上，黄教给予藏族之前途，以致命的阻碍。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朝，努力奖励黄教，并不是一番好意，乃是促进西藏民族之衰落，以免边陲多所顾虑耳。

藏族女多于男，故男子有供不应求之势。拉卜楞为藏回汉三族杂集之地。汉回人在此经商者，多为单身男子，而从拉卜楞四乡来拉卜楞市交易者，以女子为最多，因此事实上形成一种极随便之男女关系。因与汉回人经常接触之结果，藏人女子亦渐习于修饰，如洗脸洗澡施用脂粉等事。藏女对所喜悦之男子，能毫无顾忌的与之交往，家庭社会均不以为怪。不过，此间尚未形成固定之娼妓制度。黄正清曾下令禁止藏女之绝对自由的性行为，而事实所至，功令终无效果。此亦为黄教之流弊。从根本上更正，始能望藏族之男女关系，走入正轨。

记者二十八日离开拉卜楞，顺大夏河谷地东北行，行一百四十里，出土门关始得开旷地，二十九日更行六十里至河州。河州是中国西北回教圣地。中国西北回教中主要的宗教、军事和政治人物，以出于河州者为多。城池并不特大，且在平原地上，亦不险峻。然而河州之名气，却震动西北各族人之耳鼓。回人听到河州，非常的高兴，这是他们的老家，是他们财产的集中地，是人口的集中地，是各种运动的策源地。河州虽然是甘肃的地面，因为宗教和种族关系，却由青海军队布防。河州人除对甘肃负担各种捐税之外，又要负担青海的各种需求。城内汉人较多，城外几尽回人。十七年国民军与回军在河州作战的痕迹，至今还可以清楚的看见。

三十日记者在河州休息了一天，三十一日又首途走兰州，打算终结这一段的旅行。

河州所出产的水果蔬菜，记者在成都平原上所见，亦不见得比之优良，价格也非常便宜。以南方社会的工作收入，到此地来消费，必能使你不胜其舒服。

河州到兰州有两条路，一条是东路，一条是北路。北路乃顺大夏河至永靖，连过两次黄河，达到兰州。东路则须过大夏河和洮河，并须越牛行山、陈家山和尖山子三座大山。北路较远而平，东路较近而有山。记者闻东路住宿较便，所以走的东路。以东路来说，河兰间的距离仅二百里，因为站口关系，分为三站。第一站走四十里，宿牛行山上的锁南坝；第二站宿洮河渡口东面的埧坪；第三天就可以到兰州。

河州东北行十里过大夏河，有桥，过河后，即上黄土质的牛行山，再行三十里至锁南坝。这个牛行山一直到洮河西岸为止，计长九十里，山路甚平坦，走起来不甚困难。

河州的鸦片实行公卖，每条街有几家明挂招牌的营业处，旁边往往配上“清水香烟，货真价实，小本生意，欠账免言”这几句坦白的附语，在乡村里，也是如此。据记者调查，所谓“清水香烟”，多半是汉人作顾主。汉人善吸鸦片，不能不算特有的本事。

在牛行山上向四面了望，山峦起伏，景象万千，因而引起了记者对于所谓“山脉”起了问题。普通多认“山”有“脉”，山是从一定的地方发源，也和水一样，向一定方向进展。这种说法，其实不大合理。第一层，我们要问，山是怎么成功的？山是否有一个地方发源，和水一样向四方流出？水势就下，山势也就下么？一般都说亚洲山脉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分为若干支，向东西南北伸出，我不懂山的“源”是怎样“发”法。是液体向四方流出，遇冷然后凝结成功的么？这当然不是的。记者看牛行山及其南北的高地，见此原为一片黄土层的大平原，经若干年风雨

的冲刷，被冲洗的部分，一年比一年低下而成为谷，成为溪，余剩下来的，就成所谓“山”。我们看在各河发源的地方，地势是高的，然而地面却大致平平。越到下游，山往往越高，峰往往越奇。这却不是山长高了而是谷被水冲深了，故反映到山势峻拔，这是水冲成的山。第二种，完全由地层之突变，如地壳之断层作用，好好一片平地，忽然一面坠了下去，剩下的一面遂成了山。火山爆发，也可以成山。总之，山者不过各种形式之高地而已。山并无脉，俗说某某山脉者，其每段地质构造，地质年代往往都相差很大，自无从谓是“一脉相连”。事实上所谓山脉，不过若干高地彼此巧遇相连，结成一线之分水岭，遂姑以之为“脉”耳。

九月一日午后过洮河渡口，渡口为回民所主持。对汉官恭维毕至，随到随开船，对回民同胞亦关照周切，取价廉而过渡快。独对于汉民留拦拖延，敲索重价。汉民过此者，非候两三个小时不能过，而且每人带牲口过江，须出渡资四五角之多。记者所过全国渡口已不在少数，未见有如此之不合理者。

过江二十里宿幔坪。此地全为汉人住户，惟汉人嗜鸦片者过半。精神萎靡，中毒已深，此种恶果，不知将遗中国前途以如何重大的创伤！负责播毒者，是否曾计算自己应负罪咎之重大。

此间妇女缠足，小不及三寸，走路必沿壁行。可怜，又可恼。

河州境内，道路平坦，牛行山上，路亦开凿宽大，洮河以东，路全借山涧自然之形势，毫无修理功夫可言。二日连过陈家山与尖山子，即见黄河在北。河南北两岸，平畴沃野，绿林村落，精神为之大振。快马加鞭，兴高采烈，盖五十日之长途旅行，三千余里之跋涉，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也。

（一九三五年九一八纪念日草完于兰州）

## 第二篇 陕甘形势片断

### 一、长安剪影

记者于途中，读杜少陵丽人行，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之句。又读其曲江三章，见有“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以为长安城中，必定富池沼之胜，有如北平之三海，南京之秦淮河玄武湖者。然而当记者于十月中旬到长安以后，遍游长安城内，不见有可以供丽人游玩的水边，而所谓曲江也者，尚在今长安城南三十余里之遥，且只干沙沟一片，既无菱，又无荷，根本无从枯折起。纵有风，亦不会有涛来。问之长者，始知唐代长安，远比现在长安为大，中包曲江池，池边殿榭星罗，池中波涛荡漾，菱荷丛生，故杜诗常吟此。惟丽人与曲江二诗作于唐天宝年间，距今不过一千二百余年，而长安之景象，竟已逸乎少陵意境之外！一代文章，其所记述者乃当时当地之事物，故单知文章，只算接近知识之初基，必对于实际之事物，加以体察，始能得乎知识之真途。以现代事实附会古代文章，或以古代文章曲定现代事实，皆不明乎时空之关联，将使客观事实与记述事实之文章，彼此相去愈远。

日前长安市面，与国内任何省会以上的都市，有其相异的外观。一般都市都在经济没落中叫苦，独有长安却呈现急促的繁荣。商店的数目，和各店中的贸易额，皆有极大的增加。建筑事

业更如雨后春笋，异常活跃。土地价格从每亩十数元，暴涨至数百元，甚至千元以上。旅馆业尤为兴盛，无论大小旅馆，欲求得一席之地，亦殊有“长安居，大不易”之观。

长安繁荣，系以陇海路通车为主要的因素，而“剿匪”军事中心，由成都移至长安，亦为重要的助力。铁路直达长安以后，外来货物，不必再由潼关用汽车转运，这里省去了一笔汽车运费，和在潼关转车时的起卸费，减轻了长安市上货物的成本，因而市价一般的低落，增加了市民的购买力。铁路伸入关中，对于关中农产品的收集，既在交通方面增进了便利的程度，同时运费的减少，使渭河流域的农产品在潼关以东的市场有更大的竞争力量。

交通经济发达的结果，则目前成为交通上起卸点的长安，自然相因而至的有多量货栈、旅馆、饮食店等建筑的需要。建筑需要扩张，地价亦因以增大。加以西北“剿匪”总部之成立，整批西来的军事政治人员，与平大量的前方部队的供给，在衣食住的消费方面，皆给予重大的兴奋，形成了长安的非常景气。

从市政上看，一年来长安的进步，直可谓一日千里。主要街道，已一律筑成碎石路，小街僻巷，从前大坑小坑镶成的路面，现在亦通成了通车无阻的坦途。

但是长安繁荣的里面，却包含着严重的事实，这个严重事实，决定了长安繁荣是暂时性的发展，预示着若干时间后的衰落。因为目前的长安，是以单纯消费景气和暂时“剿匪”景气为实质。江西南昌曾以“剿匪”而盛极一时，同时在红军离去江西以后，南昌的景气，亦被他们带走。而且就一般情形看，陇海路送到长安来的货物，以日常直接消费的制成品为多，生产日用品的机器，却非常之少。这是表示关中货币，无希望的流出，隐

示着社会金融紧迫的前途。诚然，在交通用机器方面，有较大数目的进口，而且特种大规模的工业，如咸阳酒精厂等，亦消纳机器不少。不过，交通用机器，只作用于日常生活品之沟通，而不能作用于日常生活品之制造。建设厅创办，由吴伯馨先生主持之咸阳酒精厂，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为非常重要之企业，而对于日常生活品之自我供给，仍有其有限的范围。

随着土地价格的飞涨，长安市内和陇海路西延线的两侧，所有土地，几尽为土地投机商所把持。往往有凭借政治力量操纵土地，转瞬遂成暴发富翁。更有凭恃政治势力，以兼营商业者。官厅法令，对此等营业，亦往往无可如何。如某记者在西北饭店中，遗失珍贵照像机一事，不但店方若无其事，毫不置理，即治安当局亦因环境关系，颇感难于下手究办。

社会的发展，如果脱离以一般社会福利为中心的正轨，让钱与势交相为用的集中于一部分人之手，必生不平之鸣。杜少陵作丽人行以讥唐明皇时代大官贵人之骄淫恣逸，非亲尝此种滋味者，诚难了然于其用心之苦。（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

## 二、兰州印象

东边的朋友们对于西北的想象，总犯两种错误。一种人是消极的态度，总觉西北是荒凉与苦寒，难宜人类生活，因此不愿到西北来。一种是过火的乐观态度，受报章杂志不真实的宣传所影响，以为西北已经开发建设成了一块崭新的地区，争先恐后的想来观光瞻仰。后者可以说中了报纸杂志的毒害，到西北以后，没有不失望回去的。四川某长途汽车公司经理，因为听说西北公路交通的发展很为迅速，特为到西北来考察，等他走过西兰公路



以后，很丧气的对朋友说：“四川的公路虽然不好，我现在也不能再说不满意的话了”。

西北气候，自然一般的较为寒冷，然而寒冷之中，也有适应此种环境的生存方法。并且象兰州这样地方，在冬季比较平津的气候，却还要温和一些。

兰州高出海面一千五百余公尺，本入高寒地带。只因黄河由青海东流，横断黄土高原而过，冲刷成为东西行之大谷道，河之南岸且冲积成南北广六七里之平野。兰州城位于平野之北边。冬季西北风作，皆由黄河北岸高原上直过南原，故兰州城市区域，不甚感受西北风之袭击。

在历史上，汉代以后，汉族对于西北各民族之征伐或抗拒，多以兰州为极西之支撑点。即到现在，兰州仍然成为汉族在西北与回蒙藏各族交往之中心，自政治方面言之，中国汉族现在政治力量西部之极限，仍以兰州为止。北过黄河，西过洮河以后，军政权力，尽在回族手中。

如果拿中国全国来看，兰州是中国的中心。说也惭愧，我们现在实际的中心点，已东迁到襄阳。而且依今后的形势看，我们能否保持以襄阳为中心这样一个圆面的领土，似乎还要看我们今后斗争力量的强弱！

西北各省的交通，兰州是一个总枢纽地方。新疆与内地之交通，必要过兰州。青海与内地交通，也要过兰州。从兰州东北通宁夏，西北经甘、凉、肃以通新疆，西通青海。更由青海西南，为人藏大道。南溯洮河转顺白龙江至嘉陵江而达四川。东南出汉水，由汉中以通湖北。东过六盘山或由天水顺渭水东下，可入陕西。所以在新疆与内地交通未隔绝以前（现在表面未隔绝，而实际上客货皆不能自由来往），由四川湖北陕西运往青海新疆及

西部外蒙古等地之货物，络绎于途。而由青海新疆运至内地之皮羊牧畜等土产，亦异常畅达。故当时之兰州，客商云集，客店货栈盛极一时。

自新疆事变迭起，经济上，新疆十九已入苏联经济范畴之中。对中国内地之经济关系，无形停顿。故内地作西北营业之商人，不再来兰州，新疆土产，亦不再至兰州交易。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大恐慌以后，海外市场疲滞，青海皮毛出口业，亦受到重大影响。一般社会的购买力，亦相因而大形减退。故青海经兰州之进出口贸易，皆高速度的低落。兰州本以“过站”的关系而繁荣，到了各路交通都停滞的时候，它自然也无法维持其旧观了。

兰州之经济地位，高度的衰落之后，所剩下来的，在政治上还是西北方面的中心（至少甘宁青三省）。西北本来地广人稀，工业和农业都还谈不到。支持政治军事的经济力量已远不如前，而政治军事经费的需要，却未曾减少。这一个矛盾的事实，逼迫甘肃财政走到“实际的重税政策”，甚至不得不依靠鸦片为首要的进款来源。重税的财政形态，当然加速商业的停滞和农工业的不振。而一般人民之生活，自日渐趋于暗淡。

一般社会经济的紧迫，逼着知识分子只有向军政两界拚命的挤进（教育包括在政界内），因为这样才有大家可能的前途。但是在这里，甘肃的知识分子，遭遇到一个特殊的难关，即是甘肃的军事政治久已脱离了甘肃本地人的掌握，政治上支配甘肃的，十九是来自六盘山以东的力量。因而第一、第二、乃至第三第四等的位置，亦大半为东来的朋友们所占有。甘肃本地的朋友们的环境，可谓窄路中又逢隘道，出路更加困难。

我们在兰州各机关所遇到的办事人员，本地籍贯的朋友太

少了。本来甘肃因经济的衰败，与交通的不便，已少训练近代人才之机会与力量，更加以参加政治之机会又因上述之关系，异常不易，则训练人才之可能，亦日渐其稀微。

客观的事实，逼着甘肃的朋友走向两种倾向。在已有相当政治地位的人，只有好好的应付各方面，只求圆滑的无过，敷衍过去就算了事，并不敢大刀阔斧的“创作”，以求事业的成功。在尚无地位的朋友，往往采取恭顺的态度，希望得一点进身之阶。其能坚固团结，以集团力量，正面争自身之出路者，似尚未曾多见。

兰州社会，薪水阶级是第一阶级，军政界的职员，尤受一般社会的崇仰。这些老爷们（社会习惯称呼阔人者），又往往吸收本地女子，配成家室。政局变化一次，老爷跑掉一批，遗留积累下来的太太，与时间成正比例的增多。以本地男子谋生尚感不易，本地女子生活自然更加艰难。

兰州是西北一部分的代表，这些事实显示出我们西北朋友们的前途缺乏光明。如果我们的社会生活打不出一条生路，我们个人迟早也必陷入破产的深渊。无办法的等待，或一味的希望着他人，决不会有美满时期的到来。（十二月十六日）

### 三、对于西兰公路之观感

东北事变以后，一般国人的眼光又注意到西北上来，从报章杂志宣传讨论，到要人的视察，专家的设计，以至于实际建设工作的进行。“开发西北”的声浪震动了一般国人的耳鼓。农林、牧畜、卫生、水利，几乎应有尽有。尤其令一般国人感到兴趣的是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交通之完成。这条公路是沟通陕甘，

联络西北各省的陆路交通的干路，在陇海铁路未完成以前，西兰公路占西北交通上最重要的地位。亦为“开发西北”以来，所表现的最大结果。

因为这条公路的重要，所以由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西北国营公路局来直接经营，从筑路到行车都是经委会直接管理。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经费，主要是来自美国棉麦借款。棉麦借款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败有其重大的加速作用，故西兰公路之经费，其来源与普通经费的性质，大不相同。在“开发西北”高唱入云声中，由国家直接经营的西兰公路，自然大大的影响于西北民众对中央政府之观感。

这条公路的建筑与开办，据说曾用一百四十万的巨款。记者两次通过西兰公路，承各站的朋友们指示和帮忙的地方不少。但从沿路民间方面所流露出来的舆论，一般旅客们的批评，乃至记者所身受，与乎直接观察所得，觉西兰公路之现状，实在不如东方人士所想象之美满，尤与西兰公路自身之宣传，大相径庭。记者本爱护西北交通之诚意，敢将见闻所及，忠实的布露于关心西北交通者之前，并以供在此公路中负责的朋友们万一的参考。

西兰公路在今年五月一日正式通车，但是西安到兰州的汽车交通并不是在五月一日以前没有。商人汽车往来于西安兰州间者，为数且相当的充足。所谓五月一日通车之西兰公路，是以下述三种意义而出现：第一、私人营业汽车在五月一日以后不得自由行驶；第二、西兰公路另筑有较为合用之路线，供私营汽车行驶之用；第三、在国家经营之下，因力量可以较为充分，发展较为便利，而从西北国防之观点言之，主要公路之国家直接经营，尤有其特殊的效用。

防止私人资本之自由竞争，以免大资本之独占交通事业，

或就国防的理由，而收公路为国营，当无可批评。但吾人所欲研究者，为国营后之西兰公路，其内容究竟如何？兹仅就筑路工程与行车以后之设备，分别论之。

在未有国营西兰公路以前，商业汽车之行驶路线，大半随大车路略加修改而成。而大车路之十九部分，皆为左宗棠征新疆时，所辟大道。西兰间道路所经地区，有几个重大的特点：第一，石料缺乏。西兰路全长七百余公里，计一千余华里，惟六盘山附近，有石料可采，其余皆为黄土与沙磧地。第二，西安与兰州相差千余公尺之高度，其间完全为一黄土质倾斜地面，这块地面上，大小土沟，随地皆有。此种土沟，在夏秋雨季，往往山洪暴发，立成巨川。而冬春干季，则每每随处可以过车马，而不须桥渡之劳。故在此种地区修筑公路，有其特殊的状况：第一，在高原上或沟地（或曰川地）中行车，根本不必如何修理，即可行驶，而所谓修路，亦仅略划路线，即可竣事。上原与下原之坡路，虽须开修盘道，但开凿土坡，颇为容易（惟平凉以西之六盘山盘道，不在此限）。第二，因黄土松软，路面易坏，而且山洪时发，路基亦常受影响。第三，碎石面之敷设，太感困难，故通畅平达之公路，非有大规模之工程，暂难实现。第四，坚固的桥梁涵洞之工程，需要甚切。因整个路面之碎石化，暂不可能，而横越大沟之桥梁，与通过小沟之涵洞，则不能不求其坚固。盖在雨季中，无坚固之桥梁涵洞，汽车通行困难。即在干季中，如桥梁涵洞不备，上沟下沟之间，所费时间、油量，皆不经济。

西兰公路通行如此地区，其所遭遇之环境，远比其他公路为特殊。以仅百余万之经费，自不能期望全部碎石路之出现。但是一般舆论颇有烦言者，在西兰路以一百余万之巨款，所做出之成绩，实在太难令人满意，因为西兰路上最大工程，以泾川县汭

河桥，六盘山盘道，和华家岭山道为主要，其余仅为平地上整齐黄土道路，与上下土原之凿土坡工程，并非重大工作。华家岭为三百余里之长土岭，岭上开路，工程不小，但是此岭大道原为国民军时代所开，并非西兰公路所新辟。六盘山凿石所成之盘道，中外皆认为巨石，但完全为华洋义赈会作成，并非西兰公路之力。泾川县之汭河桥，工程亦大，但其三分之二，亦已为华洋义赈会所筑成，西兰公路仅补筑其未完成之三分之一的部分。尤其予人以口实之处，即在西兰公路所续筑汭河桥之三分之一，完工通车不及一月，即为水所冲倒，而华洋义赈会所修筑之三分之二部分，迄今已数年之久，尚屹然未丝毫动摇！

即就土路工程而言，公路所占用民地，自与各省公路相同，为无代价之征收，然而对于沿路修路之民工，却非劳动服务性质，而有相当之工资。按之实际，此中弊病，尤为人所传道。如定西段与隆德段之土工，则系由县府征工。静宁段一百余里，则系由驻军兵工完成，据当事者谈，此段仅得一千余元之代价。平凉又有包工办法，议定工价若干，若干日完成，所有工人皆自备粮食。来自数十里外不等，每日必俟监工到达，始能开工，监工一去，即须休息，故平均每日午前九时始开工，午后三四时即停工。而工价又必须在收验土方之后，始能发给。乡农根本不知土方为何物，只要几天粮食吃完之后，就根本不能支持，且各人农事紧急，不能久待，而工程人员方面又坚持土方未完，不能自由离开，终于逼成工人逃散现象。于是包工之实惠，尽归人当事者手中！

一般桥梁，由木板架成者多，涵洞又既小且少，决难以当山洪之冲刷，故随修随塌者，在所常有。西兰路五月一日通车以后，正是雨季，新路之路面与桥梁可行者少，故十九仍走旧路。近

来冬令地冻，始改走新路，然而新路因未曾用碾压紧，路面凸凹不平，车行其上，忽高忽低，宛如乘风破浪之势。

西北旅行，最感困难者为食住两项，西兰公路于主要车站附设有旅馆食堂，不能不谓为旅客设想周到之至。但是实际上仍大非其然。监军镇（即永寿县）、平凉、静宁、华家岭、定西各站之旅馆食堂，记者皆曾亲尝其滋味。以旅馆言之，设备比私家旅馆为简陋，呼唤茶役，比请托朋友尤难，而费用则比一般旅馆为大。食堂只优待司机，旅客买饭比讨饭尤不易。而且其物价之昂贵，其招待之马虎，简直出人意料之外。

西兰路之汽车离开车站以后，司机成为无上之主宰。旅客直等卑弱之臣民，狡黠之司机往往用各种方法，使旅客不得不予以种种之赠送。如上坡，常故意说车力太小，命客人下车推车，待客人下车以后，彼乃一气开五六里、七八里不等，然后停车休息，使客人狼狈步行而前。或则故意耽误时间，使旅客着急而莫可如何，甚或故意弄坏机器，借此休息，置旅客利害于不顾。

就驾驭汽车之技术言之，西兰路之司机，多为上选。惟其所得报酬，最多月薪为四十元，食宿全由自给，每月所余无几，故不得不求另外之收入。且每月每人行车次数之多少，丝毫不影响于薪金之所得。故意弄坏机械，反为自求休息之方。

司机之待遇既薄，不能令其安心工作，而各站对于司机之管理又差。各站长之对于机械明瞭者不多，司机每以机械上之假理由，以要逼站长。如故意开放水门，而谓水箱已破，不能行驶，站长亦莫可如之何。甚有站长只知敷衍司机，不管旅客利益。如某君由静宁搭邮政车赴兰州，计两日程，其第一宿点应为定西。但于达到华家岭站后，遇西来车数辆，时仅午后一时许，

最多午后四时，此邮车即可到定西。然而司机们因有私图，计议即住华家岭，乃商之站长，站长答以：“只要你们负责，我无所谓。”某君当时提出抗议，谓华家岭驻军甚多，住宿无处，且司机不按站住车，太不顾旅客利益。站长因其人单势孤，毫不置理，但谓：“站长有调车全权，旅客不能过问。”某君无法，徘徊街中，后由驻军予以通融，始得过夜。

总之，西兰公路之现状，颇难令人满意。从旅客声中，流出两种口号，对路曰稀烂公路，对车曰气车。盖谓路既不好，而凡坐车者无不生气也。（十二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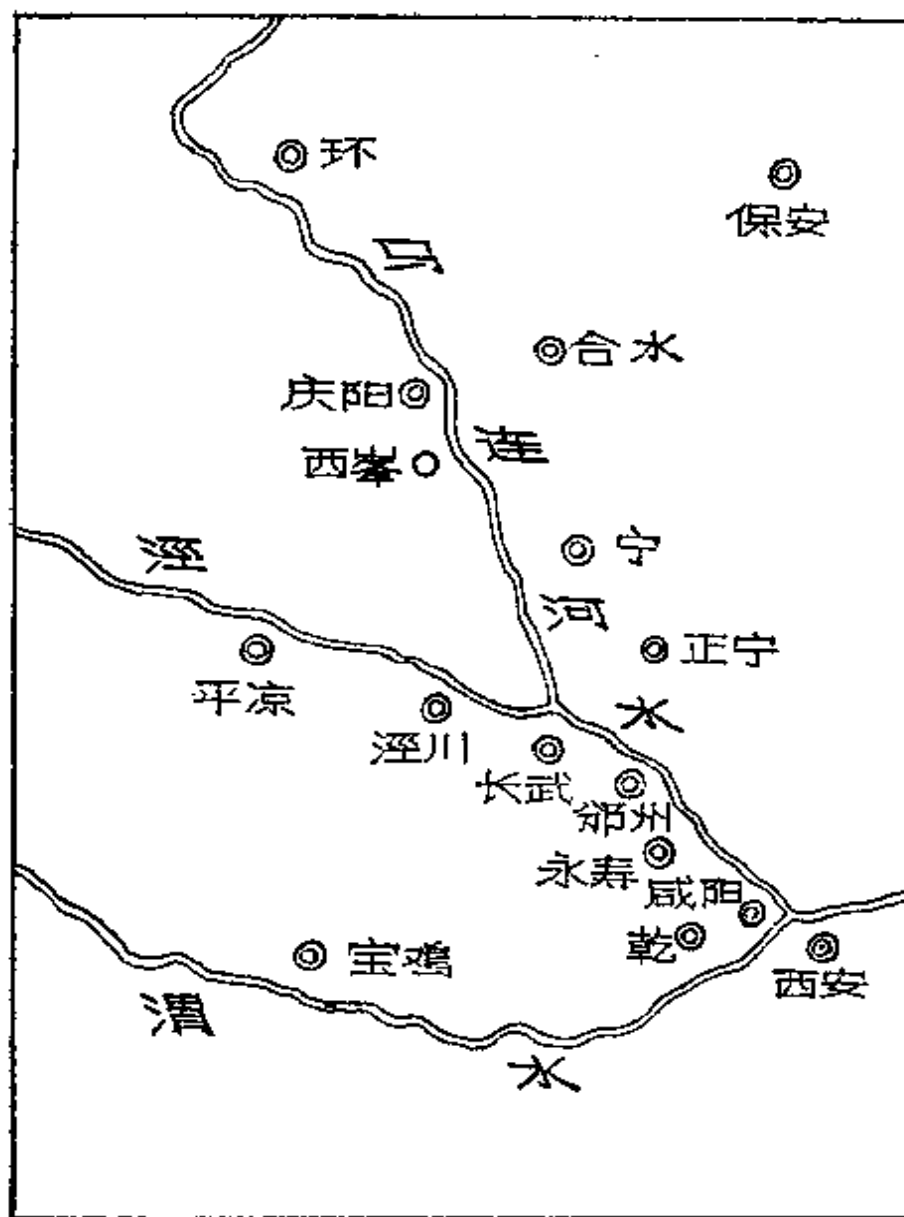
## 四、陕北甘东边境上

### （一）凭吊古战场

中国汉族从渭水上游发祥，后来顺水东下，蕃衍于渭水本流及泾水流域。再后又由渭水流域，扩张于黄河中下游，北及白河流域，南及长江珠江。然而随着汉族的东进，藏族、回族及蒙古族，亦交替扩张其势于泾渭流域之间，于是演出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战争。周代的犬戎，唐代的回纥、吐蕃，宋代的西夏，都在泾水流域和汉族作过大流血的战争。不过，自海外交通发达以后，汉族对外关系，已由西北大陆移至东部沿江沿海一带，陕甘交界泾水流域的地方，始渐失其繁荣。然而自刘志丹纵横陕北，徐海东与毛泽东相继过甘入陕之后，陕甘边境上之情况，又渐为一般读者所留心。

记者于十一月二日离西安，因友人之便，特往陇东庆阳一带旅行。经咸阳、邠州、长武，于四日安抵庆阳之西峰镇。次日即





遭一场大雪，气候突然巨变，东来人颇感难安。

陇东宁县、庆阳、合水、环县一带为泾水支流马连河流贯的地方，这里是平均一千五百公尺左右的高原。一望平野，难寻半点山丘，只是高原上的雨水，汇流冲洗若干年后，在高原中已刷成无数的深沟峻谷，如从沟中望原上，又觉有层层高崖罢了。

宁县为唐代古城，狄仁杰尝为宁州刺史。城西十五里，尚有高

丈余周约半里之秦太子扶苏墓。庆阳东北五十里，有公刘庄，有沃田数百亩，号天子掌，相传为姬周发祥地，至今仍任其荒芜。庆阳西南八十里有秦霸岭，相传为秦穆公走马会西戎处。西峰镇北彭原里，有唐肃宗时郭子仪李光弼之点将台。庆阳东有宋代范仲淹任环庆节度使时旧宅遗迹。北城楼之镇朔楼，亦为范仲淹与西夏对抗时所建。城东北一百八十里，更有大顺城，为宋庆历间西夏内侵时，范仲淹以计筑成者。合水东百余里有驰道，为秦蒙恬斩山湮谷，上达上郡（陕北），下通咸阳之大道遗迹。顺子午岭起，南至关中，北抵河套，俗称为“圣人条”，传为秦始皇筑长城时所开运粮道路。

有谓周之先代，曾建都于庆阳，惜记者旅中无参考材料可资研究。惟距今三千年以前，马连河流域，已为汉族活动的主要区域，实无可疑。自二千一百余年前的秦代起，此一带即成为汉族与西北各族争战之场，尤以宋代与西夏在环县、庆阳一带战争最多，九百余年前范仲淹、韩琦曾在此间为赵家天下，立下若干汗马功劳，故所遗宋代战迹特为普遍。

记者到庆阳一带，正是秋末冬初，十数万大军，转战于地广人稀之黄土高原上，进无足用之饮水与粮秣，退又为大势所不容，因忆范仲淹有塞上吟二首，虽时代与内容不同，而对于作战军队之描写，却仍恰到好处。其词云：“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 （二）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马连河为陇东北高原地带之泄水沟，此黄土高原上缺乏森

林，地质又不能含蓄水分。在雨季，往往山洪暴发，而在旱季，不但河水如丝，随处可以涉渡，一般人之饮水，亦成问题。最普通之饮水来源，系挖土窖储蓄雨季中之雨水而成。凿井往往太深，非普通人之经济力所能办到。环县以北，因河水来自宁夏境内产盐区域，其味苦而咸。窖水之用更大，乡人一季所蓄窖水，即供其一年之饮用。如发生旱灾，或有大批军队过境，耗水过多，窖水告竭，则乡民往往取水至数十里之外。

居住方式，则地下窑洞，多于地上房屋。往往有所谓村落也者，地面上并不见有房舍，而地下却有若干人家。窑洞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系在黄土断崖边，并列向里掘入，成为若干互不相通的单窑。又有自平地掘入，先成一大平底四方阱，然后从四壁各自向里挖成若干单窑，更自阱外地面掘斜洞以通于阱中，成为过道，亦俨然有院落之形式。土窑冬暖夏凉，除光线与卫生问题，值得相当研究外，殆为西北上最理想之住居办法。窑洞上可以行人马，可以走载重大车。从近代防空设备之观点言之，西北之窑洞，且将为一般住所之模范。

环县、合水接近陕北地区，往往四五十里始有三五人家，土地荒芜极多，农地尚多在粗放的三轮种植时代。在陕北边境上，牧畜比耕种为盛。

此间无土地之农民甚少，但因地广人稀，大地主所拥有之土地，其面积之大，实可惊人。往往以山或川为计算大地主所有权所及地区之单位，如云某某川为某人所有，或某山至某山为某人所有。彼此之间，亦无精确界限。庆阳城中有数大财户，拥有数条川道土地，究不知其面积有多少。当其盛时，但知有牛八百万头，羊一千二百万只。如以牛作五元一头，羊作二元一只计算，则其货币财产当为六千四百万元。

过去军事割据时代，马连河流域偏僻之区，军人与贪污土劣相结为恶，无限度的剥削农民，环县、合水、保安一带，因对外交通闭塞，剥削方法更新，往往一担柿子，通过街道，须纳税四五角，全担柿子之本价，或不及此数。鸦片烟税每亩抽四五十元，而每亩产烟之全价，亦不过如此！庆阳一县，从前每年收入不过四万余元，而每年支应军费在十二万元以上！此种额外收入，皆非法取之于民间。贪污土劣更从中多方勒索，积数十年来之事实，已使此方农民得一深刻之观念，即一切政府机关法令委员等，皆以“要钱”为本质，故对政府根本失去信仰。

地方教育尤落伍可笑，各县皆无中学，高等小学已为最高学府，主持高小之先生，必授“学而”、“先进”、“诗云”等科目，始受地方欢迎，如教“科书”（即“教科书”之俗称），则此先生准有打破饭碗之危险。故此等小学中，往往有三十左右之老学生，仍对新旧知识，一无所知。其父兄则尚往往以其子弟系“学而未进”自慰。

### （三）刘志丹之鼓动与民心之背向

由于交通之隔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东接境地区之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平日除有提款委员以鞭笞与他们间或相见外，其他可谓与政府无丝毫关系。狡黠者往往利用此种社会背景，啸集山林，一以敌抗官府之无厌征求，再以图一般有为分子之共同出路。故此地带素为绿林豪杰活动之区，驰名中国各省之樊钟秀，与曾在西北盛极一时的陈国璋，皆发祥于此等地区。即刘志丹亦曾在此一带作团旅长等职。不过在刘志丹以前，所有绿林运动，总不外以个人荣运为目的，以义气为互相结合之“水门丁”，尚无大

的政治系统为背景，无与社会打成一片之政治组织，无一贯的社会政策，更无所谓政治目标。

然而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社会运动。他针对着政府的缺点，来宣传组织民众。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牛羊予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再加以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百里以内之民众。

此次毛泽东以不及万人之疲惫的徒步之师，截击与追击之者，不下数万人，如跟踪以入陕北，不但毛泽东一路将散亡大半，即刘志丹之老家，亦将大受影响。然而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晨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之苦境中。彭德怀于洞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作猛烈反攻，追击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此种反攻之动作，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

目前国民党政府在陇东北庆阳一带，针对着刘志丹的政治工作，作两种政治设施：第一、在消极方面，澄清吏治；其次、在

积极方面，著力于交通、保甲、道路的举办，这是希望配合军队，对赤色运动加以制裁。

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

（十一月九日）

## 五、渭水上游

### （一）西兰空中所见

一般地理学家多称陕甘两省为高原，而德人李希霍芬称陕甘地势为盆地。记者此次由兰州经天水至西安，往返空行一周，觉陕甘地势，颇为特殊。兰州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天水一千一百公尺，西安则仅四百公尺，由西到东构成一大倾斜面。以陕北、关中、陇东、陇南四部而言，这一块地势，大体言之，西南北三面皆以分水岭之姿态而作成边围，把这个范围以内的水，大体以东南，正东，东北三个方向而流注，更东以入于黄河。所以从海拔的高度看，这块地方无疑的是高原，而从地势的构成上看，又无疑的是盆地。我们很可以称陕甘地形，为高原盆地，或者盆地高原。

但是我们一想到“原”字，就容易与“平”字发生直觉的联系，以为“原”一定是“平”的，然而在陕甘高原中，除关中一部，尚多比较完整的原地外，其余部分，大半已经“原”而不“平”了。如单单从空中观察，除六盘山、关山有明显的山形外，其余皆为黄土高原，中间夹着无数的大沟小沟，大体总算平

坦。然而凡是在地面上走过的人们，没有不感到这种上下于破碎的高原，辗转于大小土沟中之艰难崎岖，实在这块高原的年龄，大概是太老了。长年累月的雨水冲洗，把好好的黄土高原冲得四分五裂，人类生活活动区域，主要的已不在原上，而反在沟中。所以从整体来说，现在的陕甘高原，已经只有“高”而不十分的“原”了。

我们十二月三日午后三时三十分由兰州起飞，由定西通渭这条路，飞向天水。由一万一千英尺的高空，降到六千多英尺。起飞的时候，天气本来很好，到了通渭附近，忽然六盘山那面飞来黑压压的乌云，东北两面的天空，立刻变成暗淡，不一刻，我们前进方向的天空，也被乌云所笼罩，看看我们的飞机快入危险境地了。这时候我们的青年飞行员陈蔚文君回头来向我们笑笑，表示他的镇定，把飞机忽上忽下的避开云雾，最后把我们的飞机降到山谷里，整个的躲在云的下面，依山谷的曲折而前进。我们的机翼稍一差迟，就可以和山崖“接吻”，然而赖我们青年飞行员勇敢而谨慎的操纵，我们于黄昏之前，安然到达了富于历史意味的天水城。

从空中看到的渭水，只是一条沙溪，村落和城市也小得可怜，美国大空军主义派的领袖米奇尔将军力主“战舰无用论”，谓空军发达以后，海上耀武扬威的巨型战舰将不值完备的空军之一击，记者对于他的见解，颇有相当的同情。

在天水、甘谷一带盘桓了五天，八日午后三时，又搭机赴西安。天气很好，机身升到九千多英尺，才从陕甘交界的关山的北面飞过。关山的阴面积着零乱的白雪，间或在山崖上看到一二家人家。过了关山，我们沿着渭水北岸向东直飞，下面是平坦广阔的原野，中间稀零的点缀着大体成方形的村堡，渭水南岸被白云覆



罩着的秦岭，好象撑天屏一样，和渭水成平行的遮断了我们向南的视路。秦岭的北坡，一片白雪覆盖了大地，要不是地势高低之间，以及涧谷村落露出一一点褐黄色，我们简直看不到除白色以外的任何其他杂色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对于在冬季从关中过秦岭回南方的旅客心境之描写，可谓深得其实况。

十日我们又由西安飞返兰州，仍过天水，离西安时，天气本来不好，过武功县时，在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上空绕了一个弯子，继续西行。此时西北方面一团团的白云，直向我们猛冲，我们左避右躲，好不容易才接近了关山，而此时的关山整个的藏在烟雾里，看不出一点空隙让我们飞过，高度表已经表示出一万一千英尺，我们还没有找到过山的缺口，没办法才改道走关山的南面，循着异常曲折的渭水峡谷，倾斜着机身，蜿蜒前进。通过关



山之后，飞行士对记者表示，亦认此次为“几乎”了。

## （二）天水甘谷半旬游

甘肃人说到天水，就等于江浙人说苏杭一样，认为是风景优美，生产富饶，人物秀丽的地方。现在的水天是由六个城合并而成，最有历史意味的是“伏羲城”。我们现在虽然在考古学上还未能具体证明“伏羲”的时代，和他当时社会的内容，然而汉族最早的传说和神话，都在渭水流域，特别是在渭水本源的上游，这却无可怀疑。

汉族是否由中央亚细亚来的，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到汉族比较成长的时候，和汉族的基本地盘——渭水流域——接近而成长起来的民族，却有三个：北面的匈奴；西北面的突厥，西南面的藏族。在汉代和汉族争雄的是匈奴。在唐代，回纥称雄西北，同时藏族势力也很大，所谓“吐番”还曾经一次威迫京师长安。唐肃宗中兴以后，当时的藏族还散布于渭水上游一带，其势尚不可侮。杜甫于肃宗时流落到秦州（即天水），到处见藏人势力之雄厚，深发其对汉族民族主义之深忧。其所作秦州杂诗中云：“州图领同谷（即成县——记者），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又云：“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其寓目一诗云：“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可以想见当时藏族势力的普遍。其表现民族情绪最高者，为日暮一诗：“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将军别换马，夜出拥雕戈。”似乎当时情形，藏族跃跃欲动，汉族武力一旦松懈，即有为藏族所乘之虞。

唐肃宗时，距今不过一千一百余年，而现在之渭水上游，已无复有藏族丝毫之踪迹。且民族自大之思想，已为民族平等之思想所代替。杜甫今而有知，亦当自笑其所见之不广。

我们三日到天水，四日骑马游甘谷。两城相去一百一十里，路循渭水上溯。冬季渭水上游，水势甚小，河底十九干涸，但见一片流沙。唐代对西陲用兵异族，多遵渭水大道。杜甫吟天水东门楼云：“万里流沙道，西行过此门，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可以表现当时渭水大道上兵役之频繁。然而亦因战争要地的关系，所以天水一带多出名将，汉代威震匈奴的李广，即籍隶天水，蜀汉时代承继诸葛武侯的姜维，亦天水人士。

由天水西行，道路尽在山谷中左右，南北两面，皆为土原，自谷中望之，如两列高山，土原亦有不等距离的断间处，中即为小溪，即为岔道。此种情形，最宜用伏兵。因军队之主体，必须由谷中行动，断续之原上，行进困难，而在高空侦察未发达以前，对于岔道谷口中之伏兵，最难搜索，无论对于前进，或后退军队，伏兵皆能发生重大的作用。诸葛武侯与司马懿争渭水上游时，常用伏兵战法，这与地形构造有特别的关系。

四日住八十里之关子阵。沿途土地肥沃，而农民则鲜有殷实气象。五日越渭水曲折处之关山（与前述关山同名——记者），山为土质，上下三十里，山上积雪甚厚，呼气成霜，须眉尽白，至此人生又多一番经历。三十里下山至甘谷，甘谷原名伏羌，县设于唐代，即征服羌人（羌人即藏人——记者）而设之城邑。此种侮辱藏人之地名，当不能再让其存留。

甘谷风景甚美，城西通武山大道之南，为一大致连续长数十里之大石壁，高达数十百丈。近城石壁上，刻有高八丈余之大石佛像一尊，并有观音卧像一具，异常壮丽，不知为藏族之自制，或者为当时汉族统治者羁縻藏人的一种设施。其余石壁上亦皆凿有石屋，为清以来汉人避回民暴动时之藏身所。至今仍为攀登不易之避难地。

最可痛心者，是渭水两岸这样平坦富饶的川地，农民竟被政治经济种种力量，逼得遍种鸦片！沿途村镇，无不百业萧条，而我们在路上却常遇到三五十成队而行的鸦片贩子！

这时在松潘回师的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三十里铺。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记者去年过松潘时曾见过胡氏一次，只觉得他喜欢住山上古庙，和有些人不大相同。所以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不住甘谷城，住的是居民不满三十家的三十里铺，而且不是三十里铺的民房，是三十里铺半山上的一座小庙。我们到庙里去看看，他住的正殿，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他会他的部下，就在寺前山下的松林里，把地上的雪扫开，另外放上几块砖头，就是座位。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的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到使人有点茫然了。

### （三）民间传闻的军事

陇南各县，最近曾经徐海东、毛泽东两次通过，民间所传作战情形，颇多与公报者大有出入。记者时正读清严如煜之“行营日记”，内中谈清室官军与白莲教（农民暴动之一种——记者）作战情形，颇有一二与近今传闻相近者。因择录之，以供读者之参考：“今则将不知兵，兵不顾将，每派一路剿贼，无不以兵少为词，不得不益之以乡勇，及至遇贼接仗，则以乡勇为冲锋，以精兵为自卫，”……“贼势……出没自由，往来莫定，我兵迎击

者，忽变为尾追，如能躡迹追擒，彼亦将自顾不暇，无如领兵官离城数十百里，遥闻贼住，则与之俱住，贼行则与之俱行，竟如护送一般。以贼之远去为幸，前途滋扰，若与我无干。至派往各地堵御官兵，原恐有贼窜来，便可带兵夹击，岂知闻贼一至，便闭营自守，幸而贼不攻我，便可贪天之功。”……“贼去一二日后，方始放炮开营，于附近各村庄内将被贼弃置之难民，歼获数人，偶尔遗忘之器械检得数件，以为某处贼匪被我杀退，即行稟报邀功。”……“于是人人爱命，处处效尤，有贼之处无兵，有兵之处无贼，贼不畏兵，兵反避贼。”……“官兵过境，每多骚扰闾阎，民间竟指官兵为红莲教，以为比白莲教为更凶。其不能约束士兵，亦由于各将官平日畏死贪生，无以服众，使兵得挟其所短，号令不行，如此行军，焉能决胜？”（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

## 第三篇 祁连山南的旅行

记者继甘陕旅行之后以近百日时间，旅行祁连山的南北，盖深信此段地区在二三年或五六年，难免有重大情况发生。此种民族关系复杂，社会情形特殊，外交环境日渐错综之地段，如何能尽可能的客观的表露其中之实况，或者对于一般读者了解西北未来局面上，不无补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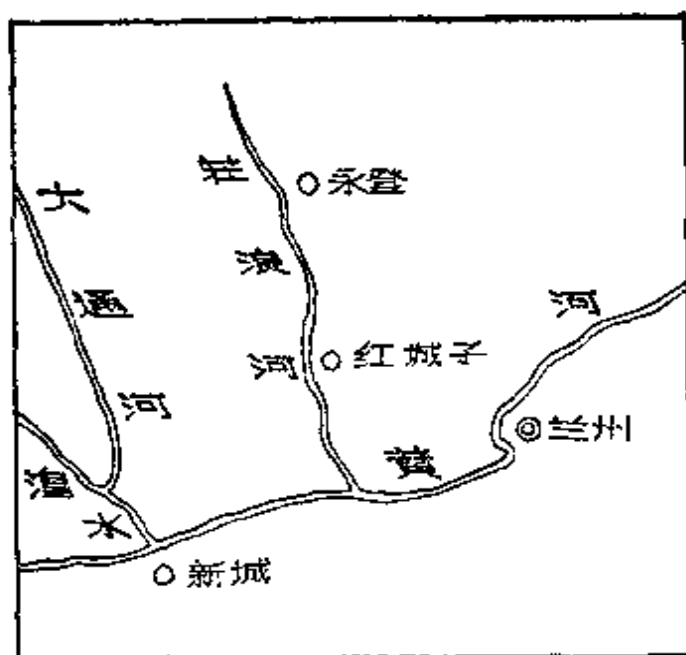
### 一、兰州永登间

记者久有人青海一行之意，欲代一般读者亲历青海以观究竟之劳。然而两种原因，使记者屡欲行而未果：第一，历代诗人对于青海的描写太坏，容易给人以凄凉的印象，减少前进的热力。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兵车行》中所谓：“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又柳中庸之《凉州曲》云：“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襟；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明代郭登诗云：“青海四年羁旅客，白发双泪倚门亲；莫道得归心便了，天涯多少未归人。”读了这些诗，我们心目中总会觉得青海太过于边荒，入了青海，至少有充军到西伯利亚那样的滋味。因此，在准备上不能不羈延。第二，我们在甘肃所得关于青海的印象太坏，似乎这里完全在上古野蛮时代，外面去的人的生命似乎有百分之六七十不能保险。据他们确实指出说，某某人什么时候在青海失踪，某某人被活埋，据

说这些都是防止青海消息向外泄漏，对付外面去的观察者的办法。记者本亦视生命如草芥之人，惟总觉得必须保持生命到能完全将观察所得报告给读者为止，始不负此一行。故研究入青办法，颇费时间，后经多方接洽，始得相当头绪，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承友人人青办理税务之便，乃同伴赴青。

兰州赴西宁的大道，本走新城转溯湟水上行。但此路因有老鸦峡之险，汽车不能通过，故改走永登，避开老鸦峡隘路。黄河南北，仅有一水之隔，而景物相差甚大，河北山上不易长草，河南则草木皆备。三十余年以来，兰州黄河大铁桥筑成以后，车马南北直达，人事方面之差异尚比较不甚显著。在清代人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那时的社会情景与现在不同。李涣的《甘泉道中即事》云：“一渡黄河满面沙，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出花（雪）。海错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笳听惯无凄惋，瞥见笙歌泪转赊。”现在的人走过黄河之后，无论入西宁，或走河西，在大道附近已万难看到这种藏人的生活情景，虽各地皆回汉杂处，然而在服饰上、居住上，并无显然的差别。

过铁桥顺黄河西行十余里，皆在肥沃的冲积河岸平原中，田园优美，果树成林。惜在严冬，草木正枯缩雕零，如于春末夏初过此，红绿争妍，



必能给旅行者以兴奋印象也。路旋北转入一干沟中，沟之初段，两侧尽为怪石崖所挟成，汽车蜿蜒于峡曲之沟中，稍一不慎，即有与石崖“接吻”的危险。如于夏日过沟中，遇山洪骤发，则汽车有被冲没的可能。渐北行，谷势渐开旷，石崖已不多见，两侧皆土山，稍平阔处，已有村落田园出现。上下三数土山后，至一大镇，曰红城子。路过至庄浪河东岸，再由此溯河沿直北上永登。兰州至红城子之间百余里中，道路尽在曲谷中，作战时行军最为危险。红城以北，人口村落逐渐稠密。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杨柳相望，水渠交通，庄浪河身宽广，中含无数小型沙洲，水势甚小，且多冰溜。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左宗棠是自命为当时才略最高的人，我们现在看他在西北所留的印象，并且不能说他完全是“自负”的夸张。他在西北的政治与兵略，现在暂不管它，单就他的道路政策，已经表示出非常大的成绩。他乘用兵陕甘新三省的机会，从西安经兰州，一直到新疆，开辟了一条三千多里的宽敞大道，两旁遍植杨柳，夏日杨柳青茂，夹道以伴行人，蔚为大观。当他还督师新疆时，他作了一首豪放的七言诗：“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遍栽杨柳三千里，未因春风度玉关”。这首诗表现他的气概是如何的雄壮。从左宗棠的路政，转而想到现在我们走的所谓“公路”，不胜其“今不如昔”之感。兰州、永登间道路并无难于措手之工程，而现行道路则一任其自然，甚至最简单的削平小土坡的工作，亦不见有人负责。一二尺的小土沟，或小土窟，亦无人为之填补，往往使汽车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一个东方人来到西北，如果只看看建设图表和报告，一定非常兴奋而满意，假如实际尝尝建设的滋味，就会感到失望而凄凉。

## 二、庄浪河至大通河

因为路政太坏，我们的汽车走了一天，才到相距二百余里的永登县。永登原名“平番”，即谓此地原系藏族住地，经汉族平了藏族之后，所设立城邑，故名“平番”以纪念武功。庄浪河亦名“平番河”。在这种地名上，充分流露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意义。永登境内驻军，系青海系下之凉州系回军，（关于回军一词，系用西北习惯称呼，其是否适当，当另文有所论列。）其服饰与内地大不相同。没有面子的白老羊皮大衣，和大黑羊皮的冬帽，充分表示出一种高原武士气概。惟待遇太差，终年不过得饷二三元。知识亦太欠，如汽车过一城镇、守卫者必向车中人索名片，报告其长官，得允许后始得通过。但回军官兵识字者不多，名片等于形式，故无论车中何人名片，甚至非在车中人之名片，只要给予一张，他们即以为有了凭据，即可通行无阻。

记者在永登系住一破店中，夜间仍本习惯，解衣脱帽就寝，次晨起床后，顿觉头痛欲裂，无力登车，幸自己身体素强，出几身大汗后，即告平息。后据西北友人相告，在西北旅行，因旅店简陋，寒气直侵屋中，夜间宜戴小帽就寝，否则体弱者往往因被寒风侵入头部，发生其他严重病症。

十八日我们离永登，西过庄浪河以趋青海。庄浪河河面宽一二里，虽在冬季尚未全涸，汽车过河，并无一定路线，亦无桥梁可循，惟视当时冰势与水势来决定，无西北行车经验之司机，未有不陷入冰窟中者。庄浪河两岸，水磨甚多，即利用庄浪河水势以发动石磨，农民磨面，全恃水磨之力。

车过庄浪河后，顺小干溪西行，山势不大，且多为土质，时见



成百之骆驼队自西而来，大致为运青海皮毛赴宁夏、包头者。途中遇一死骆驼，驼毛已被拔尽，惟弃尸体于路中，无人过问。盖骆驼自被人征服，作为运输之工具后，他自身即失去“自主生存”之神圣意义，而为人类生存之附庸。在其尚有力可用时，人们爱而惜之，在其病老之后，对人不再有其被利用之可能，则其被弃荒野，乃必然之结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动物与人类，殆为同然。行约百里，越一小山岗，再顺一小干沟下行，约七八十里始至大通河岸。大通河流域为西汉时藏族之先零部落游牧地，赵充国用屯田法逐步的赶走了先零族，开中国历史上治边政策之新途径。他的屯田政策，如果用新名词解释，可以叫“军事的农业政策”，因为藏族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打打仗，或胜或败，只能影响他暂时的地位的变迁，不能根本改变他社会的机构，即是不能找出最后的胜负点来。所谓屯田法，即用军队维持了新占地区的治安，同时即用军队开垦，把草地弄成农田，并造成城市村落，使社会从游牧社会进而为农业社会。农业社会造成之后，不必用兵，游牧民族无论如何也站立不稳了。

记者认为赵充国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对于战争会有如此的论说：“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战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他能把战略放在战术前面，绝非普通专尚气力之赳赳武夫可比。而且他对于当时异民族的认识，也比较正确。他说：“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这是他承认异民族的“人权”，也知道异民族是“人”。不象段颖（亦汉时人）那样肤浅草率的见解：“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

大通河渡口东岸，有市镇曰马连滩，居民十九为回族。回族性强悍，对教律奉行尤严，记者初不谙回教忌讳，在马连滩午尖时，因见一清真馆中之牛肉，带深黑色，乃问以是否为“死牛肉”，馆中人闻言，立即拍刀而起，怒责记者曰“侮教”之罪，势将动武。记者乃托词为方言之误会，谓记者南人，不喜吃“水牛肉”，“水”“死”混音，非谓其所卖者为“死牛肉”也。一场风波，始得避过。然而回人性格之强悍，由此可以概见。汽车过河须用船载，水急，船小，汽车须与所载行李等分批过河，费时颇多。大通河渡口，系以粗铁索系于两岸，下连一木船，船有舵无桨，过渡时全由船夫攀铁索带船而过。大通河之河身狭而水流急，大小冰块，顺水下流，系船作微细抨荡声，醒人脾胃不少。因过河费时太多，天已不早，乃宿于大通河西岸半山之牛站堡，这一天只走了一百多里。

### 三、到了西宁

牛站堡根本没有旅馆，我们是随便找民宅来住宿。老百姓真老实，我们随便要什么屋子，没有不让的。在他们想来，坐得起汽车的，总是“大人”之类，绝不敢作为旅客来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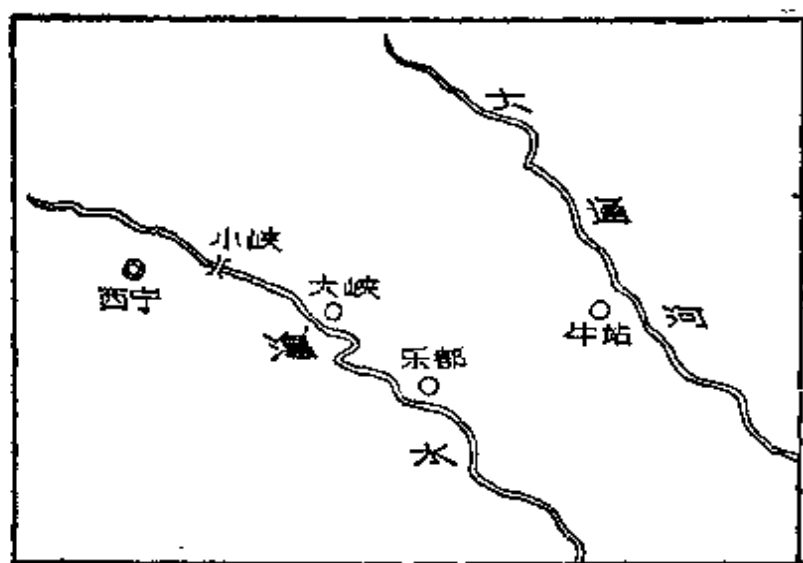
大通河和湟水之间，隔着一条山脉，它并无统一的名称，往往就那个地方的名字来作为山名，这里因为有牛站堡，所以山也叫“牛站大山”。张其昀先生游历青海之后，给了青海两条山的名字，湟水之北，大通河之南的，叫湟北山脉，湟水之南，黄河之北的，叫南湟山脉，从此这两条山脉才有统一的名称。我们要翻越的牛站大山，就算是湟北山脉的末梢了。

牛站山高九千余尺，山为土质，四望积雪连云，阴寒彻骨，

山横长四五十里，上下坡度之大，使人几疑其非汽车路之模样。尤以西坡之陡急，即骑马者亦须下马，始可免去危险，而此“无畏汽车”竟敢上下于其间，不能不谓为奇闻。

下山后即达湟水北岸。两岸土地之肥沃，田园之优美，远在庄浪河流域之上，沿路杨柳夹道，果园菜圃相连，村落整齐，人口稠密，居民身体壮实，有鸦片嗜好者绝少，小孩之无裤者亦不多。青海自马骥作西宁镇守使以来，即未放任烟禁。西北各地遍种鸦片，惟青海独无烟苗，故民间元气尚比较有相当保留，不若其他各地之已雕弊不堪。乡村中常见有高髻弓鞋之妇女，颇富古味，此种妇女谓之“凤阳婆”，乃明初皖军平定西北时，随军带来的妇女所遗留之风俗。记者于秋间游洮河上游，见岷县、临潭一带妇女，亦多高髻弓鞋之习俗，盖亦明军西征时之遗留。

青海道路，比甘肃境内者修理得平坦些，两旁密种杨柳，由杨柳林中透视冰川雪岭，风景幽逸。数十里至乐都县。乐都原名碾伯，东晋时为南凉秃发乌孤称王的都城。秃发一族，与吐谷浑同属辽东鲜卑族，皆自阴山之北迁至青海者，是为青海鲜卑族之来源。



乐都西行过大峡，峡长水急，军事易守难攻，惟两岸道路现皆修理甚好，汽车可畅行无阻。再过为小峡，有新式大木桥

架湟水上，过河数十里，即至西宁。小峡为西宁东防之咽喉，故有重兵驻守。车过小峡后，天已昏黑，我们的“无畏汽车”既哑且瞎（既无警笛，又无电灯），在此危险的峡路上，简直无法行走，经二三小时的修理，始有一个眼睛，略放光明。幸而峡口以外的道路尚好，终于十九日夜中到了我们久认为神秘地方的西宁。

西宁自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河西，所谓“击破匈奴右地”之后，遂经略湟中，筑“令居寨”。二千多年到现在，始终是汉民族与其他各民族在青海争斗的最西的依据点，到现在，汉族的势力还没有冲过西宁以西。民国以后，西宁的军政大权，逐渐移于回族之手，今则浸成西北“回汉”之宗教的军事的政治的中心，如果将来西北发生了国际战争，或民族问题，西宁将远比现在为重要。

西宁的市街颇有北平那样古色古香的外景，古装的商店，庄严的牌楼，和辉煌的机关，在在表示出这座古城的来历不浅。在街上来往的人们，单从服饰上，很显然分出汉蒙回藏四族，初到此间的旅客，诚有五光十色，难于接应之势。

此间与记者久已神交之士，尚为不少。据各方朋友谈述，知此间情形并不如外传之糟，即对于如记者之旅行人，亦非随便即置人于死地。过去某某等失踪之事，诚为事实，乃因其自身已置身于青海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故为青海当局所不容，固非可与普通考察者同日而语也。

青海之两大巨头，一为省主席马麟，一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一百师师长马步芳。马麟仅在社会与宗教上有相当地位，而马步芳则握军事政治的实权；马麟为老派人物之代表，而马步芳则为汉回青年的领袖。记者于二十一日先访马麟，马氏身躯之高，至少在七尺以上，谈话夹重浊之临夏土音，初听之，不易了解。惟其

态度比较忠厚，持论亦为和平派之人物，观其左右及各种布置，绝难发现其有积极的政治野心。旋由谭克敏先生陪记者往访被人目为“青海王”之马步芳。

马步芳给予记者之第一印象，为他的聪明的外表与热烈的情绪，并非如记者平日所想象的青面獠牙，如三国时许褚、典韦式的人物。他和记者寒暄之后，即以真挚的口吻，谈其事事落后之情形，并大谈其军事情况，适有官佐送电报至，马看毕即转以示记者，视之，乃玉树方面来电，报告西康军情者。记者一方面对马氏之态度深感诧异，同时又栗于过去所闻关于马氏之传言，故屡起身告辞，而马氏则强留共话，使记者内心起“见”“闻”上之重大冲突，不禁其惊愕之思。第二个印象为马氏之头脑相当精密，其谈青海南部之军事布置，井井有条，了如指掌，俨如曾受新式军事教育者。第三，马氏生活趋向近代，其会客室中仅布置简单之沙发及新式小桌，并不沿用西北官场中习用之虎皮或豹皮交椅，特别是他的会客室没有西北家家必有的土炕。

经过这次会面以后，记者才敢放心在西宁多住些时间，来观察青海的详情。

#### 四、马步芳的政治作业（上）

二十二日以后，记者才敢放心去研究青海的事情。青海的事情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青海省的政治机构，和实际的政治力量，分开得很远，表面上的省政府，真是可以把它撤销，因为省政府是什么事也不能作的。最笑话的是，一位县长在过年的时候，写信来给民政厅长贺年，民政厅长还不知道他已经作了县长！原来青海设省的时候，就没好好的研究清楚，草率的把西宁

道七县之地，加上些大而无当的蒙藏游牧之区，就勉强算做一省。这省的政府是否能支持省政，民族与人口情形，是否可以推行省治，都没有相当把握，只把“省”的形式立了起来，则省政之必然脱轨，恐为自然的结果了。

青海内部包括了非常重要的民族问题，我们掩耳盗铃的不想解决的办法，只是马马虎虎的设了一个“省”，这和新疆设省一样，没有把新疆问题丝毫解决。所以我们不能把青海作为“省”来研究，只能作为特殊势力来看待，明白了这个基本意义，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青海省政府组织中的财政没有人负责，职员们欠薪至一年左右，借炭借面来维持生活，而在私人势力中做事的人，则大半面团团作富家翁。

马麟的活动是侧重消极的、个人的、保守的、家庭的。马步芳的活动则比较趋向积极的、团体的、进取的、社会的。所以研究马步芳的政治作业，对于西北的将来，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

马步芳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事事不甘落于人后，可惜他僻处在西陲，可以教育他的环境太落后，不能引导他走上积极的前进的道路。二十二年他到长江一带游历一趟之后，回到青海才大大转变了方针。

记者很详细的研究过马步芳的一切设施，大别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无关宏旨的皮毛建设，第二类是将重大影响于西北将来的举措。属于第一类的，如修图书馆，修澡堂，修大饭店，修洋式商店等，我们进一步分析，就知道其中不会有深一层的意义，他在东方游历归来之后，觉得东方都市有大洋式商店，我西宁也得有；东方都市有新式澡堂，我西宁也得有；东方有图书馆，我西宁也得有；东方有使旅客住了很舒服的大饭店，我西宁也得有。当然青海的马步芳不会有那样大的经济力，地地道道的近代

化起来。然而这位不甘落后的先生，就利用他的士兵无代价的强迫劳动，所谓“兵工”，具体而微的筑造起来。材料大体征发之于民间，只雇用极少数指挥工作的工匠，故他的建设，需款无多，现在这些都一一的出现，给古老的西宁城以新的刺激不少。不过，这些新的建设绝不能给社会以积极的推进作用，始终还是装饰门面之工具，青海商业日渐萧条，原有的旧式商店，已感无买卖可做，试问谁还有力量去租新式商店，来增加自己的开销。青海旧式澡堂诚然不大卫生，有另办新式澡堂之必要，但是那样廉价的旧式澡堂，能够洗得起的，已经不多，比较代价更高的新式澡堂，一般人更无力问津了。西北旅行者最感痛苦之一，是各城市皆缺乏适当的旅馆可以暂居，西宁之开设新式的旅店，诚为必要，不过，西宁并非交通大道，客人之来往于西宁市者，并不很多，所以这种饭店在经济上是不能自己支持的。西宁图书馆的地址，甚为宽敞，建造式样，亦甚恰当，记者看过西宁图书馆之后，又想起清代存书在青海的事情。清代有人以为青海之所以难治，是由于蒙藏回满等民族之人民不肯读书，智识不开所致，所以在北京发下来了許多“钦定”的书籍，存在青海，希望大家从此多读诗书，渐归“王化”，如此则青海政治，即可渐上轨道。殊不知青海到现在还是民族压迫统治的战场，大家皆忙于自身生存问题的考虑，谁有工夫去读迂腐闲书。闻某中央院长还捐赠了青海图书馆万有文库之类一部，足见煞费苦心，但记者参观该图书馆时，除馆员一二人与无情的案头尘土为伍外，很难发现有一个借书或看书的朋友。在战场上和饥饿线上提倡迂腐的教育，同样的没有实际的价值。

西宁城附近由马步芳军队所种的树，确是不少，四五年后，西宁四周，必能成茂盛的柳林。城周四出的道路，一般言之，亦

比甘肃为强。同样的这些都不是要紧问题所在。

## 五、马步芳的政治作业（下）

最有关于西北将来的，是马步芳对于军事、经济、民族和教育上所采的政策。

记者在留西宁的半月中，有充分的机会参观马步芳的军队。他自己每天在黎明以前就到校场练兵，他练兵的目标，是想他的军队近代化，原来他是承继他父亲马麒的部曲。马麒在世的时候，马步芳不过是一个营长，现在扩充成了“师”，并且成了“新编军”，他的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不是由一种大的政治系统或学校系统而来，完全是以他个人为中心的亲戚、同乡、同教、旧部等关系而组成，他的局面扩张到现在的范围，从前的士兵成了下级干部，下级成了中级，中级成了高级柱石，这般人也和马步芳一样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甚至目不识丁者，亦大有人在。如此军队在指挥上、训练上都感到困难，故由教育他的干部以教育他的士兵，使这个军队比较近代化，这是他近年来中心工作之一。

第二种重要的军事设施，是他在“民团”名义之下，对于汉蒙回藏地方武力之干部的训练。青海民族复杂，各有相当武力，常起争端，马步芳为其自己统治安全的打算，同时想把这些地方武力，化为自己的武力，以应付当前军事的需要，所以要训练他们，使他们养成组织的能力，便以指挥。他的计划，要把这种训练，普遍推行到全青海的地方武力组织者，这是将有重大结果的设施。

马步芳在轻视私人财利这一点上，是超人一等。他喜欢积极



的扩张，一切都往大的地方干，因此他的经济的负担相当的繁重。他的军费除了青海省府每年担任七十万而外，甘肃省府还担任一些。这些收入绝不能应付他的开销，因此他不能不有旁的出路，第一个办法是自营商业政策，第二个办法是对蒙藏民族的租税政策，第三个办法是军粮征发政策。

青海羊毛出口，不但是青海对外贸易最大的项目，而且在中国出口贸易上也占相当的地位。换句话说，青海羊毛占青海全省社会经济最大的收入。马步芳乃利用其政治力量，从事羊毛贸易之独占，他把蒙藏民族对他应缴的租税，折为羊毛，这批羊毛收入，就有可观的数量。其次他在几处产羊毛的地方，独占式的收买，一般私人当然不能和他竞争，运输时他有军用的车辆及骆驼，可以不出运费，出口时可以免去青海境内一切的税捐。因此他的羊毛到了天津之后，无论市价如何低落，普通商人亏本不堪者，他仍然有钱可赚。其次关于青海土产之鹿茸、麝香、狐皮等，乃至河西（甘肃之西路）之鸦片，往往亦在经营之中。成本低，运费与税捐都比旁人少，这样的贸易，自然是不会不兴盛的。

不但如此，他这样大的集团，一切物质消费，其数亦在不少（尤其军需品的制办），因此他自己在西宁设了些工厂，制造他自己这一集团应用的东西（枪炮制造除外）。这样，他的这一集团中的经济消费，很少再透入到社会经济部门中。

青海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积，是在蒙藏民族游牧区域中，马步芳凭他父亲的声望和自己的武力，可以指挥统治他们。马步芳每年向他们收草头税一次；规定每匹马，出几角钱，一条牛出几角钱，一只羊出几角钱，游牧民族的现金最缺，故十九都是以羊毛折价纳税。此间经过中间经手人的作用，往往草头税非常之重，蒙藏民族颇感负担困难（草头税马麟亦收一些）。

军队不能不吃饭，所以军粮的开销也非同小可。然而马步芳在青海执行了一种“营卖粮”制度，即是由地方人民摊纳若干粮食，以供军需，名为给价，而实则完全征发。

总之，这种经济政策，可以叫做“与民争利”的收入政策，“半点不肯回到民间”的支出政策。

记者曾调查过马氏所办的蒙藏小学，学生都是蒙藏王公千百户的子弟，一律都读汉书，兼代蒙藏文，学生服装与生活完全军队化。记者曾试问一个小学生：“你们的学堂是什么人办的？”他很快的答复我：“军长！（指马步芳）”“你的衣服是什么人给的？”我又问，“军长！”他更加天真的回答。

原来蒙藏王公们对于马氏的教育蒙藏子弟，不很信任，马氏乃设立一个蒙藏学生家属招待所，凡愿陪着子弟读书的蒙藏父母，都被无代价的招待着，住一月半年一年都无不可。现在，那般家属们也渐渐明了读书的利益，信任马步芳而安心把子弟入学。这一个举动的意思，是相当深远。

记者在西宁期中，正遇河南亲王的迎亲藏兵到西宁，马步芳非常优厚的招待他们。请他们聚餐，请他们跳舞，送他们礼物，自己很客气的和他们见面，同时请这些藏兵参观他最好的军队，并且把机关枪大炮一齐搬来请他们看看，甚至已远过时代的土大炮，也陈列在校场上，以炫惑藏兵的头脑，这是马步芳恩威并用的政策。

青海的教育，分政府办的，与回教促进会办的，两个系统。政府办的学校，经费与人才大半两缺，故多无善状可言。有几个学校简直和破客店差不多，然而回教促进会办的学校，则又振振有生气。回教促进会共办有小学一百余所，中学一所。马步芳为回教促进会之委员长，一切经费建筑事业，完全由马步芳负责。

促进会所办之中小学，一律施以军事训练与军事管理，尤以回教中学，其办理之完善，恐在西北当归入第一等学校中。

但是，回教促进会所办的学校，并不限定收回族青年，只是一般说来，回族青年要多些。另外一个非常应注意地方，是这些学校并不十分注重回教教义的训练，在校青年学生，每周所授“教义”——即讲回教经典，每人不过二小时。

## 六、动荡中的青海

我们简括研究的结果，觉得青海的政治军事财政皆脱了正轨，本来是公的活动，转为私的经营（自然这并不是青海单独如此，不过有大巫与小巫之差而已）。一切对人对事的关联，都根据这个私经营来出发。在私集团的观点上来训练军队，来发展经济，来对付异民族，来教育青年，这个作法，将走上非常危险的道路。

“兵者，凶器也。”没有一种政治大道作为指标，只是扩张整理军队，这就是“杀力”的培养。如果继续的培植下去，在动摇的政治环境激荡之下，这一股“杀力”是否可以就此安定不乱，恐怕连操纵“杀力”的人，自己也很难逆料。

第二，“与民争利，而不与民分利”的财政政策，诚然暂时可解决私集团自身的困难，但是社会经济在本已萧条之情况下，又遇到这样巨大政治独占贸易，统制消费与无代价的征发，自然我们难于想象说一般民生会有丝毫好转的可能，民生日困，社会日艰，则崩溃之危机愈近，一切活动，将皆属徒然。

第三，中国现在能指挥青海蒙藏民族者，在军事政治方面，恐怕只有马步芳。不过，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都是建筑在

相互压迫的关系上。青海回族与汉族自称为“中原人”，意思是“文化民族”。而称藏人为“番子”，蒙古为“鞑子”。对他们只是羁縻征服，使之归所谓“中原人”统治，而不是本民族平等的思想，来谋共同的解放。就全中国来说，回族占不得势的地位，而就青海一省而言，回族是最高的统治的民族。青海全省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枢要，十九在回族手中，汉人有特殊历史或地方关系者，亦只能作“不相干”的事情。至于蒙藏两族，乃至青海特有的土人，根本没有带民族意味以参与政治军事之可能。从人口上看，蒙藏两族，今皆已大大的减少，这是一方面负担不起草头税，逃向西康和内蒙，一方面是因穷困而死亡率增大。这些事实告诉我们，青海目前的安定，只是马步芳武力统治的结果，并不是民族问题已经解除。

第四，许多人考察西北之后，都主张赶快办理教育，以为教育是解决西北各种问题的最好办法，然而依记者观察所得，赶快办理西北教育，诚然重要，但是教育的本身，并不能解决西北的问题，相反的只能使西北人更进一步的了解西北的问题，而提出些更大的问题来等待解决。从苟安的立场讲，不办教育，问题倒小些，地方平静些。办了教育，大家头脑复杂些，问题倒反而多些，急待解决的需要大些。自然从大局上看我们是不怕问题的。

青海回教促进会的例子，很可以教我们深省。他们办教育的经过告诉我们，一个青年受相当的新式教育洗礼之后，他再不会诚心诚意遵守缺乏科学理由的宗教教规。就已有的事实看，受过教育的回族青年，不再如他们的乃祖乃父一样，成为严格的宗教信徒，因此以宗教的方法煽动他们来作无意义的冲突，比较已不十分容易。但是，他们受过教育之后，他们的生活欲望提高，生存

的需要扩大，观察力和认识力都大大的长进。他们从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中，认识了自己的出路的困难，因而他们逐渐有了政治问题，有了民族问题，他们今后绝不会再在无希望的盲目屠杀中，来找他们未来的光明，他们必定会进一步的在民族平等思想下，来作有组织的努力。同时对于他们自己本族之内的政治组织，也有要求合理化的趋向。

这是西北教育必然的结果，这是西北教育必然促其外表化的西北的根本问题。

马步芳对于这些问题，也有片段的了解，然而我们还看不出他对于这些问题有怎样解决的办法。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记者以为应该以平等基础整理民族关系，以大公无私，不偏不袒的方法，整刷军事政治关系。而为青海本身计，目前似乎有两种工作，可以努力：第一，把青海的各方面赶紧的“国家化”，即是努力使青海的一切与全国的各方面发生关系，努力使之成为中国密切之一片。第二，西北民族关系，将来一定成为问题，青海是民族最复杂的区域，我们很可以把各民族的青年集合训练，以民族平等的思想指导他们，使他们将来负担领导各民族解放的责任。

青海因为缺乏光明的政治道路，各方面看不到紧张的情绪，有的，也只限于私人系统中的私的活动。一般来说，在私人系统下工作的人们，并无一定的薪金，表面上作一个机关职员，仍属无关，一样的没有薪水可支。这班人生活之维持，完全靠他们领袖的私人津贴，平日送炭、送面、送牛、送衣料；赠送的多寡，完全看你努力和亲近的程度怎样来决定。实在劳苦功高的人，就放你去作一任县长或税局局长来调剂一下。这是很明白的，你作了县长或局长之后，可以随便刮一点。因此有许多人不愿做空

头厅长，反愿作一个小小县局长。

从这些实际情形看，青海的内情，并不如一般世俗所谣传的那样，有独立的危险。青海目前只是在盲目中安定，真正的问题，是在一般人的谣传之外，甚至青海本地人许多也还没有觉察到。

## 七、班禅在塔尔寺

记者入青海之时，正国内宣传班禅行将入藏之日，此时班禅正驻在塔尔寺。记者乃于二十四日偕几位朋友往游塔尔寺。

塔尔寺在西宁西南五十里地方，为黄教始祖宗喀巴降生之地。现在蒙藏两族所信奉的宗教，以黄教为最有势力，支配西藏、西康、青海及蒙古等处人民之信仰。

西宁至塔尔寺间的道路，除过冰河有点麻烦外，其余都可以畅行汽车。道路完全由兵工筑成，路旁兵工所种杨柳亦多。将至塔尔寺，即见四围雪山之间有丛林树梢出现，转过山凹，塔尔寺全景即呈露于旅行者之眼中。从全部寺院房舍之外景观之，塔尔寺尚不如拉卜楞寺之整齐美观。惟塔尔寺有大金瓦寺与小金瓦寺，其房顶皆用金叶盖成，则拉卜楞又无如此之名贵。

我们到寺以后，被招待在客房吃了一顿手抓羊肉，客房陈设皆西藏所产之名贵物品。饭后，先与班禅作普通之寒暄。退出后，再约班禅作私人之长谈。班禅态度庄严和蔼而聪慧，担任翻译者为西藏青年汪德君，译语甚为畅达。

班禅首答记者，谓其回藏后之最重要工作，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交通，且以公路为第一急务。至于路线，完全待此次回藏时决定。在入藏之后，关于宗教事务，仍沿旧习，惟政治方面，必

须改良，以合于西藏人心为归依。但是改革政治的经验，还希望中央政府的指导。他又说他返藏后，关于西藏军事、教育、内政皆当照内地改进。财政以自己供给为原则，不足时再求中央帮助。外交方面对于英国的关系，完全听中央的处置，他根本不赞成西藏与内地分离。记者最后要求班禅表示对于政权与教权应否分离之意见。盖西藏政治，至今还在政教未分的状态中，宗教上的主宰者，即为政治上的支配者。班禅于此略现犹豫，终谓，在原则上宗教与政治应该分开，但是现在因一般人民信仰宗教的关系，使政治与宗教分开后，反易生其他麻烦，故宜一仍其旧，希望将来办到分开的目的。

班禅住在塔尔寺之后，远近来朝拜大师的人络绎不绝，塔尔寺比平日更形热闹。不过我们看了塔尔寺的情形，不觉引起了两种悲痛感想：第一，是满清的宗教政策太过毒辣；第二，是我们现在采用的民族政策，前途仍甚渺茫。

塔尔寺的大金瓦寺，为宗喀巴降生之地，故为塔尔寺中最神圣的地区，内藏宗喀巴生前各种遗物，故蒙藏人以到大金瓦寺前叩头为终身大事。寺门前之廊阶，系以松木铺成。每年更换一次，然而每年换去之木板，皆已被叩头者之双手双足及头额磨擦成二三寸深之五个大坑。蒙藏人民往往以一生生产之所得，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完全在一次叩头中耗尽。甚有从西藏内蒙等处，完全叩头以至塔尔寺者，此等人少则数年，多则十数年始能叩到塔尔寺。有叩头至中途而资斧断绝，无能为继，则作记道中返家，再行经营牧畜等，俟经费有着时，再从作记处继续叩起，必达到塔尔寺而后已。此种精神可以看出蒙藏民族之伟大，然而以此种精神用到如此地方，似又太无价值。满清统治汉族，是奖励八股，对于蒙藏民族，则提倡黄教，这完全是宗教的愚民政策，把

整个蒙藏民族的精神与精力，尽消耗于“希望来生”“超脱凡尘”的工作上，不再过问今世的军事政治问题。满清的政策，诚然有相当成功，而蒙藏民族人口、文化，却受了难于计算的损失。

如果说宗教是一种道德的和教育的作用，到还可以说通；如果说只要信仰了什么宗教，那里就有人可以引渡你到另一个安乐世界，似乎太难令人相信。到了一九三六年的今年，我们的民族政策，似乎应该科学些，确确实实的来解除彼此的痛苦，以谋共同的团结，似乎不能再用宗教的愚民政策，以自欺而害人。对于西藏民族，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根本吸引一般藏族同胞的方法，只知道利用一个班禅，利用原有的宗教，走愚民政策的老路。某要人公然到塔尔寺大叩其长头，五体投地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叩个不休。也许他是个人的诚心，如果这表示政府的民族政策，那就难于解说了。

还未入藏的班禅的情况，值得特别注意。班禅本人似乎倒没有什么。有许多随班禅到青海来的汉人，现在的状况已经非常可怜。如无线电、驾驭汽车等工作，在班禅左右之藏人能会此种技术者尚不多，故初颇优待此种汉人，后来他们学得差不多了，就不要这般汉人了。不用以后，路费也不给，气势非常高，经济大权在彼辈“堪布”手中，汉人也无可奈何。最可怜的是有一位汉族青年军人，从百灵庙起就投效到班禅这里来，为班禅训练卫队，他满怀大志想乘此入西藏，将来为国家在西藏立一番汗马功劳。初时尚好，到青海塔尔寺以后，卫队训练已渐成熟，他的环境也渐渐坏起来，每月给他二十元薪水，关于入藏应备的马匹衣服，也没有人负责，一切都没有人理他，他因此忧郁成疾，有汉人同事曾请堪布送往西宁医治，而堪布们亦不之理。于是这位精干有为的青年军人，就作了可怜的牺牲。在利用主义的民族政策下，



被利用的人何尝不知道，不过，在他有求于人的时候，自己卑躬屈节些，一旦自己稍为有点力量，他自然不再对利用者表示好感了。

## 八、回教过年

在塔尔寺附近，有个市镇叫鲁沙尔，是羊毛贸易的大市场，各种民族混住其间，藏女之美丽，尤为吸引游客的一大力量。我们当晚住在鲁沙尔街上一位朋友家，晚饭吃来吃去总是羊肉，制法也粗糙，吃起来总有点不顺口。

我们想尝尝夜间骑马的滋味，所以在十二时稍过，我们就起身上马，离开鲁沙尔回向西宁。此时星月在天，冰河雪霜与星光月影相映射，整个大地被上了深银灰色的外景，一小队夜行的征夫，纵马于高冈浅阜之间，此时万籁无声，只有偶然的马蹄触石声，与我们同行者问答声，才是打破寂寞的唯一音响。连过几条小冰河后，人马皆异常兴奋，于是我们纵马狂奔，旋乃引吭高歌，青年积郁之气，几乎全部发泄以出。同行者唱马仲英军中歌谣，使记者深感兴味，歌曰：“骑大马来背钢枪，富户门前要粮饷，大姑娘捎在马上，大姑娘捎在马上”。这一个歌谣，充分表示出，一群不能解决食色两问题的农村游民所组成的武装团体的性质。

二十五日的清晨，许多人还在温柔乡中，我们已经到达西宁市。

假如我还在少年时代，我希望住在青海，因为这里有三个年可过，汉回藏三族各有一个“年”。平常人只能过一个“年”，热闹一次，青海是三个“年”，可以热闹三次。藏族的年怎样过

法，记者没有亲见过。这一回却详详细细的看了一个回族过年，这一个年给人的印象，大可注意。

回族年节的规定，是依据阿拉伯历法，每年年节不在相同的时间，今年如果在十月，明年就在九月，在这一月中，所有教徒都“奉斋”。即是这一月里面，每天日出以后，日入以前不进饮食，饮食的时间只能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据说，这中间的意思，是令一般人知道饥饿痛苦，好真心救济贫穷。又有一说，谓回教教主穆罕默德尝与人苦战，每日黎明以前略进饮食之后，即出外战争，至日落始归家就食，故以后教徒皆每年奉斋一月来纪念他。

这个大典的举行，是在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左右，西宁附近的回民男子，都先后齐集马步芳平日练兵的校场。我看不到有一个人在指挥他们，而他们老老小小的自动向西方坐成很整齐的行列。一种庄严的伟大印象，透入每个参观者之心中。此时北风劲烈，记者重裘无温，而席地而坐之整万回民，没有丝毫浮动气象，不能不谓为难能可贵。这个大典表现了几种非常大的意义。第一，回族内部的团结太好了。这成万的老百姓一切都是自动的组合成功，而所有礼拜及大典中各种活动，没有不万众一心，动作一致的，那天天气如此之冷，因为搬运播音机差不多耽误了二小时以上，旁观的人许多已经受不了，相率退去，回民中却没有一人半途而逃。第二，教主的权威太大了。那天播音机到了以后，这样新式的东西对于青海回民总算是一种特别的刺激，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然而在场中的成年回民，没有一个离开坐位来看的，只有少数的小孩，实在抑不住好奇心，跑到了播音机的旁边。后来那位总教主讲话了。他一句话是：“小孩子们！大家一齐坐好！”我一面听着这一句话，一面立刻看到小孩子们都很快的

依行列坐了下去。第三，回族目前政治趋向非常良好。青海总教主每年对回民的训话，有绝对的权威，他是不轻易说话的。他讲话先用阿拉伯语，然后自己用临夏（河州）土话翻译出来，另外一位朋友又用西宁土话翻译给记者。教主今年训示他们两点：第一，要把个人看小点，个人不要不知足，国家才可以安定，才可以太平；第二，要服从有能干的领袖，不管他是汉人也罢，回人也罢，藏人也罢。要这样才可以团结，才有力量，才可以不受外国的欺侮。他这话有多少理论的价值，暂不管它，不过，他这话确代表一种趋势，我们不能忽视。

西宁的大礼拜寺，表面并不堂皇，而他的教权所支配的区域，却包括整个的青海，以及青海系回军所支配下的大夏河流域和河西地方，教权与军权合一，其前途就不单纯。

记者对于可兰经教义，毫无所知，不敢有所论列。惟对于回族问题，颇感兴趣。在青海所遇新旧朋友中，对于回族问题比较有正确见解者，首推刘希古先生。他因为思想锐进，性格倔强，故时遭颠沛，现尚仅以小学教师糊口。而一般环境较顺之朋友，又多忙于现状之应付，大问题之研讨，似又无暇及之。

西宁对于外间去的游客，还有两种力量可以令人惊讶，即回军的骑术和藏女的歌舞。记者参观过两次回军骑术表演，骑士在马上仰卧上下，或马上倒立，或马腹藏身，有人能用中国旧式土枪，在一趟马程之内，在马上连放七枪，真属绝技。惟回军之集团训练不够，与有组织的军队不能作战。其次西宁有几位歌舞兼长的藏女，她们善唱情歌，舞姿和歌情虽比较单纯，而其歌声与态度，亦能令人心醉。

东方的朋友常常轻侮的批评西北人，称其一切都落后，似乎不可以有为。而记者则认为不当。东南人有东南人的长处，西北

人有西北人的长处，人的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看环境如何，自己所得的训练不一样。关于近代工商业社会的生活能力，东南人比西北人长些，但是关于高原农产和牧畜生活的技巧，西北人比东南人又多些，西北人的骑术是一端。记者离西宁前曾看过西宁中级学校所举办的游艺会，演员对于西北乡村社会生活的表演，技术非常成功。

## 九、西宁至新城

西宁之游既毕，记者乃取道青海北路，横过祁连山以趋张掖，一月四日记者与从者二人乘马离开西宁，承友人们策马相送，直至离西宁西门外十里之湟水桥上，始依依握手告别。别后彼此犹时在马上回首相看，影没后，心殊怅然。

西宁在湟水南岸，由西宁至张掖，系出西宁西门，过湟水，遵北川河西岸行。北川河两岸田园，仍甚优美，惟不如乐都一带之湟水流域富厚，北川河西岸地势较东岸尤宽旷肥沃，将来修路开渠等事，皆无大困难，现在道路十九在黄土狭沟中。经青海兵工修理后，已具公路之规模，但因大通县为青海产煤之区域，每日络绎不绝之煤车，来往于大通西宁间，路面与桥梁损失甚大，一乘所过，黄土乱飞，行人颇以为苦。

张掖西宁间道路，大都为人烟稀少之地，饮食住宿，皆感困难，而且须通过汉回蒙藏四种民族居住区域，如果语言不通，道路不熟，旅行殊为不易。记者所带之从者，乃青海循化县之撒拉回族，兼通汉回藏三种语言，且曾数走此路，故为最理想之向导与通司，途中必须的用品都完全自己带上，主要的粮食，固不用说了，就是火柴、盐、醋之类，亦非预备齐全不可，只有水一

桩，用不着自带。因为到了没水的地方，随地有冰有雪，可以化冰化雪，倒不成什么问题，这两位撒拉回人，精明强干，途中一切饮食起居，我完全听他们指导，所以从出发时起即未遇重大困难。惟他们彼此用突厥语谈话，记者丝毫不解，颇有身入异域之思。

青海之平均高度，为中国各省之冠，即以西宁而论，海拔高至七千五百英尺，仅次于西康之康定，其余各省省会之高度，未有能及西宁者。再由西宁西北行，地势越高，气候愈冷，故服装方面，汉式装束，即不大相宜，西式之普通冬季服装，简直毫无用处。最适用之服装，为藏族用之大领皮袄与长统毛靴，在马上尤为相宜。记者所衣，乃相当于王公千户之藏服，从者亦为藏式。高原地带，空气清凉，马上四望，胸怀开朗，惟从者不断以突厥语相谈笑，状甚愉快，记者一人除默然思索问题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自遣，因此深感情绪上之孤单。举目所能接触者，为山巅的白雪，北川河中的冰滩，寒缩的村庄，枯落的杨柳，与日间出现的羊群，大道上似相迎送的过客。所谓“漠漠穷边路，迢迢一骑尘，四时常见雪，五月不知春”者，记者今始临其境矣。

四十里至猴子河，为一小市镇，回汉杂处，回人之房屋与服装，皆较汉人完整富足，所开小馆客店亦较卫生，汉人小孩有裤者少，若干少妇亦仅有破单裤，上仅破棉衣蔽身，一般男子壮丁，到比较服装周全些，不过如果和记者等比较，那诚有天堂地狱之差了。唐顾况看到当时关中民间之穷困，因作《长安道》词一首，意在劝人归隐，他说：“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何不归来山中老？”大概这位顾先生一定是出身地主家庭的人，总觉得在都市生活中颠连，不如退居山中，与世无争，过点幽闲生活。他哪里知道，一般缺衣缺食的人们，在都市中或交通大道

上，终日奔忙，尚不能糊口，归到山中，试问凭什么来衣食？穷人回到“山中”，恐怕不等“老”，早已饥寒而死了！

最可怜的，是这般煤车夫。他们在衣食的鞭策下，来往奔走，每星期来往于西宁大通间一次，一车煤需本三元，西宁市价，一车只能卖四元多，除了捐税与人马消费外，当然难寻相当的剩余。车为木制，最易破轮，往往在天寒地冻之野地中，发现破车，车夫哀坐其旁，疲瘦之牲口蜷伏于侧，为了小小一块木料，须往返数十里经一二日之露宿痛苦，始能有继续前进的希望，高卧西宁的阔人们，日夜燃煤取暖，亦知大通煤来历之不易否？

途中有成群的藏民及蒙古人，沿途乞食，状至穷苦，据翻译问答之结果，始知皆系来自远方，向班禅叩头者，其所有积蓄，皆于见班禅时，全部贡献，致归家时之路费，亦大成其问题，此种精神可惜用于宗教上，如用之治科学，治军事政治，其成就当难限量。

青海回军大体为派兵制度，士兵皆有家室可寻，非同游民集团式之募兵可比。故每年过年时士兵照例放假回家，所有服装马匹枪械一律自由带回家去，并不须有官长监督。记者途中遇不少由家回营之全武装士兵，因系派兵，故逃亡者少，而且逃亡以后，立刻可以捕回。所以如此放任，仍不会有大问题发生。

四日夜间，我们住离西宁七十里之新城，城紧接北川河西岸，仍为回汉杂处之小市镇。地渐贫苦，河东有山峰突出，曰老爷山，与河西山势接成一峡，长城蜿蜒山上，壮至雄伟，青海境内之长城，建造于何时，记者尚无所知，惟就历代边防政策推之，或为明代之遗迹，亦未可料。老爷山上有大喇嘛庙，藏人每年朝山者甚众，庙会之期，山上山下，骤成市集。

## 十、过大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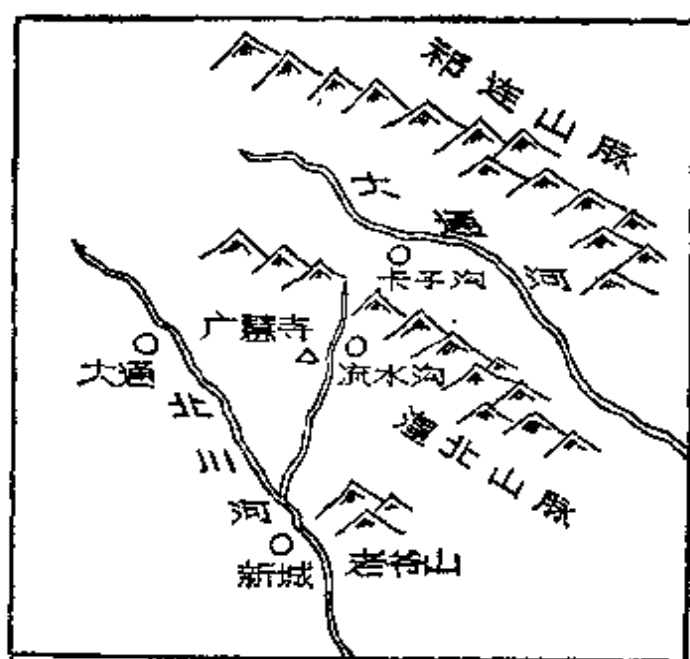
经小峡之后，我们到了湟水南岸，出了西宁，我们又过湟水北去了。湟水水势甚急，严冬亦难冻结冰桥，非人工驾桥莫能渡。北川河亦为不易冰结坚桥之河川。新城西北约里许，即出长城口，今已无关卡，惟军事形势，甚为险要。出关口，北川河两岸又见平川。关下村落处有歧路，一走大通县，一走甘肃之张掖。我们于晨光曦微中，即已走近北川河桥，桥名通济，坚固宽敞，可以通行汽车及大车，现在许多新修公路中，如此坚固之桥梁，尚不可多得。

过通济桥，即到老爷山根，有人家三四，绕山东北去，有石峡曰东峡，峡中有小溪，溪谷全冰涸，出峡以后，溪水积溢，成为广一二里之大冰滩，冰滩滑马，故大道皆避去积冰，绕道山麓行。沿途村落渐稀，山谷形势渐露荒凉景象。野鸡与吃人之黑鹰，随处可见，从者用手枪射野鸡，皆应声而倒，撒拉回族之枪法，诚有非常人所能企及者。

四十里至一大喇嘛寺，曰广慧寺，俗名过莽寺，藏人甚多，寺之四邻，已多藏人生活习气。广慧寺原为最有军事政治力量人之机关，清雍正时青海罗卜藏丹津反对清人统治，朝廷用年羹尧为川陕总督，督师西宁，严行剿办，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武将军，佐理军务。年羹尧采酷烈的杀戮政策，广慧寺因此被岳钟琪所焚，后再重修，始得安定附近藏族。广慧寺附近山上，森林畅茂，盖为数百年老林，现寺僧只知砍伐变卖，年有缩减，未知稍加培植，恐十数年后，青海又少一避暑佳地矣。

又十里至湟北山脉下之流水沟，山势紧凑，谷口亦狭，由此

再上，即翻过湟北山脉之正干而至大通河流域。此段湟北山脉，俗名“大板”，计过山有三条小路，曰上中下三大板，记者等所欲经行者为下大板。下大板一路比较危险小些，因其坡度与路之宽度，尚容马匹勉强通行。我们到流水沟旅店时，店主劝不必当日过大板，因午后风大天寒，如不能赶至站口，山中过夜甚难。流水沟过山以后，六十里无人烟，必至卡子沟始有宿处，记者为赶程计，不能顾忌如此之多，只好冒险走去。行行重行行，马行速度逐渐减慢，比到登山处，已全身大汗，喘气告乏矣。道路两旁野物甚多，我们为路程所迫，也顾不得作打猎游戏，下马牵马上山，屡憩屡进，终于人马交困，始达山巅，山口顶点，计高一万一千五百英尺，记者之鼻腔感受压迫，随有血汁流出。从者则久习于高寒生活，若无所苦。下山遵山阴小道行，山阴积雪甚厚，道路尽在雪中，不知此雪果已积厚至如何程度，亦不知已积若干千万年，人行其上，终觉惴惴难安，万一坠入雪窟中，记者视察所得，恐永无与读者相见之机会矣。



山阴坡度比山阳更为峻急，路中常有冰溜，滑跌之危险殊大，从者牵记者马而行，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危险者，今得其实景矣。幸而下山，马尚不甚劳碌，如由此面上山，殊非易事。

下山后行数十里，始于天色昏黑中达卡子



沟。卡子沟高九千英尺，全为回族村落，只有一家汉人，亦为佣于回族。此地因地势高亢，五谷不熟，即寒带植物如青稞之类，亦难望有其成。居民以洋芋为主要食品。我们到店以后，欲买煤烤火，而煤不可得，柴亦无之，只有羊粪可充燃料，气味虽不佳，然亦无可如何者。我们吃的东西和作饮食的工具，幸而皆自己全备，缺一样即根本无法可想。旅店内部尽是灰土，如果有女客一道，那就难以为宿了。

湟北山脉两侧，本为有名的牧畜区域，然而此间土著居民之能穿羊皮衣以御寒者，尚不见多。自己养羊，而不得穿羊皮，反而穿单破之棉衣裤，谓非剥削过重之结果，实不易给人以满意之解答。

五日，计行一百一十里，惟此种里数，多为随便估计，可靠性少。六日我们由卡子沟赴门源县。

卡子沟北二三里，即至大通河岸，野鸡野鸭群立马蹄旁，土人缺枪，打猎者少，故不知畏人。大通河介于祁连山脉与湟北山脉之间，其上游地势甚为平坦肥沃，宜农宜牧，惟顺河东下，至互助县北，山势紧急，构成险峡，名“浩门隘”。大通河在浩门隘以上为浩门河。汉光武时，浩门河上游藏族不服命，帝命马援率师讨之，两军相拒于浩门隘，援用奇兵抄击，大破之。

普通人只知马援征交趾（越南），而不知马援曾征青海，建立奇功。马援一生行径，颇多可令人深省者，援为陕西关中人，曾放牧于陇东南及陕北一带。王莽称帝后，闻其贤，兄弟三人皆仕于王莽。后莽败，援逃避凉州，因为熟悉西北情形。隗嚣称霸天水时，厚礼以援为谋士，援曾代表隗嚣见四川成都的公孙述，述盛陈天子仪式以接援，援因断定公孙述不足有为。他说：“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以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

如俑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回来又代表隗嚣去洛阳访汉光武刘秀，光武只身相迎，援始大为惊服，愿为光武用。隗嚣败没后，援为光武出镇西北，对其他民族，恩威并用，西北安定者垂十年，他大战浩门隘之时，正是镇守西北的期中。他后来南征交趾，北拒乌桓，声威并著。他深感功高震主，所以始终寻机会作对外战争，不愿引入内争漩涡中，终以战败，以六十余岁之高年病歿于湖南，死后有人谤之光武，谓援有私意，几不得还葬，光武用援时何其客气，援平日持身何其清明，老年为刘家天下而牺牲，反不见谅于开明之光武。为个人效忠，其所得结果不过如此，也就是中国历代的第 一 流军事政治人材难得善终的普遍原因。

## 十一、浩 门 河 上 游

一到浩门河岸，我们就顺着河南岸行，河北是祁连山脉，河南是我们刚才翻过来的湟北山脉，两条雪山，夹着沃美的浩门河谷地，风景绝佳。浩门河上游以产走马著名。居民大概河北为汉人，河南为回民。汉人人口比回民为多。民间穷苦景象，溢于服饰间。

明陈棐有吟祁连山诗一首，记者认为与此时情景最为恰当：“马上望祁连，连峰高插天；西走接嘉峪，凝素无青烟（因山顶终年积雪也）。对峰拱合黎（合黎山名，在祁连山北），遥海瞰居延（居延海名，在蒙古草地中）；四时积雪明，六月飞霜寒。所喜炎阳会，雪销灌甫田；可以代雨泽，可以资流泉。”这段节录的述事诗，把祁连山的风景和作用，都说得明明白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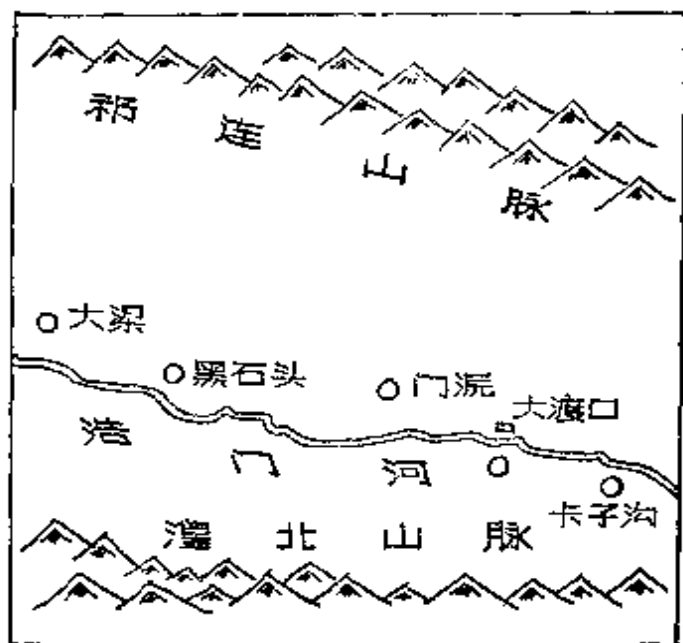
到离县城十里的地方，有渡口曰大渡口，此时河宽不及半

里，水深不过二尺，水清见底，两岸结冰亦不宽厚，本可以涉水而渡，但水中因夹有大小冰块，急流而下，马入其中，易被冲倒，故另设渡船一只，由一少年船夫司摆渡之责。此处渡船与马连滩者完全相同，有舵无桨，全由船夫拉铁索，带船而过，此少年船夫像至聪明，其头脚手身皆结满冰块，真可谓之冰人。问他待遇，则为纯然义务制，系由地方住民轮流担负者。世间往往工作最苦之人，即待遇最薄之人，养尊处优者反多不费力之收入。真正公道之日，不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门源县在河北岸，为青海通张掖、武威的总道，东北出老虎沟可以至武威，路险只宜于单骑行，有二三百里无人烟，西北出扁都沟可以至张掖，人烟亦稀，路较宽敞，现在走张掖者多，走武威者少。门源县城内全部商店不到三十家，县政府系寄居关帝庙内，萎靡难入眼，然而县府之权力却是非常显著。记者在途中见县役用皮鞭乱打被传来县之农民夫妇，而与县长谈话时，问民生疾苦如何，县长坚谓民间甚为富足，异乎常人之观感。最可怪的是记者在县府中所见的逮捕学生的纸条，那条子是一个学校当局送给县府的，上面说，学生某某等“不守校规”，“殴打同学”，和“当众跳舞唱歌”请予派警拘捕，以维风纪。县府在那纸条上批了一个“照办”，这不能不说是奇闻。我们要知道，这个县只有小学一所，对小学生用这种方法，总算是对教育法上新的“贡献”！

此间商业，十九为汉回对蒙藏的贸易。汉人与回人对藏人与蒙古人，其贸易中夹浓厚的欺骗成分，绝不是平等民族间商业关系所能有的态度。贸易货物中，除土产而外，以日本货为最多。记者曾托人去买白糖，迨回来检视，仍然是日本制造。

浩门河谷地在唐时原为鲜卑民族吐谷浑住地，后由蒙藏两族



更迭据之，今则蒙藏两族亦已远往西移，完全落于汉回两族之手。一千余年期中，人事更变，已有如此之大，再过数十百年后，不知汉回两族，亦能长安于此否？

记者到县时，有凉州回军派来捕逃兵的人员亦到，叫嚣无已，杀气冲霄，

地方机关皆对之好好应酬，不敢稍怠，因捕逃兵与提派款，为回军之两大好差事，有各种“好处”可得；被派担任此种工作者，必为与高级官吏最有关系之人。回军士兵多系派来，或抓来的汉人农民，军中衣食皆缺，而劳役无已时，故往往有逃亡事件发生，此种士兵皆为有家有室之人，故追迫其地方负责人及其家属，一定可以追回原人，而所谓“好处”者，即出在这个关系上面。

夜间感觉气候甚冷，验高度表已达九千五百英尺，比在西安空中的普通飞行高度，还要高出约一倍，自然不会温和了。

过了门源以后，气候高寒，不宜人居，农事无望，我们七日预备住宿的大梁地方，马的草料和作饮食的燃料，皆无从取给，所以必得由门源先行派人送去。被派者名为乌拉，任乌拉者大半为贫苦人家，其运送工具为牛，速度甚慢，故必须早一夜作通夜行，始能赶到目的地，我们骑马的旅客还在甜梦中休息，而可怜的乌拉，已经拖着疲乏的身体踏上他无味的征程了。

## 十二、祁 连 山 中

据向导的告诉，知道门源至大梁计程有一百二十里，而且全系无人烟之草地，如果赶不到大梁，寄足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只好赶早出发，闻途中时有游牧之藏人杀人越货，故在门源添加善于枪法且通藏情之护士一名。早间约四时动身，明月当空，严霜被地，寒风迫面吹来，刺脸欲裂，眉目与鼻孔四周，皆凝重霜。记者所衣之藏服，此时亦减少其效力。走了将近二十里，才看见我们背后太阳慢慢的上升，从者多脚冻不能支持，下马步行以取暖。道路尽在于平川草地中，已由青海军队修成公路模样，异常平坦，平川中除有碱草外，极小的灌木亦不生长，四十里不见任何人家，远远山边草野间，间或有隐约的牛羊群和游牧毡房出现，那就是我们视界以内唯一的朋友和伴侣。

四十里至一站口，曰黑石头，有回回店一家，污浊破烂，无法入内，店内有奶茶可供饮用，余则一无所有。黑石头以西，又是八十里无人烟，地仍平坦。门源以西，已不见野鸡，只有野兔，从者常于马上发枪，十发九中，途中粮食，因得重大的补充。

黑石头以后之道路，紧接祁连山南麓，祁连山产金处甚多，今晚预备过宿之大梁，亦为有名产金地。途中有不少徒步苦力，背负粮食衣服工具等疲惫而行，土人谓之“金夫”。我们听到“金夫”名称，很容易想象到这般苦力都是容易发财的人，而事实上则不然其说，这般金夫都是高利贷下的“奴隶”，并不是自主的劳动者。他们都是农村中生活艰难的人，高利贷者才借给他们相当的“金子”，如果市价为一两金子换银元九十元，高利贷

者只借出五十元，即须要苦力们将来还一两金子。而借出所谓五十元，还多半给予粮食茶叶，现金占极少数部份。这些折价的货物，其价格又远比普通市价为大。故金夫在三层压迫之下，其所劳动之结果，全入高利贷者手中，与牛马同为无代价之劳动。造洋楼者不得住洋楼，挖金者不得用金之利益，各事盖有同然。

又五十里左右，藏人及蒙古人牧畜渐多，水草之地，皆易见毡房，蒙藏男女在大自然中，欢歌快舞，不忌不羞，似不知人间有辛苦事者。

近大梁处，已有野羊发现，其背黄故名黄羊，从者屡下马射之，皆未得中，盖黄羊性灵活而健捷如飞，俗有“黄羊站一站，马出一身汗”之谚，可见黄羊行动之迅速。明范瑟之塞上诗云：“健儿骄马浑无事，射得黄羊带血行。”我们用新式枪打黄羊，还难打着，他用箭射，居然可以“带血行”，似乎也太神乎其技了。

黄昏前，记者已人困马乏，近暮始到大梁。见有炊烟自地中出，而地面上并无一间房屋，心颇疑之。走近，始知为金矿区的大梁，穷苦之金夫皆傍土崖穴居，有所谓客店者，乃在一乾河岸之石穴中，石穴为水所冲成，外塞以乱石泥土之类，穴外秽污狼藉，死马三数冻僵门外，穴内人马杂沓，烟尘绕转，呼吸皆为之闭塞不通，张眼亦难，必到夜深人静，寒气逼人，才有相当清爽空气。假使夏季住此，山洪暴发，我们这般人就难免与波臣为伍了。同住穴中者尚有十余人，皆以皮衣为被，无一人有被盖者。店主人黑小脸，亮突的眼睛，不断注视记者之行装，使人不敢安然就寝。

这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山势似逐渐变矮，实则地势渐高。大梁高度为一万零五百英尺，几与湟北山口同高。

在石穴中对付一夜，次晨才从石穴中爬出来，似乎人生又增一番经历，看看一般金夫的住处，又觉得他们的生活，竟这样永远继续下去，人生希望直等于零了。

九日赶早登程，走过二十里冰河，有数处冰滩长一二里，滑马可畏。河尽，过一小岗曰景阳岭，为大通河与弱水的分水岭，山北之水北流居延海，山南之水汇入大通河。门源土人有句俗话说：“天下高不过景阳岭”。景阳岭海拔一万一千六百英尺，并不能算高，比它高的山还多得很多，然而门源人的“天下”中看来，景阳岭要算最高的了。孔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的“天下”诚然比门源人的大些，但不过也未出黄河下游的区域。各人的环境不同，认识不一，这是最好的例证。

大梁以后，本已入了祁连山脉中，为最易下雪刮风的区域，我们这次却每天有太阳，天气非常良好。因此只要我们肯做，许多危险的环境，也能侥幸逃过。

景阳岭后，又是平川，黄羊遍野，记者数发枪射之，皆未命中，遗念甚多。马行又数十里，始终未见人烟，藏人毡房亦不可见，举目荒凉，常起绝域殊方之思。回忆起汉朝李陵被迫降匈奴后，给苏武一封信上说：“顾国家于我已矣！”那一句话。那时的国家是姓刘的国家，李陵为博取功名，故欲立功异域。在穷荒绝域中战争之结果，“功大罪小”，竟蒙全家之诛，可痛殊甚，因此他不愿再行返汉。他苦战之后，得到如此结果，他再也忍受不了他平日的积愤，他想着苦战以争天下的是一批人，而安坐享用的又是一批人。所谓“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减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所以他的愤慨语，实为千古英雄吐出了不少怨气。

行八十里，至一破旧古城，俗名俄博城，图上曰博望城，遍

请本地之“知识分子”，无有知此城来历者。按张骞回来道路走祁连山南的事实推之，骞曾到此，亦未可知。城市破旧，无一间完整之房屋，农耕和商业都无可言，这里猎户是第一等人物。这样破烂的古城，却有两个税收机关，似乎政府的职责，只在乎收税，所以在无论如何荒僻地方，总有收税机关存在。

### 十三、走出祁连山

博望城四周本皆藏人牧畜地，因避汉回人势力，故远避山中。此间夏日雨后，蘑菇甚多，城内穷人多恃此为业。

景阳岭应为祁连正脊所在。俄博再过四五里，又翻一山梁，人扁都沟。梁上有“筹番碑”，字迹已模糊不清，不知为何代遗物。大体为汉人兵力打败藏族的纪念。

扁都沟长八十里，绝无人家，我们走了一天，只有几个缠回到青海做棉花生意的，是我们所见的唯一行人。路愈向北走愈低，因而显出山势愈高，道路尽随沟溪左右行，唐皇甫曾有诗云：“塞路随河水，关城见柳条”，真算有经验的说法。因为边塞上的道路，大半顺着河水走，有柳条的地方大半有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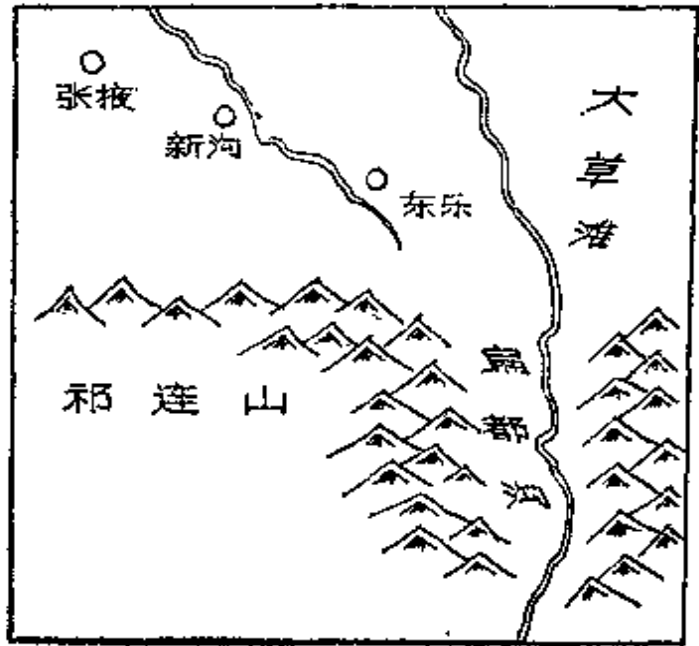
扁都沟中行二三十里，始有小小的木本植物发现，如大梁、博望城等处，只有草，小树也不见一株。博望城北有一夹硫磺质之煤层出现，扁都沟中西侧山崖上所露的煤层尤大。大梁以后，打尖颇为麻烦，此带为草地，无柴可寻，水皆结冰，得水不易。我们在扁都沟走得饿了，找了一个避风处打尖，水已坚冻，破冰无术，好不容易跑了一二里才在较薄的冰下，得了一小锅饮水，辛劳的征马望着我们的水喷气，那我们只好说“对不起”了。

马步芳和马仲英在扁都沟中打过一仗，这里的地形，如果从



北往南攻，非常不易，只要稍稍设防，欲由此路攻入青海，根本很少希望。

扁都沟走完，我们的视界立刻从祁连山中解放出来，丰沃平广的张掖盆地，披上无边的雪锦、村落、林木、溪流、牲畜、行人、炊烟……一一的进入我们的眼



底，我们立刻感人类社会的再临，我们出了扁都口才算到了自己的“家乡”，穷荒绝地的祁连山里，真有把人退回到千年前的凄凉！

出山口为炒面庄，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此间男女小孩十无裤，成年妇女大半单裤，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冷缩的模样，路旁间有大堡子，内中人们衣服比较完整，似为地主之家。

计行一百三十里始达东乐县，东乐原名洪水，清顺治时还是汉人和藏人相互做交易的官定市场。洪水往东，紧靠祁连山北麓，有一片大草滩，直通凉州。清康熙时，青海藏族请以大草滩为牧地，政府官吏力争不可，认为大草滩为武威、张掖要地，如果给了藏族，则藩篱已失，河西决难安定，河西不保，西北难有能安宁日子了。藏族领袖怀阿尔赖表示反对，他拔刀砍地上说：

“前明汉江山，独我不可得一片土，天何用生我为？”他的意思是多么可令人注意。明朝汉族的江山，你们满族可以取而代之，独我们藏族得这样一块小地方来牧畜，都不可能，那天又何必生我们藏族呢？这是民族平等的呼声，这是少数民族的民族生存权

的呼吁。象怀阿尔赖这样的思想，我想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有的，造成这种思想的事实，如果不能铲除，民族间的关系，绝无圆满解决之日。

东乐城内住户，恐难满二百户，穿城不过半里。我们黄昏始到，住关外一小客店中，店中空无一物，连烤火的柴也得自己设法。最妙的是，店主人也感到燃料的恐慌，屡次来偷我们的柴草，这是任何地方的旅店，所不易遇见的。

东乐至张掖尚有一百四十里，里度甚大，我们又不得不赶早登程，披星戴月，戴月披星，我思想的活动，藉马蹄的声响，节奏地开展起来。我的大藏马越走越有精神，在平地里骑马也比较在山地里要少操心些。所经过的集镇，都有“民药局”，就是公开卖鸦片烟的地方，明明是卖毒物，而硬名之曰“民药”，不问实际，只顾表面名称，这是传统的“秀才政治”的遗毒。

我们在一小镇打尖时，因为当天可以到张掖，所以吃不完的点心，都不愿再带走，以减轻马匹的负担。我们给了一块极普通的糕饼予一个农民，他不胜惊异的吃了一半之后，脸上充满了新奇的感觉说：“老爷！这是什么？我从没有吃过！”此小镇之西，为五十里长之荒滩，无水草人烟，名石高墩，黄羊成群出现，但遇下马持枪之人，立即远逃无踪，记者屡屡以枪击之，无一命中。

离张掖四十里处曰新沟，新沟以下，景象完全大变，崭新而整齐的村落，稠密的树木，熙来攘往的人口，如网形散开的水渠，并不下于淮河流域的风光。将到张掖时，我们看见对面来的牛车上载三个小女孩，约五六岁光景，问之始知为某老爷新买的“丫头”，三个小人的代价，共计十五元！张掖地方如此之富，而民生竟如此之穷，河西的情况，使我们感到怅然不释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兰州）

## 第四篇 祁连山北的旅行

### 一、“金”张掖的破产

每一个到西北游历的人，最容易听到本地人所谈的俗谚之中，总短不了“金张掖，银武威，秦十万。”这一条表示甘肃最富庶地区的语句。他们的意思是说：张掖，武威，和天水（即秦州）是甘肃省首屈一指的财富地方，特别是张掖，要算第一。

就是从历史上看，张掖在西北民族关系上，也曾有过重要地位。二千年以前，这里还是突厥族的匈奴占领的地方。汉武帝时，霍去病赶走了祁连山北的匈奴，汉民族才扩张到弱水流域来，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把这地方改为内地。张掖一郡，特别重要。所以取名“张掖”的意思，是“张”中国之“掖”，西通西域，以断匈奴与藏族的联合。

不过，汉民族以后，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巩固发展下去，唐朝时回纥占了张掖一带，宋朝中叶，藏族的西夏又代替回纥人据这块地方。一直到明朝，汉民族在这里的社会基础，才算巩固，树立了健全的军事政治组织。明代防御蒙古民族，从西北到东北造成一条长城，又把长城分为七段，设七个边镇，任防守之责。另设两个策应的边镇，共为九镇。其最西的一镇叫“甘肃镇”，镇地就在张掖。

清代的疆域远比明代为广，蒙古新疆尽入版图，张掖在军事

上的地位，已丧失其“西北重镇”之资格。一方面突厥族之回族，自明末已与汉族混居至复杂之程度，而且在军事上回族已取得相当力量，距今约三百年前清顺治时代，回籍军官米刺印以张掖为根据，联络西北回民暴动，满洲人费了很大的力量，才算平定下去。自此以后，张掖在军事上政治上再没有表现过重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离开张掖城十数里路，再来纵览张掖的风光，我觉得明代郭登的《甘州即事》一诗，形容得非常恰当：“黑河如带向西来，河上边城自汉开；山近四时常带雪，地寒终岁不闻雷。牦牛互市番氓出，宛马临关汉使回；东望玉京将万里，云霄何处是蓬莱？”他这首诗有点代表东方人怀慕乡土之思。

本来中国内地乡间流传着一句俗语说：“天下无水不朝东”。照内地的经验看来，所有的河流都大体以东的方向流到海里，然而内陆的河流却并不一定是这样，张掖的弱水（即黑河）就是向西流的。所以他说：“黑河如带向西来”了。

记者以一月十日到张掖，初被美丽的野景和壮丽的城池所刺激，内心里深觉“金张掖”之名不虚传。稍过几日之后，原来幼稚的愉快印象，逐渐换为惨痛幻灭的凄凉。

记者在张掖所得的第一印象，是没有裤子穿的朋友太多了！十四五岁以下的小孩，十之七八没有裤子，有家的人还可以在家里避寒，整天坐卧在热土炕上，偶尔出外走走，又逃了回去，倒还可以勉强过得去。有许多根本无家的孩子，只好在大衙门和阔人们的公馆背风的墙下，过颤栗的生活，他们的上身披着百孔千疮的破衣，或者原来就是没有做成衣服形式的烂布块和麻布袋，胡乱裹在身上，从绅士阶级们的卫生观点来观察，对于他们简直无从说起了。中年以上的妇人，在街上流落的，比孩子们少些，不过，随地也可看到。她们的外观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她

们无论上身单薄破烂到什么程度，如果裤子上半截，实在遮不着她们认为非遮不可的地方，那么她们总在自己腰部的下面围着一圈污烂的麻布或布块，最低限度得挂一块在小腹的前面。

这里已是拔海五千英尺的高寒地带，盛暑的夜间，人们都得用棉被。而且这时正是三九的寒冬，无论怎样穷苦的朋友，缺了皮衣，实在难于活动。然而这班孩子和女人竟破落到如此惊人的地步！我们如果在北风怒号的寒夜，闲步街头，不当风的墙角巷弯，常常发出一团团的火光，这就是他们白昼拾来或偷来的木片柴枝，在实在难支的夜间，正在作他们暂时对抗残忍寒冷的工作。

每日到了午前十时以后，太阳的热力，慢慢浸暖了地面的空气，他们的肢体才渐渐从屋角墙边舒展起来。小摊上、小店铺门口，是他们经常照顾的地方，大衙门和大公馆的厨房抬出来的残羹剩饭，尤其是他们的大宗而上等的食料。

青年的男子和女人，他们破落以后的出路，又另是一样，男子可以逃亡，女子可以走去作明的或暗的卖淫的生活。女孩子之出卖，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某次有一个妓馆的老鸨告诉记者：“王大的女孩子，我给他六元，他还不卖，张家只给他五元啦。”记者因问她：“王大的女孩子今年多大了？”“十二岁”，这是她平淡的答复！

要论张掖的街道，宽敞整齐，和内地的二等城市相比，并不见得很差。保定的市面颇近于张掖，而张掖的街市建筑却还在徐州之上。不过，这样大的城，这样宽的街，这样多的商店，到了实际活动起来的时候，这些商店很少开门，宽宽的马路上面却没有多少商业的来往，据经济界朋友们的告诉，张掖各方面崩溃的趋势，现正在加紧期中，张掖的“金”帽子，无论如何再难勉强戴上去了。

## 二、张掖的破产，是人懒的过？

许多朋友告诉记者：“河西的人太懒，抽大烟，所以穷得如此厉害。”然而记者经相当研究之后，觉得他们的话还不是正确的看法。人都是愿意生活得更好些的，饥寒交迫的日子，谁也知道不好受的。一两个人的堕落破产，我们还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无知”和“不长进”，整个的社会崩溃，却不是由于大家的“懒”了。难道大家都是天生来就是懒的天性，自己早已自觉的去甘于饥寒吗？如果大家表现了懒的现象，一定有使大家不得不懒的原因。

清代以后，张掖在军事政治上的地位已经没落，新疆与内地交通阻滞以后，张掖向有的“商业过道”的资格也根本取消。陇海路通到西安，西兰公路又畅行以来，原来由包头经草地到张掖，转发兰州各路的货物，也不再走这里，因此张掖的商业地位的没落，乃为不可挽救的事实。但是以张掖土质的肥美，灌溉的便利，出产的丰富，如果有合理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张掖的人民尽可以非常优裕的生活下去。现在的事实，张掖的生活不但不优裕，而且没落到饥寒线以下。这里我们不明白使张掖破产的根本原因。

张掖全县只有十万稍多的人口，从军队到县政府区村公所直接向民间所征发的米麦柴炭，我们暂且不谈，建设这个，建设那个，向民间摊的款项和物料，我们也无法统计，虽然这些负担，已经叫张掖民众“叫苦连天”。钱粮赋税，各地都有，张掖也不能算特别。我们只就“烟亩罚款”一项来说，已经使张掖农民非走到破产的道路不可。

甘肃省政府财政厅规定要张掖每年缴将近二十万的“烟亩罚款”，不管你种烟不种烟，政府非要这笔款子不可。并且给作县长的一种“提成”的办法，就是县长经收罚款，可以有百分之五的报酬，收得多些，提成的实数也随着大些，自然当县长的乐于努力。我们首先用不合实际的书呆子算法，每年二十万元担在十万人身上，每人每年两元，十万人中有五万是女人，不能生产，于每个男子每年负担四元，又五万男子中有二万五千人是老人和小孩，那么每个壮年男子每年要负担八元烟亩罚款了。有许多人不但没有种烟，而且根本连地也没有，这样的烟亩罚款仍然辗转嫁到他们的身上。事实上亩款负担情形，还不是如此容易推算，黑暗的方面，还不在这里。

亩款的目的，并不在“禁烟”而在“筹款”，这是我们要首先认识的。而亩款摊派的方法，系随粮税附征。表面上看来，粮多的人，一定土地多些，他们的经济地位好些，所以叫他们多出点烟亩罚款，倒是公平的办法。然而，谁知张掖田赋情形，早已脱了正轨。张掖全年共粮四万石，历年“报荒”之结果，免去了二万七千石，现仅每年一万三千石。因为地方政权在绅士手中，绅士们的地，都是上等地多，他们得了报荒的机会，把自己的好地报了荒地，免去粮赋。而真正荒了田地，却仍然要按亩上粮。所以这一万三千石粮，十之六七还是由一般贫苦的农民负担。种植鸦片，必须上等地始能成长，而上等地大半在绅士们手中，故绅士们种烟最多，但是无情的烟亩罚款，却又随着粮税不合理的把大部分落在贫苦农民身上。拥有二三等土地，种少量鸦片的中等以下的农民，负担亩款的主要部分，则他们每一个男子每年的实际的亩款负担，总在十五元以上。如果从租税负担能力的比例来讲，贫苦农民十五元之负担，往往比绅士们之三十元或六十元

还要痛苦。收款的人员就是县区村的“公事人”，这些人又是绅士们自己充任，他们在收款时候，还在农民身上想办法，农民这些额外的负担，恐怕连农民自己也算不清楚！

种鸦片，该罚，农民不想种烟，当然该加以赞成。前二三年高台县的农民曾经请求政府，自动禁种鸦片，不再缴那种令人害怕的“烟亩罚款”，然而政府对于这种请求，却没有允许！这桩事情证明农民之不甘堕落，而政府硬要强迫收他们的烟亩罚款，其中道理，颇令人难以了解！

农民的收入，本来不象工商业者那样比较有伸缩性。他们收入既只限于农产品为主要，而收获的季节，又大大的限制了他们。对于这种无情的强力榨取，实在没有支付的能力。但是“提成”制度奖励了县长的狠心，各种严刑重杖，在县政府中毫无顾忌的施用起来！张掖代人受杖一次的代价，是铜元两千文，约合大洋两角六七分。如果被衙门里当时活活的打死，这两千文的代价，仍不出被代替者的荷包！

政府一定要钱，农民没有，没有就打，那只好促成高利贷的产生了。农民最困难的时间是春天，张掖情形，一二三月借账，五六月还账，不到半年的时间，大致是这样的利率：

- 1、借现金者——百分之五十的利率为最轻者！
- 2、借鸦片者——百分之三百！
- 3、借粮食者——百分之百！

农民在这种毫无希望的高度剥削情况下面，除了抽抽鸦片，苟安岁月而外，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叫他们兴奋的从事工作？



### 三、弱水南岸的风光（一）

如果再在张掖住下去，不快的事情还要多些，十八日正午记者离张掖向酒泉出发了。本来打算十八日赶早登程的，因为韩玉山先生留记者看看他的军队，所以迟走了半天。这部分军队是马步芳的基本队伍，精神动作都不差，在我对他们的讲演中，我希望他们能在中国对外生死存亡的关头上，多多卖些气力。

骑马出了张掖西门，把眼平视出去，只有疏密不齐的林木，枯缩待春的枣园，祁连山和焉支山挟持着的平坦肥沃的弱水盆地，被冰冻了的河流渠道，以及大小远近的村落，点缀成有画意的幽静恬淡的乡郊，不过一低头看看地下的道路，和大路两旁居民的生活情形，一种酸苦的滋味，即刻改变了原有的情绪。闻某君在张掖做县长三年，刮去民膏七八万之多，而城门外的道路，也不见稍微收拾一下，似乎太有点“过于”了。

紧接西门外二三里地，即为弱水之支流，从祁连山里向北流来。弱水土人又名曰黑水，上源分两支，一即此由祁连山流出者，一则来自山丹县。两河会于张掖之西北境，更西北流至高台之西，始转北流至额济纳蒙古草地，注入居延海，下游又称为额济纳河。古人对于弱水，总想到是非常边荒。唐杜甫所谓：“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宋代苏轼，本来是比较旷观的人，然而他提到弱水，仍然是不胜其假远之思，其金山妙高台诗谓：

“我欲乘飞车，东访赤松子，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俗更有所谓：“弱水不载鹅毛”的说法，似乎弱水简直“弱”得了不得，实际弱水仍与普通河流差不多的水性。只是弱水南支从祁连山中冲出来，因为地势关系，河床倾斜度很大，在夏秋之间，祁

连山的积雪融解，山洪下注，水猛而急，故常冲下大小石砾，垫高河底，使河水左右横冲，于是河道年有变易，形成无定河之大观，合计现有各河道所占之面积，总在十五里左右，如能筑堤束水，则现有之若干河滩皆可立刻成为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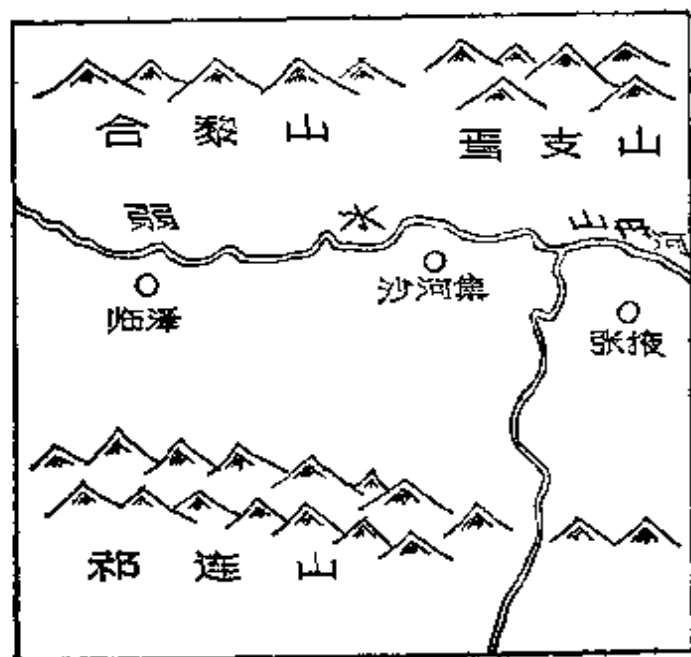
过完河汉，到一个小小的村落，地名乃寺，距张掖已二十里，乃寺西行，经三十里起伏无定的沙漠梁，沙漠梁区域中看不到有草木的存在，村庄人影，也在这个区域中和我们绝缘。唐人所谓：“匹马西从天外归，扬鞭只共鸟争飞”，必须有骑马行沙漠的经验者，始能了然其描绘的景象。十八日住沙河集，计行七十里，到店时天尚未黑。从张掖直接到沙河，我们丝毫没有休息，骑惯了马，在西北旅行，将感到很大的便利。

沙河集上的人告诉记者，地方上的区长村长多半是花钱买来的，三百元二百元一个的区长，只能保险一二年的期间。如果区长没有比三百元更大的好处，我想不会有人花钱去运动的。而且说地方上的绅士，多半也花钱在军队里运动顾问、参议之类的名义，钱多的是顾问，钱少的是参议。张掖的毛大绅士就是青海的顾问，假使顾问参议这些名义不会有某种便宜，运动当顾问参议的，不会如此之多。

夜间，同栈住有西来的几个士兵，他们在随便唱歌，内中一首是：“打了一仗又一仗，仗仗不离机关枪，三八式单打老乡”！后来他们重复唱这首歌，声音变为颤弱而凄凉。在寂寞的空气中，他们的歌声，似乎显示出一种怨望的意思：怨望中国二十余年无已止的战争，而每次战争，只是中国人打中国人！

十九日清晨上马离沙河集之前，在旅店门口遇到一个全身污浊，没有裤子，身披破絮的孩子，年岁不过七八岁左右，旁边站着一个一样脏烂的老妇人，大致是母子的模样，很疲乏的直眼望

着我们。这时街上还没有一个人出来，因为严冬的清晨，冷风飕飕的刮着，普通人是不愿出门的。我们为了赶路，是没有法子，这一对母子不找个地方避风，却一早起来当街站着，那一定是冻得受不了了，才起身来活动的。我把手中还存的半个馒头给



了孩子，他接过馒头以后，眼汪汪的望着我叫一声“爸爸”，半个馒头叫“爸爸”！在饥饿线下的朋友，对于吃饱了饭的人讲究的尊卑长幼的“礼”，似乎也顾不得许多了。

沙河以西，有十五里长的碱地，因为水利不修，缺乏充分的水来灌溉，碱性上浮，结成黄白黑三色混合的地面。碱地上除了碱草而外，旁的植物不易成长，惟有大道两旁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的柳树，还有少数歪斜的长着。

二十里铺，有几家破烂人家。过二十里铺又是十五里的沙漠，沙梁比乃寺西面的还要大些，汽车绝对不能行走。往来的旅客在沙梁上上下下，沙子随着人的脚迹移动，比走坚硬石的山梁要有兴趣得多。

沙漠走完，再几里就是临泽县。临泽县的城市，不如内地一个市镇，这个县的农民每年也要出六万元的烟亩罚款，各方军队在这里提取“拨款”的，都是长年累月的住着，总也提不清楚，因为农民实在拿不出钱来，农民负担太重，都慢慢的走向逃亡的

道路，好好田地一天一天的荒废起来，据友人明驼君的统计，临泽县第四区，民十九年共上粮一四四五石，到二十三年只上八八一石，减少了五六四石，按平均每耕地十亩承粮一石计，五年之内，已有五千六百四十亩耕地成了荒田了。如果按比例来说，五年之内，荒去耕地，已占原来耕地面积三分之一以上！据记者估计，这个比例，可以普遍的说明河西各地的耕地荒废的情形。另外一方面政府纵令种烟的结果，农民十之七八变成了骨瘦如柴的瘾君子，不能再吃辛苦去种地，这也是加速河西耕地荒废的重大原因。

#### 四、弱水南岸的风光（二）

过了张掖西门外弱水的南支以后，一直西到酒泉东面百余里的地方，我们都是弱水的南岸进行。临泽以西，村落稠密，阡陌相连，沟渠纵横，虽在严冬，犹有成都平原那样富庶的外表。

这时已将近旧历的年关，乡村中的人总在集镇上买些过年的东西回家，大道中熙来攘往的人们，都忙着准备他们过年的办法。只有记者同着几个从人，骑着征马，孤零零的永远走向陌生的地方！唐人岑参服官河西，到年底时，感到生活的寂寞，给了寄居在当时京师长安中的朋友一首诗说：“东去长安万余里，故人何惜一行书，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岁除”！农业社会成长的人，容易发生怀念故乡的观念，特别在有节气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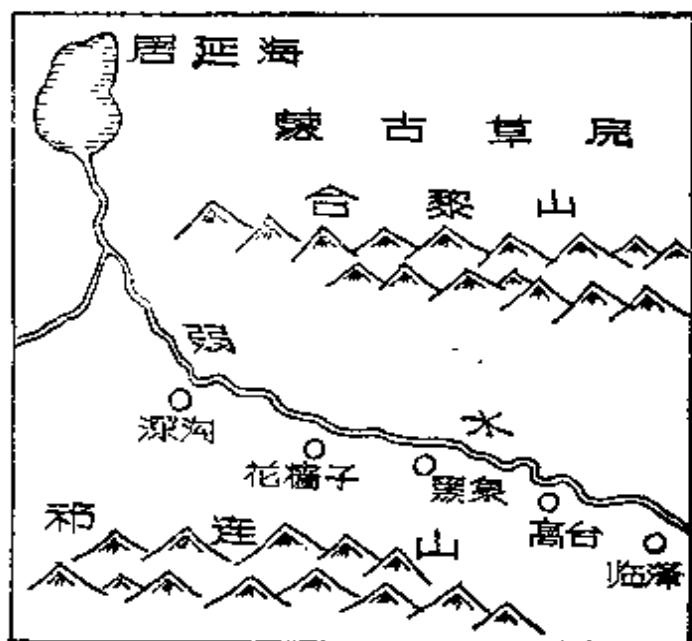
高利贷是河西普遍的现象，不过此间今年放高利的人却吃了大亏。往年的烟土价钱很高，一元只可买二两左右，放高利的人以为今年的烟土，也可以保持平常的记录。所以大半放账的都用了这样的办法：借洋一元，还烟土六两，这等于借洋一元还三元，

是百分之三百的大利！谁知今年鸦片大贱，一元可买七八两，因此不到一元的代价，就可偿清六两烟土的高利债，高利贷者于是大倒其楣了。

因为已届过年时节，田间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乡村的院落里，间或也有休息闲谈的农村家庭，气象也相当活泼。但是只要有一种戴貂皮小帽，穿着马褂，背上背着布口袋，口里含着长旱烟筒，一手拿着白布包好的账簿，一手提着打马棍，或者嘴上还留着八字胡的人，走近村子的门前，那个村子立刻变成了肃杀的气象。大人不讲话了，小孩也不闹了。主人的气势一泄，狗也不敢放声的狂咬，挟着尾巴退到一旁。这就是收账的人来了。这家人今年是否可以过安静的新年，就得看债主们，是否可以让今年所欠的利和本，等过了年再想办法。这一天遇到的收账的人，总有七八起，这简直是穷人们过年时一种大杀风景的东西！

将近高台，由泉水作成的大小渠道，穿错田亩间，泉水经冬不冰，所以不管雪在地上积得如何厚，渠中的泉水仍清澈见底的不断流行。要不是天气的寒冷，和地上堆着的白雪，我们简直辨不清这里是不是江南的乡村！

高台距临泽是四十里，我们黄昏以前才赶到城中。友人强留记者在高台住一天，他知道记者喜欢练习射击和骑术。他在二十日的早晨，约记者骑了马带上枪，到弱水南岸去打各种水鸟。弱水河中，常常有“天鹅”的降临。南方几省流行的一种俗语说：“癞虾蟆想吃天鹅肉”，意思是：“办不到的事，休要妄想”！那么，“天鹅肉”是不容易吃到的东西，已为大家所公认了。我们那天因为没有发现天鹅，无从打起，所幸友人还打得有现成的一只，和我们打着的十来只水鸭，大吃而特吃的饱餐了一顿。天鹅的形态颇近于南方特别高大的家鹅，肉味近于鸭肉。



最宝贵的，是天鹅的皮上拔去粗毛以后的绒毛，天鹅绒是非常高贵的装饰女人衣服的材料。

张掖、高台一带的人，常常有个不能解答的问题。他们用肉眼看去，高台比张掖要高，为什么弱水会向高台流？记者初时的感觉和

他们一样，但是高度表告诉我们，张掖海拔五千英尺，高台只有四千七百英尺，还是要低三百英尺。

高台附近的村庄，多半有高大的城堡围着，外表非常堂皇，如果进村子里去实地考察一下，虽然是年关在迩，我们仍然看不出丝毫殷实的内容来。仅有的一点殷实气，早已被黑暗的政治、剥削和高利贷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时离旧历过年只有三天，还有三三五五的中年妇人，穿着污旧的单衣裤，到城厢各处偷偷的乞食。她们的家里如果有支持一天的粮食，她们决不肯出来受冻和丢女人们最看重的“颜面”。又假如她们还年轻些，或者有人收她们进妓院，或者她们也想作半明半暗的皮肉生涯，只是，在这样小小的城中，哪容易寻找如期送粮的“恩客”？在饥饿与羞愧的战斗中，她们终于被饥饿打到街面来了。

在高台停留一天之后，我们不得不踏上西赴酒泉的征途了。从此西行二十里至方向堡，农田非常肥沃。再西则有碱地出现，

地质渐晓瘠。又三十里至黑泉镇，镇店以外人家渐稀，这里因为人家不多，经济生活单纯，故有放高利资格的人都难找，只在村区上干公事的人偶尔放点账，每元每月利息二角，只照单利计算，每元每年利息是二元四角，就是年利率百分之二百四十！

“公事人”的钱，借钱的无论如何少不了的。

出了黑泉镇，西北上远远望着无边枯草，环绕着浩荡的湖水，湖水的北面是弱水河身，再北面就是平平的土山，土山上如长蛇式的万里长城，很明晰的进入我们的眼底。紧靠大路的南面，是不长草木的粗沙梁，大致和大路平行，间或间隔着很大的沙窝，村落树林，在沙梁这面再也看不见丝毫踪影。刚才被高台附近乡村所引起来的江南风光的回忆，至此又整个的换上了塞外的枪凉！

心境被各种问题所占据，没有留心辨别岔路。我们一行五六匹马的小马队，走进了完全的沙漠区域中，愈是前进，沙漠愈大，向导也不知究竟错了没有，大家只好照着沙漠上旁人走过的足迹前进。不过，渺茫的心情已经笼罩了同行的每一个人，大家只是不得已而且无希望的走着。幸而不久有两个徒步的苦力从对面走来，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道路应该向西北的，走成向西南了。如果再走下去，会困陷在沙漠的中心，当天无论如何走不出沙漠，人马都将无法找水饮食，自然住处更无从说起了。我们才立刻变换方向，对准西北上走，马匹虽然吃苦不少，我们总算达到了大路驿站的花墙子地方。

## 五、弱水南岸的风光（三）

花墙子约有二三十家居民，以产甜瓜著名，前清时进贡的

“哈密瓜”，并不真正完全出在新疆的哈密，一部份出在敦煌东北的瓜州，一部就是花墙子所产。瓜大而味甜，为内地绝无之塞外名产。

天已不早，我们只好马蹄不住的前进。花墙子往西，路仍是一面南靠沙梁，一面北临弱水，地尽碱质，一望都是草滩。此时弱水中被冰冻着一只空船，停靠在弱水的北岸。船的附近，只有三五头黄牛，自由的在吃草。“野渡无人舟自横”，不意塞上亦有此天然画景。

预定住宿地是花墙子西三十里的深沟，我们走到日已西斜，经过很长的草滩，慢慢上了前面的粗沙梁。梁上有一旧破古庙，下马扣门问住持，始知花墙子到这里只有十里的路程。啊！好大的十里。天晚路遥，无论人马如何困乏，也只好鼓起勇气登程了。马过庙后，但见无边的戈壁（粗沙漠），没有丝毫草木的踪影，一种茫茫然的心情，油然而生，不知当晚是否尚可赶到宿处？因而又想起唐人过戈壁时的诗来：“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记者本无“家”可“辞”，而且长年累月的飘流，也无从计算“月”“圆”的“回”数，却是“今夜”的情况，记者诚与千年以前的古人同其意境了。

西北人的习惯说法，称粗沙漠曰“戈壁”、称细沙漠曰“沙窝”。两者有一个共通性，即都是其中无水草，无人烟。戈壁非常宜于行汽车，地硬而平。沙窝则凸凹起伏，沙质又松，人马经行其上，亦感困难，汽车绝对无法通过。地理专门名词上应该如何称谓，俗说是否适当，记者尚不得知。

慢慢的，前面的戈壁滩现出了边沿，我们知道戈壁滩快完了。再前进些时候，边沿的前面模糊的现出了草滩沟，黄昏前，



灰白色的草滩沟的远方，隐约的现出了村庄土墙的模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尽了自己的目力，向前探见，随着马蹄的前进，我们大家的面色逐渐变做了愉快的表情。

驰下戈壁滩，深沟的人家已清楚的进入我们的视线。草滩地上随处有黄羊，记者下马借黄昏光匿草丛中连发射之，惜皆未中。骑入深沟站，居民已掌灯，于昏黑中视之，房屋十之七八已经坍塌，一种死寂的空气，压着了行人的心灵。深沟现在共只有四五人家。原来满清时候，是驿站，并有防备北面蒙古的兵营在这附近，本来相当的繁荣。地属碱性，水利未修，无法耕种。所以从前完全恃国库的饷粮过活。民国以后，驿站撤除，兵营解散，所以本地人皆无法生活，死的死了，逃的逃了。现在剩下来的几家，只靠偶尔留一二个过路客人，得一点店钱来维持生活。然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妇人和孩子们都往往因为缺乏衣服蔽体，而无法出门。

记者寄宿的一家，是深沟的甲长，他的父亲作此地甲长，父亲死后，他就“世袭”了，仍然作甲长。这里的地方政治组织有点特别，乡长要保长每年每人报效一百五十元，保长问甲长每年每人要一百元，甲长于是问人民每家每月要一千文。这不知是那里来的规矩！一个老妇人告诉记者：“迟早深沟不会有人了！”

弱水到了深沟的北面，就转而北流，出万里长城，经过一个峡口，直北流到额济纳蒙古，再北流入居延海。再从深沟往西走酒泉，我们再没有富有史意和诗意的弱水在右面陪着我们了。可惜记者因路程所限，不能陪着弱水，一直走到居延海，去看看那面的景象。唐人胡曾曾有一诗吟居延海道：“漠漠平沙际碧天，问人云此是居延，停骖一顾犹魂断，苏武争禁十九年”！照他的诗看来，居延海那面是十分荒凉，只是驻马一看，都会令人“魂

断”，可见非常可怕。不过，中国过去的士大夫，十九都只想过舒服日子，不愿轻离温暖的故乡，所以偶遇新的环境，就大惊小怪，往往过甚其辞。据曾走过额济纳居延海一带的朋友徐少尹先生所示居延海的照片，则见其水草丰美，林木参天，牧畜发达，仍为非常适于人类生活的地方。

汉武帝时，西北方的匈奴民族，非常厉害，武帝令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统率勇敢兵卒五千人，到张掖酒泉一带练习射箭，以防备匈奴。李陵旋奉令出击匈奴，败于居延海，被执于匈奴（苏武牧羊也在这里）。李陵之败，从战争的本身言之，是由于各军失了道路，连络不上，而且骑兵和步兵形势完全不一样。最关紧要的，是汉武帝的政略的失败。他太看重了军事部门，忽略了政治经济的领域，游牧民族的匈奴，根本无固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地，可以作为他攻击的目标，让他占领了这些中心地带，就可以使匈奴屈服。匈奴永远这样东南西北流动着，随地都可以生活，随地都可以战争，汉武帝最多只能杀些人，得些牲畜，绝对没有屈服他们的方法。只有武帝上一代皇帝景帝时代，赵充国对付青海藏人的方法，才是好方法，他用军事力量推进到可以耕牧的地方，立刻使那里成为农业社会，弄好了再前进，凡是水草丰美的地方都把它农业化。武帝不知师法充国，专重干戈，虽然军威曾震撼一时，而对于民族间关系的影响，仍无重大意义和收获。

## 六、策马望酒泉

二十二日别了深沟，西行三十里碱地，至盐池驿，盐池驿北有天然大盐池，故名。有人家约百家，因为盐池的出产，大家直接间接总可得些利益，所以一般的生活情形，总比深沟要强一

些。我们小马队到驿街之后，有几个衣服肮脏如乞丐的老头，走来给我们溜马，他们的目的在希望得几个代价抽大烟。记者见他们的衣上佩有符号，细视之，才知道他们还是“壮丁队”的队员。啊！好“老”的“壮丁队”！

盐池里的盐，谁都可以去挖，只要你自己有家具。盐的原价，每百斤是大洋五角，但是一上岸，就得每百斤上二元三角的重税，成为二元八角的高价！盐本来是人类生活必需品，尤其劳动者，食盐比普通人为多。有些国家对于盐是不收税的，而我们不但收税，而且税得如此之重。此地民生如此其痛苦，不见当局有任何设施，以福利民生，只知道设税卡子要老百姓的现成钱，似乎太说不过去！

盐池西面又是四十里无人烟的碱地，北风劲烈，小雪纷纷，面如刀刮，为记者到西北来稀遇之奇寒。

双井子有人家十余户，记者暂入一家屋内避风，奈屋中仅一暖炕，主人全家四五口尽在炕上作过年食品，除老主人夫妇外，尚有红衣绿裤的大小姐与新媳妇，亦在炕上工作。记者进屋后，她们皆急得无地自容，避实无处可避，不走开又觉得和年青的生男客坐在一个炕上，又太有点不好意思，她们再也不能安静的继续工作，陷入了局促不安的状态中。记者无奈，只好自己知趣的别了主人，再跨上马背，继续我雪风中的长征！

双井子之西，和东面是一样的荒凉，风更大，幸而记者全身藏人装束，除险部外尚不感十分厉害的寒气。走了三十里左右，路旁有一小方型单间的土屋，屋门口站立着一位非常健壮美丽的少妇，她用手挡着眼前的大风，伸长脖子，似乎向荒草滩中探视什么的样子。一会儿，草滩那面一匹雄骏的白马，载着一个壮年男子，如箭似的奔来。他们两人很快乐的进了土屋，留了白马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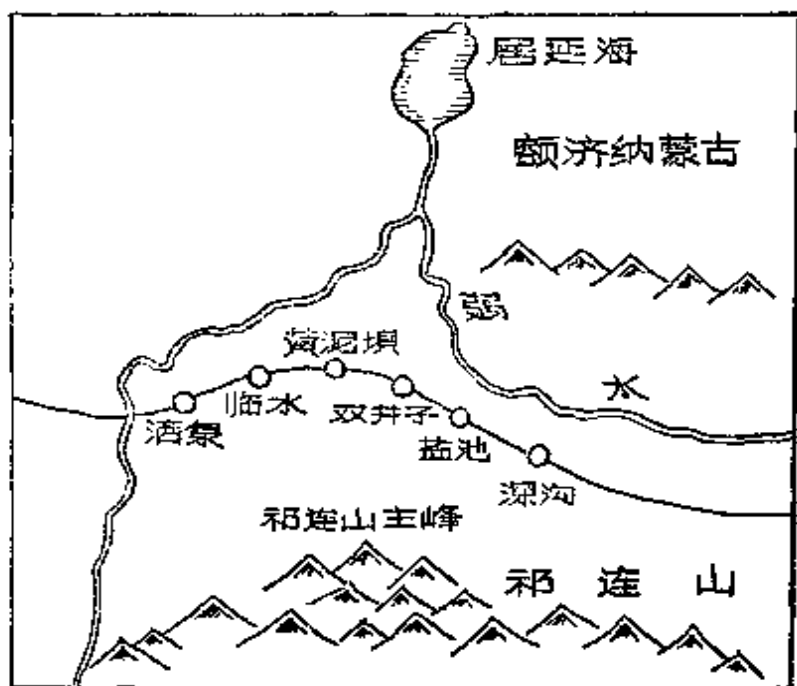
门。不知道传说的薛仁贵回窑，是不是如此光景？

因为风大，我们总是低着头走，突然从者用马鞭指着西南上叫记者注意，记者从风雪交加中，只见西南上有较高的积雪山梁，并没有怎样特奇的地方，又低了头走。从者再以鞭指得高些，再请注意，记者随所指处注力视之，立刻精神为之一变。原来西南上的雪山高出寻常，几次往上移动视线，才看见了耸入天际的高峰，这正是祁连山的主峰，高度近二万英尺，比记者所站立的地面还要高一万数千英尺。明人戴弁吟祁连说：“气吞沙漠千山远，势压番戎六月寒”。诗气之雄壮颇足与祁连山势相当。

薄暮，共行一百一十里至黄泥坝。此地亦仅不及十家的住户，穷困不减深沟。妇人们都穿单裤，十四五岁的女孩还光着屁股！水井因为冻冰，所以只是化冰作饮料。从者向他们买喂马的麸料，他们拿不出来，他们说他们平常就没有机会吃到大米糠和麦麸子，只是吃黄米糠。我们的马要吃麦麸子和豌豆之类的“料”，他们连人都吃不到，哪还有卖的。

他们说，他们迟早也要逃到外方去的。这里“款子”收得紧，没有钱，挨打受不了。而且不是今天“练壮丁”，就是明天“编保甲”，弄得大家鸡犬不宁。他们村长自己家里有“监”，可以监禁他所管的百姓！一个妇人更愤愤的说，她家里欠村长三元款子没有缴足，十几只绵羊被村长赶去，成为他的所有，另外还借了每月二角五分利一元的大利款子三块大洋。缴了所欠的款子，才算了事！这几天黄泥坝的几家人已经弄得一无所有了。“过年？过年只有看见人家热闹！”她发出无望的叹息。

店主人的小公子，在次日黎明就夹着书往外走，记者因赶路每天总是微明起床，我奇怪他这样早去上学。他说，他们先生自己兼带着种地的，迟去一点，恐怕他上地上去了！同店也住着一



位酒泉小学教师，他穿一件浅蓝色污旧的单竹布长衫，没有任何的行李，和一位送他的苦力在炕上抽大烟。第二天他就这样光光的一身冒着风雪上路，要说教育界的清苦，我看这样就算到了

极点了。不过，他那种长衫皮底鞋的风度，在本地乡下人看来，仍不失为一派斯文。

临行前，主人收了我们不多的钱，另外他却和一位瘦长黄脸，戴貂皮小帽，穿黑长衫马褂的公事人模样的人，在唧唧咕咕，手里拿了一张纸条，你看了我看，我看了你看的谈着。记者有点奇怪，接过他们的条子来看，上面写道：“今摊到省上来委员大人，人×名，马×匹，白面×斤，油×斤，料×斗……”记者承蒙他们官封“委员”，虽大小阶级尚未明定，而一夜寄宿之情，竟不惜以名器相假，诚使人啼笑皆非！一方面我们过路客人，实在非“省上”“委员大人”之贵，我们人马的消费完全照价付款，自无用其“摊”，而且我们消费的也没有单上开的那样多的数量。假如记者不发现，这一村的老百姓，又将负担冤枉的款子了。

我们过了黄泥坝，就算入了酒泉盆地了，成排和独立的树

林，单个和聚处的村庄，把眼前的景致点缀得有充分的生气。二十里到一大镇，叫临水，镇中商店都贴上鲜红的春联，因为今天已经是除夕，明天是新年初一了。有一家比较整齐的商店，正在写各种春联，记者乃下马挥毫，给他们写十几付充满喜气的成句对子，然后上马直奔酒泉。又二十里至马坊，一群无精打采的中年男子坐在家里炕上混光阴，面上都有饥色，记者进屋休息，问他们过年安好。一个瘦白的汉子白了我一眼，接着说：“过年？借了临水镇里吴家六块大洋，每一元每月三角利，现在共计借了十个月，该利十八元，还不知道这利再算不算利！现在什么都当完了，还差好些，再过一年，我这辈子永远还不清了！”记者替他算算，单利的年利率是百分之三百六十！后来知道记者写春联的那家，就是商人地主兼高利贷的吴家，心中颇为懊悔。

马坊离酒泉只有十二里了，风雪似乎来送“年”，比昨天更加劲，路上常有单衣单裤徒步的妇人，急急忙忙的走着，头上缠着薄被，抵抗风雪，但又不能不留一个眼睛在外面看路，今天是除夕了，环境还不让和她的丈夫或者子女在家里布置年节！同是人类，而苦乐相差，竟至如此！

酒泉的近郊，仍属不冻泉水所灌溉的肥沃田园，不下于张掖。城垣不及张掖之广大，而街市之整齐则驾于前者而上之。

## 七、酒泉走向地狱中

记者以除夕到酒泉，次日即为旧历新年，各行皆歇业休息，穿红挂绿之妇女儿童往来贺年，爆竹灯火熙熙攘攘，予旅人以深刻之刺激。但是尽管是新年时候，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十岁以下无衣褂全身灰泥的乞丐儿童。有几条背风的街道，记者简直在晚间

没有勇气经过。这般几乎全身赤裸的孩子，在夜间，他们就在门角墙脚，乃至无水的水沟里藏了起来。你如果用手电去照，这里一堆三个，那里一堆二个，彼此挤得紧紧的睡下了。到了夜间十时以后，气候变为酷寒，这般孩子渐渐忍受不了，他们于是本于童性的自然，放声哭出他们求救的惨痛哀声：“妈妈呀！冻得很呀”！“爸爸呀！救命呀！冷死人呀”！“老爷太太呀！实在冻得受不了呀”……有时天气特别寒冷，一两条街的灾童一齐号啕大哭起来，哀声震动全城！记者也去参观过所谓“救济院”，院里的设备和管理，就和一些破产的男女老幼自由偶尔聚集到一个地方，没有两样。东睡一个病人，西睡一个老汉，屎尿污水，随处横行，房屋破烂，管理全废。我以为如果让他们自己散开去寻生路，起码还可以减少些彼此疾病传染的危险。

酒泉本来是火商业口岸的地方，为新疆、包头、兰州以及新疆南路商业上的转运点。一位商业上的朋友指给记者，某家铺面从前是二十万，某家铺面从前是三十万，现在都关门了。自然一般经济的不景气，和新疆政治情形的变化，当然是使酒泉商业衰落的原因，而酒泉自身所有的破坏社会生活的势力，我们不能不加以特别的研究。

酒泉和张掖一样，农民最大的出产，全靠鸦片。酒、张两处的烟土，不及武威的好，武威鸦片销山西，供晋人吸食之用。酒泉鸦片走平津，以为造“白面”的原料。烟如不起价，社会经济即立陷于紧张。农民的鸦片，被高利贷和商人已经剥削一回了，最厉害的，是军人每年要地方上缴多少的“官土”。“官土”者，官家要的烟土也。收买官土，并不是自由交易性质，系派定某区缴若干，某区缴若干，区派保，保派甲，甲长派到每个农民，穷而无势的农人特别吃亏些。官土如果是二万两，农民总得

多出几千两的“中饱土”。官土的价是“官定”的，“官价”比“市价”要低。这样低于市价的官价，又常常只给一半。这一半的官价，经过商会到各区，区到保，保到甲，等到分到农民手中，比原来的数目又差好些了！所以纵令烟土的市价很高，农民除了把烟土送给旁人发财外，没有旁的希望！

酒泉那点“风烛残年”的商业，军人还要和他们竞争。他们把官价收来的烟土，用军队的骆驼运到绥远，他们比普通商人要少付一次酒泉本地的烟土税。普通商人由酒泉到绥远，共上四次税：酒泉本地税、额济纳蒙古税、宁夏税、及绥远的“塞北关税”（本国境内要上“关税”，不能不算奇怪！）。军人运货，本地税局只好装做不看见了。他们在绥远卖了烟土，换成茶叶布匹等货物又运回酒泉，本地税局又不敢收税。他们并且自己嫌麻烦去销售，把货交给商会，摊到各商家，立刻又要集中现款！他们又在青海运些大黄、蕨麻等土产，强摊各商家，换取现金，不管这些货是否能有销场。

这里的官场似乎已养成一种风习，不管大局倒不倒，只要我此时此刻能弄金钱到手就行。有几个河北人在酒泉办了一个化学工厂，利用嘉峪关外玉门县的石煤原料，好容易才造出些洋烛肥皂之类，并提炼煤油汽油，成绩还很好，而特税局的人非要他们照外国的洋烛煤油上税不可！奖励这种脆弱的工业品推销才是正道，硬要用重税去摧残，试问是什么道理。大概还嫌河西一带，有了这样一个化学工厂，反而不顺眼，不如简直根本把它取消，倒还好些！

新疆和内地的关系，本来已经不断如缕。我们在这地方负责的人们，似乎还惟恐其不早日打断这一缕情丝。新疆到内地的商人，现在比从前少得多，而且输入的也没有重要的货物，只限于消



费用的葡萄杏瓜之类，因为新疆重要出产，出口苏联，到中国内地的是苏联不买的东西。这种贸易情形，已算可怜到极点了。怎样用方法联络新疆商人使其内向，当为目前西北的急务。然而我们的税收机关，对于新疆来的商人，除正税之外，还要多方留难，多方压迫，甚至死人棺材经过，也非出贿赂不能通行，一定要用铁钩伸进棺材去，把死尸钩得乱七八糟，才算满意！

酒泉一带农民最感切肤之痛者，为对于军队的负担。农民每年缴给县政府的米粮，再由县政府转交驻军，作为吃用，以抵销省府应给驻军的军饷（近来军饷已由省府直接放发，比较改进些）。各县不论有无驻军，一律把粮交军队，所以秋收时。大量的贱价粮米，尽归了军队，到春荒斗价高涨时，军队又拿粮来卖给商人，转卖农民。这种不用本钱的办法操纵粮食，农民当然只好加速度的堕入破产的深渊。

粮之外的油、盐、柴、炭、料、草，……无不征发于民间，设有“兵站”专司其事。兵站之权，又是制民死命的了。因为征派之缓急，权在兵站，兵站可以直接拘捕杖禁农民，所以区长保长之类，都得送款于兵站委员，否则兵差一到，这般人就会应付不了。

这样可哀的酒泉农民，每年仍然要出十几万的烟亩罚款！县政府之收烟亩款，自然不用重刑不能榨出现金了。酒泉人被无比其多的公款逼得无法，他们明知是“饮鸩止渴”的高利贷，借了高利贷十九都要破产，然而他们为“先公家之急”起见，仍然只好先求对付现状。又为了稍微自己安慰起见，他们养成了一种“及时行乐”的风气，不管情形怎样，有了钱在手，那管借的高利贷也罢，卖家俱的也罢，即刻要用也罢，他先到小饭馆去大吃一顿再说，宁可出了馆子再借高利，亦无所用其踌躇！

## 八、嘉峪关头

酒泉的朋友们留记者在酒泉住了半个月，尝尝塞上新年光景，亦是人生不可多得的机遇。

二月十日始由酒泉搭新绥汽车公司特开敦煌的汽车，出嘉峪关外一行。新绥汽车公司原担任绥远至哈密的道路交通，后来又扩充哈密至兰州一线，终因政治的牵制，兰哈线未能直达，只限于兰州酒泉间之来往，新绥公司虽为私人营业，实在西北交通上负有非常重大的任务，新疆与内地之交通，全赖此一公司苦力支持，惟就目前记者所深悉之各方局势言之，该公司应早定大计，将交通总枢纽，移至西安或兰州，更有计划的发展西北交通，并彻底改善内部的组织，如此，始能有光明的前途，并可以一新全公司之耳目。

酒泉以西的地势，戈壁地要比黄土地多些。戈壁上常生一种植物，多刺，冬季成白色，骆驼喜食之，俗名骆驼刺，唐人诗中所谓：“酒泉西望玉门道，千山万壑皆白草”，所谓白草，即指骆驼刺。

我们内地人看到酒泉，已经觉得是边远地方，而玉门关外的人看酒泉，则又已经是内地的很舒服地方了。班超在西域为刘家天下镇服诸国，一直老了还不让他回来，他在“求代还疏”中哀求皇帝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玉门关在敦煌西北，尚东距酒泉一千余里，他只要活着进了玉关门，已十分满意，若到酒泉，那简直可说是意外的庆幸了。

酒泉至嘉峪关七十里，大道约十分之三为冰块所盖，行车最为危险。不过这一带行车，必须开车的有特殊的经验，乘车的人

尤要有置死生于度外的决心，不然，总会让你感到恐惧与苦恼。车行四十分左右，道入广泛无边的戈壁。戈壁西面，在两山环抱中耸立起巍峨的城楼，矮矮的长城有如一条长蛇似的，从边远的北面山梁，蜿蜒穿过城楼，又向南面的山梁爬去。同行的指示记者，那城楼处就是“嘉峪关”了。

嘉峪关为明代长城最西的起点。中国长城只有秦隋明三代的工程为最大，但三代之中，又以明长城为最长，而防边设备，亦最完备。秦长城起于甘肃临洮（洮河东岸），隋长城起于甘肃武威，只有明代长城起于嘉峪关。

嘉峪关有小城一座，历年兵祸，城内已全废颓，城外有居民约五六十家，街市房屋矮小破败，居民亦穷困无活气，“关口”在城西，关上有高楼一座，现楼盖已为大风吹去，仅剩支柱几栋，还在为此古迹作勉强撑持，关门洞中，写满了古今中外游人过客各种各样的题诗，记者详细读过一遍，佳者不多，且十九为苦边怀乡之作，气势雄壮者，不得一睹。记者因忆起林则徐过嘉峪关的诗来，林氏因反对英人贩卖鸦片毒害中国，毅然以武力与所谓“文明民族”的英人周旋，竟因抗英有罪，谪贬新疆，他路经嘉峪关，作了一首胸襟豪壮的七言诗，读之颇能使人精神焕发，诗：“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峭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湟谷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在他的塞外杂诗中，还有两句，气势也好：“雄关楼堞倚云开，驻马边墙首重回”（边墙即长城）。他的诗比现在旅客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所表现的情绪要高明得多了：“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好象出了嘉峪关就是生离与死别！不但俗人充满了保守家乡的思想，历代知识份子也多视离乡别井为畏途，唐戴

叔伦的《边城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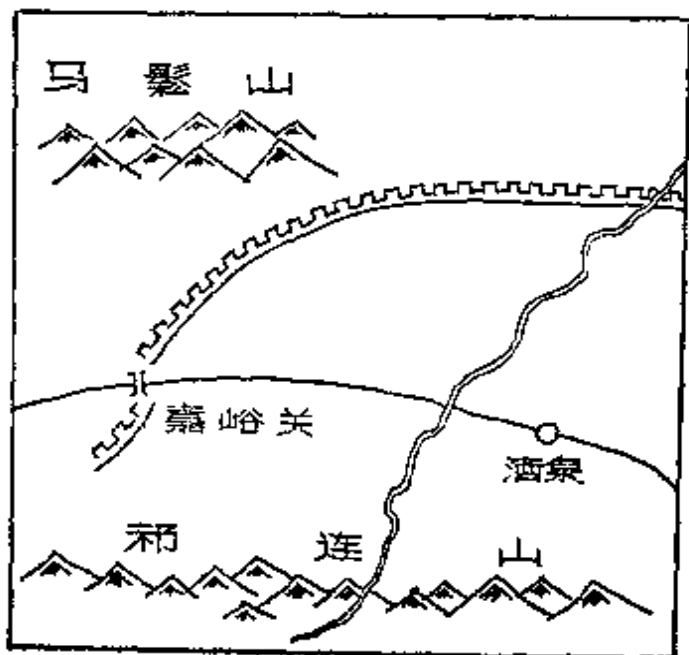
“人生莫作远行客，远行莫宿黄沙碛”。清谭吉璫的《吊战场云》：

“祁连山下草，寂寞少人烟，魂魄千年后，犹思渡酒泉”。我不知道老守在家里干什么？

但是，我们看看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民族的情绪，却看不出丝毫留恋家乡的意思来。

成吉思汗左右之通中国文化者，只有契丹降人耶律楚材，他因原属契丹，而且已受相当中国文化之熏陶，然而他的诗的滋味就已经来得不一样：“葡萄亲酿酒，橄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即哈密瓜），人生唯口腹，何碍过流沙”（征新疆时作），又说：“优游聊卒岁，更不望归征”，他们只想找更美满生活，根本不想回家，无论沙漠怎样苦，他们也不怕。东汉马援所说的：“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死于妇人女子手中耶”，成为后世的佳话。记者以为“男儿”死了不必一定要有人“裹尸”，更不必要“还葬”，本着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百折不回的做下去。那天死，那天完，根本用不着管尸体将来怎样安排。丁文江先生在青年留学日本时候，改日本名诗抄给朋友说：“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这首诗上虽然功名气重些，但是比那种始终不愿出门的秀才，又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嘉峪关这一带地方，是秦汉之际乌孙国地，其西疏勒河流域



为月氏，其东北，今内外蒙古地为强盛之匈奴。后月氏被匈奴赶至天山之西，乌孙亦被匈奴指使，追月氏而移国于伊犁河流域，汉武帝时代，为想联络乌孙，以夹攻匈奴，把江都王建的女儿细君，起为公主，不惜陕、甘、新三省长途跋涉，往嫁乌孙。乌孙王叫昆莫，年纪已大，而且语言不通，这样当然使这年轻而美丽的细君，难于过活下去，她因此作了黄鹄歌一首，以表达自己的哀情，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逝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我们读了这样悲痛哀恻的歌词，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对异民族无办法，逼得用女人去联络异族的辛苦景象。

## 九、玉门安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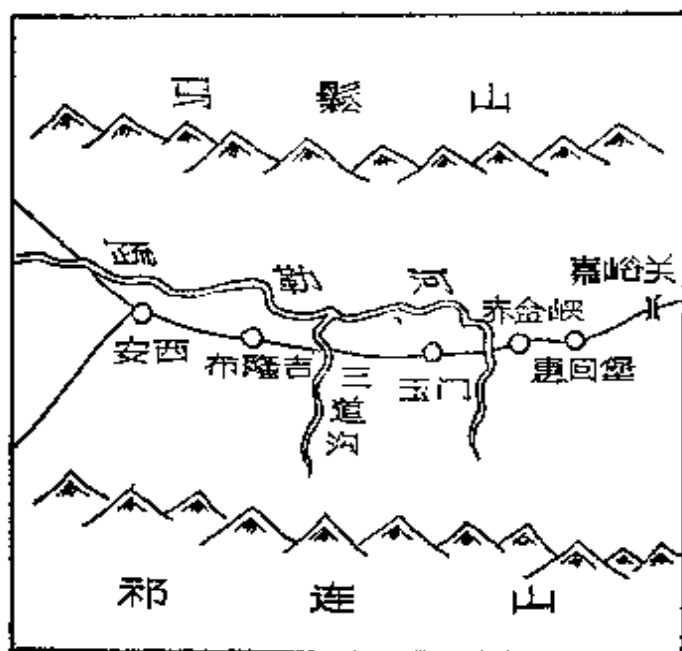
记者在嘉峪关遇到一个不了解的事实，就是此地的关税问题。新疆是中国自己土地，新疆商人到甘肃来贸易，为什么要在百货税之外，上一次“关税”？关税应该设在中苏边境上，怎么设到嘉峪关来！

中国汉唐以来对于新疆都没有得到切实好处，每年出征西域的，十有九死于塞外，只有新疆出产的葡萄，有不少进到关里来，故唐李颀有：“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人汉关”之叹息。

车出嘉峪关，经七十里戈壁至惠回堡，住民约四五十家，雕零气象，比嘉峪关为甚。又一百一十里至赤金峡，路仍多戈壁，人烟在半途中绝难看见，我们汽车从峡河的积冰上驶过，冰已渐溶，如果车要重些，恐就难保险不破冰下坠了。又九十里至玉门县。玉门县并不是玉门关。玉门县系由安西酒泉两县分来的土地，系后设的县治。玉门县四面都被戈壁包围着，只有东面孔吕

河之西，还有一条可耕地地方。县城小而狭，汽车在街上转动，太感困难。

玉门西五十里为三道沟，这是关外第一大镇，比玉门安西的县治都要富厚繁盛些。三道沟有一个山西大商人在任乡长，他这个乡长在三道沟，可以说是“权



倾中外”，什么人也没有他大了。汽车在三道沟附近陷入小溪的活沙里，好容易才弄了出来。

兰州以西经武威、张掖、酒泉、三门、安西，略有缠商的足迹，不过越往西来，缠商的势力更大些。新疆大部的人口是“东土耳其人”，大致即中国历史上所谓“突厥”。他们喜以布包头，故汉人呼之曰“缠头”，又因他们多半奉“回教”，故又叫做“缠回”。张掖以东，他们的势力不大。酒泉的东关，几乎全是他们的商业。他们除将新疆土产输入内地外，并销售苏联出产的各种布匹等件。苏联布匹价廉质坚，深受一般消费者欢迎，故缠商的商业，颇为不坏。三道沟之缠商来往者颇多，他们赶着骆驼队或者毛驴子队，穿过沙窝戈壁，东西运送，他们性情忠厚驯善，身体壮实，青年男子和少女，颇富欧洲人的美丽。元人马祖常有诗记关外商业情形说：“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踪，采玉河边背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不过现在的缠商，主要的不是贩卖新疆南路的玉石，同时也不到中国来换“桑麻”，

这是与“波斯老贾”略有不同罢了。

三道沟常有蒙古人来交易。三道沟北面紧接马鬃山。马鬃山界于新疆、甘肃、外蒙古之间，以西北而东南的方向，袤延数百里，山不高而歧分杂出，形如马鬃，故称为“马鬃山”。山中现住有不到一百家的蒙古人，大半为外蒙古独立以后，不容于新政权之蒙民，过去时与外蒙武装冲突，经外蒙派人入山大屠杀一次后，本有五六百家之蒙民，现在凋零到只有几十家了，他们皆以游牧为生，由一张姓汉人以团总名义管辖他们。三道沟南面过祁连山脉，即为青海和硕特蒙古，近因负担太重，常有蒙古人从青海逃入马鬃山。马鬃山的蒙古人，现在对北面怕外蒙，西面怕新疆的哈萨，所以不敢住在马鬃山西北两面，情形非常衰弱，然而此间汉人对之尚呼为“鞑子”，贸易对之亦欠公平，民族关系如此，可为深虑！

途中遇到二位到安西提“拨款”的军队副官，那个气势之大，真叫人不忍接近，闻安西全年收入不到二万元，这一次的拨款就是二万四千元，其他的拨款还不算，试问不足的款子从哪里去想法子？殊费思索。

三道沟的市面因为皮毛起价，较往年活动些。高利贷在这里不很流行，因许多人穷到水平线以下，赤光光的一无所有，只要有人放账，他们都借，但是借去以后，只有要他的“命”，才是唯一的还债的方法，放债的人也只好束手了！

三道沟过了一夜，次日转赴安西，上下五六条干河，全为疏勒河的支流，再经几十里丰美的草地，共行九十里至布隆吉。在草地中走错路，绕了几十里，才转到布隆吉的市街。

布隆吉亦为破烂之小街，有大树数十株，相传为清雍正时年羹尧所手植，故称“年大将军树”。年羹尧为雍正时最有才略的大

将，以征服青海之罗卜藏丹津建立大功。他本人是否曾到过布隆吉，记者尚无所知，惟就其用兵经过说，他确曾派军监守过布隆吉。当时年对青海用兵的布置，先分兵永昌、布隆吉两处，把守祁连山，防罗卜藏丹津冲入河西内地，南面屯兵巴塘里塘（在今西康）及四川松潘北之黄胜关，扼敌人川藏之路，又屯兵新疆吐鲁番、哈密、巴里坤（镇西）一带，截其通新疆北部准噶尔之路，然后分遣主力，从青海东面的西宁，诸路出击，罗卜藏丹津不支，但仍负隅柴达木盆地。年更计划由西宁、松潘、张掖、布隆吉四处出兵合攻之，副将岳钟琪不听，请兵孤军直入柴达木，终迫罗逃入新疆，平青海。就此事实观之，年或者曾到布隆吉巡视，亦未可料。

汽车最害怕的是冰滩，一层是汽车轮吃不着冰面，一层是冰的厚薄不一，不容易看出来，一到薄的地方容易陷到冰里去。五十里至双塔，冰滩阻路，我们找了一个老农带路，他不敢上汽车，只愿意在地下徒步作汽车的向导！车过双塔，路入南山的戈壁中，一百一十里至“十工”，再由十工经四十里草地北入安西。

安西以“风”著名，俗谚谓“一年一场风”，粗率的想，以为风不多，而实则终年不断的大风区域，风经常为东西向，故安西县城南有一座新城，东西两面的城垣，被风吹开许多裂口，如排齿之倒立。安西为疏勒流域，惟水利未能尽其利。民生之痛苦与政治之黑暗，为黑暗的河西之第一等黑暗地方。绅士与地方官互为勾结，鱼肉乡民，如某绅士既为县政府科长又兼教育局长又兼中学校长，县长兼任党部委员，故一切事皆可为所欲为，一切政事，皆为取钱之机会。当区长要运动费，打官司要特定的状子费，练壮丁，只要有钱可以免役。军队要收“官土”，县政府派定



每家若干两，但不要“烟”，要“现款”，而所规定的烟价比市价要高二三倍！收款以后，再照市价收烟土，交付军队，一转手之劳，可以获倍蓰的利益。临时派款尤为利害，我看见过一家农民家里的墙上，贴满了交过派款取回来的收条，好些收条没有图章，又没有日期！不久以前，安西出了一个“两江代电”的笑话，煞是有趣。有一天商会会长突然被押在县府里，会长追问被押的理由，据说是“欠款未交”。会长说：“我什么钱都交清了，还欠什么款呢？”县政府的人说：“你还欠一个‘两江代电’的款子！”这把商会会长也弄得莫明其妙了。后来说明白了，原来是这样一回事：省府曾有两个“江”日(三日)电报，提调某种款项。商会早有款存县府，遂彼此对销，谁知县府事后忘去，追查旧案时，见两电之款无着落，乃立刻把会长拘来。其势甚凶，经说明原委后，被拘者才又恢复自由。

从安西西北走，为哈密大道，西南通敦煌，为关外之咽喉地。乃政治黑暗如此，民间村落十之五六已无人烟，多分别逃往哈密、敦煌一带。就城厢而言，原有户口九百户，去年为七百户，今年只有五百户，差不多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在递减！相反方面，新疆则无代价给难民以土地、耕牛、种子、农具，召致人口，繁荣新疆东境，所以农民逃亡者日见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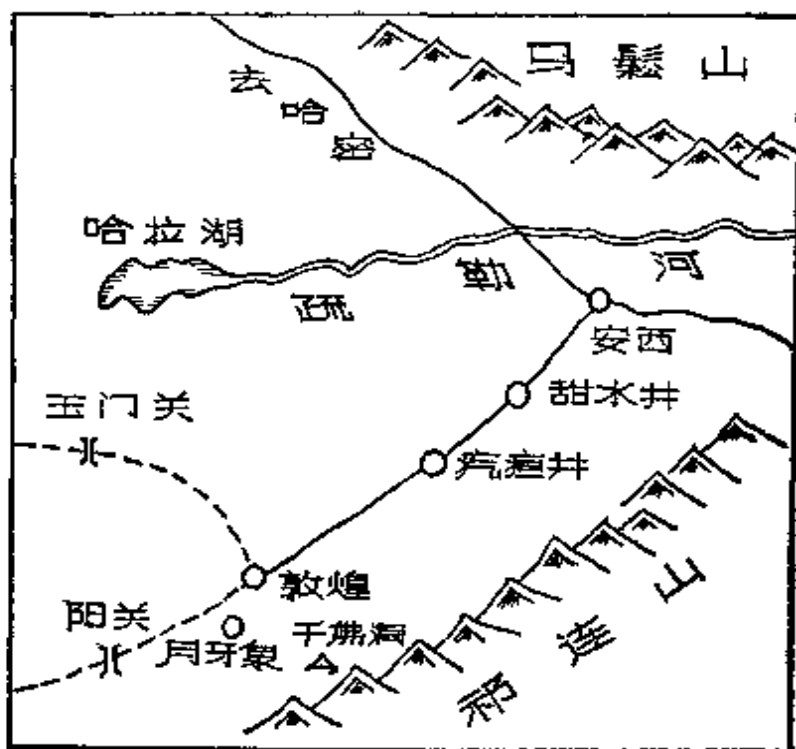
## 十、塞外桃源的敦煌

河西各县地势，以玉门县为最高，拔海五千七百英尺，比张掖还高七百英尺，比安西高一千英尺。安西到敦煌共计三站，二百七十里，十分之九为戈壁，只有站口的地方，有水和土屋，可以吃喝休息。夏天戈壁蒸热，人马都难于支持，只有夜间上路还凉爽些。

然而汽车走戈壁，却太为理想了。戈壁平坦坚硬，可以高速度的开驶汽车，有如在无甚阻碍的碎石公路上。十二日车由安西开敦煌，第一小站过瓜州，为昔时种瓜进贡之地，阡陌痕迹尚在，惟城堡已废，田地亦荒。甜水井为第一站，有土屋一间，有井一口，水苦，名“甜水”者，乃希望的表示。第二站为疙疸井，简单如前。疙疸井再过数十里之碱草地，中为一大盐池。盐区广大，人烟太少，自无力谈开发地利，至离敦煌四十里处，始有村落，曰新店子。从新店子望敦煌，只见南面为寸草不存之大沙漠山，北面亦为无人烟之碱地，只有敦煌附近林木葱茂，土地肥美，人烟稠密，此可谓名符其实的“世外桃源”。敦煌拔海四千英尺，在大戈壁包围之中，惟藉南面祁连山水的灌溉，故土地出产甚丰，宜于居人。

现在中国内地对新疆的交通，系由安西走哈密，而汉时则由敦煌西北一百余里出玉门关以至西域，班超、张骞经营西域，都是走这条路，所谓“但愿生人玉门关”的“玉门关”就是这里。唐时对西域交通，已有路路变动，玉门关之道因人事与自然的改变，阻塞不通，改在玉门关南另辟大道的关曰“阳关”，“阳关”即玉门关南面的关也，唐王维诗云：“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即指这个阳关。唐以后，阳关之路亦断，今欲由敦煌至新疆，无路站可循，必须横过二千里无人烟的戈壁与沙窝，无特殊准备者绝不能通过。在汉时，玉门关的规矩，早晨鸡鸣开关，西域各国的朝贡使臣始得过关。而各国进贡马匹，总是在雪晴了的时候，带进关来。“月明虏使闻鸡渡，雪霁番王贡马来，”即描绘那时玉门关的事实。记者因限于时间，两个古代雄关的遗迹，都没有去实地凭吊。

到了玉门关附近，我们不应该忘了汉武帝对匈奴的政略，和



张骞出使西域的事情。汉武帝似乎也曾深深的察觉到了，我们以农业立国的民族，永久不止的和那游牧为生的匈奴民族对抗，总是有点不胜其麻烦。最好能另找到一个游牧民族和我们同盟，去应付匈奴。月

氏本来是疏勒河上游牧的民族，被匈奴赶走了的，如果我们去联络月氏，请他仍回来住牧河西地方，他与匈奴为世仇，自然无妥协余地，而且有月氏的阻隔，决不会使匈奴与藏人联合起来。有了这样一个月氏住在河西，汉朝自然可以少去许多军事的顾虑。在这样的政治需要之下，张骞就从长安向伊犁河的月氏出发。那时河西尚为匈奴所据，张骞要通西域，又不得不走河西。在他通过河西的时候，被匈奴发觉，把他逮捕起来。十几年后才得间走脱，继续西进，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经今吐鲁番、焉耆等地以向伊犁，后知月氏已逃至中央亚细亚，不再在伊犁，乃越帕米尔，径趋撒马耳罕。谁知月氏安于中央亚细亚之土地肥美，不再想回河西。张骞不得要领，乃起程东返，归路走塔里木河之南于田、和田等地。他因鉴于上次被捕的经验，不敢再进玉门关，乃由阿耳金山口，进入青海柴达木河流域，欲由祁连山南

面寻路东归。此时藏人（羌人）已与匈奴有联络，故仍执张骞以献匈奴，再被囚，遇机会才再得脱东返故国。他这样的精神和毅力，值得我们衷心敬仰。

记者在敦煌住了一天，只骑马去参观过闻名中外的千佛洞，和早著名于汉时的月牙泉。

敦煌在汉唐时候，为中国与印度，中央亚细亚各国，欧洲各国陆路交通的大道，商业与宗教的传播，皆以敦煌为过道。故当时敦煌为陆路交通上重大商埠，财富与宗教学术文献之存积甚多。其保存文献最多者为千佛洞。千佛洞藏有千余年来之各种珍贵文献，清末为英国大探险家斯坦因所发觉，盗窃殆尽。现在此种文献分藏于伦敦、巴黎者不知凡几，敦煌本地人士所有者不过千万分之一之残篇断简而已。出敦煌东南行约四十里戈壁，放马急驰，约一小时可到。洞在戈壁断崖处，南向之长沙石崖上，凿有一千余个洞口，计分上中下三层，洞之大小不一，每洞有若干塑像，壁上亦绘满各种与佛教有关之图画。洞与洞之间，从前在洞外有走廊连接之，现在走廊已塌，乃凿穿洞与洞间之石壁，以通行。今各洞中之塑像之有价值者，已被盗一空，壁上图案之有价值者亦被人拓去，故无特殊有价值可言者。藏经卷文献之石室，今已一无所有。洞壁前为一冰溪，溪旁有古庙三座，周有耕地亩许，引溪水以为灌溉，柳树成林，别是一番富丽风景。溪之对面南山，上有三山峰，并立如“山”字形笔架，传即为三危山，“窞三苗于三危”，不知是否即是此地。千佛洞的工程，现虽已经颓坏，惟其工程浩大之程度，仍属可惊。壁上图案中，多为印度之风俗与城市情形，人物生动欲活，着色亦周详切当，至今尚有非常鲜明者。石壁之西端，有坐形大佛一尊，须登其前特造的九层高楼，始能平视其口部，楼口俯视地下，心中怦然欲坠，

粗略计之，其高总在五十丈左右。

出千佛洞向西北走，约二十里戈壁，翻一沙窝凹，入一四面为沙漠山包围之窄地中，地有大泉，积水如钩月，故名月牙泉，泉深十数丈，终年不涸，亦不外溢，冬季结冰，水中产铁背鱼，土人不敢食，盛长水草，曰七星草。泉旁有庙，及居民数家。汉武帝时，相传此池中有天马自水中出，日行万里，因此献之京师，有“天马歌”记其事，其为妄诞，当可无疑，池旁刻有石碑曰：“渥涯池”，即汉时名称。

敦煌孤悬戈壁中，玉门阳关不通后，交通上已无重大价值，全恃土地上之出产以维持社会之生活，故农业为敦煌之主要经济部门。敦煌人口率多来自内地之移民，现仍就移来人民旧有之籍贯为单位，划地聚处耕种，名其地曰“兰州坊”，“秦州坊”等，每坊人之生活习惯语言等，一仍其旧。因人口来源复杂，彼此互相观摩影响，思想与性格皆比普通世居一地之农民为活泼。

敦煌因地势低下，故气候温暖，冬季有棉衣即可以御寒，兼有雪水灌溉，农业收获甚佳。然而敦煌亦走入种植鸦片的黑暗道路，好地尽种了烟土，一般人亦十九吸食鸦片，每年粮食不足，春荒时流亡遍野。绥远、平津一带鸦片市场，近年供给过剩，烟价跌落，敦煌烟只能到新疆去找些微的销路，用秘密方法，运入新疆，给东土耳其人与汉人消费。不过此种出路，终属太少，故敦煌社会经济，陷于死路。全县每年仍负担二万五千元的烟亩罚款，虽然因为县长是位忠厚长者，摊款的方法公平些，而民众正愁各款的负担，仍为人不敷出的现象。记者试统计过一户的支出收入情形，有凭有据的他们一年出了五百多元，而他收入的农作物，全部用最好的市价计算，出不了二百五十元的数目。

## 十一、敦煌返张掖

由敦煌动身回酒泉，是十四日的中午，我们的汽车回到离“十工”十余里地方，突然坏了机器。那时天近黄昏，戈壁寒风袭人，饮食住宿皆无着落，全车乘客无不惶然不安。幸经司机辛苦的修理，于黑夜中勉强到了“十工”一家村庄里。

当地的村甲长看见汽车到了，赶快派人过来伺候，问我们如果要什么东西，尽管吩咐，他们立刻就办。并且对我们长一个“大人”，短一个“大人”的，必恭必敬的立着好几个。我们知道他们一方面误会了我们是“官吏”，一方面他们又可借此机会，摊老百姓一些不应当的负担，自己从中渔利。我们严重的声明了我们是“旅客”之后，他们才散去。

汽车经过多方修理，十五日居然能继续前进，诚属难能可贵。平常朋友们说，河西的“大姑娘”有些也没有裤子穿，然而我所见过没裤子的“姑娘”，却没有“大”的。这次我们的汽车回三道沟时，汽车的喇叭声，吸引出来无数的男男女女，这回有一位确乎“不小”的姑娘，忘了自己没穿裤子，也跑了出来看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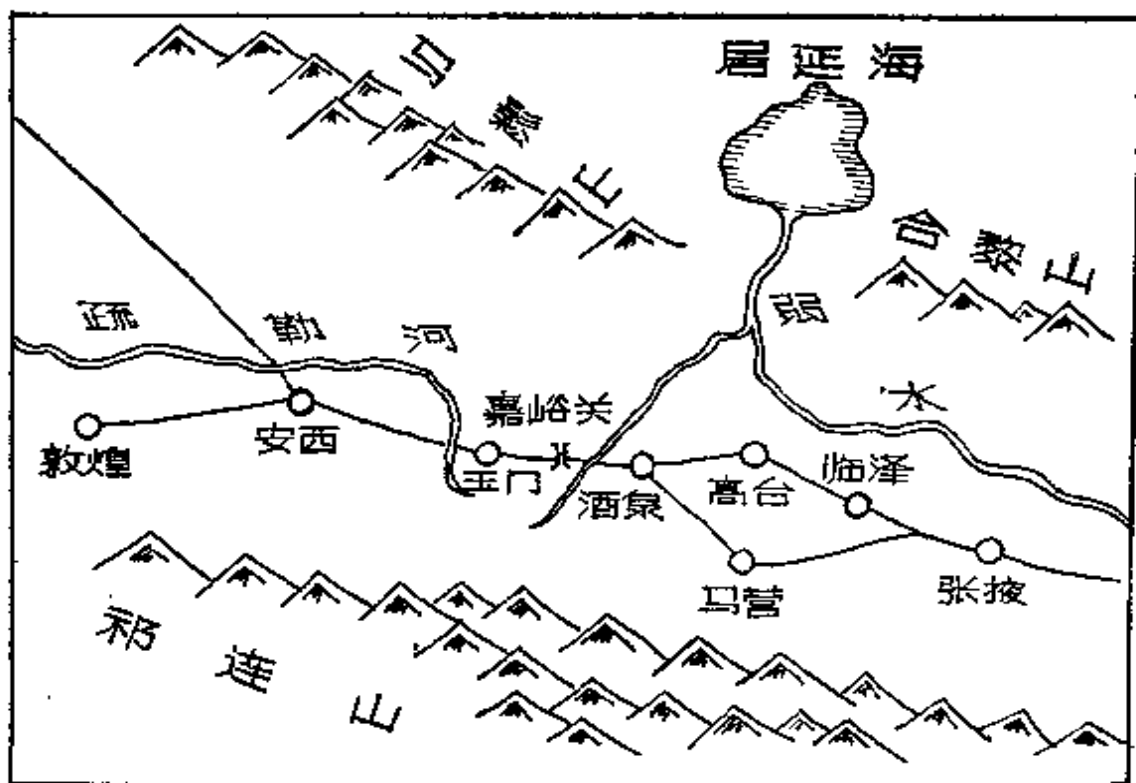
这天起风，把三道沟到玉门的戈壁路吹得看不清楚，我们走迷了大道，幸有新绥公司的何静轩先生随车指导，经停车研究，终于改正了方向，才回到玉门。

玉门县长在新年中做出了一件有趣味的事情。旧历正月十五日，县长突然用椅子作成“八人大轿”的形式，由八个人抬起，请了四十名驻军前后拥护着，在正街上来回走了一趟，回头县政府叫玉门城厢居民每家出洋一角，全城计九百余家，共洋近百

元，说这是“迎春费！”

十六日我们由玉门回酒泉的路上，遇到成群的逃荒农民，他们都是惠回堡一带的农民，一切收入交了公款和高利贷，逼得自己没有吃的东西，只好离家逃亡。光腿的孩子，小脚的女人，女人怀里还多半有不能行走的婴儿，烂棉絮、破麻袋、水壶和柳筐……没有次序的驮在小毛驴背上。男子们身披着或反提着破羊皮袄，一步一歪，无精打采的在戈壁走着。我们西来时，他们尚勉强支持着，不到十天工夫，他们抵不住饥寒的压迫，只得向他方去乞食了。或者他们理想的目标是玉门、安西、敦煌这些城镇，他们那知道，那面的农民也是一样的逃亡呢！

记者十八日始离酒泉，搭汽车重返张掖，欲由张掖以赴武威。张酒汽车路，因避沙窝，不走高台、临泽大路，改遵祁连山北麓行。此路人烟稀少，举目荒凉，黄羊随处可见，惟酒泉境汽



车路尚好，车行甚为顺利。张掖境内，水渠乱灌，道路泥泞，汽车时而横爬土梁，时而困入沟中，常走此路之司机亦难认清大路之所在。

祁连山中住有藏族的一部分，他们信喇嘛教，同时又有信回教，念可兰经，也如回教不吃死肉，这大体为回藏混合民族。

西北民族关系相当复杂，在一般人对中国“汉回”是“回族”或者是“回教”的争论未定之前，记者不久当就管见有所论列。但就西北汉回大本营的甘肃临夏县居住的汉回而论，他们的性情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同车有河州（即临夏）友人，故讨论至此。

河州人勇敢好斗，尚武轻文，有古代欧洲斯巴达人的风格。乡俗对于窃盗缺乏正确认识，只要不在本地方活动，一个人赤手空拳的离家出外，半年或一年之后回来，骑了马，带了许多东西，大家都恭维他为“好汉”。受了伤，或者残废了手足，都无大关系。最可耻的，是一无所获，或者被人捉了受刑而归，他们叫着“没有光辉”！

在河州西乡还盛行一种赤手捕野鸡野兔的风气。在冬季下雪以后，野鸡无处觅食，而且匿藏不易，他们就凭空手去捉野鸡。还有一种办法，是联合几十个人或者几百个人，大家骑马分散开，围着一座山，或者是一块大草滩，作为临时的猎场。这种猎场的广大，数里或十数里不定，大家围定之后，大声呼噪，惊出草丛中的野鸡和兔子，谁发现了鸡或兔，谁就骑马狂追，同时东西南北一齐追赶，不让鸡兔有片刻休息的机会，渐渐的，鸡兔都跑疲飞倦了，把困乏的身体藏到草下或者石隙间，追的人遇见这种机会，就会不顾一切的，从飞奔的马背上扑将下来。下面是水也罢，泥也罢，冰也罢，刺也罢，树枝也罢，他们全付力量，向目



的物直扑而来，否则恐有落于人后的危险。追赶的时候，不论平地，河滩，山崖，他们的怒马总是直上直下，横冲直闯，故往往有两马相撞同时毙命的现象。追赶开始以后，虽弟兄父子长官部下皆不相让。捉得鸡兔者，将猎获物拴于自己所乘的马鞍上，无论多少，绝不交旁人携带，鞍上野物多者，则趾高气扬，乘空马回者，则垂头丧气。回家后又将兔皮鸡毛放置门外雪地上，以多者为荣，邻人皆聚而称羨，无皮毛之人家，直无面目出门。勇敢胜利的人，回家时，能得全家人之爱戴。如父子同出，为父者空手而归，则家人亦只对子热烈，当父亲的只好退到冷房子去自己藏羞。至于吃食，则大家共享，毫无关系，只有“光辉”不肯丝毫让人。军队围猎，尤为猛烈，每次围猎结果，必有若干人受大小创伤，此种风俗，为中国各地所无。

在张掖候车期间，约了几位朋友骑马带枪到郊外去打黄羊，张掖北门外二十里地方是弱水的东支，土人叫做山丹河，因为源出山丹县境。河中常有天鹅水鸭之类。由木桥过河，即为一约十里宽之戈壁滩，戈壁北方有山横列，曰焉支山。汉武帝使霍去病攻下焉支祁连，置张掖等四郡之后，匈奴不胜其苦，乃为之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因为祁连水草丰美，而焉支则出产颜料，为匈奴妇女化妆颜料所自出也。

戈壁滩中，一切生物及建筑，皆不易见，偶尔见远远的黑影，使大家起了相当的兴奋，当我们跑到之后，或竟是一个沙堆，一块石头。以常情言之，在生于人烟稠密，生产富饶，家庭美满的人看来，象焉支山邻近的这样地方，实不宜于长久居留。唐杜审言所以说：“红粉楼中应计日，焉支山下莫经年。”我们从焉支山回张掖城，系绕走弱水上游，从冰滩上强过，冰坚滑马

蹄，必下马牵之而行。将近南岸，为未冻水流所阻，乃再上马，策马入水中，强行渡水，水深几没马背，且寒冷彻骨，若非塞外耐寒健马，恐难不丧身冰流之中。

## 十二、到古意盎然的凉州

二十八日始得搭车离开张掖。张掖以东道路，完全听其自然，丝毫无修理之痕迹，水渠并无与道路配合的计划，自由交叉，而农民排泄水渠剩水，亦无一定安排，胡乱放些在大道上面，水积泥松，且有薄厚不等之冰块浮盖上面，汽车一入其中，难得不受拘留之苦，故汽车往往绕行甚远，始能通过。

车旋过东乐县旧城。城南，直达祁连山麓，有大草滩，为历代边防上牧马之地，俗称大马营。今军政部亦有牧场在此，据本地友人相告，现尚无良好之成绩。

车至山丹县，司机驾车绕城外而过，盖避免进城时驻军之留难麻烦也。此间各县习惯，无论车辆或行人，欲进城通过，必须出名片一张，交守门者转交其最高负城防责任之长官，得其许可后，始能通过。而一般官兵识字者无多，知识太差，行动迟慢，往往在城门空等二三小时，尚无答复。故有经验之旅客，多不入城，省却许多无谓的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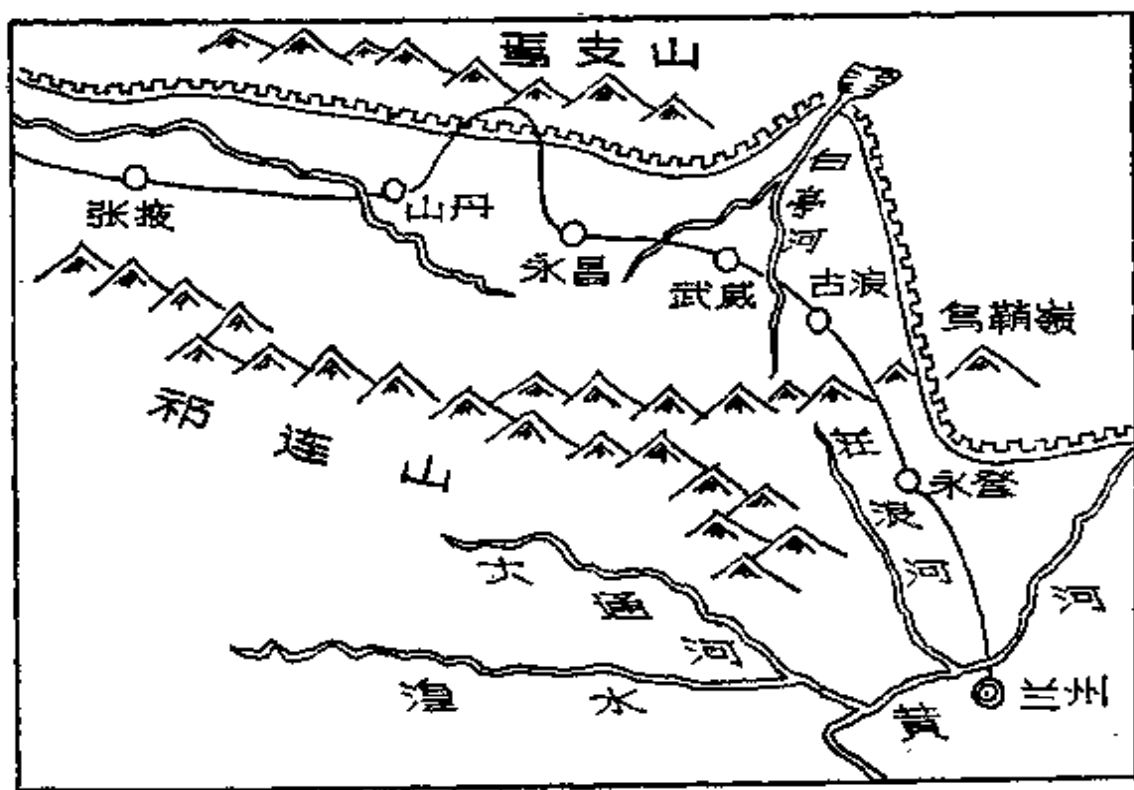
山丹以后，汽车路穿长城而出，沿焉支山根东南行，可以避开许多水渠的阻挠。长城在山西境以东者，为石筑，陕西以西者，为土筑，甘肃境内全为土筑，故损坏甚易。山丹境长城已十塌四五，余者亦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由此推想过去之新筑与培修，不知耗去多少人力，牺牲多少民命。冯译帕克尔著的匈奴史说：“读史者应知长城者，实一大血线也，埋骨其间，无代或

绝，千余年来，魂绕边塞者，奚止百万！”诚为有深见的论说。

黄昏过峡口，峡口为祁连与焉支之连接处，峡路峻急，乱石当道，为武威张掖间险要军事地，深夜住水泉子，旅店里有一个非常肮脏的少年来招待客人，记者送他一块烧饼，他看了一会，才猛吃下去，回头说：“这个东西好吃，我还没有吃过！”

焉支山在峡口之西者，随处有煤矿，煤层暴露在山崖上，土法开采之煤窑甚多，并有瓷窑厂，烧制各种用品。惟山丹直至永昌之间，庄户本已稀疏，现更破坏，所余无几，举目凄然，不解年来社会何以雕零如此之甚！

二十九日车趋武威，武威即古“凉州”，在历史上曾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永昌、武威附近的道路，其修筑比张掖直可谓为“不可同日而语”！然亦因渠水无适当之管理，随处漫溢，冰滩蔓延，重大的损坏原有的道路，且若干地方缺乏桥梁，车须涉水而



过，亦为令人不快之事实。渐近武威，人烟渐密，地势渐开，土地亦现丰沃气象。惟人事方面，则汉人十九身体孱弱，衣服褴褛，鸦片烟残害后的苍黄瘦脸，挂在多半的汉人头上！凡是身体壮实，衣服整齐，骑高骡大马者，都是回回！

千余年前的凉州，是各民族混合居住的地方，而且人口也很繁盛。在唐人吟凉州的诗中，我们还可以推想出当时的情况，岑参诗有云：“弯弯月色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当时蒙古族尚没有强盛，没有发展到贺兰山祁连山一带来，故所谓“胡人”，当属于突厥族的回纥之类。惟人口多至“十万家”，虽有文人过甚其辞之嫌，而人口之稠密，当可看出。

至于凉州在过去各民族战争情形，元人戴良之《凉州行》，记述得有声有色：“凉州城头闻打鼓，凉州城北尽胡虏。羽书昨夜到西京，胡兵已犯凉州城。凉州兵气若云黑，百万人家皆已没，汉军西去笛声哀，胡骑闻之去复来。年年此地成边土，竟与胡人相间处。胡人有妇能汉音，汉女亦能解胡琴。调胡琴、按胡谱，夫婿从征半生死，美人踏筵尚歌舞。君不见：古来边城多战死，生男岂如生女强？”

当时的战争，表面虽属民族间的战争，而实则只是“家天下”的几姓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发动，拿功名富贵笼络些战争人才，为他们作战，一般当兵的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元人宋无《战城南》一诗，深绘此种战争之实际：“汉兵鏖战城南窟，雪深马僵汉城没，冻指控弦指断折，寒肤著铁肤皲裂。军中七日不火食，手杀降人吞热血，汉悬千金购首级，将士衔枚夜深入。天愁地黑声啾啾，鞍下髑髅相对泣。偏裨背负八十创，破旗裹尸横道旁。残卒忍死哭空城，露布独有都护名！”（“都护”

当时最高带兵官也) 记者希望以后人类世界上, 这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战争, 能够减少些才好。

凉州为河西首要地方, 无论在地形上, 经济上, 皆在河西占领导地位, 这里因为黄河和其他地理条件, 使它有进可以扰动甘陕, 退可以静观大局的优越形势。王莽篡汉时, 刘家天下和王家天下还未十分决胜负的时候, 西北上有一位非常有眼光的势力分子, 名叫窦融, 他看看天下大势未定, 前途尚难乐观, 乃召集他的兄弟们说: “天下安危未可知, 河西殷富, 带河为固, ……一旦缓急, 杜绝河津, 足以自守”, 因此他就率部进守河西, 驻节凉州, 以静观天下形势。到汉光武把刘家天下恢复起来, 定都洛阳, 然而天水的隗嚣, 四川的公孙子阳, 和河西窦融, 尚在半独立状态中。特别是天水的隗嚣对光武不大客气, 如果他和窦融打成一片, 顺渭水东下以取洛阳, 则刘秀的皇帝可以做多久, 恐怕还是疑问。汉光武看到这里, 于是极力拉拢窦融, 封他为五凉大都督等大官。在光武致窦融的一封信上, 我们可以看到光武对于河西的力量, 是如何的彷徨: “今益州(即四川)有公孙子阳, 天水有隗嚣将军, 方蜀汉相攻, 权在将军, 举足左右, 便有轻重, 以此言之, 欲相厚岂有量哉。……欲遂立桓文, 辅微国, 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 连衡合纵, 亦宜以时定天下。”他的意思是说, 你的位置和力量都很有左右大局的能力, 我很愿意和你要好。你愿意帮我完成帝王大业, 请帮忙到底; 如果你想自己当一方之王, 亦请早定主意。这封信总算客气而坦白, 但是当时的光武已领有中原广大土地, 势力已经不小, 他反而对于小小河西这样重视, 我们一方面不能不佩服光武帝的眼光, 一方面又不能不深刻的了解凉州在西北政治上的重要。

### 十三、武威现状不乐观

武威烟土，驰名西北，可以连抽至十几次，则其烟性之烈，可想而知。山西境内所消费之烟土，以武威烟为最普遍。城内有电灯、电话、戏园、医院等新式设备，皆为马步青一人所办。马氏为驻防军长官，能用一部分钱花在地方带有永久性的事业上，从远处着想，总比完全在租界上打主意的，要有利于地方些。

武威计有两城，一曰满城，一曰汉城，或曰新城与旧城。新城现完全变为马步青个人练兵场及私人住宅。旧城为一般商业所在。新旧城间有一极为平坦的马路，马路两旁植树已成林，风景宜人。惟此间造林，其树苗乃系砍伐另外民间树木而来，这是“毁林以造林”，真正的造林，不是“移林”，而是普遍的增植树木。

武威的军政情形，记者所知者不多，惟此时适读明戚继光先生文集，见其“誓词”有云：“其将领土卒，若秦视越，……迥无痛痒相关之情，恣意科敛，以供馈送，分类搜索，以需造作，极力咨询，以奉奔走，俯首侦伺，以徇好恶……至于随处差委员役，极彷徨以应……却将事实，一毫不为。”我希望凉州不会是这样。

地方军权如果侵入了税务、司法、县政，那简直是不可收拾。所以凉州的税局、法院、县政府在他们正当业务之中，都非常清闲。地方上几个大绅士与军队“勾结”，包办了一切。

县政府所能做的工作，就是“逼款”。记者在武威是住在距县府不远的地方，每天夜晚都有许多人从县府垂头丧气的出来，引为奇怪，有一天晚上，特别去参观究竟。当记者将近县府

的中堂，有两种声音刺人耳鼓，声音发自相近的两间屋内。一种是：“啪，啪，啪，啪……”的竹板击软性物的声音，杂以：“一呀，二呀，三呀，四呀……”的唱数声，再加以“哎呀！哎呀……”的惨叫声。另外一种是：“碰扑！”“碰扑！”……的重杖击一种松中带硬的物体声。还“嘿”，“嘿”……声，和“啊呀！”“啊呀！”的沉重痛呼声。再前进数步，在两处黑暗的灯光中，显出活动的复杂人影。记者渐挤人人丛中，先向“啪”、“啪”声那面走去，只见两位操贵州口音的人坐在一张公案上，案上有一盏异常黑暗的菜油灯，中国土红纸做的灯罩罩在上面，他们每人头上戴一顶土耳其式帽子，看来一位是科长，一位是科员，科长坐在上方，面前放的几本粮册捐簿之类，手里拿一根小鞭，似乎是临时的指挥棍。科员坐在侧方近灯处，前面也有记帐的簿子，随时把钞票对灯光照照，似乎在看是不是假的。公案前面有八条特制手刑木凳，八个衙役分两行各人管理一张凳子，凳子上正有几个人被打着，外面环绕凳子站立的，有近百的“非绅士”模样的人，也有些随便坐在地下。不过，大家的情绪，没有一个觉得奇怪或者紧张的样子，似乎都是等着“消了差”就算完事的神气。突然，“王大兴！”的叫呼声，发自科长口中，人丛中应声出来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他很迅速的跪在公案前面，是什么的脸面，记者没有看得清楚。“你的款子怎么样？”科长问。“没有法子想！老爷开恩！”这是回答。“不行。打！”指挥棍向那人一指。“老爷！我今天只有五角！以后再想办法，”“不行。打！不过，少打你十个。”于是衙役把那人右手上了刑凳，那人的左手往衙役的手上一放，有极轻的多数金属块相互压击的声音，发自两手相接的刹那间，随后我只见竹板头落在凳子上面发响，被打的那人空叫了一会，就退回人丛中去了。公案上的那位科

员，把两张小票看清，和一些铜元数妥之后，郑重的放进了钱柜里，接着又有人被叫。记者又转身到另外有灯的地方去看，有许多人正围着一间屋子，从窗子上往里面探视，秩序很乱，到门口往里面看，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站在公案旁边，左手按着桌沿，右手恶狠狠的指着地下，口里说：“看你缴不缴！”一个破了罩子用纸糊上的煤油灯，挂在大汉身后的公案上方，光线非常软弱，不能清晰的看出屋内情形。不过，这一点却看得清楚：在大汉的指头下面，和衣平卧着一个男子，他的头和脚，各有一人按着，身旁立了一个衙役，右手提一条结实的木棍，把一头顶着地板，左手叉在腰间，粗而且长的呼吸着，似乎在休息，地下被按的那人没有动作，也没有说话，只见他的呼吸急促而微弱，略夹昏迷的呻吟声。

空场上突有小贩叫卖“油炸豆腐”，记者想起当晚有人请赴茶会，才挤出人围，再通过小贩的包围，出了县府。

民间对于军队与地方各机关的供给，实已疲于奔命。如柴一项，民间亦有拆屋作薪，缴纳“官柴”的现象。所谓“斧劈柴，一斧一心酸，昔为栋与梁，今为樵与薪——”，这样的历史谚语，我们不要忘记！记者过武威时，驻军正大劈了两个劫人犯，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三天。他们以为这样严刑重罚，可以制止盗贼的发生，其实未必尽然。请看宋末文天祥给当时湖南大帅江丞相的信中，关于“贼”的讨论：“盖贼有出于田里之饥荒，有激于官吏贪黷……”所以真正原因不除，民生日渐破产，无论如何杀头，都是不行的。

三月八日记者特至凉州西二十里之天主教堂一行。此间原为甘宁青三省天主教之总机关，创立将近百年。现总会虽移兰州，此间仍为各种聚会要地。堂中多德国教士，华服华语，除面目



外，不易别其为非中国人。他们自己种有葡萄，自酿有极佳之葡萄酒，记者痛饮几醉。唐王翰凉州词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记者如不到天主堂，几错过凉州之“葡萄美酒”矣。

此等教士有种种方法吸引民众，交接官厅，人多精干老练，对于中国社会情形洞悉无余。关于军事消息，中国边地官厅，往往须借助于他们，始有应付办法，记者对于宗教，认为各有其真义，各人尽可自由信仰。但外国传教士自由在中国设立教堂，设置产业，收纳教徒，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布全国，是否会有其他的危险，颇值得研究。记者且举一段八国联军时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八国联军总司令是德皇威廉第二的侍从武官长瓦德西伯爵（Walderssee）。他进了北京，再发兵攻张家口，之后，给德皇一个详细报告。兹节录其中一段：“关于侦探一事，极难着手组织，所有内地消息之探知，余（瓦氏自称）多赖天主教神父之助，而且此种帮助，系出自彼等情愿。惟其中极为老练聪明之主教Farier，不幸已于数日前，前往罗马，离开中国。彼临行之时，曾训令彼之代表Jarlin主教，务须尽力助余。因此上校Yorck伯爵进兵张家口之时，曾有许多神父随营效力相助。”（见王译中华版，瓦德西拳乱笔记）此种太高级的军事政治行动，我们不能说一般传教的都知道，而且真正以传教为神圣任务的人也很多。我们不能不引为忧虑的，是中国政治力量不能自由支配的如此其多的外国传教士，如蛛网式的布满了中国，为中国自己打算，为公正的道理着想，是不是一件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

和武威的朋友告别是九日的事情，道路溯白亭河而上，至古浪已是六千英尺的高度。古浪为甘肃最易地震区域，城垣今已无存，住屋亦无多，县城直等乡镇。古浪南有古浪峡，峡窄而长，

车行甚险，为军事战守地。再南即过一万英尺高的乌鞘岭。当夜因天晚，乃宿岭北小镇龙沟堡。

次日清晨乘冰冻地硬翻乌鞘岭。岭上有韩湘子庙，俗传至灵，过往者皆驻足礼拜，并求签语。记者亦随诸人之后，拜求灵签，欲问“中国今后数年之局势”。乃签书云：“子当贵，病速愈，……”大概韩湘子近年亦“态度消极”，“不问国事”，故“王顾左右而言他”！

下乌鞘岭，车涉庄浪河上游冰滩而过，冰已渐解，颇为危险。循庄浪河西岸下行，过镇羌驿、岔口驿，再至武胜驿，过庄浪河大木桥，转至庄浪河之东岸，旋到永登县。这是记者旅行祁连山南面青海区域的故道了。（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包头）

## 第五篇 贺兰山的四边

“贺兰山”，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啊！这条山是稍有倾斜的南北延伸，计长约八百余里。它的东面是宁夏本部，过黄河即接连陕北高原，山的西面是阿拉善蒙古，南面遥望兰州，北面与狼山大青山呼应而向包头。记者于旅行祁连山南北之后，乃转而游历贺兰山的四边。这里关联着若干正在变化的军事政治和民族问题。或者读者可以得到解决某种问题上一部分有关系的材料。

### 一、再会吧！兰州

不亲自经历的事情，每每不容易了解那件事情的真象，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这话实在一点不差。东边的朋友常常轻侮的批评西北的人事简单，但是只要他们到兰州来经验经验，他就知道西北的人和事，也相当的复杂啊！

“兰州城里谣言多”！本来没有的事情，只要几天谣言，立刻可以满城风雨。粮食也上涨了，汽车也不敢放心开往某些地带了。尽管事后“全属子虚”，然而第二次第三次的谣言，又继续上来，而且这些谣言，一样有效，可以激动一时。这个易于发生谣言的原因，大约不外下列几点：第一，西北汉与回相互间不必要而且无意义的成见仍然存在，清朝三百年来所用的“汉回互仇”的毒辣民族政策，至今还留下恶劣的影响。第二，汉之中有

派别，回之中有阀统，彼此历史纠纷，难于清理。第三，寄居在兰州城内的高等闲人太多，他们终日以制造传播各种军政消息为能事，稍有可乘之机，谣言即因缘而至。第四，兰州缺乏一种商办之新闻纸，能随时发表正确消息，以指导社会观听。

不过兰州在近年来的进步，可谓相当迅速，各种纷乱的情况，已略有端倪。新闻纸方面亦有相当发展，以近来之西北日报而论，其编辑与印刷皆可渐跻于东方大报之林。

记者以四月二十四日离兰州，搭牛皮筏，遵黄河以赴宁夏。西北水上交通，皮筏较木船为普遍。皮筏有牛羊皮两种，其组成方法，系将牛羊皮袋经过相当油浸工作之后，紧束头尾四肢，内胀以空气，然后以数个、十数个或多至数十百个，编成平面长方形，上再施以木架，架上可以载货搭客。又如运载羊毛水烟等数量较多之货物，则大体皆用牛皮筏，因其载量较大，一筏可以载重数万斤。更有将羊毛装入皮袋中者，如此可以省却筏上堆毛的高度。筏上如张设帐幕，则立即可以布置成功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与光线皆十足的美好，而且随河水的流动，终日有千变万化的风景，可以供旅行者的观赏。兼以兰州至宁夏省之中卫县一段，为黄河流域峡谷区，水急而险，较黄河之流于平沙地者，有特殊的奇象。

操纵皮筏之苦力，十九为甘肃河州（临夏县）之回民，亦有西宁方面者。他们的身体坚强结实，因为宗教教条的训练，他们养成了几种非常有益于身体的生活习惯，如早起，勤于沐浴，遵守时间，不吃死后的生物等，特别是不吃鸦片，关系于他们的体格方面，非常重大。西北回民与汉人同样种植鸦片，贩运鸦片，然而回民之吸食鸦片者，百难得一二，而汉人之不吸鸦片者，绝难有一半之人口！此种趋势，如没有纠正的方法，则西北之将

来，汉人只有渐归于天然淘汰之途！

记者所乘之皮筏，乃由一百二十个牛皮袋所组成，平稳宽舒，坐卧读书，皆甚相宜。筏上共有水手六人，分掌前后各三桨，水手名把式，中有一人为首领，名为拿事。前三桨关系重大，故以头等把式司之，拿事对各把式不但有指挥之全权，而且有保护之责任，因一个筏上之水手，大半与其首领有宗族及乡里等关系，离家时所带出之人丁，必须于返家时交还其原来之家庭。首领对于筏上之安全亦负完全责任，必须能领导皮筏免去水上一切的危险，故为首领者必须久走黄河，深习水性，而且为机警果断之人，始能胜任。

兰州以下黄河，在离城六七十里以后，有长六十里的大峡，险水最多，故普通水手不易通过，于是应运而产生一种专门驾驭大峡一段险水为职业的水手，名峡把式。峡把式皆系特别精通水性，熟悉水纹的老手，他们能领导皮筏，安然通过几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过了危险地带以后，他们又离开皮筏，回到兰州，作下一批皮筏的保险者。

春末夏初，正是兰州梨花开放的时节。黄河南岸自兰州城起一二十里之遥，仍可以望见成林的初放梨花，绿中吐白，河上清风，时常带来岸上花香，顿时感觉一种恬静清逸的安舒。惟黄河北岸则寸草不生，一望黄土山崖，殊少兴味。

筏人向阳峡中，峡长四十里，两岸虽有峡形，而水势平稳，无可引人紧张之处。峡将尽，见一只大头石羊窘处于石峡绝壁间，壁高数十丈，壁上有十数猎人用石顺壁下击，壁下水中有人驾羊皮筏上攻，然因崖高壁险，终无奈石羊何。以石羊此时之环境而论，因一时被追情急，遁入了这样绝地之中，但这里上下皆已无路可走，终久亦无生存的希望，然而它仍继续尽其全力以图生

存，它并不即时跃入黄河，早日结束其艰难之生命。可见凡百生物，皆受此求生之自然法则所支配，人类社会此理尤为明显。一时代之社会政治制度，苟不能适合于当时大多数人生存之需要，则此大多数人必如石羊之艰苦挣扎，以求其生存之继续与发展。

峡尽，地名泥湾，泥湾为一小小之黄河冲积平原，梨柳争绿，野麦正长。筏中突遇此景，心神为之豁然。此时离兰州已六十里。再由泥湾而下，即入大峡，峡把式之身手，将于大峡中施展之。

## 二、过大峡

黄河的大峡，正同长江三峡一样，峡里航行，须有专门的领江。大峡两岸，山势比向阳峡陡峻得多，河面有时非常的窄逼，水急而常有巨滩，与近乎直角的转道。首先经过险地为“大肠拐子”，河道数数曲折于紧狭的石壁中，稍有不慎，即可与石壁接触。其次为“乱石头窝子”，为一乱石峥嵘之险滩，滩浪起伏如小屋，滩中并有一大水漩，最易发生危险。最险者为“焦牛把子”，河水直冲一石崖尖上，皮筏必须对石崖放去，同时又须于未接触之一刹那，转筏下流，生死存亡之际，其间不能容发。筏上水手与搭客至此皆屏息肃静，以待命运之降临！筏上首领则站立筏上高处，全力注视水纹，一面发出各种非内行不易听懂之命令，指挥前后之水手，同时不断有“扶达”！“扶达”！……之祷告声，因回人称“天”为“扶达”，扶达当系阿拉伯语，在此危急之时，只好于竭尽心力之外，再求天之保佑也。

险峡既过，“峡把式”登岸而去，一般“筏客”（“筏把式”之又一称呼），莫不喜形于色，盖从此到包头，已再无什么

难过的地段也。他们于桨声哗啦、哗啦之际，常引颈高唱他们本地山歌，歌声高朗，震撼山谷，内容则多述边人男女爱情之思。如：“阿哥的肉呀！阿哥来时你没有，手里提的肥羊肉。”这是说一个男子，提了肥羊肉去看他心爱的女人，而女人又不在家，男子于失望之余，唱出来的情调。

六十里出大峡，更行二十里平川冲积地至条城，条城岸上风景不减于泥湾，绿柳随风飞舞，与笔立冲天的白杨相间成趣。李后主曾拿枯落的杨柳来比色衰了的女人，他有这样的诗：“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芳魂感旧游，多见长条似相识，强垂烟穗拂人头”。但是，正在“得意春风”的杨柳，它却不是如此颓丧心情，它有充盈的青春娇柔和美丽，可以吸引青年游人流连而忘返。

筏客们的意识，给我们很大的兴趣。他们是生长在中国西北边上大夏河流域的河州，那里是非常接近藏族的牧畜地方。他们对于他们土著的牧畜和初期的农业生活，不感兴味，而对于东方都市，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则不胜其企慕之思！他们羡慕进步的便利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对于他们传统的特殊生活方式不表现丝毫留恋。他们一到包头，总是尽其所有，购买包头市场上新式工业制品。回到他们家乡之后，那种新知识多的，新式生活工具多的人，可以大大的为他们乡里所敬重。我们从这里结论出一种“前进生活支配后进生活”的法则。都市支配农村，大都市支配小都市，上海支配中国的内地，而伦敦与纽约又支配了上海。

第一日水程，就住在条城附近的河上。夕阳西下的辰光，凉风扑面，冷气渐升，忽然一个筏客赤条条的下到黄河水里，他的胸部以下都浸在水中，时而把身体移来移去，似乎寻找什么东

西。这时西北的气候，傍晚天气，相当于南方的深秋，记者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打听，才知道他把我一个直径不到一寸的小茶壶盖，失坠到河里，他之所以下水，为的是把它找回来！这无异海底捞针，我想太不值，也太不易。然而怎样劝他，他也不肯起来，他的同伴们劝他，也没有丝毫移动他的心志。在我们大家已准备在筏上休息的时候，他笑嘻嘻的拿着茶壶盖上来了。于是大家热闹谈笑一阵，在这之后，记者才明白：他不顾苦痛入水找茶壶盖的意思，主要的是为了他们同伴间的颜面问题。河州回民有一个普遍性格，即是不愿意在他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无能。一个人失去的东西，不论如何没希望，他能千方百计的找它回来，在同伴中看来，这种行为是有无上的光辉！

唐人凉州词上有：“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之句，据记者观之，恐以写兰州以下至宁夏省中卫县这一段的情形为恰当。因为中国各地的习惯说法，从东南两方向西北两方进行，叫做“上”某某地方，反过来说是“下”某某地方。以凉州附近的黄河来说，读者如翻阅地图，则只有上述这段黄河可以说“上”了。而且这绵亘三四百里的山峡，和稀零的城池，正是“一片孤城万仞山”的实景。

条城下游，有一地曰拜湾，前甘肃督军陆洪涛曾筑石堤一道，阻导黄河，救出农地不少，至今堤内农民犹受益不尽。陆氏在甘肃之功过，甘肃人自己知之最深。但就拜湾筑堤一点来说，他却做了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本来有人认他的一般行迹，多属军阀之所为，而平心论之，中国二十五年来痛苦经验告诉中国民众，在国计民生上“肯做实事”的“军阀”，到底要比专说空话的人们强些。



### 三、红山峡和黑山峡

在羊毛皮筏上过夜，得了一个难忘的经验。本来厚厚的羊毛，积成软软的褥垫，应该有“塞外沙发”的优点。不过羊毛白天受了强烈的日光，到夜里一齐发散出来，睡在上面的人，尽管你当空一面冷清清的，而底下一面则如蚂蚁上了热锅，片刻也难得安稳。必到中夜以后，羊毛所收热力发散殆尽，始有让你入梦的可能。但是往往在东方破晓的时候，又刮来阵阵寒风，此时不但皮筏上不能给你任何温暖，而且如果不赶紧自己披上棉衣或者皮衣，自己原有的体温，还要向外发泄，而使人感到如冬天的寒颤。

第二日飘过一个无甚险阻的“无敌峡”，经靖远城边，往下直放。忽然大风扬沙，水纹不能辨识，乃被迫停靖远下十五里之河滩边。

皮筏行黄河中，除峡内情形稍异外，在平流地方，完全看水纹而行，择水纹主流所在，而移筏以就之，因主流之水深而速，无搁浅的危险。故稍有风雨，使水面经纹一乱，皮筏即失了遵循的指标。如必勉强行进，则一旦误搁浅沙滩上，或被大风刮置沙滩中，则筏客只有全体入水，拆散皮筏，将一个一个个的皮袋移出沙滩之外，再行束好，始能继续前进。此种水中拆扎之工作，至为辛苦，而且关系于筏上首领之技术名誉，只要搁浅一次，他的名誉立刻糟糕，下次再难得人之雇用。故风起以后，筏客皆一致不愿再行前进。

中午刚过，就要停止休息下来，这样情形，对于旅客是最没有兴趣的事体。谁知第三天的情形更糟，筏子清晨入了红山峡

（峡为红色沙砾崖石，故俗名“红山”），峡长一百三十里，水势平稳，我们预计当天不但可以出峡，而且可以再进百里左右，然而仅仅在中午不到的时间，峡里的大风又刮起来了。这样简单而原始的交通工具，对于天时的抵抗力太过于薄弱，飘到不及一百里的水程，我们就被迫停住在红山峡中了。

这里地名叫“华子口湾”，两岸山上没有一棵绿树，更看不见一团青草，在风沙飞扬中，好容易看到西面河岸上有一两处残破的村庄。大家都希望得着些什么似的，很自然的，筏上的客人和水手，一大半都冒着风沙向村庄进发了。走近村庄，则其中主要区域之建筑，已经倾颓，所存的只是东鳞西爪的几家单间土屋。女人和小孩似乎没有出山外去看过任何的社会，他们似乎只认得同村的十几口人，才是他们社会里的人类。因此象我们这样普通的水手和旅客，会让他们见了害怕，惊惶地逃进他们的小屋，而把门紧紧的关了起来。

夜间无事，筏上的水手和客人共同组织一个临时俱乐部。水手有人有一把地地道道的“胡”琴，再加上些碗和筷子，另外凑上几张嘴，几副手掌，算是乐器，这些水手们就高声唱他们的土调了。他们有时一人独唱，有时几人合唱，歌声因山谷之回应，更显得悠扬遐逸，上彻云霄，使此荒山幽谷，倍增其恬然世外之情。歌调近于藏人之风格，以高而长之音调为其特点，惜内容多不能了解。这般水手们的性格之诚实，对人对事之忠贞，使人感到一种人类间彼此全然相互信赖之愉快。

走完红山峡，又进黑山峡。两峡水势大致相等，惟黑山峡全由带青黑色的坚硬石崖所组成，崖势亦较高峻，风景比红山峡为奇丽。此峡为甘肃宁夏两省之交界处，过去数年皆为土匪变兵盘据之地，下水皮筏十九皆被劫洗，甚至伤害旅客生命，我们这次

侥幸连过几处最易发生劫杀之区，皆平平通过。峡中两侧石崖间，野羊（即前所谓石羊）时常发现，其行动之迅速，有如猿猴，数十百丈高山，顷刻之间，即见其已登援而逝。野鸡咯咯之叫声，在红黑峡中，成为经常的伴行音乐。

为安全计，我们第四日停筏于黑山峡之绝壁下。两山壁立，黑黢黢的一对山峰，高耸云表，峡势颇不减于长江三峡中巫山峡的作风。

记者最喜欢听水手们谈他们得意和失意的事情。他们尽管有这些遭遇，而他们对于这些遭遇，只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而不能求出其中的理论系统来。青海的汉人和回人，都是自称中原人的，他们轻视藏人和蒙古人，叫他们做番子和鞑子，因为蒙藏同胞的生活比较落后，头脑比较单纯，在商业来往上，最易被人欺骗。他们和蒙藏同胞做交易，很少有公平的打算，他们十九用欺骗手段，叫做“抓番子”和“抓鞑子”。蒙藏人如果向他们买粮食，他们就拿些酒肉把顾客请到屋子里，让他们吃得酩酊大醉，然后用草或者树枝泥土之类，填到他们装粮的皮袋里，只是在表面上装上些粮食，等顾客们迷迷糊糊骑马回家之后，酒性醒来，始知受骗。然而他们虽屡屡上当，心中非常不高兴，因为商业经济的大权，尽在汉回两族人手中，心虽不愿，亦莫可如何，说到这些地方，水手们都觉得他们有中原人的威风，比“番子”和“鞑子”高了一级。等他们说他们的筏子到了包头的情形，他们的神气就相当沮丧了。包头的铁路、电灯、马路、商店的大玻璃窗，偶有的洋楼，五光十色的街面、大饭店、大旅馆，两三层高的饭馆，两三进的酒店……这些东西使他们头脑昏乱，似乎山鸡进平原，感到世面太宽，不知道怎样安置自己的身体才算恰当。他们和包头商店做交易，第一，不识货色，第二，不谙行情，第三，不通

官话，再加上店中伙计们的花言巧语，于是他们至此又作了“番子”和“鞑子”，被旁人大“抓”而特“抓”，一元市价的货物，卖给他们时，总是二倍或三倍的价格！有时他们自己也知道吃了亏，然而只要有一个水手在某家商店作成了交易，其余的总是一窝蜂到那家商店来，价值只要和最初的一样，外形大致差不多，内容纵令有相当变更，他们仍然可以接受。

这样不平等的民族关系，无组织的贸易关系，对于一个国家的前途，绝对不会有好的影响。

#### 四、路 过 中 卫

次日，仍然有风，皮筏冒险强行，始出黑山峡，但到距中卫二十里地方，仍不得不靠岸。地名煤窑湾，有小市镇，为产煤地带，有煤窑工人三五十家，日长无事，上岸欲买食物。谁知此间生活异常贫乏，除粗面外，一无所有，煤工之家，污浊黑暗，人亦似终年不曾沐浴者。此间有宁夏省林矿局分卡，记者以其必为保护矿业，或改进矿工之生活者，后知完全为一种税收机关。每一小羊皮筏煤炭，由此运往中卫等地，须上税大洋三角，对于林矿事业之本身，则未闻有丝毫的筹谋。至于煤之开采，全为旧式土法之自由挖掘，煤工之作工与否，及其工作之多寡，全由自己之经济环境与健康情形，自由决定，大规模之生产，还未曾出现。不过，在严酷的生活鞭策下，煤工的“自由”选择，只有限于饥饿，或者无休止的辛苦工作两途。

也有黄河北岸的地主，在这煤矿区放债，不过十九为实物放债，如米面油茶盐之类，而偿还则要现金。奇怪的是，此地真正人山受苦的，多为本地人，而做小饭店、小店、小商业的，则多

为河南山东人。在这小煤区中，山东河南人要算上等人人物。

将过中午，许多煤夫，借了吃饭的机会，聚在一家小店下象棋，记者也去参加。他们几乎全为鸦片政策下的牺牲者，加以工作之不合卫生，营养之不充足，故其身体与面貌，皆苍白羸弱，令人可虑。他们这小小集团中，走棋技术都不甚高。末后有一位中年弱瘦、衣服褴褛、烟毒遍身的煤工，出来和记者对弈，他精密高远的棋步，令人惊服他的聪明。只有用同归于尽，或稳扎稳打的战术，记者才可以希望与之打成平手！而且他的态度之大方，内心之沉着，皆为不易多见者。记者曾在某处见有黄包车夫自做对联云：“莫笑拉车受辛苦，请看当年宋太祖”，颇与此事同令人有所感动。

最后一日的水程，只有二十里，就到中卫县水路码头的新墩。筏近新墩，即可以看见黄河西北岸互相连络的圆柱形大碉堡。红色的外表，成排密接的枪窗，使人望而生畏。据记者在西北各省所亲见碉堡言之，当以宁夏省中卫境者为第一。如登新墩岸上视之，则坚牢之大碉堡群大约以五里之半径环拱中卫。此种碉堡之作用，当在防止红军之渡过黄河。就中卫一地言之，已成难攻不落之形势，惟碉堡之修，必有所守，如社会经济日蹙，民生日困，则祸乱将起于萧墙，边境之防御工事，将无所用之。

新墩距中卫城五里，墩之对岸，尚有未熄之火山，夜可见光，日可见烟，闻烟火中有奇味，近之则能立刻使人昏倒。墩上居民四五十家，其房屋整齐，身体强壮，屋内清洁者，全为回民。汉人多为鸦片所毒害，身体日坏，经济日窘，生活所逼，故妇女之风气，颇有难言之苦衷！

中卫为兰州、宁夏(今银川——编者)水陆交通之枢纽，且东可以过黄河以通固原、平凉、庆阳、环县，西可以过沙漠达永

登,再由永登西通青海,北上凉州。故军事与商业皆为要道,唐宋时所谓鸣沙州即此。因中卫城西有沙山,人如自山上滑下,沙中作雷鼓之声,与敦煌之鸣沙山同其情景。自科学之见地言之,此种鸣声,究为何种物理作用,尚有待于专门家之研究。

中卫城中,此时正在大大的翻修下水道,所有城楼庙宇亦在大大改造之中。各种苦力,如制土砖,运土砖,砌墙壁……等,皆以士兵为之,只有关于细微技巧之处,始雇工匠,故此等士兵对于土工、木工、石工之中下级工作,皆已熟练,其灵巧者,直已变为纯熟之工人。惟待遇方面似乎甚差,士兵之衣服,表现为千缝百补之穷象。

黄河到中卫以后,因为山势之开展,故河之两岸冲积成肥沃的平原。自秦汉以来,渠政早兴,引黄河水以灌此沃野,水旱农作皆甚相宜。惜因对内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皆无甚可言者。即以中卫而论,县党部民众书报阅览室中,仅有厚厚的灰尘蒙盖下的几本旧书,除宁夏甘肃两省党部办的民国日报各有一份外,只有一年以前的天津大公报两张!

皮筏上的滋味,已经尝过了,落后的交通工具,虽然可以满足到西北游人们的好奇心,等到实用起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到底不行。西北本是多风的地带,这样见风就停的筏子,如果要一直坐到包头,那只怕要急白了旅客几根头发!中卫到宁夏已有长途汽车,而且当日可到,于是我们舍筏而登车。水手们知道记者要离开筏子的消息,他们一齐似乎堕入了冷寂的空气中。几天来培养成的热闹活泼气象,至此化为乌有。他们说:你们要走,我们都“破翻下”了! (“破翻下”为河州土语,表示心里难过的意思)因为生活痛苦而枯燥的劳动者,他们最难得的,是旁人对他们诚挚而平等的态度。谈谈古今中外各种各样故事,

和他们所不了解的各种问题的解答，都使他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只要是用实用的材料，有和蔼灵活的教师，而且被教者的最低生活又有办法，我想民众教育一定能很快的推广。

## 五、宁夏地理特性

俗谚说：“天下黄河富宁夏”。这是因为宁夏有特殊的地形结构。如果展开用颜色表示地势高低的地图，我们立刻可以看出宁夏本部，很象一个葫芦的形状（阿拉善蒙古不算在内）。从黑山峡起，中卫以下，地势开放，为中卫与中宁两县之平原沃野，西以贺兰山之南梢以界于蒙古草地，东以陇东高原之沿边而分界于甘肃，北上至广武镇，贺兰山与黄河东面之高地连为一脉，横亘为卫宁平原之北边。黄河分卫宁平原而过，北上断此横亘高地而出，构成长二三十里之青铜峡。青铜峡以北，山势又开，河东之金积、灵武，河西之宁夏（今银川——编者）、宁朔、平罗共五县之面积，作成宁夏最主要的肥沃农地。其东西界限仍与前一平原相同，而北锁于石嘴山。石嘴山之北即为蒙古草地。利用黑山及青铜两个石峡为基点，借黄河水流的斜度，凿沟引水灌东西两岸平原中，称之为渠。渠有干渠，从干渠再引支渠，支渠再引小沟以灌于田土中。渠口有闸，可以因黄河水量之大小，而增减河水入渠之水量，河水大，则于闸外从另道放水入河中，河水小，则闭闸外各泄水道，则使之全体入渠。干渠之末梢亦有闸，如水有余裕，则由此闸以归之湖中，或仍泄至黄河。最妙处，系由支渠小沟灌入地上之水，如有盈溢，仍有水道转纳湖泽中，或再由湖泽以泻入黄河。故宁夏渠工，其机微巧妙，直使以科学水利自称之专门人士，亦不能不惊其完备。

宁夏土质，碱性最重，地面常呈白色，故宁夏古名“银川”。因这块葫芦形的地带中，常如银地一片也。故未开发之前，古人有称此为“斥卤不毛”者，盖碱地不易生长植物也。但是，这些碱质，只要经过黄河水一灌，立即碱性消除，变为沃壤，雨量尽管那样稀少，但是五谷果木的种植，皆非常的相宜，唐人所以有：“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之美誉。

宁夏社会，全赖渠水维持，而考渠政发达之历史，则远自秦汉唐各代皆有开凿，故最早者，已有二千余年。我们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以前，就知道如此微妙的水利工程，虽然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从其构造原理言之，不能不认之为深合乎科学，可见我们并不是如“文明人”所说的“劣等民族”那样不堪造就，我们之所以进步迟缓一点，完全是我们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环境对我们过于宽厚，不能叫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常常走到绝境上，因而逼得我们不得不作更大的向上努力。

中卫的乡村风景，至少可以与淮河流域相比。其西即见通于黑山峡的大沙窝，由此走兰州、永登，途中人家缺少，水且不足，旅行者视为畏途。城中商人以山西人为主，河北商人之势力次之。山西人经商能力，有超人的优点，故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绥远，以及未独立时之外蒙，皆以山西人占商业上领导地位。近年来经济萧条，此间商业亦甚清淡。

宁夏（今银川——编者）中卫间公路距离，计四百余里，约大半日程可到。记者以五月二日离中卫，晨间天气清明，田中农民正开始耕作，右有黄河，左有贺兰，公路修筑亦大致平坦，故车行甚速。但于出发后二小时左右，天气突变。朔风怒吼，挟浓厚之沙土，飞扬空中，沙石击人头面，对面不能见人，眼耳口鼻，尽为沙土所填积，晨间所呈现的一点恬静乡景，被此稀有的狂



风顿时弄成沙漠的枯燥。刘邦打败项羽，取得天下之后，从长安回到他的故乡沛县（今江苏省西北角），正巧天上刮开了大风，他随口作了一首大风歌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那一场大风引起了这位英雄主义者的豪兴，唱出了如此雄壮的歌词。不过我想，他那个大风，远不及宁夏这回的大风利害，这个风让人眼也张不开。欧亚航空公司二号机，竟被这场大沙风，迫得在宁夏省垣上空坠落下来。这样的大风，我想很难当时令人发生诗歌的兴趣，如果事后要作这样的大风歌，也只能类似这样的说：“大风起兮沙飞扬，土填耳目兮心内慌，安得家屋兮躲一场？”

风这样的大，汽车仍然慢慢的前进。路渐近贺兰山，间有沙窝，前进甚难，有一二处须下车推车，始能通过。贺兰山为明代以后，蒙古与内地之界山，隋以前贺兰山还没有长城，那时的长城在黄河东面，隋代的长城才西起武威，经贺兰山北上，东入伊克昭盟之南，贺兰山始为“华夷”分界的地方，宋代西夏建国于此，“华夷”之界，移到今陇东陕北，明代的长城，始又推进到贺兰山来，现仍能见各山口皆有长城的遗迹。沿山筑大小相连之城堡，驻戍兵以备边防，故唐人之诗有：“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

## 六、西夏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教训

到了宁夏，令人引起无限的历史回想。许多的史事，还可以给我们现代中国人以若干的教训。

宁夏省垣，就是从前曾建国三百年的“西夏”建都地方，那时叫做中兴府，到成吉思汗灭了西夏以后，才改为宁夏路，所谓

宁夏，就是平定西夏，使之永远安宁的意思。

西夏为藏族之一种，原游牧于青海东南部一带。唐太宗时臣附中国，始由大夏河、洮河一带，迁移于今陕西北部，及绥远伊克昭盟一带地方，赐姓为李。到了宋朝，这部分的人势力渐渐强大，时有掠夺边境之举，宋朝也赐他们姓赵。并且赐他们许多金玉锦缎之类，封他们领袖的高官，想这样羁縻夏人，只要他们称臣宋室，大致不差，就一切皆可加以优遇，至赵德明时，他有一个儿子叫元昊，劝他父亲不要再称臣于宋，德明不许，对他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绣，此宋恩，不可负！”元昊却这样答复他父亲：“衣皮衣，事畜牧，本我族所便，英雄之生，当帝王耳，何锦绣为！”元昊当权后，果然自己作起皇帝来。这里告诉我们，民族间的羁縻政策，绝对不能笼络得住第一流的人物。

元昊自建国家之企图已明，宋朝派了韩琦、范仲淹、夏竦这些大将，防守洛河川、泾水和渭水的上游，以御西夏。宋代兵力本相当强盛，因开国皇帝赵匡胤，恐以后有人争他的天下，所以自己坐上皇帝宝座之后，立刻解除了各大将的兵权，弄些金钱美人，把所有百战练成的强兵健将，一齐腐化下去。所以到西夏称兵，元昊帝制自为的时候，则兵将两缺，边防恐慌。象夏竦那种人也凑去当领兵大将。竦在军中，出发巡边时，帐中置女婢，自为歌舞，几乎把军队激变。夏元昊仅以制钱“三千文”，募他的首级！这样的纨绔子弟，如何是元昊的敌手？当时关中华州有两个白丁：一姓张，一姓吴，对于西北边情非常熟悉，而且胸怀大略，抱负不凡，很想在西北军务上效力。但因无有力者为之援引，致怀才不得售，乃飘泊山林中，题诗以自况。张曾题鸚鵡一诗云：“好着金笼收拾取，莫叫飞去别人家！”他们此时是在作最后表示说：“你们要用就用，不然，我们就跑了！”韩琦、范

仲淹虽召见之，但似因“资格不合”（？）未曾引用。他们乃改名张元昊，逃奔西夏，元昊用之为谋士，各种军政策画，皆出自二人之手，遂使终宋之室，西夏之害，不能解除。草泽人才，关系于一时代安危者至深且大，局势变乱中，尤其是如此。

在西夏与宋朝的外交经过中，也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暗示出我们中国历史上民族政策和西洋国家不同之点。元昊称帝之后，范仲淹曾写信去和元昊交涉，一共举出九条，大意是只要元昊去了“帝”号，不给宋朝这个“帝”面子上过不去，则什么都可照办。元昊称“王”也可以，用他自己本族对于皇帝的称呼，如匈奴之“单于”，回纥之“可汗”，都可以，只是不能称汉人文字中的“皇帝”二字。如果元昊答应了这个条件，宋朝可以送他无数的金帛，可以大封元昊的左右，乃至其他的实惠。元昊没有应允，给范仲淹回了一封难堪的答复。仲淹没敢将元昊回信，报告朝廷，私自在前线把它对众烧了。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国际外交尽用秀才手段，空空在文字上下功夫，只有丧失实际的权利，而得不到丝毫的好处。自己的国力如此不充实，纵然元昊答应了宋朝的要求，暂时去了“帝”号，得了宋朝许多财政与物质的补助之后，他仍要当“皇帝”，进一步来对宋朝用兵，试问你把他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力量作后盾的外交，最多不过是暂时“名”的成功，专重“名”，不务“实”的外交，将貽误国家。其次我们感到中国历代对各民族的征伐，大半都是“应付”态度，最多不过是虚荣的夸张，并不是由于我们这个民族人口过多，或物质资源不够，不得不向外发展，即不是一种“不得不”对外侵略的形势。所以武力强时，挾伐几次四境民族，只要他们“称臣纳贡”，显耀了自己的武功，就算达到了目的。武力弱时，只要旁的民族不要在面子上做些难受的事情，维持了“中

外之体”，子女金玉乃至土地都可以奉送！这一点是西洋的民族关系，和中国对其他各民族的关系，根本不同的地方。

元昊对于中国的轻侮，可谓到了极点，他自己东征西战，连年用兵，弄得不能支持，乃上书宋朝请和。他仍然不称臣，而自称“子”。称宋朝曰“父”，最妙的是他在他的名字下面加一个“兀卒”，合称为：“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乃西夏文之译音，如译意，则为“吾祖”，即“男邦泥定国吾祖”，故宋朝给元昊的文书，要称他做“吾祖”！所以表面上给了宋朝一个便宜，实际上宋朝仍然是大吃其亏！

宋朝和以后元朝成吉思汗对西夏用兵的军事地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宁夏的形势。宋对夏的攻防，有三个时期的转变。第一期为侧重防御时期，韩琦、范仲淹主之，守渭泾洛三川及无定河上游，即今之绥德、榆林、延安、环县、庆阳、平凉、凤翔一线。第二期比较采取左翼的攻势，李宪曾帅领主力直至皋兰山下，筑兰州而还。第三期完全采取攻势，这正是王安石当政时代，王韶以全力出天水，攻略洮河流域之临洮、岷州、洮州（临潭），及大夏河之河州（临夏），更取洮水流域、西宁等地，欲由此以出祁连山，攻西夏之背，终以内部变化而止，这显示由东面攻宁夏之不易。

成吉思汗曾五攻西夏，一二两次路线不详，三四次似皆从北面而来，第三次围了夏都中兴府，引渠水灌城，未得结果而还。第四次亦围城，夏主奔西凉（今武威）以避之，亦无大获。第五次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由居延海溯弱水而进，先占张掖、武威等地，以断西夏后路，更由沙陀（即大通河、湟水一带）以过黄河，转而东北以攻灵州（即今灵武），再转围夏都，夏主始请降。可见宁夏当时最怕敌人攻击的路线，是西南一面。东南的屏障，全赖黄河。

## 七、宁夏民生的痛苦

目前宁夏政治情形，无论在政治与军事上，指挥皆非常贯彻而统一。因为这里军事与政治负责人员中，整个的是十五路军这一个系统演化而来。内部很少暗潮，亦不如兰州之易发生谣言。宁夏城的政治空气，亦相当安定。

担负宁夏各部门工作的人员，因受东方社会的洗礼很深；更加以西北人特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故表现一种灵活迈进的气象。

在财政方面，宁夏的旧式繁杂的田赋，现一律经简单清丈之后，改为简易之土地税。按土质之肥沃，分为上下七等，每亩每年征税，最高者一元五角，最低等二角，另有附税每亩每年最高者为一元四角。如此税率明白规定，项目单一，手续简单，可以免去收税时许多作弊的可能性。

这葫芦形的宁夏地面上（阿拉善蒙古除外），现共约生活着八十万的人口。因为历代都是边防的地方，各地来戍卫边防的军人，是宁夏人口主要的来源。历代对于边防军队，亦皆由国库支給经费，所以以这样肥沃的地方，人口又远在饱和密度以下，除农产之米麦等而外，还有羊毛、羊皮、甘草、枸杞子、池盐等出产，加上这一大笔的军费流人民间，故宁夏昔时之社会经济，异常富厚而繁荣。

民国十五六年之间，西北军由宁夏以进入甘肃、青海，因扩充过急，对于民间牲畜物资现金之征发，过于繁重，使宁夏人历年来之积富，根本摧毁！其后随之而至的不断的土匪蹂躏，以及对于地方驻军的军费负担。鸦片解禁以后，烟祸渐普及于一般

民众，一般人之体力又受莫可救药的摧残。至于东方都市工业品对于农村金融无形的吸收，其加速于农村之破坏工作，尚在普通人感觉之外！

宁夏经十年来的变乱与剥削，民众之体力日坏，负担日重，收入日少，支出愈多，积至今日，渐有不能维持的形势。于是表现下列各种畸形：

第一，是农民的逃亡。农村经济其元气本来薄弱，积数十年之休养，难当一二次的破坏。况年年加以暴乱，益以重征，其无来苏之望，乃为显明之理。近年来宁夏人仍负担宁夏全省之军政各费，共约四五百万之谱，地方款项，尚不在内。以八十万人民言之，此数实非同小可！农民之无法安业，恐为无可惊异之事。故近年来相率逃亡之事，随时发生。其逃亡方向，主要的有两处：第一，为阿拉善蒙古草地，其中各业皆无捐税，容易生活。第二，逃往石嘴山以北临河以西地方，此处事实上为宁夏、阿拉善、绥远“三不管”地方，亦容易谋生。

第二，为高利贷之横行。宁夏省府曾下令严禁高利贷，查出重办。然而贫困的农民，在紧急关头，借高利贷还是唯一的救济办法。于是势逼而产生一种“外形无利的高利贷”，或“外形低利的高利贷”，如甲借予乙十元，五个月付还，共应本利二十五元，则甲与乙的借款契约上却写做：乙借甲洋二十五元，五个月付还，无利。或者这样写：乙借甲洋二十三元，五个月付还，利洋二元。这种契约又是乙亲自愿意订定的，在法律上，甲绝对未犯高利贷禁令。社会生活到了这步田地，就不是法律的力量可以解决的，而属于实际经济的范围了。

第三，为粮食投机的普遍。在经济一般衰落的宁夏，有资本的人绝不愿投资于农工业，因其负担重，危险大，获利迟。至于

普通商业，因购买力之贫乏，更无扩充资本的必要。这种病态过剩资本，遂主要的走上粮食投机的残酷交易中。因为农民各种负担，使他们在秋收之后，不得不赶紧出卖其主要收获物之粮食，以缴付税捐及偿还债务。供给多，则市场价格低落，故农民卖粮时，其粮价非常低小，所得无多。如白米一斗收获时仅值二三元。等到农村中的粮食都大半转到投机者手中后，只要经过冬季，到次年的春天，一般农民没有粮食吃了，都又要买粮过活，这时粮价立刻上涨，二三元一斗的白米，即刻涨到五六元的市价！一转手间，投机者可以得最少百分之百以上的利益！粮食投机的现象，在宁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体，但是一般农民之贫穷化，将因此而加速其程度了！

第四，重税制的厉行。财政为政治之基础，故从政府立场上观察，一个预定的财政收入总额，如何可以让它十足的收足，是首先考虑的问题。在社会经济急剧崩溃之宁夏，一共不过十县，比较收入好些的不过七八县，要供给一个省政府，和将近二万的军队，还有地方行政等繁重的负担，则民众纳税能力之减弱，及各种税收部门之无好转的希望，乃为当然之结果。故如用政府直接经收之收税方法，收税人员本着“有则收之，无则不管”的态度，则省库财政，当可预断其“所入无多”。很自然的，此间财政发生了两个现象：第一，多立税目，第二，实行“包税”。前者如宰羊一只，则起码上三种税，羊只要上捐，牲畜屠宰要上捐，末后羊皮还要上税。包税制实行之后，因包税的人必须缴清预定的总额，政府财政收入上，可减少收入不足的困难。

但是这个多税与包税两重政策的结果，对于宁夏社会经济，发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用资本来包税的人，他是一种营利性质，当然要在所缴税额之外，有相当的赢余。所以除财政预算上

所定税额之外，民众无疑问的还要负担这些包税者的赢余。宁夏的包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包税的并不是普通商人，而是与军政各方面有深切关系的人物。此中自寓有调剂多年相随之至今仍感穷乏之部属之用心；然而有军政关联为背景之收税人员，在必得赢余的根本思想作用之下，是否容易发生额外苛索之现象，当为一般人所能预料。

## 八、宁夏的纸币、鸦片与宗教

宁夏省银钱纸币和鸦片的处置问题，到目前已到了不得不想法解决的时期。

一元宁夏省币，现只值法币六七角之谱。宁夏货物来自包头及平津一带，必须用法币始能成交。而在宁夏市场售物所得之货币，为不能行使省外之省币。发行省币之省银行又不能兑现，故势必产生重大的“贴水”，于是宁夏市场上之物价，昂贵异常。以省币为标准的宁夏各级公务人员，以及一般必须购买日用品来生活的民众，无不叫苦连天。

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对此种畸形的币制状况，非常欢迎。他们用“水涨船高”的原则处置了他们的商业。同时以庞大之资力，来作纸币市价之投机。如果平时法币一元值省币一元五角，他们用大量的法币投到市场，收买省币，则省币对法币的价格可以高涨到一元二或一元三，这时他们突然以大量的省币，购买法币。同样的原理，亦可以相反的应用。一转手间，他们大发其财。而小商人小市民就在他们金融魔力之下，沉入于日即破产之深渊。

宁夏人口之中，除回教人以外，其不抽鸦片者，实比较占最少



部分。妇女之有鸦片嗜好者，更随地有之。常有有嗜好而受孕之妇女，其胎儿在腹中即中烟毒，脱离母体之婴儿，往往必须用烟气喷面之后，始知啼哭！如此再放任下去，将来一般民众过半皆成骷髅，则一切问题，将至无从说起！

单从经济观点说，九一八以前，西北烟土销东北及平津，故烟价尚高，农民之种烟者，除自吸之外，只要卖去一些鸦片，经济上即可勉强维持。今则平津与东北市场完全为某方独占。山西市场本每年可销售约八九百万两之烟土，但晋绥为一体，绥远年产二三百万两，故已占去约三分之一的市场，武威烟土因品质优良，最为山西所乐用，故目前西北烟土滞销于绥远市场者，尚有五六百万两之多。所以宁夏烟土不但现在很难有市场，将来除非各省大量吸烟，亦不易有希望。农民种烟，已占去上等产粮地面，本身抽烟，身体亦难再作辛苦之经营，烟价又低，收入无几，试问将来如何生活下去！

所以就整个情形观察，宁夏前途，隐忧正多。第就目前局部的状况方面而论，亦有若干之成绩。

强迫识字运动，在宁夏的成绩很好，用强制的警察力量，非每家按时派人上课不可。初行之时，因方法不佳，民众深以为苦，有白发老妪因家中无他人可派，亦须每日到识字班读字之笑话。不过，行之既久，民众对于识字逐渐感受兴趣，每日到识字班之学生，逐渐踊跃。

关系“回教”与“回族”问题，宁夏的态度，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马鸿逵及其大多数之干部，皆为回教徒，但是他们认为中国回教，是一种宗教，不是一个民族，认为和汉人皆是“黄帝子孙”，而信奉的宗教不同而已。和中国人之信仰天主教、基督教，没有什么分别的地方。所以，他们不赞成以“回教”为单

位，在国内去作政治活动。他这种理论，从学术上的见地看，是否可以存在，尚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他的主张，是有一种消除西北汉回成见的用心，我们可以从政治见地上得到了了解。

去年冬季有几批某国人到宁夏去调查，其中有几段经过，非常有趣。他们曾经访问过宁夏建设厅长马晓云先生，问黄河每年运输量和宁夏矿产等情形，马故答以“不知”。某国人责以：“岂有身为建设厅长，而不知其所属境内交通与矿业之理？”马乃答谓：“中国之所以弱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自己向来马虎，如果事事认真起来，恐怕早已不是这个任人宰割的样子了！”此种答复，可谓极尽幽默之能事。

宁夏省府之中，立有岳飞所书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之石碑，字大如拳，闻系由某庙中移出。诗文为：“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阏氏血，旗臬可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笔势飞舞，如蛟龙行空，当为岳武穆之真笔无疑。惟依历史之记载，则岳飞已执兵柄之后，并未曾到贺兰山附近来过，或者岳送张北伐时，系用大字写成原稿，送给张氏。后被人将此原稿刻之宁夏城中，如此始能勉强说通。

## 九、宁夏赴青铜峡

十一日骑马游黄河东岸各地。

宁夏川中湖沼多。一出省垣南门，即可看到非常广阔的湖潭，除长水草，养活些水鸟外，在夏季产生非常利害的蚊虫，对于没有蚊帐阶级的人，成为夜间安眠上一大威胁。如果能通湖水入黄河，则不但上述的蚊害可以免除，而且立刻可以增加许多非常肥沃的土地，闻建设厅正在作此等工作，将来裨益当不在小。

这样好的土地，这样多的空地，我们仍然看不到多少树林，偶有的稀疏林木，也带几分凋零气象。两旁的土地中，一片片的鸦片烟苗，已盖在土上发出青青的颜色，有许多的妇女和小孩，正在土中耘除鸦片地上的杂草。他们当然不会明白：鸦片的毒害；如果这样延长下去，对于中国民族的前途，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只知道让它好好的抽苗，好好的开花，丰丰实实的收些烟土，卖得高高的价钱，拿它完了税，付了捐，还了债，还要多少剩余一点，来对付一家人过日子。他们哪里知道，鸦片市场已经没有希望，长此种烟下去，会弄得大家一齐没有下场！

二十里至王桥元，有小学一所，每月全校经费共有省币八十六元，共有教员三人，学生一百余人，并且已欠经费三月未发！我们看到上课的学生仍非常踊跃，教室已至不能容纳的现象，颇有点令人不解。

又二十里至阳和堡，为一近百家之市镇。汉人之在镇上者，已没有几家，因回人身体强健，能受辛苦，彼此团结，无鸦片嗜好。汉人情形，恰恰相反，故自然无力作生存的竞争。

贺兰山一带的气候，已带大陆性，初夏晴天的正午，空气炎热如蒸，最易中暑，故午前十一时至午后一时之间，不易行路，我们这天就在阳和堡作正午的休息。至过午之后，正要整顿鞍马，准备就道之际，我们看到有一对娇弱无力的青年妓女，在这炎阳直射下面，亦在收拾大车，准备向中卫路上出发。不知道她们是由哪里而来，也不知道她们往哪里而去。不过，假如她们生活有办法，她们决不会作飘流的妓女，同时，如果她们原来寄居的地方，营业不差，勉强可以糊口，她们也不会冒着塞北的火热天气，来作长途的奔劳！她们对于我们这小小马队，不断暗中放送秋波。她们哪里知道，我们也是被中国变乱的环境激动出来飘

流的分子！相逢何必频相顾，“同是天涯沦落人”！记者内心不觉作如此沉吟了。

又二十里至宁朔县，县无城垣，不及东南一中等集镇。宁朔以南，荒地渐少，牛羊马匹散游水湖边，或黄或白或黑，益以湖水之倒影，景色如画图。马到叶升堡，已行八十里，堡为百余家之集镇，回人绝少，烟毒深涂于每个男女之面目间，见之使人对于西北汉人将来能否有力存在，发生重大之疑问！

在叶升堡店中，遇一英籍基督教教士，他与记者谈西北各省情形，无论民族与宗教，皆甚熟悉，道路交通状况，尤了如指掌。假如万一中国与英国开战，我不知他们将作何态度？如万一为英国所用，将会发生如何的影响？！

夜间因朋友之约，移住惠农渠岸之办事处中。此地为临渠之西式小亭，内部陈设，亦多西式，整齐、清洁、高朗、恬静，四望渠光树影，微风洗面，一日所受之闷热，至此一扫而空。设使中国将来人人有如此一间住室，月白风清之夕，大家听听无线电广播的新闻和音乐，不知届时大家的心情，将会如何的快乐！

次日清晨，四时半已经东方放亮。一清早骑马，穿过树林、村落、渠道、小桥，初绿的田野，迎面有清香的微风，头上有拂尘的杨柳，全身清逸，意态飘然。二十里至小坝。渠上所建客舍亦精，规模比惠农渠尤稍大。又二十里至大坝，为唐徕渠之闸口，唐徕渠长三百余里，灌地数十万亩，为宁夏第一大渠。此时田间已开始灌水，有烟癖的农夫，在田间监视水道之际，受阳光之蒸晒，身体疲不能支，往往倒地酣卧田中，任水自溢，状至可怜！

大坝有堡，建于坝西，同治回乱时，毁于兵，今尚未回复旧观。溯唐徕渠上行十里，至青铜峡北口，唐徕渠之拦水坝远伸黄

河中，几占黄河一半之水面，逼水入渠中。船渡过峡后，即可见宁夏兵士新开之峡中马路。过河以后，回视黄河西岸，又是一番风景。

青铜峡为甘宁青三省重要骆驼道之一，每日过往骆驼，多至数百计，峡中渡船简陋，码头设备不周，笨拙之骆驼，过河一次，颇为困难，每年因过渡折断四肢之骆驼，当以百数计，闻宁夏省府有在此建筑铁桥之计划，关系于交通者当不减于兰州黄河铁桥。

## 十、飘羊皮筏到金积

宁夏将来对外交通干路，如果站在对外军事观点上来看，包头至宁夏之路，决无可利用之点。惟有宁兰路，与由青铜峡出固原，经平凉至西安之道，始有其后方连络之作用。尤以宁夏西安一线，为宁夏与内地衔接上最直接之道路。平凉西安间，为西兰公路之干线，可无问题。平凉经固原以至青铜峡南口，多为黄土地，修路甚易，宁夏至青铜峡北口，亦早已通车。最难之工程，为峡口内之工程，因峡为石质，有数处为坚石之绝壁，昔仅凿小径于崖上而过，牵骑难行，下临黄河，上连高山，虽欲绕行，亦无路可绕。故过去常有劫贼，专在此杀人越货，每年死者不知若干人。宁夏现以兵工开此峡路，以炸药强自半崖中炸一条汽车路。记者至时，已完成艰难工程之半，如无变故，今年秋间当可畅行汽车。

夜间住峡中羊圈内，因峡中无房屋，工作士兵住帐幕，余即平日宰羊之羊圈一所，内亦有土房数间，低湿暗浊，屋内秽气逼人，幸工程处之柴桂勋先生本人住此，已经多方修理，否则更难

驻足。兵工以外之石工等，则麇集潮湿之土屋地上，全有鸦片嗜好，穷病污乱，他们的生活，直可谓已深沉在地狱之中！

告别了青铜峡的羊圈，十三日我们从峡里坐小羊皮筏顺流而下。五六尺长方这样小面积的羊皮筏，和一百二十个的牛皮的大筏子，滋味全然不同。我们的小羊皮筏轻而且快，可没有搁浅的危险，只是不能搭帐幕，正午时候，阳光直射，无法躲避。

在这羊皮筏上，我们想起了宋朝和西夏的战争，为什么只能从左翼兰州、青海一带进攻，而不从现在的金积、灵武直接攻过黄河的原因来。这原因全在渡河问题上面。黄河在冬季结冰以后，可以自由通过，但是生长于中土的汉兵，要在冬季的时候，和游牧民族的西夏打仗，这是气候上拚不过的。西北上宜于南人作战的季节，是夏秋雨季，但是此时黄河水势浩荡，欲渡为难。记得宋朝夏竦曾答复过皇帝关于渡河的事情，他以为造船不是一时可以办到，我们如果驻兵河边，保护造船，一方面孤军边外，多则难养，少则不敌，同时夏人不断来攻，船亦难于造成。如果挟皮囊泅渡，则夏人可以“半渡而击之”，将无法对付。似乎当时还不知用皮囊联成皮筏的办法，否则也勉强可用以渡河。

我们本来打算飘皮筏到离金积七八里路的秦坝关，然后登岸骑马入金积县。但是还离目的地不远的时候，北风大作，平静的黄河，立刻变为万顷波涛，蜂巢式的大浪，把小小皮筏包围在无定的波墙之中，不但前进不成，反有倒流的趋势。两个水手挣扎了很长久的时间，才到了秦坝关。

宁夏河东之金积灵武为回民最多的地方，尤以金积为回民最密之区，他们处处表现不一样的精神。金积境内的道路水渠，没有不是井然有序的，农地中阡陌整齐，荒废之地，决难发现。对于农事之耕耘除草，亦能工夫实到，故金积回民一亩地可出鸦片

一百二十两，而黄河西岸之汉人则仅能出七十两，相差几乎一半。秦坝关原有汉人数十家，因散漫不团结，彼此有困难时不相救援，故日渐穷困，今已无有几人。

金积附近之烟苗最多，回民之家庭全体在田中工作，他们的妇女喜欢穿大团花红色衣裤，头戴面罩，远视之，颇似新疆缠头女子，仍保持土耳其人之遗风。

稍知清代史者，或在西北生长的人，盖无不知“金积堡”之名。回汉两族在西北杂居，为了生活各别之发展，自然有利害之冲突，而且回人为严格之宗教组织所团结，不通婚，不读汉书（指以前情形，现在只有不通婚），故不能与汉人彼此相互同化，在此“杂而不化”的局面下，基于人类排斥异己之习惯，汉人人口众多，难免不歧视回民，而回民性格强悍，加以教主们（阿訇）利用其宗教之迷信支配力，假托天经（即可兰经），从中煽动，遇有机会，即起暴乱，使汉回互相仇杀。同治之乱，亦不脱此根本法则之作用。此次变乱之起，发源陕西，延及甘肃。金积堡之马化隆，本其在西北各地回民中宗教上的信仰，于是号令各处回民，联络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处回商，打听军情，调动西宁、河州、临洮、靖远等处回民武装，势倾一时。左宗棠亲率大军，驻节平凉，数攻金积，皆不得要领。后来左之勇将刘崧山由山西进兵陕北，经绥德、榆林、三边、监池而至金积，局势始有转机。刘崧山旋战死于金积攻城之役。城破后，回民之遭屠戮者不可胜计。盖过去西北汉回循环报复之心理，已由长久之历史所养成，变乱一起，回军得势地方，汉人难幸免，而汉军战胜之后，回民亦难望安全。

金积攻破之后，对于安置回民问题，左宗棠当时已深知回民强悍可畏，本来打算移他们住在平凉的，后来他奏报皇帝说：

“平凉系入甘肃大道，居关（陕西）陇（甘肃）之中，北达宁夏，南通秦（天水）凤（凤翔），东连泾、原、邠、宁，西趋金城（兰州）湟中（西宁），形最重要，不宜多居异种之人。”所以把大半的乱后回民，都安置在平凉南化平川一带，至今化平县所属仍几全为回民。不过，左宗棠自己也没有想想，满洲人对他，是不是也看为“异种之人”！

## 十一、灵武城中忆当年

现在的金积城，就是金积堡旧址。马化隆的西边一个府邸，改作纪念刘崧山的刘公祠。马化隆的孙子马进西，至今仍然是金积回教一派中的教主，马进西所主持的礼拜寺，在金积北数里的板桥地方，记者拜访他时，他的精神仍非常矍铄，年纪已经六十九岁了，还象五十左右的人，他属下的回民对他仍有不可揣摩的神秘信仰。

金积西北二十里为吴忠堡，乡村间充满一种殷实气象，树林村落皆甚稠密。现为宁夏全省首富之区。吴忠堡虽属一小小集镇，但其商业之盛，甲于全省，回人刻苦善经商，故此间经济大权，仍操在回人手中。从前此地回民受旧式教主之宣传，不读汉书，恐被同化，于是在日常生活之来往上，诸多吃亏之处，近年来回民青年之读汉书者亦渐多，回汉间感情，亦非常融洽，惟中年以上之乡间回民，对汉文尚多一知半解处。记者在金积中见一回回饭馆，门外挂一“机器饭馆”的木牌，单看文字表面，至少他是用机器造饭。而其实，则只有一架切面机器。他这个饭馆，是专卖机器切成的面条！

从吴忠堡东北行四十里，即为灵武城，唐代中兴的皇帝唐肃



宗即在这里即位，由此再进关中，重行恢复了唐朝天下。他即位时所居的宫殿，相传还遗留着一片古墙，至今视之，已无多少特异。灵武城内街市，寂寞如乡村，东门外数里，即紧接沙山，寸草不生，与山下之平畴沃野，大易其风光。

有一种的历史记载，谓征服中亚回师以后的成吉思汗，死于灵武。日本学者有谓其死于甘肃南部清水县之西。记者对其死地之确在何处，不感兴趣，惟当其死时，吩咐他的儿子征服金国应采取战略，确令人惊服他那第一流的军事天才！

那时金国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宋朝立都临安（杭州），成吉思汗早已经取了金国北边的都城中都（今北平），现在他又征服了全部蒙古、新疆、中央亚细亚、俄罗斯东南部，回师灭了西夏，屯兵于六盘山渭水上游一带，他正打算大举灭金，乃不幸得疾不起。临死前，他把他胸中战略，告诉他的继承者说：“金之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连”字恐有误——记者），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之汉中（“之汉中”三字为记者补充），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邓唐（二地名，在河南省西南——记者），直捣大梁（指开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他死以后，承继蒙古大统的是他第三子窝阔台，窝阔台就遵照他父亲的指示，自率大军趋潼关，而命他的四弟拖雷，从凤翔经大散关以入汉中，东北出河南以击汴梁，窝阔台更由潼关两路夹攻。称雄数世的金国，遂由此而灭亡于成吉思汗预定的战略之中。

灵武在清代还出的一个胆大包身的人物，为本地生色不少。清代中叶以后，受西洋物质文明刺激，力以更新。那时两湖总督张之洞，就是努力革新的中坚人物之一。他在朝内朝外都红极一

时，今天主张这个，明日变变那个。灵武人有个叫张煦的，时适作湖南巡抚，他看不惯张之洞的举动，不管他的地位权势如何让人害怕，张煦给了他一封毫不客气的信说：“公自命为国家理学名臣，才大望重，当为海内所钦仰，鄙人敢不敬服。然而好大喜功，惑于浸润，往往言不顾行，既行复悔，若再加以涵养，庶为完人。”末后再教训他一顿说：“若恃才傲物，以势凌人，人纵甘而受之，是岂海内君子所望于公者欤？弟深愿公为良臣纯臣，不愿公为才臣能臣。”对于官高势显的人写这样的信，胆量确是不小！

唐宋以后，灵武皆为边防军事重地。要内地的农民为皇帝“守四方”，保住他们一家坐天下，无论民智如何不开，这种明显的利害关头，谁也知道不是值当的差事。于是鼓励一种升官发财的思想，用所谓“封侯”“赐爵”这一套东西来迷惑人心，其实一般当兵的要想封侯拜将，简直比买航空奖券还没有希望，那个苦痛，才叫做“纸不胜书”。我们看看明代卫边兵士的苦况，就可以推想各代情形：“当人卫之届期也，各军贫无他资，必须讨数月月粮，方可办衣装备途费，而在镇家口，已夺数月之食矣，啼饥号寒，艰苦万状，……其启行也，数日前号泣震地，耳不忍闻。行之日，哀吁割痛，目不堪视，若赴汤火之难，而无复见面之期者。其在道也，严程无休息之会，劳惫多湿寒之侵，负病僵仆，道路相望，逮到边城，尽为鬼形，不过备数而已，何济于用也。及分发地方也，腹无饱食，身无完衣，咸以客兵，故令筑险扛石，相继殒命。苟幸生者，若经终岁，似历旬年，……逮回营也，舆尸骈载，见者惨凄，纵有生还，多属濒死。”这样状况下，谁愿为一家之天下努力。所以我们看到灵武城中的大庙特别的多差不多北半城全是庙宇，现虽残破雕零，然而庙门外庄严的铁像

(如秦桧夫妇的裸体跪像，大狮像等)，以及“仁至”“义尽”这些森严的门额，都是当时守边防官吏于无办法中鼓励士卒和恐吓士卒的手段。

## 十二、河工与屯垦

出灵武北门，有几里的小沙窝，刚刚过午的阳光，蒸起了浓厚的闷人热气，马行其中，亦困顿无力。由此向西北行三十里，所过皆为肥沃的荒地，原有的阡陌痕迹，与村落废址，至今仍历历明现于大道两侧荒野之间。现存村舍，若晨星之寥落。本来所谓“塞北江南”，“鱼米之乡”之宁夏，因变乱与征敛的结果，人民逃散，若干地方已渐即荒芜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又安知今日尚有此同调？

过黄河即宁朔县，黄河河面过宽，此时多深仅数尺，最易搁浅。现在河水主流向西冲移，距宁朔县政府已经不远，如不想法挡水，今年洪水过后，恐县府及许多村落皆将不保。因宁夏境内黄河，在黑山峡青铜峡及石嘴山三处石峡区域，河床固定。但在卫宁平原与夏、朔、平、金、灵平原之中，河水穿纯粹之沙土地而过，沙土质松而软，无束缚水流之力，水之所向，坍塌随之，而背水对岸，则淤积成为新土。水流任恣冲刷，如今年冲东岸，往往一年之内冲去数十里沃野，而西岸则新地积成。故往往半亩之家，顿成拥有广大面积之地主。经过相当时间，东岸如有硬地，阻挡水势，水又改向西冲，只须一季洪水，有若干田连阡陌之巨室，一旦变为“穷无立锥”之赤贫。故宁夏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俗谚，意思是三十年前住在河东的家，三十年后，他那原位置已经是黄河之西了。所以宁夏近来的“河工”

很紧张，而且以宁朔县的工程为最大。其作法系以石块、泥土、谷草三种混合，筑堤、修坝，顺水势而迫之向中流。完全用中国传统旧法，收效颇著。惟工程巨大，征发民夫以千数，工程费亦以十万计，此种工程对于宁夏财政当为奇重之负担。

宁夏近年新开凿了一条“云亭渠”，亦为兵工政策的产品，渠长百余里。全国经济委员会原来计划开渠经费二十万元，经过士兵劳动者集团努力之结果，只用去十二万元，还多余八万元，可以作其他事业经费。

宁朔到云亭渠，如果走小路，要经过王台堡，这里有一座奇怪的树林，树上专门停留一种名“雕”的奇鸟。雕形如鹤，体之大小亦与鹤相仿佛。惟雕嘴有具特别形状者，其嘴细而长，在尖端突作扁盘形。羽色有黑、灰、白各种，而以白色为最美丽。其纯白雕，羽带浸色，名贵无伦。土人常以雕羽作扇，白雕扇之上等者，价值数十元。最不解的是，这近千数的雕，永远只住在这一个树林上，在旁的地方，雕见人即飞避，而在此林中，人行其下，雕初无远逸之象。记者惑于雕之美丽，不顾土人“神鸟”之迷信，下马发枪射之，虽伤未落，再发未中，始悻悻而去。

马行云亭渠上，东面一片肥美荒草地，黄河隔草地与渠平流，黄河东岸为沙漠性沙梁。渠之西面仍为无数垦后再荒之田地，紧接为树林村落稠密之区，由树梢上平视西面天空，雾蒙蒙的贺兰山，高接云表，似为我们表示它有只手撑天的力量。

云亭渠是开成了，但是我们走了好半天，仍然看不到有一块开辟的荒地，渠水滔滔的北流，只有牧羊的儿童才是这孤零渠水经常的伴侣。它满怀灌溉几十万田亩的志愿，而且充分的具备了实现它这一志愿的力量，但是社会的环境只让原有的农村日渐崩溃，农民日渐逃亡，并不能发生扩张开辟农地的需要，它主观上

虽然要想大有作为，然而在这莽莽的荒滩上，它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在王台堡打听，从那里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云亭渠的屯垦区，是三十里，所以我们以为用不着预备粮食，到了那地方再吃不迟。谁知走来走去，永远是一无所有的草滩，人饿了，马乏了，终于空肚子受不了马上的颠簸，记者只好下马步行了。后来在一家破店里，买到了馒头麻花之类，这时也无所谓卫生不卫生，放开食管，拚命往里运送。只觉得样样甘美，件件芬香，平时不大愿吃的粗食，至此变为无上的佳肴。可知苦乐原为相对的存在，并无绝对的分野，善于找“苦”吃的人，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

“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饭再上路，人也轻了，马也快了，我们要拜访的屯垦区，也不久就到了。此地土著人家告诉我们，上面所说的三十里，足足有六七十里啊！

屯垦区在云亭渠北段，所经营之土地，不及全渠所有荒地百分之一。如果把宁夏全省的荒地一齐开垦出来，在现有的人口八十万之外，再添上一百六十万，亦非困难之事。因为宁夏地利太好，荒地太多，而水利又太方便，恐为不易得的理想屯垦区域。

如果从对抗绥远方面伸入的外敌压迫起见，宁夏是甘青两省的门槛，宁夏一破，则甘青难安。而巩固宁夏，则记者以为一方面急宜开通青铜峡一路，以通后方，同时有计划的把本省军队尽量从事于屯垦，自食其力。另外将外省多余之军队，编二三十万屯垦军，移到宁夏来。一以减轻内地负担，二以充实西北前线。如此则国库无长期之累，冗军有安插之地，粮食增加，前线有备，当为各方面有利之计算。但是，此种计划之实行，以国家内在之军政各项有了光明确切之前途为先决，否则，枝节做去，亦必无完满之结果。

### 十三、踏破了贺兰山缺

此间屯垦区之设计者为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之邵惠群先生，他本着“土地公有”之理想，采“省营农场”之形式，而以军队为屯垦之先锋，以此计划建议于现任宁夏民政厅长兼十五路军参谋长李翰园，李转其意于马鸿逵。马氏深以为然，即以云亭渠之荒地，由邵计划进行。邵即根据其理想，本大农制战胜小农制，集体经营强于个别经营之原则，筹立村庄，开辟道路，分划地亩。欲在此无人之荒地上，不经革命困难，建立最进步的农业制度。后几经变故，他的理想未能实行。现在重新规定，土地以百亩为单位，分配予十五路军中上级军官，作为私产，于是军队屯垦之意义，遂因而无大可称述。现在虽仍有一团士兵在加紧工作中，一般精神尚好，然而其前途是否有辉煌的希望，那就恐怕已成定论了。

监督屯垦的是秦寿亭先生，他亦终日与邵先生在田中工作，两人面目强健如农夫。夜间我们就留宿在荒地上一座古庙中，他们弄些鸡肉和羊肉，大家在古庙中饱餐了一顿。饭后，我们一齐到荒地上，把古今中外畅论起来，秦先生是出身士兵和农夫的人，他讲他的心理最有价值。他说，他们的头脑最怕人讲“主义”，谈“政策”，最能激动他们的，是关于他们生活上衣食住行的困难，和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

因为疲劳与内心的畅快，十五日夜间，我们享受了一夜甜蜜的酣睡。

由云亭渠回宁夏省垣，还不要半日马程。十七日清晨，我们又从宁夏向贺兰山西面的阿拉善蒙古出发了。

阿拉善蒙古亲王为元朝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尔萨的后裔，经明朝至清朝之康熙乾隆间，因随军征伐边地有功，封贝勒，郡王，后封亲王，现在亲王为“达理札雅”。宁夏改省以后，阿拉善与其西之额济纳二旗皆属宁夏省境，但事实上这里有严重的民族问题，不是单纯的省区问题，所以形式上虽然省辖两旗，实际上仍一点也管不着。阿拉善旗之地位，不同于绥远、察哈尔之普通旗，普通旗之上有盟，如普通县之上有省一样。阿拉善为特别旗，以前直属中央，如今之中央直辖市或直辖市一样，此旗之上，再没有盟的存在。

宁夏西行，过唐徕渠，十里至满城，清时为满洲人特建的兵营，后为宁朔县县城，宁朔县移去以后，仅为普通兵营。满城再过，即至贺兰山麓沙漠中，汽车因机器旧老，故通过沙漠，甚为费力。

记者在某处，见有人送一位从广东北伐，一直到了西北来的军人，这样几句东西：

“十年前珠江上孤零的战友，

到今朝已竟饮马贺兰山边。

回首东北望，

敌氛又展，

问将军：

何日再率兄弟们放棹松花江面？”

诗之技巧如何，记者门外汉不敢论列，惟觉其意思与时事甚切，自己到了贺兰山边，不禁引起无限的感怀。

贺兰山下，现尚有无数之土丘，传为西夏建国时历代帝王之陵寝。车行甚速，未能趋前详视。不过，在古今兴亡陈迹之间，容易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性情柔弱者，更易发生消极的思想，所

谓：“强兵战胜今何在？赢得虚名人史编”这一类的想法，最易发生于为功名而战争的军人心中。

阿拉善的首城是定远营，定远营与宁夏（今银川——编者）之间，有两条交通的道路，一是人马行之小路，一是车路，前者直越贺兰山，路险而陡，约程一百六十里，后者绕行南面三关口之山沟，较平顺易行，多六十里，一般商人以走大路者为多。

车过沙漠，进入丰美的草原中。路向西南行，数百骆驼散牧草原中，闻汽车行动声，皆昂首惊视，状如数百龙首之朝拱，使善画者睹此，当可作成奇丽之画图。

四十里至平羌驿，为盗匪随时出没之区，通常行人皆有戒心，驿仅土屋数家，已紧接山麓，居民貌多清秀，妇女尤然，在此荒塞之区，出清秀之人，颇出意外。

再发平羌驿，车即入贺兰山中，蜿蜒前进，大体遵山中沟道而行，路多待修理。旋至长城处，为头关。长城南北纵分贺兰山而过，状至伟观，关门已不见。再进有险峻石峡处，为二关，亦无关门，惟山上之土墩尚在，此处形势险要，前西北军门致中部曾与阿拉善蒙古人大战于此，蒙人擅长射击，仅二三十人把守关口，而西北军之死伤于此间者以数百计。二关再进为“三关口”，已离宁夏九十里。

三关口为贺兰山之背脊，亦为阿拉善与宁夏之分界点。过此即下山人阿拉善蒙古境。岳飞《满江红》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之志，可惜他赍志以殁，未能率军直捣贺兰。然而，今日之曾“踏破贺兰山缺”者，已早不仅记者一人了。

三关口有蒙古兵把守，他们缺乏训练与组织，完全为王爷当差，并无薪饷的规定，故无近代军队之整齐团体而有力，且有染鸦片嗜好者。



车下蒙古草地中，沙石相杂的无水地上，普遍的生着杂草，西面远处，已可以看到浩瀚无涯的沙窝，大道两旁再难有农地发现。路向西北行，二十里至长流水，有三数家屋。又四十里至姚坝，人家约倍之。到离定远营不远处，水泉渐多，有泉处即有人家，泉水大的，人家多些。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到达了渴念甚久的定远营。

## 十四、满洲人的治蒙政策

出人意料之外，定远营这样的地方，外观上一点也不象蒙古。街市和城池虽有规模大小之不同，而其构造则与内地相去无几，街上的汉人远比蒙古人多，街上做蒙古包的人虽不少，但是我们决不能在街市附近视线以内，找到一个蒙古包。达理札雅给予记者之印象，直等于在北平会到了二十年的老北京。他的王府是北京式的，房内设备，最低限度也是北京的旧样子，而西洋式的沙发椅子、煤气灯、加利克香烟，抽烟自动发火机……一切一切，和北平一般高等生活情形不会有什么差别，他满口非常熟练的道地北平话，和一种安详文雅的动作，北平习惯用的仲春时节中式服装，光光的头发，聪明大方的面庞，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一一点蒙古味道。达王左右之生活，亦趋向“平化”，他们不再牢守着成吉思汗以来的生活方式，而猛烈的向进步文化转变。“前进的文化必然领导后进的文化”，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有力的例证。

蒙古人是以勇悍的特质，建立了横跨欧亚二洲的大帝国，明代对于蒙古人，只有修万里长城把他们隔开，并没有平等抗战的力量。真正有毒辣手段的，要算满洲人，他们用了双重政策，

来制服蒙古人：第一，是收买少数英明的领袖；第二，是根本摧毁这个民族的人口。前者之表现为公王制度之确立，后者之表现为喇嘛教之提倡。少数聪明能干的分子，封他们为“王”为“公”，又或用皇帝宗室中的美女下嫁，金银玉帛之赏赐，惟裕惟充，只要这班有力分子能制着蒙古人不反，他们子子孙孙可以世袭的当王公，永远过舒服日子。自己本身作了王公的分子，当然不愿造反了，他们的子子孙孙因自小就过上安逸生活，不容易产生杰出的人才。而且日子过得舒服，有权的王公十九都不愿意造反。而一般平民，要想造反，智识和权力两缺，反也反不起来。这样还嫌不精密，满清皇帝在王公衙门里放了一个四品讲师，官虽不大，但是他可以“单独上奏”，王公要上奏皇帝时，他们的奏折必定要讲师盖印才算有效，所以王公们要想有何举动，皇帝早就知道，而有所准备了。

蒙古人始终是强悍的。笼络了王公，满洲人觉得还不保险，于是极力提倡黄教（喇嘛教），推崇喇嘛，国库拨出大量的经费，建造规模宏大的寺院，以作喇嘛为最尊贵之阶级。王公只能管辖平民，管不了喇嘛，平民作了喇嘛，王公就不能再问。凡是当喇嘛的，除了念经是他们的责任外，其余什么事都不管，衣食住皆要平民供给，而且所用生活资料，都是要上等的东西。此种丝毫不劳动而坐享高等生活的阶级之确立，当然可以让许多优秀分子都投了进来。满洲人在事实上还造成一种定章，每家最多只能有一个儿子是俗人，其余的都得当喇嘛。随着就来一个规定，喇嘛不得结婚。试问过半的男子作了喇嘛，当然发生女子过剩的现象，女子多于在俗男子数倍，事实上性之需要所趋，在俗男子当感供不应求，而成不固定的多妻状态，这一方面戕害了在俗男子的身体。在喇嘛方面，不结婚虽有明定，基于性本能之司样理

由，势必与此“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过剩女子发生关系，由此杂乱无章之性关系，故弄成特别普遍之花柳病，毒害蒙古民族之健康。这个政策达到了下列几个目的：一，人口日少，二，健康日坏，三，经济生产能力日微，四，聪明才智之士日鲜，因为饱食终日，只知念经之喇嘛，决难念出人才也。

记者以为喇嘛政策之狠毒，无异鼓励人家犯手淫，这个比方虽欠文雅，而内容却很相当。等于这样说：凡能犯手淫一万次者，官封万户侯！如果大家这样去求官、求富贵、求舒服，等你目的达到之后，你至少已不复有人形，而统治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满洲人对蒙古人的两重政策，二三百年来，使蒙古人大大的受到了致命的创伤！

现在蒙古人比过去明白多了，达理札雅已命令他属下的儿子，非得他许可不得当喇嘛，这是限制了喇嘛的来源。其次，他把蒙古兵之充卫队者，也穿上制服，受新式军事训练，另外以他的叔叔塔旺策林作校长，办了一所小学。蒙汉子弟并收，蒙汉文并授，校内设备，新式而整齐。自校舍，校内器具，学生服装，校内清洁整齐数点言之，不下于平津第一等小学。

达王喜骑马打枪和照像，他对三种技巧皆甚娴熟。关于政治问题，我们开诚布公的讨论很久，让我们感到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到现在已经不是掩耳盗铃可以解决的问题。第一，我们不能再认“民族问题”为“地方问题”；第二，我们对于民族问题要赶紧提出解决方案，作为大家共同努力目标。如果一味敷衍，苟延时日，恐在此外力压迫下，不出数年，将至无法收拾。（关于宁夏与阿拉善最近为磴口事件之争详后）

## 十五、平 罗 南 北

定远营之城池，建于雍正时代，今尚完整。此间有著名之“倒流水”一处，水从山下，倒流至山上来，群以为奇迹。记者不信此反乎物理之事实，乃与同伴亲往考究，初视之，水果自城外山下经山上穿墙入城中，不胜骇异。经详细之观察，始知为吾人目力之错觉。因山脚地势，自水源处以近四十度之倾斜，顺水流方向而下，山坡间所引渠道，其倾斜度甚小。故如视山下地势为平面，则渠道几以四十度而上行，纵泛认地下为二十度左右之斜度，则水流亦显有二十度左右之上倾。经此鉴定后，同伴戏谓记者：“倒流水被你打倒了！”

二十日由定远营返宁夏（今银川——编者）。我们最后和宁夏省垣分别，是二十二日的清晨。

宁夏以北，凡平罗石嘴子等地，皆为孙殿英攻宁时战场，故战痕特多。省垣北门外之赫连宝塔，为赫连勃兴时代之建筑，高数十丈，状至雄伟。

四十里至李刚堡，道路修理甚好。惟路旁良田，十之四五为荒地，孙殿英之役，地方所受影响不小。李刚堡之市面颇为热闹，离堡北行又是荒地。不过，此地所谓荒地，不是云亭渠那样全然未曾开垦的荒地，而是已垦再荒者。途中天气突热，行人多赤膊，口渴不能支，同伴下马欲寻骆驼队分水而饮，旋见路前远处有塔，知有人家，乃再策马前进。二十里至姚伏堡，同伴皆下马痛饮，渴极而后饮，其水味之香，盖为不易轻遇者。

傍晚赶至平罗，宿南门外破店中。夜间同伴为臭虫咬得不能安眠，终于逃出露天过夜，而记者则“咬吮让他咬吮，好觉我自

睡之”。这种传统的“大国民风度”，我以为是对抗边僻地方旅店的无办法的办法。

平罗城四周房屋，被炮火打得完者无几。次日继发平罗，拂晓登程，山光野色，沁人脾胃。贺兰山的景色，尤变化万状，目不胜收。这时贺兰山下，渐渐浮起一层深银灰色的薄雾，平伸数十里，有如长虹，朝曦渐高，雾亦上移，一会，完全消逝。这是沙漠反光所投射出来景象，因为贺兰山东麓，有一东西宽约二十里之沙漠存乎其间也。

半午到黄渠桥，计行三十里。天忽大风雨，气候突寒，非棉皮衣不暖，只隔一日，寒暑相差如此。明冯清有西夏漫兴一首，即记此特殊天气者：“风阵阵，雨潺潺，五月犹如十月寒，塞上从来偏节令，倦游南客忆乡关。”

黄渠桥为宁夏北部第一大镇，街市宽敞，商业繁盛，镇上及四乡过半为回民，他们住的家屋和种的田地，都是整整齐齐，灌水与除草总是做到八九分的人力。所以表现一种蓬蓬勃勃的气象。汉人多有鸦片嗜好，自然住居农事皆萎靡不振。不过黄渠桥上，有少数汉人，因与回人彼此自然竞争的关系，倒非常振作。

这里的回民，他们自己已经发生了读汉书的需要，自动送子弟上小学。礼拜寺的教主，最初阻挡这种情形，要令小孩们读可兰经。他们家长答复教主说：“我们子弟读了汉书，立刻有用处，可以帮助家计，但是读了经书又有什么用呢？”然而教主们仍然有坚持读经的。所以这里的回民学童，大半是小学开学以后读汉书，放寒暑假时，读经书。如果以一年全部时间来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进小学，四分之一的的时间念经文。

风雨太大，时间虽然很早，我们只好不再前进。

经过一夜风雨，晨间的气候变为冬寒，记者所穿棉衣已感难

于与寒风抗战。贺兰山似乎因为与风雨苦战，经一夜的劳心焦思，把自己的头顶完全变白了。明人谓：“寂寞边城道，春深不见花，山头堆白雪，风里卷黄沙。”诚有所见而云然。

驼夫们在暴热的那天告诉我们：“紧接着要刮北风，天要冷了。”我们直到被这突变的寒冷袭击以后，才奇怪他们预断的灵验。自然这是他们多年经验的结果。照自然地理来研究，一个地方的热度高涨之后，空气因热而上腾，于是形成空气稀薄，气压低减之现象。此时四周之空气，其温度低，密度大，气压高者，自然向此空隙中流入，而成为风。贺兰山紧接内外蒙古及西伯利亚寒带地方，所以宁夏之气候暴热，则其北面之冷空气，必来补充，而风雪因与之以俱来。

黄渠桥至石嘴子计程六十里。地多荒芜，家屋亦稀，为盗匪最易活动之区，我们在午前十时，即到了石嘴子。这时恐怕许多朋友还在甜蜜的梦中，我们却已经走了六十里路了。

## 十六、石 嘴 山 外

在石嘴子南约十里的地方，长城从贺兰山上如黄龙饮水式的爬了下来。贺兰山与黄河之间的平地上，已没有长城的遗迹，黄河东面伊克昭盟的南边，又有残断的长城和西面遥遥相对。贺兰山的本身到了石嘴子附近，也改变了它原有的奇伟姿态，而降落为低矮的平凡。

石嘴子因为已经在旧日长城之外，所以叫做口外。这里因为没有西北面高山的屏障，沙漠大风直扫而来，所以此间街市和四周的景物，已夹带有几分沙漠的性质，荒凉袭人。

清时，石嘴子为蒙古人与内地交易指定的口岸之一，而且为

宁夏、包头水陆交通必经之道，故在昔商业甚为发达。惟清时对蒙贸易，制有定章，不许内地将硝磺、钢铁、军器、白米、白面、豌豆卖给蒙古人。硝磺钢铁军器之禁止，是防止蒙古人军火的扩充，豌豆的禁止，是防止蒙古人储蓄马料，以为长途征战之用。所以清代以优厚的生活腐化王公，似乎是好意，而其实对蒙古人之打算，却无微不至！

石嘴子再顺黄河北上，为绥宁陆路交通大道，经磴口以至绥远之临河、五原、包头，即是所谓后套区域。但中途沙漠太大，汽车不能行驶。欲通汽车，在不结冰期内，可由石嘴子过黄河，遵黄河东岸下驶，至磴口再过河。另外一路亦由石嘴子过河，斜穿伊克昭盟西北角，以至临河，两路稍加修理，通车甚易。惟两过黄河，总有若干麻烦。

近半年来，某国人在这里测量调查，费去很多时间。因此地为宁夏之北部入口，贺兰山势至此与河东之伊克昭盟高地，遥相锁对，黄河直贯其中，成为天然的奇险。欲固宁夏，必守石嘴子，乃为军事的定论，故致劳他人之费心。

因为这里是过道，所以此地主要的机关，是各种各样的税卡，此外最占重要位置的是客店，再其次最多的是妓女。这些分子都不是自己生产的群众，他们全靠来往客商之惠顾来维持，所以最令石嘴子的市民关心的事情，再没有比关于客商来往的消息了。午后三四时左右，只要骆驼的铜铃，或者大车的轮子，或者小小马队的铁蹄，发出声音，局卡里的收税员，旅店主人，穿红挂绿的妓女，都到各人的门外，预备欢迎他们各自的主顾。

石嘴子之北，又入蒙古草地了。青青的骆驼刺，把这块蒙古草地织成了无边的绿茵，穿过草地中的道路，就好似绿茵上的花条。比较有高地可据的地方，现在还留着孙殿英与宁夏作战时所

作的工事，成群的牧马在草地上自由来去，间或有黄灰色的兽类隐约绿草间，那就是聪明的黄羊。

没有人管的蒙古马群，我初以为最易被人偷盗，后来打听，这才是不必要的杞忧。每一个马群有一个母马统率，和人类还在母系社会时一样，母马随时监视着她这一群马，不许有一个任意离群太远，否则她用口咬蹄踢等手段强迫使之回群。如果发现生人，母马发出嘶声，警告全体，大家皆昂首注意准备意外。如果已明白了生人有逮捕它们的企图，母马立刻于狂叫之后，率众急奔而逃，绝对不易为人暗算。

行约五十里，至二子店，土人则称四十里，店仅土院一座，土屋三间，无门无窗，乃至桌椅等任何家具，店主人之炕上亦空空如也，席毡等亦无之。然而石嘴子以北半日程中只有此一家烟火，不能不认为难能可贵。

二子店之后，为不断连续之沙漠，马行甚苦，孙殿英败回时，遗弃伤病之骆驼驴马等甚多，今已早成累累之白骨，散置道旁沙漠间，增人凄凉之感。

既而沙风又作，目不能张，强欲张目，亦“但见黄沙不见人”。在此人烟断绝的地区中，偶尔发现一二人影，反易促人发生戒备之心，盖匿迹草中之健客，难保其非当年李逵之同志。石嘴子磴口间之过客，非有特殊戒备，即须结大帮旅客，始易通过。如记者之人势单孤，必有相当武力，始能安全，我们后来在一段沙河道上，发现前面小土岗上有两人迎风而立，身旁显出长条黑色的东西，从者与记者皆为之愕然。记者乃命从者持枪实弹直趋之，归来报告，则为全国经济委员会黄河水道测量人员，正在冒风沙作测量工作。此种实际作艰难创作工作之人士，使人发生衷心的敬仰。



在风沙中行五十里至河拐子，其为“只此一家，并无分店”也，同于二子店。仅土屋多几间，而土屋有一二间有木门而已。粮食用具，全赖自己携带，不然即将无所措手。

## 十七、磴口和宁阿之争

二十六日东方仅有微白，我们已经登程了。顺着黄河边上走，所过尽是肥美的地方，地上也有阡陌痕迹，现在水利不修，社会不定，完全又成荒地了。十里左右，路旁有蒙古人羊圈，乃下马入其简单之蒙古包中饮茶，我看他们高高鼻子，略带灰色的眼睛，不和普通蒙古人一样，知道他们正是“回回蒙古”或“蒙古回回”这一种特别的民族。他们现在住蒙古包，说蒙古话，穿蒙古服装，也过蒙古游牧生活，政治上属于阿拉善旗管辖。但是他们不信喇嘛教，而信回教，从很远的地方请来回教教主为他们念经。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祖先是哈密人，迁移到这面来的。故大致为新疆东土耳其人（缠回）之一支。后来血统与生活为蒙古人所同化，而宗教则尚保存其旧日之传统，他们现有三百余家，散处在磴口西北一带。

河拐子之后，仅有一二十里之好路，其余完全为无边的黄色大沙窝。黄河主流现正向西冲刷，将河边仅有的泥沙地，完全冲去。河水已紧接沙窝，如不走沙窝，即必至无路可走，沙窝中走马，辛劳万状，直使人不忍久骑。

路旁随处有野鸡，“哥哥”之叫声，颇易动人情怀。在此沙窝草滩相间之道上，我们常常看到一种特殊的旅客，他们大半是运粮小贩，从绥远西部运贱价的粮食到宁夏转卖。他们总是结成二三十人的大帮，每个人有一头以上的毛驴，所以毛驴合起来也

有三四十头。他们因经济的困难，不能住店，亦无力买草饲养他们的毛驴。因此他们总是随身带好自吃的干粮，走累了，大家选个草场，放驴吃草，他们自己，就倒在草中睡将起来。睡醒了，吃吃干粮，赶起牲口又走。如是，走累了睡，睡好了走，并无一定的站口，更无所谓昼夜。此种办法，既经济又卫生，更可以表示西北人坚苦卓绝的生存斗争能力！

中途有土屋两家，可以打尖。午后所过道路无沙窝，但是沙风又起，迎面扫来，一刻不休息的，把我们连接到磴口。河拐子到磴口，据说是九十里，而实则有一百二十里而强。

磴口有蒙古衙门，同时又有县政府。为了磴口设县事情，阿拉善旗和宁夏发生了很大的纷争，现虽已暂告一段落，而阿拉善方面则尚不甚满意。然而，平心论之，磴口设县一事各有困难之苦衷，即各有其正当理由。宁夏之设县于磴口，固然难免无税收之目的，然而从国防交通之见地言之，临河与平罗二个县域，相间六七百里，其中无重要市镇，当然不便，故设县为事实所必需。然而自阿拉善蒙古人之立场观察，磴口乃在阿拉善所辖土地中，自不容外省在此设县。故双方不下，乃为势所必然。中央政府方面，曾特派大员从中调解，当时已得双方同意之妥协办法，其后阿旗认为最重要之一条，即：“磴口设治案，暂作悬案，呈报中央于相当时期撤出本旗境外。”等到行政院公布之解决磴口案办法中，将此条取消，使阿旗大感不满。记者以为在此各民族一般知识渐高之今日，我们应痛彻铲除过去传统的民族歧视思想，重新以民族平等的精神，切切实实扶助国内各民族之经济、政治、文化的向上，使各民族的力量充实而坚强，大家彼此信赖，互相团结以捍卫我们大家的国家。始终歧视异民族的办法，缺乏大公无私之精神，决不能应付现代政治的潮流。

黄河到磴口，转向东北流。照目前河水冲刷的情形，巨流已直指磴口后方而来，冲成一大湾曲，如不修堤排水，恐磴口将成河中孤岛。

磴口是个二百家左右的商业地方，四乡全为蒙古人，市上汉回蒙杂处。县政府及各机关和驻军的费用，全由市上居民担负，责任太重，缴纳为难，故已有四五十家居民入了蒙古籍，不愿再任这些负担。

由磴口东北行，沙地渐少，黄河冲积平原上，丰腴可爱。平原之西北，仍为接连河拐子以来之大沙窝。蒙古人皆住蒙古包于大沙窝中，汉人则有租蒙古人地耕种或开旅店者，闻水大时，平原中易被水灾。

是日有蒙古兵送行，按站交班，如藏人之“乌拉”。他们的马生长在沙窝中，故走沙窝特别有办法，我们的征马简直对它们望尘莫及。

行九十里，住宿于“二十里柳子”。店有土屋两间，而客人有二三十人。炕上茕茕草编成的席子，厚约寸许，自然是臭虫繁殖的大本营，我们只好在帐幕中过夜，比较还清凉有味。此地附近，由三圣宫天主堂主持之开渠工作，正在动工。从堂中派出来的经理人员，其气焰之大，不似中国同胞应有之态度。

## 十八、三圣宫天主堂

后套中一大特色，即为天主堂，总堂在三圣宫。临河西境乌拉河至磴口之间，尽为天主堂势力，其有“天主国”之称。此间种地农民，非入天主教不能种地。事实上(非法律上)这一带的居民尽为教徒，教堂为唯一可以指挥民众之机关，神父为最有支配

民众力量的首领。一般农民只知有天主堂，而不知有政府，只知有神父，而不知有官吏。教堂于宗教之外，兼办水利、农业，以至于保安等工作。三圣宫教堂所在地，外围以深壕及高厚之城垣，集居民数百家于中，有城门，有炮楼，俨然正式之“城国”。

原来这里是阿拉善旗的土地，天主堂在七八十年前即来后套传教，势力尚小，庚子八国联军之后，教堂亦曾受相当扰乱。和约缔结之后，此间教堂亦要求赔偿，遂定由阿拉善旗赔损失五万两于教堂。当时阿拉善旗王爷是现在达王之祖父，已交二万两，尚欠三万两，于是遂将三圣宫一带土地作抵，归入教堂手中。经其数十年之经营，遂造成今日之特殊现象。

记者以为宗教之“伟大”，在于“感化”，上帝之所以要宗教之存在，乃在使此等“先知先觉”的，肯“牺牲一切”的宗教领袖们，来劝化“顽顽的众生”。所以如果“顽顽众生”有侵犯宗教之处，当更加努力宣化，使其“觉悟”，教堂当无凭借本国军事政治力量而要求赔偿之理。本来是精神感化的“神圣事业”，这样要求赔偿，岂不成了通常的市俗行为。又在清代的银价说来，一个教堂里的东西，无论如何计算，二万两已经足够赔偿。如果有生命损失的话（当然没有），那正是“为宗教而牺牲”，不必在金钱上找代价。再则到对方无力再赔的时候，应该本“上帝的仁慈”，不再追收，何必要土地来抵押？就传教事业本身来说，教士只能以“宣扬教义于民众”这一任务为止。其他经济、政治、教育的事情，绝对不应该过问。中国政治紊乱，它自己会寻求出路，中国经济落后而破产，它自己会有解决的途径。如果你们觉得在中国有安全的危险，或者有贫困的压迫，那么你们很可以回到你们自己“先进国家”去过日子。不必在我们中国造成些特殊势力，增加我们“自我改造”的困难。

比方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校，表面上很好，令我们感激。但是你看看教的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明白。记者在三圣宫时，看过他们的“国语教本”，是他们教会自己编印的。里面虽然是汉字，但是有两种思想让人看了不懂：第一，它说中国之所以穷，由于实业不发达，实业不发达，由于大家“懒”，即是“不知振作”，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试问天津、上海破了产的工厂，是不是因为我们工人整天在工厂里睡觉弄糟的呢？还是因为关税在外人手里，保护不了自己幼稚的工业，活活的被外国工业品打倒的呢？第二，它说人是造化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那么宇宙是有定的，人生是有定的，总逃不了造化主的定型。象我们这样被人压迫的民族，也是造化主事先定好了的，我们大可以安心被人压迫，被人欺凌，不必起来作什么反乎天意的解放运动！

诚然思想自由，我们不反对，信仰自由，我们也赞成。但是那是对青年以上的人说的，这些乡村儿童，知识本来简单，你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就信什么的，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因此，我们以为目前中国，对于宗教问题，最低限度应如此做法：第一，确实保障成年人信仰之自由，排除一切干涉宗教自由信仰之力量；第二，教会（无论何教）绝对不能在“宣扬教义”一事之外，以教会或教士资格作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第三，限制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上述办法，如与不平等条约抵触，则根本取消不平等条约。上帝的心是公平的，对于取消不平等的条约，他一定能赞成，这一点我们敢于相信！

二十八日住补路脑（扑隆淖），屋内臭虫太多，屋外又无帐幕，我们就到大车里过了一夜。次日发补路脑，旋过乌拉河，即入绥远临河境。

临河境内公路与桥梁工程，皆甚良好。仍荒地太多，人烟稀少，将来一定可以供大规模屯垦之用。行五十里至黄杨木头，民间有烟瘾者异常普遍。为中国前途着想，记者以为：“宁可使财政破产，鸦片绝对不可再行蔓延”！

黄杨木头与临河之间，亦大半为上等良田。中间有一段蒙古水草地，蒙古女人之放牧者，一面放牧，一面缝织衣服。有小沙窝处，间或露出蒙古包，不减塞外风色。

## 十九、临河、五原至包头

到临河即可以感到浓厚的“山西味”，机关里，商店里，客栈里，很少不是说山西腔调的，偶尔有人哼几句，也是“山西帮子”。一切一切，显示出山西同胞，经过数代的辛苦，在塞外开辟了这样的成绩。临河城垣系新筑，临河城中人家惟近东门处较稠密，余则大半为空地，商业繁盛之区在东关外，市场景象已充分带内地风光。

从临河起改乘大车赴五原。大车在不平的路上摇荡前进，铁皮车轮与坚硬的辙道互相撞碰，使人不久即为之昏迷。记者在西北最怕之三事：即为坐大车，睡热炕和盘腿。后二者已有避免之方法，而大车之苦恼，直到快要离开西北时，始得加以亲尝。

大道的西北方，狼山的形象渐渐接近我们的眼帘。大道所经，全为沃土，六十里至天台桥，有蒙古女子冒充汉人为妓女者。似乎经济恐慌已震裂了蒙古人常态的生活，而逼出相当的变态来。

此后常有残破的村落，为过去数年土匪摧残者，今已寂无人烟。北风时作，牧羊者尽衣皮裘，比之宁夏，暖冷相去甚大。三

十日行一百一十里，宿吴家集。

吴家集离五原只七十里，我们仍然微明动身。这时各家的小学生也和我们一样清早出来，走向他们的学校，短短的身体，小小的制服，三三五五的，牵着手，并着肩，活活泼泼的，通过这小小集镇的街市。不但这个市集因他们的早起而活跃，中国困苦艰难的前途，也因为他们这样生气蓬勃，而显得有无限的光明！

这以后的大路，因为水淹未退尽，绕行乱草地中，车身东倾西倒，人坐其上，苦痛如受重刑。四十里至满过苏，打尖，店主人看到我们宁夏带来的萝卜，深为惊讶。她惊讶宁夏天气之热，萝卜已经成长得如此其大了。

从石嘴山出发到现在，我们吃饭都没有筷子，只有临时用树枝折成的东西。满过苏的小店中，筷子又和我们再见，让人发生一种渐即于光明的快感。又三十里至五原城。

五原有新旧两城，一为县府所在，一为商业区域。冯玉祥先生在游俄回国重新整刷国民军之后，有名的五原誓师，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五原有路可以通外蒙，当时苏联接济冯玉祥的械弹，就是从外蒙用汽车运到五原来的。这里不但与国民军有不可分的关系，与中国近三十年军事史上，也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商人总喜欢标榜奇怪或距离遥远地方的物品，来刺激顾客们的好奇心，借此推销他的货物。五原城里有人立着“四川仁丹”的大牌，四川哪里出仁丹？恐怕全四川人没有一个会知道！

五原距包头四百里，这里每天有长途汽车来往，七八个小时可到，我们的旅行，从此方便得多了。只是这里的汽车有些特奇，根据“进步的赶走落后的”这个原则，日新月异的汽车，不断的添到都市来，过时的破旧汽车，自然被赶到内地小都市去，越是交通幼稚的地方，越是汽车老朽的地方，这是不足怪的。令

人奇怪的是：轿式客车的票价，既然比货车收得高了百分之五十，而客车里面的前半段，即坐着不甚颠簸的几个座位，却完全只堆货物，把客人一齐挤在末尾上，这不知哪里来的新章？包五公路大体尚好，有几段新修不平的地方，车尾颠起了来，把客人们的头一齐送到车顶上，接了一个切切实实的重吻！

车由五原东行数十里，道即随大青山南麓行，触目荒地，农牧前途皆尚待努力。二百里至八庙子，休息。因未带粮食，幸而买到白饭两碗，白盐作菜，白水为汤，饿后食之，亦觉可口。庙中驻有蒙古游击骑兵一小队，似为维持治安者。其中过半有鸦片嗜好，成吉思汗的子孙啊，那是万万不能再吸的啊！

大青山南部地方几已完全汉化，纯粹的蒙古风味已不多见。现在山北还是纯蒙古生活的地方，但是汉人在山北之开垦与建造房屋，已经不为蒙古人所许了。

将近包头，村落渐密，人口渐稠，乡村妇女喜着鲜红色衣裤，似为这塞外无极的旷野，铺点几朵红花，别饶风韵。

午后三时，一架有太阳徽号东来的军用飞机，和我们的汽车同时到达包头。（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上海）



